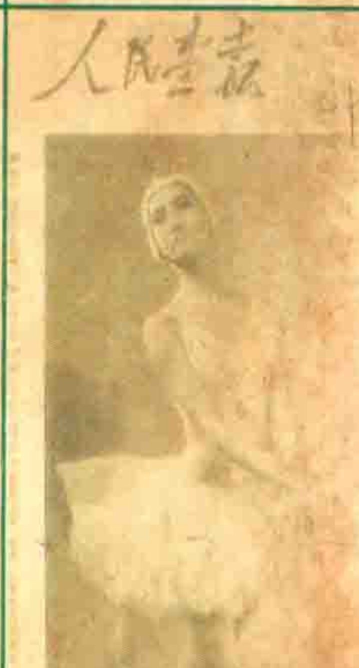
时代的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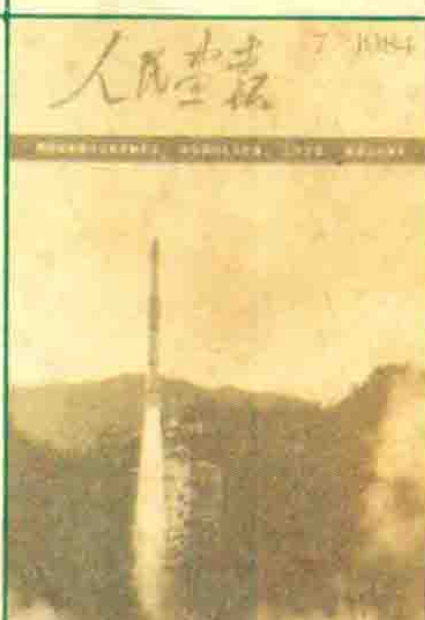
人民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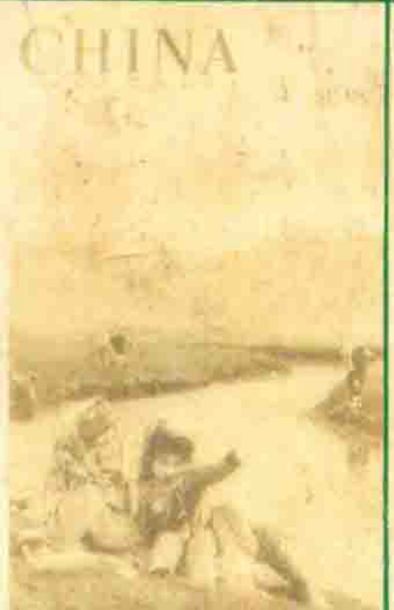
35年

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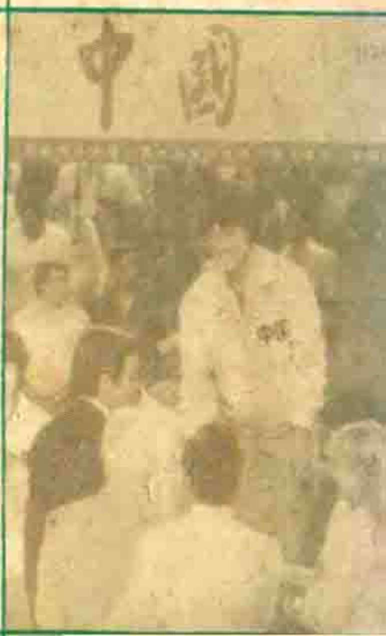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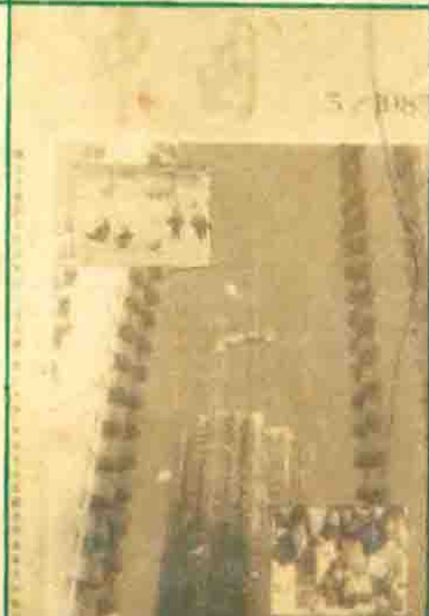
人民画报社











书号：7363·1001
定价：2元

时代的足迹

人民画报35年文选

人 民 画 报 社

时 代 的 足 迹

人民画报35年文选

(1950 — 1985)

* * *

人民画报社编辑出版
正文印刷：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印刷厂
封面印刷：精 美 印 刷 厂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国际书店）发行
北京399信箱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0,000
850×1168毫米（大）32开
书号：7383·1001 定价：2 元
00200 17—C--1983P

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颇为别致的散文选。

散文一百七十一篇，是从近三十五年来《人民画报》发表的数千篇文章中选出来的。

三十多年来，《人民画报》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和关注。也许有人认为：画报是一个以图片取胜的刊物。但事实上，图片没有文章的配合，报道就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画报要求每组报道图文并茂，既有优美动人的照片，也有引人入胜的文章，使读者既能看，也能读。

画报要求文章简洁，几百字，千字以内，甚至几十字，既言之有物，又有文采。当然，也有稍长一些的……不论长文短文，问题在于文章本身，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能否给人以知识，是否值得一读。

《人民画报》的对外所有文版均名《中国画报》。它的宗旨是向外国读者介绍新中国，这一特性，要求画报内容广泛，丰富多采。画报的文章当然也是适应这一总的要求，其描写对象不仅有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的重大事件和建设成就，还有人民生活、山川风物、古今人物、国外见闻、访华印象及艺术精品的评介等等，在读者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本书文章的作者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这里有大作家、名记者、学者、艺术评论家；有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有外国朋友，也有本报的编辑和记者。这一特色，从另一角度决定了文章

风格上的多样性。但就大多数文章来说，具有纪实性、知识性、趣味性。有的文章也可以说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

选入这本集子的文章，是经过了一定时间的检验，仍值得一读的作品。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至前几年一些文章中所记述的、描绘的对象是当时的情况和面貌。岁月如流，物换星移，情况起了变化，面貌有了改变，事物有了发展，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对这些文章除作一些技术性的修订外，都不作改动，以保留其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无论是道报建设，描绘山川，介绍人物，传播知识，品评艺术……都围绕着“介绍新中国”这个总题目，并且在许多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一定的时代风貌，留下了前进中的一些足迹。

编　者

目　　录

首都的早晨……………………………………………………老　舍（1）
上海在前进中…………………………………………………夏　衍（3）
桑干河畔的一个村庄…………………………………………丁　玲（6）
中新纺织厂的命运……………………………………………荣毅仁（10）
外滩变了………………………………………………………夏　衍（14）
雨花台凭吊……………………………………………………谢泗春（16）
北京，巨大变化的十年………………………………………吴　晗（18）
我想唱一支歌…………………………………………………老　舍（22）

青岛之夏………………………………………………………冯亦代（24）
富饶的南疆……………………………………………………陈依范（26）
乐山的风物与变迁……………………………………………郭沫若（30）
西湖……………………………………………………………钱　浩（32）
黄山游…………………………………………………………周怀民（36）
春城无处不飞花………………………………………………徐嘉瑞（39）
春江如画………………………………………………………郁　风（42）
鲁迅的故乡——绍兴…………………………………………钱　浩（45）

从兰州到玉门…………………………………………………谢泗春（49）
安西"风库"…………………………………………………张吉年（51）
水乡白洋淀……………………………………………………春　风（53）
芦沟桥畔话今昔………………………………………………俞铭传（55）
河西走廊巡礼……………………………何世尧　邓永庆（57）

芦笛岩……………………………………………………于　宗（61）
千里嘉陵……………………………………………张韫磊（63）
天山脚下……………………………………………茹遂初（65）
独特的网河区………………………………………王庆恩（69）
粤北的山山水水
——记北江流域……………………………………曾湘敏（73）
沿运河旅行…………………………………………黄祖安（77）
塔里木河，生命的河………………………………胡文康（80）
揭开巴丹吉林大沙漠的秘密………………………白国柱（83）
奥秘的自然　独特的资源
——西藏科学考察记………………………………冷　冰（86）
大江之源……………………………………………贾　庆（92）
穿行羌塘无人区
——西藏北部的科学考察…………………………陈和毅（97）
再探黄河源…………………………………………贾玉江（102）
揭开罗布泊之谜……………………………………胡文康（106）
斩断黄河的时刻……………………………………华　山（110）
春风吹绿北大荒……………………………………谷　苏（116）
在从前的荒原上……………………………………李千峰（118）
重登沂蒙……………………………………………王复遵（120）
开发塔里木盆地……………………………………王复遵（123）
金县见闻……………………………………………杨秀云（127）
方兴未艾的中国农业………………………………吴　象（132）

我们在中国的访问………………………………杜波依斯（136）
我和我的家族……………………………爱新觉罗·溥杰（139）
幻想和现实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印象记……………………叶　华（143）

一对农民的婚礼……………………………………子　冈(148)
他们十三个人…………………………………………郑光华(150)
他们这对夫妇…………………………………………郑光华(155)
吴丹的一家……………………………………………靳　以(157)
金福长的故事…………………………………………孙毅夫(160)
他们五兄妹……………………………………………过桔新(164)
失去双臂的工人………………………………………孙桂琴(167)
革命老人何香凝………………………………………黄谷冰(170)
宋庆龄——中国杰出的妇女……………………爱泼斯坦(174)
蔡畅——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李定国(179)
刘伯承——身经百战的元帅…………………………陈斐琴(184)
访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尚　志　格　来(187)
教育工作六十年………………………………………陈　垣(192)
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魏璐诗(195)
我所认识的马海德……………………………路易·艾黎(200)
来华五十年的回顾……………………………………魏璐诗(204)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横川次郎…………………………王　德(207)
王光英和光大实业公司………………………………孙毅夫(210)
在中国的大地上
　　——记伊斯雷尔·艾泼斯坦………………………古　进(212)

上海的人民游乐场……………………………………柯　灵(216)
东安市场……………………………………………阿·霍夫曼(218)
上茶楼去………………………………………………周　园(220)
粗心的人和细心的人…………………………………万　流(222)
北京的古文化街——琉璃厂…………………………邓　拓(224)
佳节话中秋……………………………………………散　木(229)

热闹的厂甸……………………………………………孙桂琴(233)
公园的早晨……………………………………………叶君健(235)
西双版纳的节日………………………………………沙博里(238)
3,000,000 辆自行车…………………………………孙桂琴(242)
喀什风情………………………………………………陈和毅(246)
西双版纳记游……………………………………梯思·温兹(250)
春的使者………………………………………………李滨声(254)
北京冬天掠影…………………………………………王　德(256)
水乡角直………………………………………………王庆恩(259)
香山红叶………………………………………………平　林(261)
竹楼……………………………………………………林斤澜(263)
东北的冬天……………………………………………骆宾基(265)

一颗永远燃烧着的心
　　——记巴金………………………………………罗　荪(269)
不倦的战士
　　——记茅盾同志…………………………………于　逢(274)
记老作家丁玲…………………………………………杨桂欣(278)
我所知道的三联书店…………………………………萨空了(283)
不老的艺术家盖叫天…………………………………吴祖光(286)
京剧名丑萧长华……………………………王誉之　钮　骠(288)
梅兰芳的新戏——穆桂英挂帅………………………许姬传(290)
谈谈梅派艺术…………………………………………许源来(292)
漫谈京剧……………………………………翁偶虹　黄　励(296)
歌唱艺术家郭兰英……………………………………赵　沨(300)
《希尔薇娅》在中国…………………………………李升恒(303)
电影《马可·波罗》在中国拍摄………………………袁华清(307)
白石老人………………………………………………艾　青(311)

李可染的艺术……………………………………………张　仃(313)
中国现代木刻版画的足迹…………………………李　桦(315)
长征中的真实图画……………………………………平　林(318)
黄宾虹山水画……………………………………………张　仃(323)
印纽雕刻…………………………………………………王朝闻(325)
一幅珍贵古画的复制…………………………………王庆恩(327)
从敦煌壁画看历代人民生活………………………常书鸿(330)
宫伎图……………………………………………………郑振铎(333)
韩熙载夜宴图…………………………………………郑振铎(334)
千里江山图……………………………………………叶恭绰(336)
宋人花鸟…………………………………………………于非闇(338)
永乐宫壁画……………………………………………郑振铎(339)
游春图……………………………………………………宗白华(341)
刘松年山水画卷………………………………………唐　兰(343)
虢国夫人游春图………………………………………唐　兰(345)
中国古代绘画的光辉艺术成就…………………邓　拓(347)
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邓　拓(352)
岭南画派…………………………………………………黄笃维(357)
明代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唐　兰(359)
洛神赋图…………………………………………………钱　浩(361)
清明上河图……………………………………………杨臣彬(363)
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郑振铎(365)
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邓　拓(369)
曹雪芹佚著、遗物的发现…………………………吴恩裕(375)

蒙古族的摔跤…………………………………………乌里吉(378)
篮下夺魁的人们………………………………………曲岳华(380)
走向世界的中国体育…………………………………李梦华(383)

气功……………………………………………………王永强(386)

我们都是中国人…………………………………………朔　望(388)
关于华侨和外籍华人……………………………………郑　群(392)
笔墨缘……………………………………………………珊　音(396)
故乡情……………………………………………………黄阿原(398)

唐代建筑…………………………………………………梁思成(401)
塔…………………………………………………………陈从周(404)
故宫的建筑………………………………………………沈从文(406)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石桥…………………………………梁思成(409)
水乡的桥…………………………………………………陈从周(411)
漫话园林建筑
　　廊·亭·桥…………………………………………陈从周(413)

唐代长安的发掘…………………………………………徐　稚(416)
周代的虢国文化…………………………………………林寿晋(420)
蓝田猿人头骨……………………………………………吴汝康(423)
殷墟考古的新发现………………………………………肖　纯(426)
中山国文物………………………………………………李学勤(428)
二千二百多年前军阵的再现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黄韬鹏(430)

杜甫草堂…………………………………………………彭继亮(434)
晋祠………………………………………………………贾玉江(436)
历史上的北京城…………………………………………侯仁之(439)

麦积山石窟艺术…………………………………………王朝闻(443)

唐陵石刻……………………………………………………贺梓诚(446)
石刻艺术的宝库——大足…………………………………傅天仇(448)
丝绸之路……………………………………………………黄祖安(451)
丝路明珠——敦煌…………………………………………黄祖安(458)
西南丝路……………………………………………………杨　阶(465)
历代陶瓷……………………………………………………陈万里(467)
纸的故事……………………………………………………谢泗春(470)
纺织的来历…………………………………………………王若愚(474)
中国计时器的发展…………………………………………赵　莹(477)
齿轮…………………………………………………………周世德(480)
石油、天然气的利用和开发………………………………邢润川(483)
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席泽宗(485)
中国气候的变迁……………………………………………沈文雄(488)

中国的穆斯林………………………………………………李华英(491)
中日友谊,源远流长…………………………………………古　进(495)
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王庆余(499)
柬埔寨纪行………………………………………………持松法师(502)
阿富汗纪行…………………………………………………林　林(504)
摩洛哥之旅…………………………………………………韩北屏(506)
今日赞比亚…………………………………………………蔡尚雄(509)
塞内加尔散记………………………………………………钱　浩(512)

兰………………………………………………………司马文森(514)
竹……………………………………………………………谢泗春(516)
饮茶…………………………………………………………黄苗子(517)
北京鸽………………………………………………………于非闇(519)
昆虫学家的珍藏——蝴蝶…………………………………李传隆(521)

温泉疗养……………………………………………………傅连暲(523)
梅花……………………………………………………………燕　草(525)
海蛰生活史……………………………………………………戴宝珍(526)

首都的早晨

老舍

无论春、夏、秋、冬，首都的早晨总是美丽的。

北京人向来起得早。天还没亮，打烧饼的、炸油条的已动手做活，使得小学生们、工人们、机关里服务的人们，在上学上工上班之前，就可以得到点心吃。卖杏仁茶的、面茶的、切糕的，也都是天一亮就摆出摊子来。天一亮，大车和骆驼负载着煤或粮，从几十里外赶进了城。一挑挑的青菜，叶上还带着雨点或露珠，也都很早的挑进城来。铺户很早的就下板子，开门；澡塘开得特别早。

一清早，北山、西山看得分外清楚。在朝阳下，北海的白塔显着特别的挺秀，故宫殿宇上的黄琉璃瓦闪动着金光。这雄伟壮丽的景色，加上人民的勤劳操作的景象，北京的清晨，无论春、夏、秋、冬，总是活泼而美丽的。

解放后，北京原有的溪、湖、宫、殿、园林就更美了。三海、什刹海、后海和护城河都挖得深深的，流动着绿旺旺的活水。故宫、公园、道路都随时的修理、调整。以前"凡夫俗子"不能进去的太庙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成为人民的博物院。那最脏最臭的龙须沟已经变成平坦的大道。这样，美的就更美了；不美的也变成了美的。我相信北京一定会变成个全世界最美丽的都城。这个最美丽的北京的远景，是可以由北京市人民政

府二年多的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工作推测得出、想象到得的。一汪臭水的什刹海既然能够变成美丽的现代游泳池（一九五一年夏季开幕），有什么可以阻碍人民不把北京各处都修建得像花园呢？

是呀，北京的人民也比从前更美丽了，因为大家都以劳动为荣啊。人民有这个内在的美丽的品质，怎会不能建设起世界上最美丽的都城呢？看吧，今天首都的清晨的气象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很早的，电车就开出来了，车首立着健壮的女司机；很早的，成群的男、女、老、幼按着广播的口令在练早操；很早的，各邮局都有成群的送信员（其中有不少是女的）出发，先去分送报纸；很早的，成群的男女学生，或步行，或骑车，喜喜欢欢地去上学，他们可不都是富家子弟，像从前那样。从前，有钱的才能去读书；现在劳动人民的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从前，很早的就有提笼架鸟的闲人在路上摇摆，溜他们的画眉或靛颏儿；如今，这种闲人已少见。一清早在路上走着的，坐着大汽车的是成群的工人。这个新气象告诉了我们：北京的人民不分男女都以劳动为荣，都发挥着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在建设更美丽的北京，创造更美丽的生活。

我爱今天的首都早晨，我一定更爱明年的，后年的，十年后的，首都的早晨；首都的景物和首都的人民生活不是一天比一天更美丽可爱么？

（一九五二年第一期）

上海在前进中

夏 衍

再过三个月，上海解放就要满三年了。和长期的内外反动派统治时期比较起来，三年只不过是一个很短的时期，但是，就在这不满三年的短时期内，上海已经开始改变了她的面貌。每一个在解放前到过上海的人，一提起上海就会联想到“十里洋场”、“罪恶的都市”、“冒险家的乐园”这一连串丑恶的称呼。上海曾是洋人统治的地方，是官僚、买办、流氓统治的地方，是“吃、著、嫖、赌”的地方，是“坏人得势、好人吃亏”的地方。日本人将上海叫做“中国之癌”，美蒋反动派被驱出上海的时候又说“上海将成为共产党的包袱”。他们以为这个不治的癌会腐蚀共产党的生命，这一个缺乏煤、粮、棉花和许多工业原料的包袱可以把共产党压倒。但是，三年后的事实是怎样呢？在这短时期中，上海人民就对反动派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不治的疾病治愈了，上海不是包袱而是宝藏，三年来，她对保卫世界和平和祖国与人民的伟大事业做了不少的贡献。

不满三年，上海的面貌变了。依靠帝国主义的城市，变了依靠劳动人民的城市；为帝国主义者、官僚买办、流氓大亨服务的城市变了为劳动人民——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城市；消费的城市开始变成生产的城市；混乱的、分裂的、无组织的城市开始变成民主团结的、秩序井然的城市；腐烂堕落的城市变成健康的朝

气蓬勃的城市了。

上海不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么？是的，上海一地计有大小一万二、三千家工厂，可是，解放之前，这之中只有四千家（约百分之三十五）能够勉强开工。这就是说有八千多家已经破产、停工和搁浅了。经过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的美蒋飞机大轰炸之后，停止和失业的情况更显得严重，于是反动派就过早地发出了“上海滩要坍台”的“预告”。可是结果呢，坍台的不是上海，正是他们自己。在全国人民（包括上海人民）热烈响应和贯彻执行毛主席“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好转”的伟大号召和一九五一年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上海工业不仅已经苏生复活，而且已经开始走上了好转与健康发展的途径。到一九五一年底，工业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经营困难、销路阻滞、停工失业，而相反的已经感到设备不足，技术工人缺乏，和电力无法供应了。

在经济情况好转，社会秩序安定的同时，陈毅市长就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提出了“贯彻为生产服务、首先为工人服务”的市政建设方针。一九五一年内，上海市人民政府在疏浚河道沟渠，修建沪东和沪西工厂区域的道路桥梁，改善工人居住区的饮水供给和环境卫生这些方面，都获得了初步的成就。“棚户区”有了电灯、自来水，“天宝河”变了“天宝路”，曹杨路新建了可容一千多户的工人住宅区。特别使人感到惊异的，是解放以来，上海已经整三年没有真性的伤寒和霍乱了。

上海的性质变了，面貌变了，风气也变了。在过去，工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可是在今天，生产战线的模范成了上海人民最尊敬最爱戴的人物；大批工人担任了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在政权领导机关工作。在过去，上海的居民是无组织的，人与人之间是带着敌意的，同住一所房子里可以“老死不相往来”，而今天，每一条里弄，每一所大楼的住民，都已经组织起来了。在过

去，上海是强横狡诈者占便宜，忠厚老实者吃亏的地方，而今天，搭电车有人让座，下轮船不会被抢走行李，买小菜不必自己带秤，火车站、电影院都有了“无人售书处”了。在过去，上海是著名的抢劫、拐带、绑架、“剥猪猡”的地方，而今天，这些罪恶的行径，都杳迹似的被消除了，一九五一年九月的一个月中不曾有一件盗案，创开埠以来的纪录。在过去，上海满街是乞丐、娼妓、推桥头、告地状，而今天，这一件旧社会的残余不再容易看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一九五〇年收容了上万的游民乞丐，在一九五一年封闭了所有的残存妓院，一百年来的罪恶烙印，就在这不满三年的短时期中被抹消掉了。

一九五二年来了，上海人民正以最大的勇气和信心，在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的战线上和新开辟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战线上进行坚决的斗争。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我们相信，上海工人阶级和上海全体人民，一定能在这一斗争中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一九五二年第二期）

桑干河畔的一个村庄

丁 玲

编者按： 女作家丁玲一九四六年曾在河北省涿鹿县（原属察哈尔省）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主要是根据她当时搜集的一些材料而写成的。今年九月下旬，本报宋学广同志曾到这个屯采访。丁玲同志从采访回来的图片和有关材料又看到了七年后的温泉屯，觉得异常兴奋。她写了一封信给当年的“战友”曹永明——土地改革前的一个贫农、土地改革中该屯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今天的屯主任。从这封信里，我们仿佛听到了时代和人物前进的脚步声。现在征得作者的同意，把这封信发表在本刊上（摘录）。

曹永明同志：

人常常总要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你看，你会忽然收到我给你的信？而在我的桌子上，忽然会放着你和你孩子的照片？这些事是怎么搞的？我本来在很安静的修改一篇稿子，并且准备这两天都不见客，也不出门，可是一会儿宋学广（一个我不认识的记者）就要来我这里。我约他来我家里吃晚饭。并且在他来以前的时间里，我一点事也不能做，兴奋，激动。我把他寄来的许多照片看了又看。那不是七年前我走过的一些地方——桑干河边温泉屯一带的风景、生活、人物吗？这些照片引起我许多说也说不清的感情。我常常想回到那里去看看。去年有个怀来县青年团委做

工作的青年去了温泉屯，他来信告诉我一些情形，告诉我你们说起了我。这已经使我神往，使我在梦中回到了那里，可是，总没有像今天这样兴奋。多么依旧的景物啊！那河流急湍的流着，那胶皮毂辘车，那河滩地，那高粱地，那羊群，那果树园，那丰收的葫芦冰和葡萄啊……而且，还有了熟人哪！我一看照片，我就笑了起来。那不就是曹永明？他还没有变样子，还是那个样，更使人快乐的是，他竟有了那么大的孩子了！你记得么，我们曾经向你说着玩，希望你请我们吃了结婚酒才走？后来到底也没有吃上。

一九四六年，我在你们那里实际只住了十八天。由于我对于农村工作的不熟悉，我对土地改革工作的没有经验，又由于当时战争环境不能把工作时间拖得长些，我对于你们工作的帮助实在不大，心里经常抱歉。以后每听到有关土地改革的事情，或者我自己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时（我在石家庄附近村庄搞土改，就花了快五个月的时间），总得把温泉屯的工作拿来回忆，总得再推敲几次那时村子上的情况和工作上的缺点。我的确对你们帮助很少，可是那短短的十八天生活，却给了我无限的创作情绪。当我从你们那里走的时候，我曾向陈明同志说：我的小说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回到张家口时，我向组织上要求的也只是一个能写作的环境。温泉屯的生活，一切的人和事，坦白的说，我知道得是不多的，可是却不知为什么有那样多的人向我涌来，我同他们一直亲切的相处着。当我每天写他们的时候——就是不写的时候也是一样——我都要进入他们每个人的心中，同他们感受一切。有的时候，我还和陈明同志争吵；他不赞成我的那些人物中的某一个人，他要修正他们一些。当我的书写完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感到轻松，心里同这些人分不开。我常回忆他们。我总希望还有机会把这些人再现一次，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些，更完整些，更成熟些，更深刻些，他们也就会留给人的印象更生动、更牢固些。

因此可以说：七年来我是很少离开这些人的。土地改革工作完了，而我还在土地改革；小说写完了，而我还在创作……

那年，我离开温泉屯，到了涿鹿县，知道了战争情况的不利（一九四六年秋该屯土地改革刚结束，国民党反动军队又来侵占。一九四八年重获解放——编者），我们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啊！我们还来不及替你们庆祝土地改革的胜利，可是我们就又预感到战争将给你们带来灾祸。我们曾分享了你们的快乐，然而却不能同你们一道担当灾难。我们是用很痛苦的心情去走了后来的一段途程。我到了阜平后，只要听说有人从察北察南回来我都要去打听那一带的情形。我听说你们那里有了护地大队，我想象着你们一定会参加的。我不能详细的了解你们的情况，我就用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的一切斗争情形来想象你们的艰苦。我也听到过许多关于你们英勇斗争的情况，我真想放弃一切到你们那里来。这些消息是多么的鼓舞了我啊！后来又听说你们遭到意外损失，我就下定决心要继续写护地大队。一九五〇年在北京遇到张雷同志时，我告诉他我的打算。去年他又将这段时间的全部经过向我作了详细的述说。我知道了你的情况，也知道了很多人的情况。唉，我到现在还怅怅于心的是我有几个认识的人却牺牲了！这段材料在我写来当然是并不容易的，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这个计划否定。可是，首先我总得再到你们那里来。我想总有一天我就来了，出乎你们意料之外的事就要发生了。

……

宋学广同志寄来的照片上有关于温泉屯的材料记录，我极注意的看了。我是说不出的喜悦。虽说你们曾经过极大的摧残，但现在一切却都又兴旺了起来。数目字都增加了很多。你们原来都是用井水的，有井水的渠，现在，却新筑了大渠，引用桑干河的流水，这样水田地就增加了，像“顾涌”那样的人就不必再羡慕桑干河对面的“六区”的地了。我猜想你们那里已经没有像这样

思想的人了，即使有，也是个别的了。那些老年人、青年人、妇女、小孩都因为生活的美好而显得是那么的笑容满面，健康和漂亮。在过去，我记得有许多人家都得吃豆皮，现在想必早已不吃了罢？看你们场上的庄稼和院子里堆满了葡萄，使我心里充满了欢喜，忍不住要找个人谈谈才好。我什么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在那里住一个时候呢？当我还没有去之前，你若有机会来北京，我和老陈都会用极兴奋的心情欢迎你的。

宋学广同志还没有来。我真希望他很快就到；我等着他告诉我一切有关温泉屯的事。

问候你，问候你们全村的人！

敬礼

丁　玲　一九五三年十月

（一九五三年第十一期）

申新纺织厂的命运

荣毅仁

当我与有关的企业已全部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的时候，回忆一下企业的过去情况，对我说来是一件有益的事。

我在童年的时候，经常在晚上陪着我父亲乘凉或是烤火。父亲常常把他创办事业的经过讲给我听。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正是清王朝的内政腐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爱国人士要求变革的时候。父亲刚学生意满了师，却想做官。但是我祖父不同意，他对我父亲说，做大官不是从科举出身做不到，做小官对上要奉承，对下要进行搜刮，不好；要父亲做点事业。父亲听了祖父的话，把心思转到办事业上去。一九〇〇年他第一次在无锡合伙开设了面粉厂，其后又在上海开办了申新纱厂。

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他的衣钵的继承者，管教很严，从我十五岁起学校放假的时候总是送我到厂里去学习。我是和职员一起食宿的，有时也到工房里去看看，和工人谈谈天。我看到工人起早落夜，工作得实在辛苦。但是他们吃得很不好，穿得很破旧，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有的还要向我借钱。我总是想，父亲说我们开了工厂，工人就有饭吃，为什么工人还是这样苦呢？这一问题长久地在我脑海中盘算着。现在我知道他们应该得到的

东西都给我们赚钱赚去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有一天报上大字标着“申新搁浅”。那时我正在学校里，看到了报，呆住了。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在前几年自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经营，出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投机失败；这一些情况就促使申新走上了搁浅的道路。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时期内，日军的炮火和残酷的暴行，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惨痛的创伤，申新亦是无例外的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都以为中国从此是五大国之一，可以好好地办一些事业了。可是反动政权为了维持他们的罪恶的统治，勾结帝国主义者，残酷地镇压人民，不惜发动内战，肆意进行搜刮。我父亲被国民党特务绑票勒索，堂兄鸿元被反动当局借故扣押、敲榨，搞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居。申新的有些负责人，看看形势不好，就携带了部分资金，远去海外。因此，到解放前夕，申新实际上已是内情空虚了。

我在当时也是左右徘徊，举棋不定，一方面受到反动派的摧残压迫，实在痛恨他们；另一方面听了谣言，对共产党也是害怕，怕留在国内生活、自由没有保障；但跑到国外去做白华要受尽白眼；而且事业又都在国内，感到前途茫茫。再三思量：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过去反动统治几十年，没有把国家搞好，现在反动统治被推翻了，是不是会好一些呢？我想我还是留在祖国的土地上，等着瞧罢！

上海解放了。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好，不扰民。不久党政负责首长邀了工商界人士进行座谈，宣布了政

策，情绪就开始稳定下来。但是，如何来维持内部空虚的申新对我说来是一个难题。我不断到人民政府去请求帮助。人民政府十分关怀和大力地扶助，采取了贷款、加工、收购、订货、供应原料等办法来维持了申新。

但是申新是一个私营企业，虽然在国家领导管理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能符合于国家计划的要求；而且劳资关系的存在，也影响着生产的更进一步的提高。

去年九月，申新由政府批准，正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同时三明、伟正两厂也并进了申新。我们管理的范围扩大了。由于公私、劳资关系的改变，生产上出现了新气象。以申新九厂为例，在合营后两个月，清花车间的回卷率就从合营前的2.16%降到0.74%；织布车间的正布率也由76.7%提高到现在的94.8%。今年产量还要增加，成本要降低19%。现在全厂都掀起了学习技术的热潮，争取一年赶上国营厂的先进水平。职工的生活也在不断提高，福利事业也日益扩大。

解放后祖国建设的大规模恢复和发展，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毋庸我再来多谈。我看到我们祖国的可爱和伟大，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就我个人来说，人民给我以信任，选我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参与了宪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在公私合营上海申新棉纺织厂总管理处里，我担任了总经理的职务，和公方代表、职工们一起共同来搞好生产。在生活上也过着比过去安定愉快而自由的生活。就是在将来我放弃了股息，却占有了全国伟大建设成果中间的一部分。我依旧可以依靠我的工作报酬来过很好的生活。我的子女已得到了国家的教育和培养，将来也不愁没有工作做。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明正确，它不但把中国从一个国弱民穷的情况中挽救出来，而且使我们每个人重新懂得了做人的目的，得到了更多贡献工作能力的机会，为国家做些事情。过去我父亲虽怀着“实业救国”的理

想和伯父及朋友们一起办了申新，但是私营企业本身就给广大职工带来了贫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使很多企业在相互排挤中倒下来，过去的申新就有五个厂是这样买过来的。因此只有消灭剥削，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过着和平、幸福、愉快、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是我们广大工商业者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到的道理。

相信社会主义的美丽的花朵将在全中国开放、结实，让我们大家都能尝到社会主义的幸福甜美之果吧！

（一九五六年第四期。作者原为公私合营上海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总经理）

外滩变了

夏 衍

一提起上海，谁都会很自然地想起外滩。外滩是上海的缩影，有人说它反映着上海的性格。

我相信读者中间一定会有许多“老上海”，那么我想告诉他们：上海变了，外滩变了，上海的性格变了。

五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听说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四十年前，我第一次到上海，觉得外滩不像是中国的地方。外滩江面上停满着炮口瞄准内地的外国兵舰，码头上站着外国巡捕，靠马路的高楼大厦全挂着外国旗子，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外国总会等等大商店的招牌全是洋文，靠近十六铺的江边还有外国人赫德和巴夏礼的铜像。中国的一切都被安上了外国名词：外滩被叫做BUND（邦得），中国工人被叫做COOLIE（苦力），舢板船被叫做WALLAWALLA（哇拉哇拉）。上海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外滩则又是这些冒险家的滩头阵地。外国货从外滩码头起运，中国人的脂膏则通过外滩的那些外国银行、商行，流到外国去了。

我亲眼看到过外滩的屈辱的过去，我也亲眼看到了外滩的新生。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了外滩，在欢呼着的人群中祝贺了外滩和黄浦江的

解放。

上海的解放还不到十年时间，但是我想，任何一个过去到过上海的人，假如他今天重访这个地方，一定会有“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之感吧。

外滩的面貌变了，这里再没有侵略者的兵舰，这里再没有外国巡捕，这里再没有外国字的招牌。冒险家、买办和帝国主义的军官政客们宴游集会之所的沙逊大厦，现在变成了接待各国和平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和平饭店”，有名的“上海总会”变成了海员俱乐部，汇丰银行现在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特别是沿江的那条马路，假如你今天再去走走，也许你完全不认识那是过去的“外滩大马路”了。经过扩建和绿化，这条路和外滩公园连成一片，树木成荫，香花遍地；混乱、嘈杂、肮脏的外滩，变成了整洁、安静、美丽的外滩。这里再也不是穷人“跳黄浦”的外滩，而是上海人民散步、休憩、锻炼身体的所在了。

外滩的变化，不只在于它的外貌；应该说，外滩的精神面貌变了。不论是清晨，不论是傍晚，不论是下午五六点钟的忙迫时间，你去看看外滩行人的神情态度吧。他们安详舒畅，带着一点自傲的心情，因为在今天，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劳动者，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外滩很美，外滩还会越来越美的。

（一九五八年第六期）

雨花台凭吊

谢泗春

出南京中华门一公里，有一座望之郁郁葱葱的小山。相传南北朝时，梁朝有位高僧云光法师曾在这里讲经说法，感动了神灵，天上落花如雨，自此这里即被名为雨花台。

从北面山麓绕到南面山头，一路春梅成林，花香满路。路尽处是石级，两旁对植着宝塔形的柏树。走上去，便是一个平坛，大书“肃静”“清洁”两字的木牌分立左右。迎面二三十公尺的地方，背衬着松柏林，有一块巨碑向阳耸立。碑上题着“死难烈士万岁”六个大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笔；碑下陈列着两排花圈。这就是亿万人瞻仰的雨花台烈士陵。

解放前，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集团背叛大革命起，到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前夕，雨花台就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场所。几十年间，上十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青年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在这里慷慨就义。附近居民每于睡梦中为枪声及“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呼声所惊醒。他们知道：这又是一些革命烈士牺牲了。

解放后，党和政府决定在雨花台兴建烈士陵园，以示对先烈们的永久怀念。南京各界人民，特别是青年们，都以无比的热情，利用业余时间在这里广泛造林，所以今天这里已是一望苍翠

了。从全国各地前来凭吊的人，每日不绝于途，青年和少年儿童们爱在这里听讲烈士们的革命故事；有的还在这里举行入团或入队的仪式。

从平坛往西看，是新建的不知什么工厂；在东南山脚下，是临时性的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陈列着恽代英、邓中夏等几十位烈士的遗像；第二部分是邓中夏等烈士的遗著、遗物和绝命书；第三部分则是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爱国志士们的监牢、刑具的照片。

走进纪念馆，人们默默地瞻仰、参观，肃静无哗。在一个陈列柜里，你可以看到一张照片，它上面画着一颗五角星，星中写着"雨花台"三字，这是贺瑞林烈士在狱中决以身殉革命的表示。另一个柜里，是赵良璋和史砚芬两烈士的绝命书。史砚芬烈士的信中写道："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必要的。我死后还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是的，史砚芬同志和其他千千万万的烈士们所鞠躬尽瘁的人民解放事业已经成功了。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和平劳动中，我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先烈们的丰功伟绩的。

雨花台盛产一种雨花石。来此的人，都要带些回去作纪念。它有烟云、波浪、火焰等各种花纹，绚烂夺目，十分可爱，然而今天这些雨花台的岩石，对于人们却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曾经洒上了烈士们宝贵的鲜血，所以它会激励着人们更加热爱我们解放了的祖国，并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付出更大的热情和勇气。

（一九五九年第九期）

北京，巨大变化的十年

吴　晗

北京，经历了巨大变化的十年。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都市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都市之一。这是一个文化中心，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工业中心。

这个巨大的变化，就发生在这十年中。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北京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建设，改变了国家的面貌，改变了北京的面貌；改造了城市，也改造了人。

这十年间的变化是巨大的。有了这个新的基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后浪推前浪，更大的变化还在明天和后天。

且不说石器时代的情况了，自然，那时候这个地区已有我们的祖先在劳动生产。公元前三、四世纪，这里已有了许多村落，现在北京西北郊还有汉代的城市遗迹。北京是古老的。但是，作为一个现代都市，我们的建设工作才进行了十年，因此，它又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都市之一。

北京曾经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封建王朝的首都，特别是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不断营建，宫殿、寺庙、园囿和民居都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文化艺术传统，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黄瓦红墙，小街深院；手工业的景泰蓝，象牙雕刻；专供皇帝享用的京西稻

米，南苑的游猎场所；巍峨的天安门，壮丽的天坛，都古色古香，慵散而又龙钟。

经过这十年，情况完全改变了。古老的故宫、颐和园、碧云寺、雍和宫、广济寺等等都修葺得焕然一新，和其他寺庙园囿一样，成为人民自己的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了；过去污秽不堪的陶然亭、龙潭和玉渊，经过疏浚，建立为公园了；藏垢纳污的龙须沟翻了身，臭沟改建为下水道，沟上是平坦的马路；矮小的民居已有一部分改建为高楼大厦，其它住宅区，也将逐步改建；天安门成为每年国际劳动节和国庆典礼的检阅台，两旁是新建的比天安门还高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天安门广场扩大了一倍；许多过去的乱坟堆、垃圾场和粪场不见了，出现了体育馆、天文馆、学校、医院、旅馆、办公楼、商店等建筑，有的地带已经形成一条条的街道了。郊区出现了一群群的工厂，形成许多新的工业区。这十年，北京一共修了二千七百二十四万平方米的建筑物，等于原有建筑面积的一点三倍。

随着城市的改建，下水道增加了两倍，用自来水的人口增加了四倍，铺装路面的道路增加了将近五倍，公共交通车辆增加了二十倍。从去年起，已经开始建设煤气和集中供热的工程。

手工业艺人组织了合作社，从单纯的手工劳动进入部分机械和半机械化，提高了产品质量。

随着历年来爱国卫生运动的进展，北京的蚊、蝇很少了。到处整齐清洁，讲卫生成为广大居民的习惯，疾病减少了，工作效率提高了。

北京是世界上最新的都市之一。

北京在过去号称文化中心，我们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发展。

在旧时代，劳动人民的子弟是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的。现

在，教育的目的是为劳动人民服务。这十年来，小学学生增长了近两倍，中等学校学生增长了五倍，高等学校学生增长了近六倍。各级学校在学学生人数达到一百二十万人。

在旧时代，北京较大的医院只有几个，全市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只有四千多人，病床只有三千张。现在，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已增长到近三万人，病床增长到二万一千多张了。一九四九年市区人口的死亡率是千分之十四点一，一九五八年已降低到千分之六点六。影剧院座位数从三万四千七百八十一个增长到六万四千三百五十五个，另外还有各机关企业的内部影剧俱乐部二百五十六个。

以上这些巨大的变化，关键在于生产的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旧时代的北京是一个落后的消费的都市。一九四九年全市的产业工人只有七万多人，工业、手工业的产值只有一亿七千万元。当时的工业绝大部分是加工和修理行业，规模很小，生产方式也十分落后。但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年底，全市的产业工人已达到八十七万人，工业、手工业的产值已增长到四十六亿元了，五百人以上的工厂达到二百七十六个，其中有钢铁联合企业和机械、电器、化工、仪器、纺织等工业。

同样，郊区的农业也起了巨大的变化。地主阶级被消灭了，农民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能灌溉的耕地从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点八增加到三分之一，超过几千年来发展的灌溉面积的总和，并且还拥有四百台拖拉机和四万匹马力的各种灌溉机械，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约一倍，棉花增长六倍多，蔬菜增长十三倍多。

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在业人口达到一百六十六万人。工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多，近郊区每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则增长了两倍多。

北京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物质面貌改变了，精神面貌也改变了。人，创造这些变化的人，也改变了。

好吃懒做的游荡汉没有了，乞丐绝迹了，娼妓成为历史名辞了。

人们喜爱劳动，认为劳动是光荣豪迈的事业。工人、农民在劳动，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国家干部定期下放参加体力劳动，学生也随年龄体力的不同参加一定时间的体力劳动。劳动成为社会风气，劳动改变了人们的体格和精神面貌。劳动万岁！

这十年，这十年的劳动，参加这十年劳动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旧时代的人。同是这一些人，在同样的土地上，却对劳动和祖国的建设有着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态度。道理是今天的人民是解放了的人民，是站起来了的人民，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是光荣的、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

我们欢乐，我们骄傲，我们幸福。我们知道，巨大的工作只是开了个头，还得更加努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大的幸福还在前面。

数风流人物，还看人朝！共产党万岁！

（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

我想唱一支歌

老 舍

因为我是那么快活，我时时刻刻总想唱一支歌！

为什么这样激动，这样高兴呢？因为呀，我和我的同伴们——艺术家以及建筑学家等等，走了八千里最愉快的路程，由内蒙古东部，心中带着原始森林的香气，草原的绿色，和十多个民族的友情与祝福，西去包头与大青山前的呼和浩特！

是呀，大兴安岭上的青松与白桦，草原上一碧千里的翠色，已经使我走着、坐着，甚至在梦里，都想唱起那翡翠世界之歌！

是呀，就是原来那寸草不生的荒沙地带，而今已是杨柳成荫，掩映着碧水清波，生长起金黄的玉米，红穗的高粱，还有啊不远千里而来的甜苹果！

是呀，那向来横行无忌的辽河，也改邪归正了，和悦地给牛羊、骆驼，预备下甘凉的清水，给蒲苇，莲花，和来自扬子江的鱼儿安排下了安乐窝。

风不再狂，沙不再飞，水库旁的小塘啊，种上了红莲与白荷！这些动心的景色，叫我怎能不想高唱劳动创造世界、改造世界的赞歌！

是呀，不仅进入原始森林，不仅看见草原上的牧场，与高粱玉米的海洋，我还看见了钢铁的包头，紧靠着昆都仑河与黄河。

包头，光芒天外三千丈，铁水奔流，气势压倒了滚滚的黄

河！有了包钢，内蒙便不仅是农牧之乡，它有了钢铁，有了机械，有了工业化的新血脉！

可是，那最动人的还是民族的团结！

是呀！人是工农林牧与一切事业的主人！

是呀，由东到西，由山到河，我看见了十多个民族，手拉手，肩并肩，如兄如弟在一起工作。

在大兴安岭中，我看见了鄂伦春族的弟兄，由原始森林里出来，由原始社会出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我看见蒙族与汉族人民，在同一块土地上建立起人民公社！我看见了定居游牧，牧民也参加了公社！我看见鄂温克族的姑娘们，骑着高头大马，来为客人们唱歌。她们穿着长长的袍子，戴着尖尖的帽儿，唱着古老的调子，内容却是互助协作！我看见了达斡尔族的家庭妇女，穿起绣花的旗袍，和绣花的高底儿鞋，表演自己民族的歌舞，古老而活泼。我看见了回族、满族、朝鲜族的兄弟姐妹，一同干劲冲天，改善着自己与大家的生活。

每个民族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尽所长，各得其所。大家没有了民族的歧视，消灭了千百年来积下的隔阂！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工农渔牧才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家家户户高悬着毛主席的像片，兴高采烈地过着新生活！学校里有各族的儿童与青年，机关里有各族的干部，森林、牧场、农村、工厂里各族的人民在一块工作！都说社会主义好，都感激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这团结起来的十多个民族，正斗志昂扬地，诚心互助地建设内蒙，在荒寒的地方建起炼钢的百丈洪炉，使茫茫的荒野变成江南景色！各族人民欢快地劳动，也时常在一起尽情地歌舞，各种的舞，各种的歌，主要的是团结之舞，团结之歌！

（一九六一年第十二期）

青岛之夏

冯亦代

中国人有句老话，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青岛就是一处又有山又有水的好地方。山给人以森严感，海给人以开朗感，青岛在山边也在水边，是森严与开朗的融合。而人在其中，既想到生活的严峻与艰辛，也想到生活的宽广与欢乐。当火车沿着海岸直奔青岛而去时，你眼前是一片明亮：明亮的天，明亮的水，明亮的心情。

清晨，你在海滨漫步，大海还掩隐在一片漫漫的白雾里，为晚潮所洗净的平沙上，不时会冒出一只小蟹，或其他的小生物来。浪涛也是静悄悄的，唯恐过早地惊人清梦。可是海岸上还是出现了点点人影——带着白头巾的女护士，正领着一群疗养院的休养人在做早操，也有银髯飘然的老人在指点别人练太极拳。慢慢地东海上升起来光芒四射的朝日，海上重雾逐渐消失；蓝蓝的天上，不时飘过一朵白云，远处海面也会偶然出现一只大海轮，或是一群古老的张着帆航过的渔船。海也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白天，海滨浴场又显得喧闹起来。碧油油的海水里，浮沉着“乐水”的人们，不时从清风里传来一二声欢笑，你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急匆匆换上游泳衣，迎着拍岸浪涛，一头钻向水里去。海水像是母亲的温柔抚爱，她抚摩你全身；一切的烦忧和辛劳，都一洗而净。你感到孩提的欢欣，青春的魅力，一句话，你

变得年轻了，甚至会忘情地唱起歌来。

傍晚你倦游归来，在林荫道上徘徊着。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刚从公园里散步回来，他们齐集在路旁盛开的紫薇花下。这是种古怪的树，孩子们叫它"痒痒"树，只要你用手指轻轻在树身一抓，花枝便会颤动起来。孩子们开心得大笑大叫，你又怎能拒绝这一天真的感染呢？便也不由己地在树上抓着，跟在孩子们的后面大笑大叫。

晚上，你熄了屋里的灯火，推窗一望。沿着海堤是鲁迅公园里几行绿幽幽的灯光，把整个青岛遮掩在梦幻似的诗的情调中。四周是那样的宁静，只有永无休止的拍岸涛声，哗啦啦、哗啦啦，像在为你唱催眠曲。不时也会飘来一声少女曼妙的歌声，或是在路角传来喁喁细语，那是一对年轻恋人，他们正在织结幸福生活的网。

青岛，这是一个忘不了的地方。你一想到它，你情不自禁地便会想起那明亮的天，明亮的水，自己明亮的心情，和你前面的那条宽广而欢乐的生活道路来。

（一九五七年第六期）

富饶的南疆

陈依范

（一）

对于旅行家，南疆具有无穷的魅力。富饶美丽的河山，维吾尔人的盛情以及他们丰富多采的生活和艺术，样样都使人陶醉。

南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共有三百万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盆地，面积比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总和还要大。盆地周围是巍峨的天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盆地中央是浩瀚的塔里木大沙漠，沙漠边缘是一望无际的肥沃平原。由于天山挡住了北面的寒风，这里就风和日暖，春来繁花似锦，夏秋瓜果满园。库车的杏子、莎车的石榴、库尔勒的海棠和香梨，都是极有名的特产；阿克苏河两岸的“黄金稻”更是稻谷中的珍品。

这里气候干燥，日照长，一年当中几乎有七个月的晴天，最适于长绒棉的生长。新疆去年产棉一亿零二百万斤，其中百分之九十产于南疆，而南疆的亩产量最高达到一千七百斤的惊人纪录。在古代，我国的丝绸是沿着兰州到喀什的大道运往波斯和罗马的，因此，这条道路曾被称作“丝路”；可是今天，把这条“丝路”改称“棉路”或“工业路”，也许更合适一些了。在南疆的道路上，我时常遇到“吉斯”和“解放”牌卡车把棉花运往兰新铁路线上的峡东车站，也时常遇到满载机器和各种工业品的卡车从峡东开来。

南疆也是新疆的主要产粮区，目前已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这里雨量稀少，全靠天山和昆仑山融化的积雪来灌溉。近年来人民解放军生产部队和当地农民修建了许多水库和水渠，其中“胜利渠”长达一百三十多公里，能把阿克苏河水引到几百个苦旱的农庄里。在南疆北部的塔里木河流域，我曾经遇到一些勘探队，他们正在调查荒地，并在研究怎样防止沙漠蚕食大量的水流。南疆约有四千万亩荒地，目前已有上百万亩得到开垦和灌溉；不久的将来，整个荒地就会变成棉粮瓜果的宝库了。

南疆虽是农业区域，工业化的幼苗也已茁露出来。喀什、库车、阿克苏、和田等地都在兴建工厂。我曾访问年产生丝一百四十吨的和田缫丝厂，它是一九五四年建成开工的，机器设备全部由江苏无锡纺织机器制造厂供给。厂里的两千多工人中有几百个来自江、浙的汉族姑娘，她们那种帮助兄弟民族发展工业的热情真叫人感动。从无锡缫丝厂来的汉族姑娘徐亚儿只有二十三岁，我问她言语不通怎样教会维吾尔族女工缫丝技术，她说：“我们比手势，用手和眼睛。”离她不远的地方就是维吾尔姑娘喀穆尔·罗赛，她和其他许多女工一样，出身于农家，一九五六年刚进工厂时样样不懂，但经过别人细心地教，自己勤苦地学，很快就掌握了技术。她曾在一九五七年两次被选为先进工作者。

由于兰新铁路没有通车，新疆现在还不可能大规模发展工业，但政府已在普查新疆的自然资源，为将来的建设作好准备。我在和田遇见了中国科学院派来的一个综合调查组，他们已在南疆勘查出丰富的石油、盐、有色金属和其它矿产。

在手工业方面，南疆最著名的是和田地毯。这种花毯相传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过去远销印度、阿富汗、俄国等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经济萧条，制毯业奄奄一息。一九五一年政府建立了织毯工厂，收容了七十多个失业行乞的织毯工人，这才

开始恢复生气，后来市场逐渐繁荣，织毯业也逐渐发展，现在工人已增加到二百八十人。在织毯工厂里，排列着许多高大的织毯木架，通常是夫妻合织一幅，有时全家共织，孩子随着学习，他们可以不看图样，单凭自己的巧手和丰富的想象力，参照记忆中的花卉景色，织出色彩斑烂、图案精美的地毯。他们的收入平均比解放初期增加五倍。现在毯子工厂正在扩建厂房，和田附近的农村中也有五千人从事织毯副业。北京怀仁堂那两张二十公尺长、五公尺半宽的大地毯就是和田织毯工人米米图孙领导七十多个老工人用三十六种颜色织成的。

南疆另一著名手工艺品是精致的花帽。在库车，家家户户的姑娘都会绣这种花帽；街道上，五光十色的帽摊栉比相连，花样十分鲜艳动人，真使你不知道怎么去挑选。

南疆最大的城市喀什市是维吾尔族的古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城南可以望见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山的冰峰，市区被喀什噶尔河分为东西两部分。城郊香稻环绕，果林片片，随便你走进哪一家，好客的主人都会用满篮鲜果来热情地招待。全市有四百多清真寺，其中艾地卡清真寺是新疆最大的一个，可容两万多教徒礼拜，城东有著名的阿帕克合加陵墓，每年夏秋时分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这里来虔诚朝拜。

喀什也是南疆主要的物资集散地，每隔六天逢一次巴札（市集）。全市人口七万多，但在赶集的日子里，人群一早便从周围几十里的地区涌进城来，人口可能增加一倍，巴札分成粮食、大布、皮靴、鸡蛋等许多小巴札，各种商品都摆在固定的街道上有的街道全是瓜果，有的全是小花帽，连道旁树枝和店铺的门楣上都挂着许多。在牲口巴札上，卖主骑着自己的马或驴来回奔驰，买主看中了哪一匹，就喊他停下来讲价。在别的小巴札上，我看见一个人买了一扇门，另一个人买了一扇窗，还有一个人买了一辆崭新的马车。此外，国营贸易公司、百货商店和合作社也

整天挤满了不同穿戴的各族顾客。

和南疆其它城市一样，喀什古城正在每天改变着自己的面貌。以前市里只有一些小手工作坊，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这里建立了面粉、农具、铁工、发电、印刷、轧花、砖瓦等十几座工厂，出现了电灯、电话、公共汽车和广播电台，郊区农村也乡乡装了电话。市内新建筑的面积共达十五万平方米，等于解放前二十年内建筑面积的十倍。一九五二年这里还没有中学，上中学要到一千六百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去，但现在这里已有三个中学和一个高级师范；小学生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八十，比解放前增加了三倍。

虽然有了这些变化，南疆人民却正在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如果说，现在的许多美妙故事的开头是“当解放到来的时候”，那么，未来的许多美妙故事的开头将是“当铁路修到乌鲁木齐的时候”，而铁路到达那里，为时已不远了。

（一九五八年第三期）

乐山的风物与变迁

郭沫若

我是生在峨嵋山下，大渡河边的人。生我的小镇名叫沙湾，在乐山县南部，离县城三十七公里。

乐山县即唐代的嘉州，有名的诗人岑参做过嘉州刺史。县城附近是风光明媚的地方。湍激的大渡河（俗称铜河）自南而北，在城东流过。平静的泯江（俗称府河）自北而南，在城北流过。二水在县东北角上合流而成青衣江，再滔滔东下。

在青衣江的对岸，也就是北岸，有几座浅山骈列。由西而东数去，曰凌云山，乌尤山，马鞍山。

凌云山和乌尤山，林木葱笼，有不少的名胜古迹。

凌云山有九峰，其峰之一的临江处有有名的大佛坐像，是中国最大的石佛，因山而成，这是唐代韦皋镇蜀时海通和尚所开凿，估计当年用意是在减杀大渡河的水势。大渡河曾改道几次，旧河口是和大佛正对的。佛下为大佛沱，是两江合流后的深渊，中产墨鱼和江团鱼，甚名贵。山上还有有名的苏东坡读书楼，相传苏轼和苏辙两弟兄是在这儿读过书的。

清朝的何子贞做过两次四川的学台。以前在山上的凌云寺（一称大佛寺）曾经有一副他写的木刻对联。联文是：

“江上此台高，问坡颖而还，千载读书人几个？

蜀中游迹遍，喜嘉峨特秀，扁舟载酒我重来。”

何子贞看不起乐山人，以为除苏东坡、苏颖滨之外，没有一个读书人，但现在听说凌云山已经有一座乐山大学了。

乌尤山亦名离堆，古称"秦时蜀郡太守李冰凿离堆以御蒙水之患"，蒙水即沫水，亦即大渡河。看来秦前的大渡河是向乌尤山和凌云山流去的，故李冰也为了减杀水势，把凌云山和乌尤山凿断了。

乌尤山上有有名的汉武帝时郭舍人的尔雅台，相传他曾经在那儿注过尔雅（这位郭舍人不是晋人注尔雅的郭景纯）。还有后来建筑的乌尤寺，塑有五百罗汉。乌尤山离城较远，比凌云山更清静，林木也更繁茂，风景的确是不错的。

凌云山和乌尤山，在南面远远正对着峨嵋山，天气晴朗的时候，峨嵋山是可以清晰地望见的。有山有水，不仅风韵清幽，而且气魄雄大，与庭园式的杭州比较起来，别有风味。

我在沙湾长大到十二、三岁，便上县城读书，读了四年光景便离开了故乡。其后在一九三九年我曾经回去过两次。那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乐山县城遭受日寇轰炸，几乎全部烧光。从那时以来又快二十三年了，我一直没有回去过，听说县城和沙湾自解放以来，都有很大的改变。县城已经充满着高楼大厦，有了纺织工业，我在五十多年前读过书的中学校址已经开拓成为了公园，就连沙湾也改变了面貌，在开始工业化了。沙湾附近产煤、产盐、产木材，成昆铁路将要通过这儿，将来的飞跃发展是更可以想见的。

因此，让我这个离开了故乡二十三年的人来谈乐山或沙湾，看来是有点类似于考古工作者在谈北京人的周口店了。

（一九六二年第十期）

西　湖

钱　浩

谈到我国的锦绣河山，不免提到西湖。西湖在杭州之西，一泓湖水，三面青山，长堤垂柳，已宛如天然图画；而沿湖四周无数楼榭亭台，文物古迹，更把秀丽的湖山装点得娇美多姿。

无论是晴天、雨天、月夜、积雪，西湖都各有一番风姿。因此爱西湖的人又有晴湖、雨湖、月湖、雪湖之说。有人爱暖风丽日的湖上春景；有人爱烟雨迷蒙的雨天景色；又有人偏爱晶莹无边的月色湖光；也有人爱银装素裹的西湖积雪。但是北宋诗人苏东坡早就写出了一首传诵人口的诗，道出了更多人对西湖的赞美：

水光潋滟晴偏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面积约五、六平方公里，环湖一周约十余公里。从湖滨公园往北路走，不久就到断桥，这是神话故事《白蛇传》中白娘子和许仙相会的地方。过断桥进入一条绿柳长堤，堤身低平，湖水拍岸，这就是后人为纪念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而命名的白堤。白堤的另一端是湖水萦绕的孤山，这里有具有江南建筑特色的秀美精巧的楼台；有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有成片的梅林和鲜花绿树。在山顶可以饱览湖光山色，而山下“平湖秋月”又是赏

月的好地方。从孤山西北行，过西泠桥，就转入横亘的苏堤。苏堤最早形成于北宋中叶（公元十一世纪），相传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疏浚西湖而筑成的，其后历代有所修建。解放后，更将堤身加宽，堤长约二千八百米，堤上有六座拱桥，各有一个富有情趣的名字，如跨虹、东浦、望山、映波等。每当春日，花柳交映，莺啼燕语，更显得春光烂漫，令人欲醉，因此有人称“苏堤春晓”为西湖风景之冠。苏堤南端有新辟的花港观鱼公园，以植牡丹、芍药等名花取胜；有新修的观鱼池，游人可凭栏看五色金鱼。由此再东南行折入西湖南沿，有净慈古寺、雷峰塔遗址等，再沿湖行，则见新开辟的柳浪叠翠的“柳浪闻莺”公园，这里又是濒市区的湖滨了，

这只不过是环湖大略，西湖的湖心有三潭印月、湖心亭等湖中胜景；周围的山则有玉皇山、南北高峰、凤凰山、宝石岭等，青山多丽，不仅可以登临揽胜，而且与平湖相映成趣。言泉则有虎跑泉、玉泉等，这些清冽的泉水和著名的龙井香茶更是相得益彰。此外如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庙之殿宇峥嵘，名刹灵隐之林木幽深，韬光山径之修篁夹道，九溪之清涧环流，都各擅胜场。至若其他奇峰怪石，塔影名花，文物古迹，都很难在这里一一描述了。

西湖原先是个海湾，因为钱塘江带来的泥沙沉淀湾口，天长日久逐渐把海湾和大海隔开，就成了湖。它作为一个风景胜地，大约在唐代（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已经是闻名了。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杭州时，曾写了不少诗词来赞美湖山，像：

孤山寺北贾亭西，
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阴里白沙堤。

所描写的早春景象，是十分新颖动人的。宋朝一代，杭州西湖已很繁华，北宋词人柳永曾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等句来描绘西湖景色。十二世纪初宋室南渡，以杭州为首都，南宋小朝廷在这里醉生梦死，爱国忠义之士在这里慷慨悲歌，民族英雄岳飞被害后就葬在这里，后人并为之修坟立庙，一直到现在成为人们凭吊瞻仰的地方。此后元明清各代屡有废兴，清乾隆帝为了镇压南方人民的反抗，曾数度南巡，并在西湖大营宫室。但一直到解放前，美好的湖山却为统治者所占有，山水佳处，布满了达官贵人的别墅，西湖也日渐淤积了。

一九五〇年春天，即建国后第一个春天，上海总工会杭州工人休养所开幕，上海市的一批劳动模范，有史以来第一次到西湖休养，这些来自生产岗位上的英雄，或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漫步揽胜于六桥三竺之间。一位老工人曾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做工三十多年，常听人说起西湖风景，今天才第一次看到。"从那时到现在，沿湖周围已陆续设立了二十多个工人休养所和疗养院，可以同时接待三千多人，每年来此度假游览的工人、学生、教师、干部不可胜数。

到过西湖的人，赞美它，怀念它；未到西湖的人，向往它。若问今天的西湖如何？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它是越来越美丽了，但杭州市人民政府和杭州人民十多年来为西湖所做的工作却不是一句话所能说清楚的，举其大略来说：几年来已挖出了湖底淤泥七百多万立方米，湖水的深度比解放前增加了二倍多，由于两三百年来没有大规模疏浚而显得有点混浊的湖水已变得终岁青碧；像岳庙、灵隐、三潭印月、湖心亭、花港观鱼、柳浪闻莺等

三四十处名胜古迹，有的加以修建，有的加以扩充；在玉泉山一带开辟了占地数千亩的植物园，既可观赏，又可供科学研究；新修了环湖公路，新建了设备完善的宾馆，以便游人；各处增植了名花异草。去年春天，当地的许多诗人、画家、建筑学家、园林工作者曾为如何把西湖建设得更美展开讨论。他们各就西湖进一步的规划，建筑和园林的风格、色调，甚至什么地方应种什么花，植什么树，提出了意见。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却有一句共同的语言：“把西湖建设得更美好。”

（一九六三年第三期）

黄 山 游

周怀民

黄山是我国名山之一。历史上著名的诗人、画家到过黄山的很多。清代大画家渐江、梅清都画过不少黄山风景。特别是石涛，在清代康熙年间，长期隐居黄山，创作了许多以黄山的奇峰异石为题材的画，正如他自己说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是黄山写生中发展起来的。

作为一个画家，我对于美妙的黄山早已心向神往了。过去一些画家，要想游览名山大川，是很不容易的，交通既不便，经济条件也困难。全国解放以后，画家才得到国家有计划的培养，经常组织大家到各处去旅行写生。前年我参加了北京中国画院组织山水画家去黄山旅行。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黄山，比以前更加美丽了。它从一九五四年开始逐步修建成为黄山公园。这里有盘山的公路，直达温泉。周围有巍峨的黄山宾馆、洁净的疗养院、天然温泉浴池，还有观瀑楼和百货商店、邮电局等等，构成了一座闲静而美丽的山林城市。宾馆里的招待员告诉我们，上山要争取时间，否则中途可能遭遇不测风雨。我们就提前安排登山用具，请了两位向导员，预备照顾几位年老的同志。绕过温泉，拾级而上。穿过金砂岭、飞来洞，来到立马亭，立即被那些奇峰怪石和苍松翠竹等美妙景物所陶醉。亭中有老僧，供给清茶，稍一休息就出发到立马桥，在

桥上看到悬岩陡壁上刻有“立马空东海，登高望太平”十个丈方大字。这里削壁百丈，下临深涧，栈道直上云际，道仅尺余。从前游人必须扶壁而行，不敢俯视，畏称之为阎王壁。解放后，黄山所有危道悬岩处处装设了钢铁栏杆，以保证游人的安全。再由度线桥拾级而上，过天门坎、小心坡、一线天就到玉屏楼。

楼前有陪客松两株，左旁有古松，枒枝伸出几丈，作迎客状，即有名的“迎客松”。登楼东望为雄伟突立的天都峰，旁有白云汇合，一峰矗立其间，即耕云峰。楼下即文殊台，在台上可以看到云浪滔滔，孤峰隐现的云海。玉屏峰上可以看到后海，西边可以看到光明顶。在玉屏楼，早晨只有二、三小时的晴天，其余的时间经常处在烟雨迷蒙的境界中，景象变化莫测，而画家们最欢迎这样的奇境。我曾画了一幅大画，并题了“迎客松前云如海，玉屏楼外雨似烟，天都绝顶三千尺，削壁巉巉远接天”的绝句。逗留三天后，我们出发向狮子林西行，过迎客松，下莲花沟，途中有顶平而圆的蒲团松，顶可容几人对坐，游人多喜坐其上。再直上石级千余到莲花岭。过岔路口，忽见石级直下，穿入云际，即百步云梯。面临茫茫林海，层层峰峦，如置身天际。右上有一峰，顶凹如莲房，为莲花峰，即黄山最高处。在峰顶远望，可见长江如带，峰峦连绵。缘峰而下，穿鳌鱼洞，登鳌鱼背，豁然开朗，即为天海。我们由光明顶而下平天矼，一路可以看到天海全貌，再沿东海门绕过石门峰和基石峰，不几里已到狮子林。

狮子林是黄山古庙之一，此地有高山平原的特点，庙旁有狮子精舍，解放以后修建了四层大楼，为西海宾馆。馆旁为散花精舍，前后皆为松林，成为林海。散花精舍前有梦笔生花峰，这是散花坞中一根矗立在松海里的石柱，它犹如一支粗壮的毛笔，顶部尖锐，一株松树从石缝中盘旋而出，故而叫“梦笔生花”。在梦笔生花峰对面不远，一峰从散花坞中耸起，顶分五岔，形似笔

架，是"笔架峰"，有笔有架，奇景天成，也很难得。始信峰与仙人峰间还能看到石笋矼，矼上一根根石柱参差林立，人们称它为十八罗汉朝南海，罗汉高低大小不一，形态各殊，有的矗立峰头，有的静坐松下，有的好像打了一把伞，有的携筇拽杖，观者叫绝，无怪有人把雁荡的龙湫，匡庐的瀑布和黄山的石笋称为天下三奇。

狮子林前的清凉台，是人们留连忘返的地方。台建于突出的悬岩上，三面临空。在台上可远观云海日出。

离狮子林去云谷寺约十五华里。我们在中午抵云谷寺，周围皆大竹林，有异萝松、黄杉等名贵植物。云谷寺经眉毛峰上下十五里，回到黄山宾馆，前后历时已经一个星期了。

黄山是我们画家理想的创作场所。在黄山我们可以遇到四面八方来的画家们，大家都带回了一捆捆的素材，整理后展出了许多次，充分体现了黄山的新面目。

（一九六三年第四期）

春城无处不飞花

徐嘉瑞

昆明，在人们的心中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寄予它很大的热情和绚烂多彩的遐想。真的，昆明确是一个水环山抱沐浴于波光云影中的城市，四季如春的城市。

昆明位于云贵高原的中心，海拔约一千九百米。平均温度是摄氏十六度，气候温和，四季花开，而茶花、杜鹃、报春是最受人们喜欢的三大名花。茶花种类繁多，逢春开放，时间长久，树身高大，有的一树就开两三千朵，是“春的使者”；杜鹃花开放在庭园、山谷，花开时节，到处出现红色、紫色、蓝色、青色、白色、粉色、金黄色的杜鹃花山；报春花常开在田野、溪边，鲜艳的花朵和绿色的嫩叶，像为田野铺上花毡。

万紫千红的花卉，使昆明市的风景名胜，倍加出色。市内的园通山与翠湖相连，山如螺髻，湖似明镜，翠湖掩映在绿柳之中，园通山则被红梅、绿萼梅、白碧桃、红碧桃、垂丝海棠、西府海棠堆成了一座花山。花片随风飞舞，人们在花中遨游，像在阵阵花雨中行走。从园通山遥望，是滇池西岸的西山，它像一个睡美人，躺在水晶的床上。山上树是常绿的，冬天都看不见一片黄叶。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墓就在西山。这一带名胜甚多，最著名的要算三清阁上的龙门了。龙门，气象雄伟，悬岩绝壁，俯临滇池，是清代石工朱家阁的杰作。他用九年的时间，把悬岩峭壁凿成

一条长长的走廊和许多神殿；从走廊的许多天然玲珑的石窗中，可以俯瞰的螺洲，渔村烟舍，和来来往往的风帆。

古建筑遗存的丰富、精美，反映出昆明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西南的重镇。至今仍屹立的东、西寺塔，最初建于唐代；全部以铜塑造的金殿，是十七世纪的产物；而筇竹寺内五百个栩栩如生的塑像，更使观者惊叹不已。

昆明，有着光辉的革命斗争历史，它是一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国民党反动派血肉相搏的城市。特别是在抗日胜利以后，昆明广大大、中学生及人民群众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一开始就采取了极端野蛮的镇压办法，使这座美丽的城市为白色恐怖的气氛所笼罩。市内市郊洒遍了共产党人和工人、农民、学生、教授等革命先烈的血；当时昆明的著名民主人士闻一多教授和李公朴先生，也由于痛恨蒋介石政府的独裁卖国，积极参加民主斗争，而惨遭特务的暗杀。

云南解放了，真正的春天来了。

十三年来，昆明的变化是巨大的：从东站到西站，约莫有五公里，出现了一条崭新的街道，马路宽阔，建筑雄伟，银桦树绿映晴空，西府海棠在日光中分外的红。在新建的工业区，烟囱像森林似的从地上涌出，钢铁厂、机床厂、风动工具厂、印染厂等等，都是最近几年新开出的工业之花。工人住宅及俱乐部，在滇池的波光云影中辉映，一栋不同一栋的结构，一幢不同一幢的风格。

昆明文化教育事业的变化，也是巨大的。解放前夜已变成国民党兵营的校舍，早已气象一新，并且建立了许多新的校舍。工人、农民、少数民族，现在能够大踏步地走入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民族学院……。京戏、滇戏、民族歌舞、花灯，由于贯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到处受到欢迎。

近郊，绿油油的麦田，满地金黄的菜花，拖拉机在道路上奔驰，人们劳动的歌声，此起彼落，这使昆明更充满春天的气息。

（一九六三年第六期）

春江如画

郁　风

我的家乡，在富春江向东转折处的北岸平川上，一峰突起的鹳山脚下，一座名为富阳的古城。登临鹳山，前面可以远眺东去中国东南名城杭州的江尾和来自桐庐方向的江头，点点白帆在层层淡紫青蓝的远山和烟波浩渺的江面之间若隐若现，顿时能使人抛却一切纷扰杂念，心胸开阔清明。从后山可鸟瞰富阳古城新貌，在绿树丛中的白屋黑瓦之间，又增添几许红砖楼房，在群山环抱的远处，矗立着高压线架。

富阳原称富春，富春江即由此得名。

富春江流域山川秀丽，物产丰饶。远在一千五百年前，文学家吴均就称道："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沿江支流甚多，两岸皆山，汇壑成涧，集涧成溪，顺山势而入于江，细流密如竹枝。富春江上连桐江，自桐庐流向东北，经富阳便折而东，下接江流曲折如"之"字的之江，再流入于钱塘江。

富春江江面宽不过二、三里，最宽处也不过五、六里，到桐庐七里泷一带还不及一里，两岸显得壁立千仞，转折处江流湍急，有些像小三峡，著名的严子陵钓台就在七里泷中。这位东汉（公元二五——二二〇年）名士，不事王侯，隐居山林，相传就在富春江一带垂钓度日。宋代（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政

治家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中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就刻在钓台的石碑上。碑石虽早已毁圮不存，但那长满葱翠树木的峭崖，那东西两台上遥遥相望的石柱亭至今仍在。历代的爱国志士常常来这里抒情述怀，如南宋（公元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年）亡后，谢皋羽来到西台上，设酒哭祭民族英雄文天祥，取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跪拜痛哭一场，后来他的墓葬也就在西台旁。中国现代文学家郁达夫于三十年代曾数次来此，写过《钓台的春昼》，又于一九三五年写过一首诗《偶过西台有感》：“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国殇！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犹似泪淋浪。”就是当时痛感国土沦丧，怀念谢皋羽而作的。

其实严子陵钓台在富春江边还有多处，桐庐的桐君山下，富阳的鸡笼山和鹳山脚下，都曾立有“严子陵先生垂钓处”的碑石。历来的诗人名士能够长久被后人传颂纪念，无非是因为他们的高风亮节感人至深。人们热爱自己的家乡，也热爱家乡的先贤，更热爱那些为民族的尊严而献身的人。如今在鹳山临江的山腰上，绕过重修的春江第一楼，有一座双烈亭，就是为纪念我的父亲郁华烈士和三叔父郁达夫烈士而修建的。我国当代文学巨匠茅盾先生一九八一年去世前不久，为双烈亭题写的“双松挺秀”四字的匾额高悬在亭子的门楣上，这里已经成为从杭州来的旅游者的必到之地。

到富阳、桐庐、新安江一线的旅游者，沿路从车窗中就可饱览春江两岸的迷人风光。从杭州到富阳，坐汽车只需八十分钟。清明节那天早上，我从杭州出发，沿路那一片片新绿的秧田和鲜黄耀眼的油菜花；那一丛丛竹林中掩映着白屋黑瓦的村居；那一树树皎洁繁茂的梨花；那重叠起伏千态万变的山峦，形成流动的线，真如“两蛇对走于平野之上”……啊，这一切都属于我最熟悉的美丽的家乡！到了临近富阳郊区时，就不断看到三五人群和孩子

们都捧着大束红色杜鹃花，从田野小路，从山坡上下来，走向城里。原来是这一天许多人家都去扫墓，墓地都在山上，而清明时节正是杜鹃花漫山红遍的时候啊。

家乡，这温暖亲切的概念，不但是和美丽的山川田野联系在一起，也和丰饶的物产和佳肴美食联系在一起。清明时节家家都吃用糯米粉和一种野菜调制的青米裹。闻着烧柴草的炊烟香味儿走进农家，堂屋里的一张八仙桌上常常摆出四碗或六碗菜：鲜嫩的春笋加切碎的咸菜，碧绿的蚕豆加上几片火腿，梅干菜蒸肉，还有那肥美的清蒸白鱼。当然，鱼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有些住在江边的农家，老汉们和十几岁的孩子们常会捉到鲜鱼佐餐下酒。

富春江最名贵的是鲥鱼，每年五、六月间，鲥鱼从大海游到江里来产卵，随着钱塘江的早潮晚汐，逆江而上，最远能游到钓台而回，过去有一首民间俚歌：

早潮归去晚潮来，潮去潮来日几回？
郎信不如潮信准，一天两到子陵台。

如今在七里泷严子陵钓台附近，建成了富春江水电站，沿江城乡用电由它供给。水库的大坝虽然留有鱼道，但鲥鱼还是逡巡不前，所以只有在桐庐以下的富阳才能捕到鲥鱼了。

（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鲁迅的故乡—绍兴

钱 浩

也许是历史的偶然，也许正如俗话所说的"人杰地灵"，绍兴，这个古城，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故乡，往往以它古老的历史故事，钟灵毓秀的山川风物，显示出它特殊的魅力。

绍兴坐落在浙江省钱塘江南岸不远的会稽山和镜湖之间。镜湖又名鉴湖，因水清可鉴而得名。这山山水水之间，纵横的河流交错着良田沃野，轻盈的小船打桨来去。把船篷油漆得乌黑的小船，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它可以让你在绍兴城乡之间徜徉遨游，领略那如诗如画的水乡风情。

白白的墙，黑黑的瓦，临水的房屋夹着望不到头的小河；曲曲的拱桥，高高的宝塔，青石铺成的窄窄的街道，这就是绍兴，一个纯东方式的城市，而这个城市周遭的古迹，更向你诉说着它迷人之处。

中国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在这里留下了足迹。远古时代，中国到处洪水泛滥，禹凿通江河，引洪入海，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他在会稽山下大会诸侯计功而殁。他被葬在稽山之麓，是为禹陵，后人立庙纪念。他是夏代（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前十六世纪）的第一代君主。历史学家认为夏是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开端。鲁迅的

《故事新编·理水》中对禹公而忘私的精神，有很有趣而形象的描写。

绍兴古称“越”，因为它是春秋（前七七〇——前四七六）时越国之地。当时诸侯并立，吴国（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和越国为世仇，相互征伐，越王勾践战败被俘，受辱于吴王夫差。后来勾践被释回国，他“卧薪尝胆”，以不忘奇耻大辱，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兴兵灭吴，报仇雪耻，这在绍兴几乎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书法家东晋时的王羲之（公元三二一——三七九）长期在绍兴居住。传说他勤学书法，洗笔的池水都变黑。南宋时，这里又出现了伟大的诗人陆游（公元一一二五——一二一〇）。他留下了九千多首诗篇，反映了那个时代广阔的生活。

本世纪初，古意盎然的绍兴，吹出了革命的号角。中国妇女界先驱，革命志士秋瑾（公元一八七五——一九〇七）于一九〇六年从日本回国后，在此联络志士，组织光复军，密商起义以推翻腐朽反动的清政府，事败后壮烈牺牲于城内轩亭口。她的鲜血在夜气如磐的黑暗的中国，射出一缕曙光。鲁迅以极其悲愤的心情于一九一九年写下了《药》。文中被杀的革命者“夏瑜”，即隐喻秋瑾。

在抗日烽火连天的一九三九年，即秋瑾就义三十二年之后，风华正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来到了绍兴。他挥笔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鉴湖女侠，即秋瑾。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关头，周恩来以秋瑾的精神，来激励浙东女儿，可见秋瑾献身精神感人之深。这里应当提到，周恩来的祖籍正是绍兴。

鲁迅于一八八一年九月诞生于绍兴城内东昌坊的一所老屋里，童年是在绍兴度过的。他的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社戏》、《阿长和山海经》、《父亲的病》等等，都描绘了他童年的生活。鲁迅于一八九八年（十八岁）离家去南京求学，一九〇二年东渡日本，一九〇九年七月回国，一九一〇年七月回绍兴教书，一九一二年去南京教育部任职。在绍兴教书的近二年间，他目睹辛亥革命在这个古城所激起的波澜和社会各阶层人物在这场大变革中的色相。这些，在他的《阿Q正传》、《风波》等作品中，都有极其深刻的反映，并揭示出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没有改变下层人民的命运。

绍兴的风物，绍兴的各色人物，常常是鲁迅小说中的素材和模特儿。故乡的生活，在鲁迅的创作中，占有不小的份量，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以至景物的描写莫不具有浓郁的乡土色彩。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鲁迅从北京回绍兴，二十四日举家迁往北京。此后，他没有再回故乡。一年多以后，鲁迅以这次回乡的经历作小说《故乡》。作者描写了儿时好友闰土的形象——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农家孩子被社会挤压成一个麻木得像木偶人似的受苦的农民。这是旧中国农民悲惨的命运的缩影。作者的心情是十分悲凉的。对于故乡的风貌，他写道：

>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但是，鲁迅是奋然前行的斗士，他没有被悲凉所压倒，《故乡》的末尾，他指出，年青一代“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又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鼓励人们起来探索真理，寻求道路。

从一九二一年鲁迅作《故乡》到现在，六十年过去了，他诞生迄今已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来，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制，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无数志士仁人，革命先驱，为振兴中

华，为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终于改变了疮痍满目的旧中国的面貌，使人民有了新的生活。绍兴这个古城，鲁迅为之歌咏，为之叹息，为之悲愤的他的故乡，也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复是他笔下的情景了。

（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从兰州到玉门

谢泗春

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从兰州乘了兰（州）新（疆）路的火车往西去。兰州的夜景很美，月光静静地洒在窗外那一片片新建筑物、瓜田和果园上。万家灯火逐渐落在后面了，迎面隐隐传来了黄河波涛拍击的声音。

跨过黄河铁桥，前面就是山区。一夜过去，火车逐渐接近乌鞘岭。这里地势越来越高，火车盘旋而上，一连穿了两个山洞。我收起扇子，穿上毛衣，但仍然感觉到冷风刺骨。看到窗外铁路工作人员身上的棉袄和山顶的积雪，一时竟忘了现在正是盛夏，原来这里已经拔海3,000公尺。

过了乌鞘岭，地势渐渐平坦，开始进入“河西走廊”。这条两山之间的、长达1,200公里的“走廊”，远在两千年前就是中国对外交通的孔道。汉朝的张骞在纪元前第二世纪出使“西域”（新疆及苏联中亚细亚一带），唐高僧玄奘在第七世纪到“西天”（印度）取经，都走的这条道路。那时候，人们只能骑着骆驼，冒着风沙，长期跋踄。而现在，我是坐在舒适的车厢里了。这条2,300余公里长的铁路将一直穿过“走廊”，直到国境和苏联铁路相接，是我国去欧洲的最近的道路。

下午，车到武威附近的黄羊镇，这里正在建设一座新的文化城，有综合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学院、水利学校等，学校之

外，还有工厂。但在我的地图上还找不到这个地方。

到张掖已是暮色苍茫了，我下车逗留了几天。这里的水稻非常有名，整个城市沉浸在庄稼、果园和菜园的绿色里，越过它们可以遥望祁连山上皑皑的白雪。在西北水是比较少的，但张掖却处处是水田、杨柳，一片波光树影。古人有诗说"不见祁连山上雪，错将张掖作江南"，这是完全真实的写照。这里还保存着许多汉、唐时代的古迹，其中以佛教寺庙为最多。十三世纪末叶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说此地"佛多于人"。这个古城现在虽然不过几万人口，但随着兰新路的通车，它将变成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

由张掖西行八、九小时，就是万里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它那高耸的楼阁背衬着蓝天，极其壮丽。过了关，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过去因为交通不便，人们往往把关外的道路视为畏途，有"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的说法。现在有了汽车、火车，旅行的人再也感觉不到这种精神威胁了。

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玉门市就在嘉峪关外二十多公里的地方。这里距兰州约八百公里，有一条支线直通矿区。在停留的几天当中，我常常看见油罐列车浩浩荡荡地从矿区开出来，运送矿山设备的列车又接二连三地开进去。过去一直影响油矿大规模建设的运输问题现在根本解决了，运费比汽车也省去了十分之九。矿区车站附近已经盖起旅馆、食堂和百货公司，在商店里还能买到内地运来的新鲜鱼虾、瓜果和蔬菜。

目前兰新路只通到玉门，这里也是我这次旅行的终点。筑路工程人员告诉我说，再往西去，线路要经过翻浆地带和石膏地带，工程十分艰巨。但在我离开那里时，往前一直到新疆哈密之间的线路上，筑路的施工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地摆开了。

（一九五六年第十一期）

安西“风库”

张吉年

一九三五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里，描写甘肃省安西县的荒凉景象说：

“民间村落十分之五六已无人烟，多分别逃往哈密、敦煌一带。就城厢而言，原有户口九百户，去年七百户，今年只有五百户，差不多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在递减……”

安西为什么衰落到这样的地步呢？除了人为的原因外，也在于它的自然条件。这里一向以风沙著名，被人称为“世界风库”。当地有句俗话，“一年一场风”，就是形容这里终年不断地刮着八级到十一级的大风，连城墙也被风吹开许多缺口，南门外的环城乡还被风沙埋没了五千多亩良田和五十八个村庄。无怪农村谈起年景来，常常要带着绝望的神情说“风收”，而不是“丰收”了。

长期遭受风沙灾害的安西人民，在解放前夕已经濒于绝境。但最近五年来，政府领导人民在流沙严重的地区封滩育林，在戈壁滩边缘、田间、河畔、渠边和村舍周围营造防沙围沙林，阻止了从戈壁滩吹来的风沙。安西又很少下雨，年雨量不超过五十毫米，过去主要依靠祁连山流下的雪水和泉水来灌溉。现在，他们整修了旧有渠道，修建起小型水库，还开辟了一条五十公里长的新渠道，把疏勒河水引来灌溉十余万亩农田。

经过艰苦的搏斗，安西人民已经初步战胜了风沙的侵袭，五年来农业生产年年获得丰收。一九五七年全县十一万亩小麦产量达三千二百九十九万斤，比解放初期增产了一倍。今天，这片不毛之地不仅变成宜耕宜牧的好地方，而且将成为西北的重要农业基地。逃亡在外的人都已陆续回来。过去缺少衣着不敢出门的人家，现在炕上垫的盖的都是一床床新棉被；姑娘们穿红着绿，春装秋装总有几套。环城乡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在信用合作社里有存款，最高时平均每人存了四十元。这些变化说明，安西人民已经在风沙面前站稳脚跟了。

（一九五七年第十二期）

水乡白洋淀

春风

我来到这里，淀里的冰还没有融化，冰天相接，一望无边。冰床像离了弦的箭，又像大海中的一片竹叶，向前飞驰。

撑冰床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叫王景生，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个聪明人。我问："小王同志，白洋淀有多大？"他说："不知道，我打八岁起跟咱爷捕鱼，整天在淀上跑，也没全跑到。"我又问："淀里每天出多少鱼？"他说："不知道，只晓得，北京、天津和保定城里吃的鲤鱼、青鱼、鲫鱼……大都是从白洋淀运去的。"

杨庄子，是水淀中心的一个小村庄，出门串亲也得撑船或坐冰床。二百来户人家，主要靠捕鱼生活。

我和村里的老渔民杨树桐一见如故，他是白洋淀人民公社杨庄子管理区养鱼专业队的副队长，曾被选为全国渔业劳动模范。这是个精神焕发，热情奔放，爱交朋友，也爱说爱笑的老人。我问他养鱼的好处究竟怎样？他用力拍拍我说："一条小鱼苗放到淀里，一年就能长四、五斤；一斤鱼可顶四斤粮。"

"产量呢？"

"很好，一九五四年合作化后，开始大力养鱼，产量一年比一年多。头两年平均亩产1,800斤，一九五七年就达到了3,663斤。一九五八年，有一亩田产了63,818斤，大规模捕捉还要等解冻后才

开始。”他是那样喜悦和自豪。

村庄里到处都是叮咚的修船声，各色鱼网迎着阳光挂在墙上，女人们在编着席，织着篓，一切都可明显的看出，一个大规模的捕鱼场面，很快就要在这里出现。

白洋淀里，有许多大小村庄，洁白的房屋，晶莹的冰，举目四眺，是一片银色世界。冰面笼罩着一层薄雾，水乡特有的新鲜空气使人心旷神怡。

（一九五九年第七期）

芦沟桥畔话今昔

俞铭传

游览芦沟桥，除了站在桥上眺望永定河的景色，往往总要数一数桥上的石狮子。永定河的水流，平常既浅又窄，洪水季节却象万马奔腾，忽然宽了好多倍，因而芦沟桥长达十七孔，桥两边的石栏杆共有二百八十一根石柱——每根石柱的顶上都刻着一个形态不同的狮子，有些狮子的身边和怀里还刻着姿态不同的小狮子，有些顽皮的小狮子甚至爬到大狮子的背上和头上去了。桥头的石碑上刻着乾隆皇帝书写的“芦沟晓月”，它会引起你的想象，使你走进“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境界。

芦沟桥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它是北京附近的名胜，而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起，它的名字却传遍了全世界，因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就是从“芦沟桥事变”开始的。

“那时候，”芦沟桥头的老居民何宝全滔滔不绝地叙述着当时的目见耳闻，“日本军队驻扎在丰台，常常到芦沟桥附近来实弹演习，闹得老百姓都不敢下地。我们这个芦沟桥镇过去是宛平县城，城内驻了二十九军的部队。七号晚上鬼子又来演习，并且硬要进城来搜索。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钟左右，鬼子在芦沟桥上边不远的铁路桥那儿响了枪，于是就打了起来……”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日本侵略者一九三一年占领我国东北后，节节南进，企图吞并全中国。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奋起抵抗，终于战胜了侵略者。

时隔二十二年——实际上只是经过了解放后的十年，芦沟桥一带的面目已经根本改观，你在这里只能见到一片繁荣的景象了。芦沟桥上铺了柏油，络绎不绝的车辆中出现了一些带着拖车的拖拉机。永定河的上游修了官厅水库，芦沟桥桥墩在洪水季节也不会受到万马奔腾的冲击。过去的宛平县城，虽说城墙上还能看到当年的弹痕，城门楼却已拆去，崎岖狭窄的街道变成了平坦宽阔的马路。城外的铁路已经改成双轨，时时可以看到相向而行的列车擦身而过，有时候一个车头拖上六十多节车皮。两岸的田野里新修了纵横交错的自流灌溉渠，尽管今年春夏间特别干旱，五丈深的井里都看不见水，永定河水却向麦地和菜地踊跃地流去。东岸的田地里不仅种植粮食作物，还种植了几千亩蔬菜，建起了养鸭场，饲养了五千只北京鸭。养鸭场附近有一个乳牛场，那是石景山钢铁公司为了职工喝牛奶的方便而设立的。西岸的小麦，已经采用马拉收割机和联合收割机来收割。在日本侵略者曾经建立过兵营的丘陵上，农民们栽了核桃和其它果树。麦地旁边，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扩建的厂房和另外几座庞大的工厂也平地而起了。

（一九五九年第十三期）

河西走廊巡礼

何世尧　邓永庆

阿尔金山上，七月里仍然寒风刺骨。一下山，进入戈壁滩中，火辣辣的太阳却晒得浑身冒汗。

我们跨过阿尔金山，从青海柴达木盆地冷湖到了甘肃河西走廊的西端。

这条走廊东起黄河，西达玉门关，南面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面是连绵起伏的合黎山和马鬃山。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铁路横贯走廊。

汽车在戈壁中行驶。远远地出现一片湖水，波光闪闪。湖边是一片稠密的树林。在干渴的戈壁滩上望见绿洲真是使人精神振奋，但汽车驶了很久，前途仍是望不到头的公路，绿洲不见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戈壁滩上一种幻景。

眼前又是一片浓绿，一座城。我们以为又是大自然在变魔术，但司机说："这却不是幻影。敦煌到啦！"

敦煌在河西走廊的西端，是我国汉唐两代和中亚及欧洲各国陆上交通的必经之处，是著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文化遗迹很多。附近的千佛洞保存着北魏到清初的壁画和彩塑。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敦煌研究所的人员正在临摹壁画。他们已经修整了三百多个石窟，临摹了九百多平方米的壁画，并且做了许多研究工作，最近三年来，那些临摹的壁画曾在国内外多次展出，

让许多人欣赏了这些珍贵的古代艺术。

敦煌地势低，气候温和，每天有十多个小时的日照，自然条件很好。但是解放前，反动统治者逼着农民把最好的土地全种上鸦片，军阀地主大发横财，农民却穷得饥寒交迫。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都没有裤子穿，春荒时节只好扶老携幼地外出逃荒。那时侯，整个河西走廊都是这样。如今这种苦难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十年来，敦煌人民大规模地修建水渠，把祁连山上的雪水引来灌溉，棉花和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我们来到的时候，碧油油的棉田里有许多穿着花衣裳的姑娘在喷射杀虫剂，金浪滚滚的麦地里已经开镰收割，各种果树上果实累累。这儿著名的杏子又大又甜，现正是杏黄时节，我们第一次尝到了那样香甜多汁的杏儿。

吃着敦煌的杏儿到了峡东，改乘火车去玉门市。峡东是一个新的市镇，也是兰新线上的一个转运站，一般的地图上还找不到它的名字。

玉门市拔海二千四百米，伸向市区的柏油马路两旁栽着白杨，街心花园里开着各种耐寒的鲜花，戏院、电影院经常满座，书店、银行应接不暇。

最近，玉门油矿正集中力量建设鸭儿峡新油田，几千人日夜不停地在开凿油井、敷设输油管和输水管、安装采油和储油设备。山坡上、山谷里，到处耸立着钻机的钢架、庞大的油罐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马达的巨响震动山谷，汽车拖着黄尘滚滚的尾巴往返不绝。整个矿区，就象一架巨大的发动机，一刻也不停地在转动。新油田的计划产量约为老油田的百分之三十五。听说已有三十多个自喷井投入了生产。

离开玉门，我们到了万里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城墙上的两座楼阁，据说建于明朝，现已修饰得金碧辉煌。站在城楼上四周眺望，茫茫的旷野上奔驰着汽车和火车，远处钢架林立。在那机器

轰鸣、人声鼎沸的地方，一座大水库快要出现了，那是为了供应工业用水而修建的。

嘉峪关旁的酒泉城，将要成为一个崭新的工业基地。铁矿丰富的镜铁山就在它的南面。这座古城有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位将军战胜归来，皇帝赐给他一坛美酒，庆贺他的功绩，但他把这坛美酒倾入一眼泉水中，让士兵们和他一起来痛饮分享荣誉，因此，这座城市就叫“酒泉”。现在，城里的泉湖公园中还有一口大井，旁边竖立着一块“西汉酒泉胜迹”的石碑，据说就是当时将军和士兵饮酒的地方。

我国很多人都能背诵这么一首唐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诗中提到的夜光杯是这里的一种特产，它是用祁连山中的水晶石和变质岩雕琢的，颜色有白、有黑、有墨绿，质地晶亮而透明。

从酒泉东行，火车在金色的麦田里和翠绿的果林中穿过。约四小时，到了张掖。这是走廊中最狭窄的地带，也是最富庶的地带。几年来，这里的几条河流都被疏通了，祁连山上的雪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耕地面积比解放前扩大了将近三倍，稻、麦、棉、麻连年丰收。今年春季，这一带曾经每天动员五十万人植树造林，防止风沙的侵袭。

我们又从张掖到了山丹。原来只有几片作坊，现在已有冶金、石油化工、煤炭、机械制造等四百多个大小厂矿。

当我们再坐上火车向武威驶去的时候，深切感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急骤前进的脚步声，一列列满载着石油的油罐车在向东飞驶，满载着机器和日用品的列车又在向西飞驶。穿着紫绛色长袍的藏民，戴着小花帽的新疆人，说着北京话、上海话、东北话或四川话的工人和专家，在沿线各站上上下下。他们是到柴达木去勘探矿藏的，是到克拉玛依去钻探油井的，是到黄河上游去建设大桥的，是到北京去研究建设计划的，是回家去探望亲友的……

到达武威后，我们访问了附近的黄羊镇，这是一个文化镇，一九五六年才着手兴建，甘肃农业大学和甘肃农业研究所都设在这里，还有畜牧、农业机械、水利、铁路运输四个中等技术学校和一个普通中学。

河西走廊有无限丰富的矿藏和各种物产，正等待人们去开采和建设。过几年再来，一定会看到更多的新兴工业基地和新兴城市。

（一九五九年第十八期）

芦笛岩

于宗

我国的著名风景胜地桂林，新近发现了一离奇的岩洞，它坐落在桂林市西北的茅茅头山，距市中心区约六公里。

山形像个馒头，在它的半山腰有个洞口，两旁生长着芦草，当地群众因为喜欢用这些芦管做笛子来吹山歌，就把这个岩洞叫做“芦笛岩”。洞口又矮又小，似乎是个很平常的岩穴，但是一走进洞里，却像进入了神话世界，各色各样奇特的钟乳石琳琅满目，光辉耀眼：红的如珊瑚，绿的如翡翠，黄的如琥珀，白的如玉石，更使人奇怪的是，那些石头有的上下相连形成擎天石柱，有的平地突起变成丛丛石笋。有些石柱石笋一经敲击，还铿铿有声，如同弹钢琴那样。整个洞府像是用珠宝、象牙、绸缎和脂粉堆砌起来似的。

整个洞可分前洞和后洞两大部分。前洞是一个又深又大的由马蹄形通道连成的洞穴；后洞则是一个宽广深邃的大岩。在前后洞连接的地方，有一个水潭；水潭附近还有一个广场，四周石柱顶天立地，一节一节，粗细不等。也有一些半截的石柱，上端好似放着花盆，花枝招展。这个广场大约可容二、三千人，正面像一座大宫殿，又像一座舞台。沿着马蹄形通道前进，有时要钻过又低又矮的石门，有时要经过一段羊肠小道。离后洞口不远处，耸立着一座巍峨的石台。周围奇峰突出，衬以浅红色和橙红的岩

壁，很像晚霞掩映在山石疏林之间。正面出现的一组乳白色的石雕，好比汉白玉砌成的宝座，上边仿佛坐着一位端庄美丽的仙女，身穿绫罗衣裳，长裙曳地，吴带当风，她的眼睛含情脉脉，如有所待。

洞中石壁上有许多唐、宋、元、明、清的题字，字迹大部尚可辨认。其中有一处写着“贞元八年十月”，这是公元七九二年，即唐德宗时候的笔迹，距今已一一七〇年，应该算是岩洞中最早的题字了。唐代题字中较早的，还有元和元年（公元八〇五年）及元和十二年（公元八一七年）的题字各一处，都是记游题字，只有人名和时间。照这些题字看来，芦笛岩早在公元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已经吸引了许多游客。同时，这些题字都出自和尚道人之手，其中一则还是越南河内客僧的笔迹。这反映了唐、宋时代，桂林佛道昌盛，僧侣云集的情况。当时桂林西山的西峰寺，就是南方五大禅寺之一，如今西山观音峰上，还有唐调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的摩崖造像。

至于元、明、清以后的题字，除了记游性质的以外，还有许多是记事性质的，而且都集中于后洞大岩里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的情况。从题字中错别字和文法不通的情况看来，这些题字显然是出自当时的避难群众之手；而且可以断定，明末以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岩洞成为当地人民群众避难之所。

在芦笛岩附近的于家村，笔者访问了几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说，好几代以来，村里人都把岩洞当成兵荒马乱时躲难的地方。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岩洞前后种有树木、荆棘，并且相约不许砍伐，平日用石头封闭洞口，需要时才将洞口打开。一九五九年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于家村农民向人民政府献出了他们长期保密的芦笛岩。经过两年多的开拓，岩洞内已修了通道，安装了电灯，过去避难之所又复成为游览胜地，使埋没已久的明珠，重现光辉。

（一九六二年第六期）

千里嘉陵

张韫磊

嘉陵江发源于秦岭，流经陕南、甘南的山谷进入“天府之国”的四川以后，奔腾在郁郁葱葱的大巴山、剑门山之间，而后南越丘陵起伏、田畴相望的川中盆地，在重庆与长江汇合。干流长达一千一百多公里。在万里长江的许多大支流中，它的长度仅次于汉水；水量仅次于泯江，平均每秒钟倾注一千九百七十多立方米的水给长江，壮大着长江东去的浩荡声势。

解放后，嘉陵江两岸，新建的公路四通八达，从前交通最艰险的上游地区已通了火车；下游由南充至重庆可通轮船。古人所说“路半嘉陵头已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今年春天，我由广元，过阆中，经南充，走合川，最后到达重庆，在千里嘉陵江上作了一次旅行。

春天，嘉陵江烟树清澜，和风习习，夹岸桃李槐花，使一江春水都飘散着清香，广元往下的江面上，从拂晓到天黑，运输粮食、食盐、煤炭的船只鱼贯而进。到了南充专区的阆中，就离开山区，进入川中盆地了。

南充专区是嘉陵江流域的重要粮油产地。提起这个专区这几年来的粮食生产，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由于农田基本建设好，全专区机电提灌设备已增加到七百九十多台，今年能比去年多灌二十一万多亩土地。

四川省原有"蚕丛古国"之称，而嘉陵江流域的蚕桑生产在省内占有重要地位。四川省有四个大型缫丝厂，南充、阆中两县就占有三个。今年开春以来，全专区又栽种了一千七百多万株三尺以上的桑苗。全省最大的蚕种场，最近也在阆中落成。

武胜在嘉陵江畔原是一个最穷的县，由于土薄石多，以往农作物产量很低，但人们依靠集体经济力量，奋发图强改变了自然面貌，使全县几年来一跃成为全省的粮油高产县。我到达武胜时，田野间一片金黄，麦子、油菜长得很旺盛。

越往下走，天气越热，到了合川，豆麦已熟，人们开始收割了。

嘉陵江畔的新人新事真是说不完。苍溪县木船运输合作社船员罗洪元，有一次放船到南充，听说那里的江上渡口，因江水猛涨吞没了渡船上的一辆汽车和一口锅炉，汽车打捞起来了，但那口锅炉一时无法打捞，他就连续二十余次下到寒冷透骨的江水里去，由岸上人们加以帮助，终于把锅炉捞出来。事后有关单位给他奖金，他却笑笑说："我不是为钱来的，是为国家财产不受损失而打捞的。"象这样生动的事例举不胜举。

嘉陵江现在变得更加美丽了，这是沿岸千多万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画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美丽图画。

（一九六四年第十一期）

天山脚下

茹遂初

自敦煌东北行百余公里，便是兰新铁路的柳园车站。从这里换乘西行的火车，不久就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时，新疆及其以西广大地区被泛称为“西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新疆在中西交通上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新疆境内，丝绸之路有沿着昆仑山北麓西行的南道和沿着天山南麓西行的北道，还有沿着天山北麓西行的北新道。北新道自敦煌经哈密北越天山，西行经伊宁，渡伊犁河、楚河，直至黑海、地中海。隋（公元五八一——六一八年）唐（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以来，它是中西陆上交通的重要路线之一。

哈密绿洲

哈密是进入新疆后的第一块大绿洲。我们来到这里，只见水渠纵横，树木和庄稼郁郁葱葱、生意盎然，同周围的戈壁形成鲜明对比。哈密东距甘肃的安西，西至吐鲁番盆地的鄯善，都有三、四百公里，其间大多是广袤的戈壁，表面复盖着一层砾石或粗砂。由于极端干旱，极少植物生长，景象甚为荒凉。在古代，穿行戈壁的旅途艰辛是难以想象的。我国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西行去天竺（今印度）求法，出玉门关（今安西境内）后，他只身在茫无人烟的戈壁中，一连行走了“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

焦”，以致晕倒在地。在这九死一生的关头，忽然吹来一阵凉风使他甦醒过来。玄奘背起行装，挣扎着前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泓清澈的泉水出现在眼前，他喜出望外，饱饮之后，继续登上征途。他以“宁可西进而死，决不东归而生”的决心，终于渡过戈壁。当他进入哈密绿洲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

过天山

离开哈密绿洲，我们驱车北行。巍峨的天山横卧在眼前。行约三十余公里，便到达天山脚下的南山口，这是古代穿越天山进入北道的主要孔道。山上有石砌的方形建筑一座，当地人称为天山庙。古代商旅经过这里，大概要焚香礼拜、祈求旅途平安。我们站在山顶向北望去，山坡松林密布，山下则是绿草如茵的大草原，景象和天山以南迥然不同。丝绸之路的北新道过天山后即沿天山北麓的草原西行。这里因有水草之便，对于古代主要以马和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商队和旅行者来说，自然要方便一些。

夏天，天山气候多变，时而阳光灿烂，雪峰晶莹，雄伟壮丽；时而云雾弥漫，大雪纷飞，神秘莫测。我们站在山顶观赏四周如画的景色，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岑参的名句：“天山有雪常不开，千峰万岭云崔嵬。”

巴里坤话古

越过天山，我们来到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所在地巴里坤镇。

巴里坤古为蒲类国，由于水草丰茂，又是北新道的必经之地，这里曾是汉王朝（公元前二〇六年——公元二二〇年）和我国雄踞北方的匈奴争夺的古战场。公元七三年，汉明帝命窦固、耿秉统兵征伐匈奴，在伊吾庐（哈密附近）置“宜禾都尉”，留兵屯田。当时，蒲类属伊吾司马管辖。公元一三七年，匈奴呼衍王南下侵扰，敦煌太守裴岑带兵三千，在蒲类击败匈奴。公元一七

二七年在巴里坤发现一方汉代石碑，记述了裴岑的这一功绩，这就是有名的“裴岑纪功碑”（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公元七〇二年，唐王朝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经营，在庭州（今吉木萨尔县）设置北庭都护府。蒲类是庭州属下的一个县。

从巴里坤镇西行，我们看到连绵不断的烽火台。虽然经过漫长的历史时代，古道早已湮没，但那一座座屹立的烽火台，仍在向人们指示着古道的踪迹。沿着天山北麓的大草原一直往西，即可到达北庭都护府的治所所在地——今吉木萨尔的破城子。遗址虽然只剩下城墙的残迹，但仍可窥见当年的规模。近几年来，这里陆续出土有莲花纹铺地花砖、铜镜、铜狮、刻花石球、下水管道等文物。

天山牧区

天山北坡由于有来自北冰洋湿润的气流，年降雨量可达二、三百毫米，牧草生长茂盛，草原辽阔，是新疆主要的牧区之一。这里居住着以畜牧为主的哈萨克族牧民。

我们在天山牧区旅行时，牧民已转移到夏季牧场。在松林边、小溪旁散布着哈萨克族牧民的一顶顶白色的圆形毡房。这种毡房和蒙古包很相似。它是在用木条编排成的骨架上复盖一层羊毛毡而成的，易拆易搭，适于牧业生产流动性大的特点。

好客是哈萨克族牧民的传统。不论相识与否，只要你走进毡房，都会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我们每到一处，主人总是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和我们拉家常，用奶茶、马奶、酥油、手抓羊肉等款待我们。夏季饮用马奶清凉爽口。据说马奶不仅营养价值很高，而且有降血压、治疗胃溃疡的功能。

哈萨克族牧民勤劳、勇敢。在巴里坤牧区，陪同我们采访的同志讲述了女放牧员毕肯一家为保护集体羊群和暴风雪作斗争的事迹。去年四月九日中午，天气骤变，一场特大的暴风雪席卷草

原，气温急剧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放牧在草原上的羊群随时都有冻死的危险。毕肯一家除了两个最小的孩子外，都立即出动寻找羊群，直到夜里，才将羊群赶回圈。可是一点数，发现少了十二只羊，毕肯的丈夫夏卡带着十六岁的儿子哈不鲁哈吉，顶着暴风雪，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仔细搜寻，直到第二天早晨，终于将散失的十二只羊全部找回。毕肯一家的事迹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独特的网河区

王庆恩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它的广义范围是指珠江下游一块面积较大的冲积平原；狭义的，也就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三角洲，则是指这个冲积平原上一片滨海的网河区，面积约一万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它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富庶美丽的地区之一。

佛山古镇

佛山位于三角洲北部，有人口二十万。早在十七世纪，就与其它三座古城镇并称为我国“四大名镇”。佛山市区街道整齐，曲折的小巷，多层的宝塔……，显得古老而美丽。

佛山市中心有一处古建筑群——祖庙，殿堂到处装饰着绚丽夺目的彩陶塑、砖塑和金漆木雕。据说，古代三角洲常患洪水，人们便修建了这座不寻常的庙宇来奉祀一位水神。现在到祖庙来的人为的是参观、游览。

佛山早在五十年代就是全国闻名的卫生镇，如今看来仍然整齐清洁。早晨，有头戴竹笠，手持笤帚的街道妇女在认真地清扫马路，挑着新鲜蔬果的人流络绎进城。移时，天光大亮，街上人来人往，自行车像潮水一样涌过市内几处十字路口。

佛山市郊的石湾镇，是个经历了千年盛衰变化的制陶业中心。

现在，镇上十九家陶瓷厂，分别生产工业、建筑、园林、电瓷、日用陶瓷、精瓷、美术陶瓷等产品。珠江三角洲上有一百多个花岗岩丘陵，在炎热的气候下逐渐风化，便成为高岭土，是制陶的原料。

基塘区

沿着公路继续南行，途经南海县与顺德县交界的九江水乡，田园景色起了明显变化。

在南海县北部，我们看到的是大面积水稻田；一过九江，特别是进入顺德县境，公路两边全是一片连着一片的鱼塘，一眼望不到边，塘基上或种桑树，或种甘蔗，或栽香蕉。这是珠江三角洲上特有的一种景色。

根据我们访问过的一些公社和大队来看，这里的农民都懂得他们周围各种生物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植桑以养蚕，同时把蚕粪、蚕蛹投到塘里喂鱼。由于桑、蔗和鱼塘互相连接荫蔽，调剂了小气候，鱼儿在适宜水温下长得很快。农民再把塘里的淤泥挖出来填到塘基上，成了桑蔗的肥料。这样水陆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形成了独特的人工生态平衡系统。

河网与大沙田

跨过基塘区，我们进入三角洲南部的沙田区。这一带的河流密度比北部更高，有时半天路程就要过三条大河。这些河流大都互相串通，支岔纷繁，使你弄不清它们的来龙去脉。不过总的来看也有其规律，这就象一张由西北向东南撒开的渔网，以放射状大汊河为主体，由宽度几百米到二千多米的纵向河道构成网状水系的经线，由宽度仅百余米的短小横向汊河构成纬线，大大小小的河流总共有一千多条。地理学家曾经指出，这种放射状河流的形成过程是：主干河道每穿过一列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就呈扇形散开，结果冲积出一片大沙田。

这天，当我们来到这片沙田区中心的横栏公社时，正赶上一场大雨，公社负责人说，等雨一停，他们就要从田里向外排水。在珠江三角洲，机电排灌站密布，这是解放以后三角洲上农田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

围海造田

斗门县则另是一番景象，这里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围海造田。在到达斗门县城之前，我们渡过了西江下游的入海口门——磨刀门水道，这是珠江的八大口门中最大的一个。珠江下游属于弱潮河口，河流泥沙受潮汐顶托后大多在口门外沉积，从而陆地不断向外延伸，其速度每年约八十至一百三十米。人们适应这种情况进行围垦以增加土地资源，使三角洲沿江出海水道和海岸一带建设了一些垦区。

这里的围垦方法听起来也很有趣，它是先沿着一条规划好的堤线抛石入海，使河口泥沙在堤线内逐渐淤积，随着不断抛石，水下的淤积层也不断加厚。一般成田要经过四个阶段：鱼游、鹤立、脊卤、草埔——先是看见浅水区内出现了小鱼；继而长腿鹭鸶飞来水里觅食；其后则死鱼的残骸露出在淤泥上；再后地面长出水草即可逐渐加以人工种植。

葵　乡

从斗门往下，我们折向西北行，来到另一个美丽的城市——新会。

这个城市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树多，据说它的每一条街道各种一种树，有白玉兰街、紫荆街、龙眼街、芒果街，樟树街、桉树街、人心果树街……。至于葵树，则城里城外、路边、公园、田埂上、河岸上……，处处都是。葵可制扇、制签、席子、花灯、床垫、扫帚、果盘、篮子等等共有二十九大类，三百多个品种。

新会县现有三十六家葵品加工厂，从业工人六千多，厂外加工人数约五、六万，仅葵扇一项就年产一亿柄。

与新会相毗邻的江门市，是个热闹的内河港口，船舶北通广츠和西、北、东江，南达湛江、海南岛、香港、澳门。市内有化工、造纸、食品、机械、电子、纺织等工业，其中江门甘蔗化工厂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甘蔗综合利用企业。

在侨乡

两天后，我们离开网河平原，看到了西部起伏的丘陵。在种满水稻和花生的公路两侧，簇集着一处处古堡式、楼廊式、教堂式的侨乡建筑，把田野打扮得更加多姿多采。

“我县五十八万人口，在外华侨和华人三十六万三千多人，”除在港澳的十二万二千多人，分布全世界五十七个地区和国家。开平县侨办主任对我说。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广东曾有几次大的移民潮向着海外。最近几年，有些在国外出生的华裔青年，带着父母提供的模糊线索，不远万里回到这片故土，为的是寻找前几代人住过的祖屋。而那些上年纪的人则是带着更复杂的心情回来探亲访友。

我们从开平经台山驱车赶到西江边的鹤山县，从那里我乘上一艘北上的内河小火轮，半天时间就回到南方的名城、广东省的省会广州。

（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粤北的山山水水

——记北江流域

曾湘敏

北江流域面积四万六千六百多平方公里，百分之九十二分布在广东省的中、北部，俗称粤北地区。

北江流域正处五岭南坡，属南亚热带地区。五岭似一幅屏障挡住了南下的寒流和北上的暖空气。

瑶族聚居区

去年，春末夏初，这里正值雨季，我从广州出发，乘车沿绥江北上，过广宁、怀集，来到“三连”（即连山、连南、连县）一带。这里是广东省瑶族的主要聚居区。此时，珠江三角洲稻秧早已返青，而“三连”才刚刚开始插秧。

连南瑶族自治县的瑶胞都喜着黑色服装，肥大的裤子，一般只到膝盖。他们下缠绑腿，穿胶鞋，大概是便于登山吧。男人用长丈余的红布裹头，而妇女却用白布包扎。未婚姑娘的头式，额前有刘海，头顶打发结，并插上山鸡的羽毛，颈挂银制的项圈，手戴银镯作装饰。瑶胞以务农、狩猎为生。

如今，瑶胞的生活正在逐渐富裕起来，山脚下建起了一处处新村。每逢秋收时节，这里都有传统的“耍歌堂”（类似歌会）活动。人们穿上新衣，有的化装成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边歌边

舞，男青年这时便可挑选自己心爱的姑娘。

一个县有二十五种方言

据《连县县志》记载："本县虽僻处粤北，交通不便，然下达英（德）清（远），则民船往来不绝，上循湖南，则商旅络绎于途。"连县历来是物资交流的集散地。这里物阜人勤，素有"耕一年饱三载"的美誉。所以，它引来了广西壮族、湖南瑶族，以及汉族地区的潮汕人、客家人、江西人、湖南人到这里居住，使这个只有七万人口的县城，竟有二十五种方言。

南陲的咽喉——韶关

韶关山水环绕，风景秀丽。北江是珠江三大水系之一，是由发源于江西的浈水与湖南的武水在这里汇合而成。

韶关是南陲的咽喉，自古水陆交通发达。它东去江西，西抵广西，北溯湖南，南下广州，是湘、赣、粤等地的物资集散地。明、清两代这里设过税关，故称韶关。

韶关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有色金属在全国占重要地位。近三十年来，韶关市人口从五万发展到三十万人，它拥有钢铁、煤炭、矿山机械、动力、化工原料以及纺织、电子、建材、塑料等工业，成为粤北地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

从"马坝人"想到的

韶关地区古迹名胜荟萃。一九五八年，考古工作者在韶关市南十公里的曲江县马坝公社的狮子山石灰岩洞穴中，发现了距今约二十万年左右旧石器中期的一具古人头骨——"马坝人"的化石；十几年前，又在狮子山石峡间发掘到先秦的村落的房基、灶炕、陶窑等文化遗存。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了。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公元前二〇六——公元八年）古墓出土的

我国最早的地图上，就标示着北江流域的山山水水。

此外，韶关的风采楼，曲江县的南华古寺，清远县的飞来寺，南雄县的梅岭古道等等，无不记载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丹霞胜地

北江流域山地丘陵占了百分之九十。南岭的丹霞山，以它独特的地貌闻名于世。

丹霞山，四周山峰层叠，有的像僧帽，有的像石塔，有的像群马、大象。每当夕阳西下，山岩色丹如霞，故名。丹霞地貌之形成，大约在二千五百万年前。这一带原是个湖泊，湖底有数百米厚的氢氧化铁和少量石膏的沉积物。随着造山运动，湖底上升，又经长期风化，形成方圆几十里，高达数百米的红色山崖。粤北坪石镇的金鸡岭，紫金县的石竹山以及福建省的武夷山都属此类地貌。但唯丹霞山为最典型，故地理学上称为丹霞地貌。如今丹霞山、金鸡岭均辟为旅游胜地了。

只开发了五分之一

北江自浈水源至三水县思贤滘，全长四百六十八公里，沿途汇集了七条主要支流。江河在群山中穿行，多峡谷、险滩。著名的乐昌峡，峡长五十公里，两岸峰高岭险，水流湍急，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

潭岭、南水、泉水、长湖四座已建成的中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二十万千瓦，加上各县修建的星罗棋布的小型水电站，已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工农业生产带来了变化。以前，广宁县潭埔公社还是全县最穷的一个公社，后来社员们花了六年的时间，在一条山溪上利用山地的自然落差，修了三个小水电站，并办起了电磁器材、塑料、农具加工等工厂，使这里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北江流域的水力资源蕴藏量约有二百多万千瓦，已开发的还

不足五分之一。

洪水的威胁

北江流域年降雨量达一千三百至二千四百毫米，上游大面积的集雨区是高山峻岭，中游又多峡谷约束水势，水位涨落变化很大。每年五、六月雨季，洪水来势凶猛，破坏力大。下游清远县一带是历史上北江洪水的泛滥区。一九一五年的特大洪水，冲垮了大堤，广州受淹七天，三角洲的堤围几乎毁尽，淹田六百多万亩，灾民达二百七十多万。

解放三十多年来，北江洪峰，超过警戒水位的，平均每年有五次之多。正当我在粤北采访期间，目睹清远、英德一带又遭洪水袭击。这次洪峰水位，超过了一九一五年。由于岁修，保住了北江大堤，广州也安然渡过了这次洪灾。

近年来，政府正规划在北江上游的乐昌峡，中游的飞来峡等地，修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使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综合利用效益。

（一九八三年第五期）

沿运河旅行

黄祖安

运河自苏州至扬州一段，长约二百公里，开通于公元前四九五年。当年，吴王夫差命人在苏州西北凿河，流经无锡，在镇江南面的丹阳境内接天然河道入长江，渡江可达扬州。它比通常所说运河源起的邗沟开凿时间还早九年。徜徉在这最古的运河上，古老的东方文明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苏州地处江南河网地区，市内水巷，花岗岩石叠砌成的驳岸，白墙黑瓦的房屋，高高的石拱桥横跨水上。河畔，老人憩息，孩子嬉水，姑娘少妇在石阶上汲水洗衣，邻家还隔水对话，各种船只穿梭往来。“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买菱藕，春船载绮罗……”一千多年前诗人笔下的苏州，今日还可领略到它的风采。

我国的古城，不少在历史变迁中曾易址重建或毁为废墟，苏州却保持着公元前六世纪吴王阖闾兴建时的规模，水陆八门的名称沿用至今，可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古城。古城的园林，历代屡有营造，最盛时达二百七十一处。名园沧浪亭、网师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代表各代不同的风格。

船离苏州，江南千年古刹寒山寺渐渐隐去了，吴中第一名胜虎丘也隐去了……远处青山，两岸沃野，经过一些村镇，便到了无锡。

运河入无锡境，分成两水北流，一水蜿蜒西北又折向东北，弯曲如弓身；一水似弓弦，贯串全市南北。城南清名桥一带，水乡风貌不亚于苏州。市内两岸工商繁荣，有“小上海”之称。两水合流于城北的黄埠墩，七百零四年前的春夏之际，南宋丞相文天祥被元兵囚禁在这个烟笼雾锁的河心墩。这位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在此又写下了“英雄未死心先碎，父老相从鼻欲辛”，悲愤之情令人扼腕。

市内另有一河梁溪，流入太湖。太湖风光壮阔而又明媚。景色佳绝处在鼋头渚公园。长春桥赏樱花，繁花像一片片绯红的云霞，煞是好看。鼋头渚听春涛，令人心旷神怡。

江南运河到镇江与长江交汇。镇江同北岸的瓜洲隔江相望，是南北水路咽喉之地。公元七三七年前，从江南运河入江北上，要绕行许多沙洲，曲折迂回，兼以长江风急浪高，船只常被漂没。这一年，镇江地方官齐浣将渡口西移，江面航行距离缩短为十公里。

唐代北渡长江的主要渡口西津渡遗址在云台山下，江边犹存石驳岸码头，登上数十级阶石，东侧一亭翼然，古色古香，名叫待渡亭。诗人李白和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都曾在此停留。

横渡长江，江风猎猎，波涛汹涌，顿显出雄阔豪放的气势。回望镇江，金山、北固山、焦山巍然雄峙，不失“天下第一江山”的气派。

瓜洲古渡引人遐想，唐代鉴真大师首次东渡日本在此启航；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此南望，写下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著名诗句。

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因运河而兴起。公元前四八六年吴王夫差凿邗沟时筑的邗城，为扬州建城之始。隋代大运河开通后，扬州处于水路交通的枢纽，经济日益富庶，文化日益发达。唐代更

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经济文化中心和国际都会。古运河孕育了繁荣昌盛的古扬州。

千百年来，扬州文化自成特色。瘦西湖水面疏朗，小园幽深，自成风格。寄啸山庄、个园、小盘谷的造园艺术以叠石巧妙取胜。清代扬州画派以“怪”著称，卓立一世。盆景、剪纸、扬剧、评话、漆器等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同扬州依运河之便而得南北文化交融之利是分不开的。

扬州名胜古迹甚多。有一处古迹却鲜为人知，那就是隋炀帝陵。它在郊外雷塘田野上，荒冢一丘，枯木数枝。这里掩埋着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兴师动众，开通南起杭州，中经扬州、洛阳，北到北京的大运河，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又是著名的暴君，连年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民不聊生，从而爆发隋末农民大起义。公元六一八年三月，被部将缢死于扬州。最后葬于雷塘。荒郊孤坟，无人问津。一八〇二年，当地为保存古迹，曾为他修墓立石，供人游览。

（一九八三年第八期）

塔里木河，生命的河

胡文康

“塔里木河，故乡的河，多少回你从我的梦中流过。……”维吾尔族歌唱家克里木深情的歌声，勾起人们多少遐想。

塔里木河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它从支流叶尔羌河上源算起，全长2,179公里，流域面积19.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江苏、浙江两省的总和。塔里木河的支流有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在上一个世纪还有喀什噶尔河。其中叶尔羌河由于上游拦水灌溉等原因，除特大洪水年份外，已基本上断绝了与塔里木河的联系。和田河也仅在每年洪水期有余水进入塔里木河。只有阿克苏河长流不断，供给了塔里木河全部水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各支流在阿克苏境内汇合后始称塔里木河，干流河道全长约1,100公里；上游年径流量近50亿立方米，中下游则因沿途引水、渗漏和蒸发而愈来愈少。

塔里木河水系所处的塔里木盆地，大部分为我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所覆盖，是我国年降水量最少的地区，一般低于50毫米。河流的水源主要来自盆地边缘的高山冰雪融水，其次为山地降水。如塔里木河的常年补给河阿克苏河，即发源于冰川密集的天山南坡；海拔7,435米的天山主峰托木尔峰下的托木尔冰川即是阿克苏河主要支流库马力克河的源头。和田河发源于昆仑山北坡，这里虽是我国最干旱的山区之一，但其冰川区的年

降水量超过200毫米，大面积的高山区仍为这里的河流提供了较充沛的水量。叶尔羌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其上源音苏盖提河即源于世界第二高峰、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西侧的音苏盖提冰川——我国最长的现代冰川。

塔里木河出自巍巍天山、莽莽昆仑，迤逦蜿蜒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北、东三面，形成沟通我国内地与西方的天然通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因此，沿河一带留下了不少古代文明的遗迹，仅古代城址就有三十多处。

水，就是生命，这在干旱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塔里木”在维吾尔语中为“田地”、“种田”之意。盆地中年平均气温10°C，属暖温带气候，无霜期200—230天。丰富的光热资源、广大的冲积平原，加上生命之水，使塔里木成为新疆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从公元前一世纪起，我国汉朝中央政府就设校尉官屯田于轮台、库尔勒、阿克苏东和米兰附近等地，负责农垦之事。到了唐代（七世纪——十世纪），和田河曾因农田引水而一度断流，可见农业生产已达一定规模。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特的物产，如和田的葡萄、甜瓜、薄皮核桃、杏干及玉石、地毯，喀什的无花果、巴旦杏，库车的黑羔羊皮、白皮杏，阿克苏的香稻等，都久负盛名。多民族世代和睦共处，也创造了优秀的古代文化，如著名的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

进入二十世纪后，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当地向清朝中央政府的报告，南疆各道、府、厅、县计有大型干渠563条；耕地面积有903万亩。但是，由于塔里木河水量不足，洪枯悬殊，风沙严重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下流经常断流或淤塞改道，既恶化了生态环境，也危及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稳定。因此，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时，整个塔里木盆地的耕地面积仍徘徊在一千万亩上下，生产还处于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塔里木河干流沿岸，还有大片人迹罕至的荒原。

近三十年来，塔里木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2年，人民政府首先在尉犁县修筑了塔里木大坝，使塔里木河与孔雀河分流，重归故道，从而结束了下游野马般乱窜的历史；以后，又在塔里木河干、支流上陆续修建了大小水库206座。耕地面积1980年达到1,980万亩。与建国初期相比，耕地面积扩大了近一倍，粮食总产量增长了两倍半，棉花总产量增长了九倍，而且发展成为我国优良长绒棉的最重要产区。瓜果种植面积增至近八十万亩。和田玉、和田地毯、库车羔羊皮等特产都大幅度增长，行销五大洲。珍贵的双峰驼等野生动物资源也得到了保护。在塔里木河流域的开发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广大军垦战士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昔日旷无人烟的沿河地带建起了大批国营农场，占有耕地三百余万亩，成为一支巨大的建设力量。

塔里木河流域又是一处尚待开发的地区，光、热、水、土资源尚未充分合理利用，地下还有丰富的石油蕴藏。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委、国土区划局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先后组织了塔里木盆地荒地资源综合考察、塔里木河中下游地区综合考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国土规划、罗布泊地区综合考察等大规模科学考察，以便为综合规划、开发、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据初步统计，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和北缘，可资利用的农、林、牧地约有1.3亿亩。但调查结果也表明，由于缺乏开发经验，缺乏全流域的统一规划，关键的水资源的浪费也十分严重。上游的大量引水，造成严重的次生盐渍化。中下游因水源短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当地主要原生树种胡杨的面积和蓄积量都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导致沙漠化的严重扩展。这些问题正引起重视，将在今后开发新疆、开发大西北的战略进军中，通过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加以解决。塔里木河流域必将变得更加美丽、富饶。

啊，塔里木河，生命的河，拨动你希望的琴弦，伴我唱起明天的歌！

（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揭开巴丹吉林大沙漠的秘密

白国柱

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有一个纵横三万九千余方公里的巴丹吉林大沙漠，它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之一。历史上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载，我们仅从地图上知道它的名字。

去年十月，内蒙、新疆等六个省和自治区的治沙会议，吹响了向沙漠进军的号角。今年五月，我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随同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巴丹吉林考察队共二十余人，携带了足够三个月的食物、大批特制的水桶以及测量仪器和无线电台，由六十余匹骆驼载运，从内蒙额济纳旗向巴丹吉林进发。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考察路线，探索沙漠的基本情况，为将来改造和利用沙漠提供全面的科学资料。

我们第一个宿营地是一座毁灭了的古城——黑城子。据说大约四百年前，有一位黑将军在这里把守，敌人来攻，截断了城外的河流，水源断绝，城子遭到了毁灭。以后，人们把它描述得很恐怖，叫它“鬼城”，一直没有人敢去。听说有这样一个神话般的地方，我们欣喜若狂，恨不得一下子到那里一探究竟。但事与愿违，那天一直走到深夜也没有找到它的踪影。我们迷失了方向，在沙漠里打起转转来，骆驼时常惊得乱跳，差不多一半人被摔下来。这样闹到下半夜，才不得不在原地宿营。

但第二天一起来，却发现黑城子就在眼前。昨夜的疲劳与惊

险顿时丢到了九霄云外，大家争先入城。城区纵横各半里，城垣高两丈多，西北角的城墙上耸立着一座形似北京北海公园白塔的小塔，旁有一圆拱形的古建筑。城上满是一堆堆用作兵器的砾石。箭楼被烧毁了，里面有许多铁箭头。城内一片断垣残壁，到处有大火洗劫的痕迹。这一切说明这个小城在毁灭前曾有一番苦战。在城里我们还发现了石磨、小铜佛和汉文古铜钱。我们本想在城里多留些时间,文水地质组的同志挖了几个坑,没有发现一滴水，因此不得不匆匆向它告别。

第二天，在大沙丘里发现了一小块绿草，我们挖了不到一米的坑就渗出了大量的水，队长于守忠立刻用电台向治沙队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由此以往，一望是壮丽的大沙山，象一条条凶恶的巨龙横卧在沙漠上，有的高达数百米。越过这些沙山并不是易事，连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也要我们下来在前面开一条路，它才跟着爬上去。每天从早到晚我们只能爬越两座这样的大沙山。但爬沙山有时也有无穷乐趣。有一次,我们摄制队随同地貌组去考察四百多米高的沙山，当我们从顶峰往下滑动时，脚下发出了象几架飞机掠过时的巨响。这种奇怪的现象科学上叫"响沙"，人们叫它"沙漠的鸣钟"，是不可多遇的。

逐渐向腹地深入，沙漠就逐渐向我们展示它诡谲瑰丽的面貌。在沙山中间平缓的沙地上，时常有一片片一望无垠的草地，使人感觉像来到了草原；在几十米高的沙坡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沙竹、麻黄、沙蒿、红柳、霸王，花棒开着紫、红、白等色的花，沙拐枣结着累累的可以充饥的果实。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几十棵胡杨树，最大的一株高十余米，沙漠中有这样的乔木，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这个发现对改造沙漠有重要的意义。

沙漠中也是一个有趣的动物的世界。跳鼠在我们帐篷前炫耀它打洞的本领，"刷刷刷"，最多十秒钟就掏出一个洞来，同时

迅速把自己藏在洞里，精采的表演时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壁虎似的蜥蜴，非常调皮，它常卷起尾巴向我们示威，在我们休息时，竟不客气地钻到我们皮靴里来高卧，弄得我们穿靴时吓得跳起来；善良的黄羊悠闲地在草地上吃草，似乎与世无争。林业组的老胡有一次捉到一只刚生下来的小黄羊，因为没有乳喂养，又把它放回原地。

在靠近沙漠中心地区，我们遇到了许多盐池和海子。盐池的水是红的，盐是白的。白色的盐层一浪浪露在红色的水面上。池边是金色的沙山，衬着缀有朵朵白云的蓝天，互相辉映，美丽极了。盐池中结晶盐随处皆是，用手水里一掏就是一把，我们要吃盐就到池里去掏，非常方面。海子就是咸水湖，传说它是没有底的。我们在里面游泳了几次，游水时毫不费力，一双手脚总是被漂在水面上来。原来海子的水密度比海水还大十几到二十倍，水的浮力特别大，物体不容易沉到底，好像海子没有底似的。实际上，我们测量最深处也不过三米。在海子的周围，据于队长告诉我，他们找到了许多泉水，地下水源极其丰富。这对改造和利用沙漠将是极好的条件。

我们摄制组和考察队在沙漠中度过了一个半月，跋涉五百五十公里，胜利地穿过了巴丹吉林，第一次为它写下了考察记录和摄下了影片。

（一九五九年第十八期）

奥秘的自然　独特的资源

——西藏科学考察记

冷　冰

一九六〇年，中国科学院组织院内各有关研究所，邀请有关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开始进行西藏的科学考察。从那时以来，经常有各界朋友向我们询问有关西藏的情况。大家特别关心的是：西藏的自然有何特点？西藏蕴藏着哪些资源？等等。现在，我应《人民画报》之约，草成此文，借以简要回答朋友们的提问。

沧海变高原

我国古语有“沧海桑田”之句，很客观地反映了地球上海陆演替的规律，西藏地史也不例外。特点在于它退出海浸以后不断抬升，成为公认的“世界屋脊”——地球上无匹的大高原。

远在一亿三千万年以前，也就是白垩纪以前，西藏大部份地区还是浸没在茫茫无际的古地中海里。从那时以后，开始由东向西和由北向南慢慢抬升起来，海浸范围逐渐缩小。到了中新世末，即距今一千二百万年前后，这个地区全部褶皱隆起，成为大陆。以后，经过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便使这个地区矗立为高原。直到近代，整个高原仍然处在上升运动之中。

现在，西藏高原基面一般是海拔四三〇〇米左右；此外已经

发现海拔八〇〇〇米以上的高峰有一四座，六〇〇〇米以上的高峰达一八〇余座。其中海拔八八八二米的地球“第三极”——珠穆朗玛峰，便耸立在南部的中（国）尼（泊尔）国境线上。

高寒、荒漠？……

一些地理书和一些人笼统地说西藏为高寒、荒漠带。仿佛西藏成了宇宙洪荒，全是不毛之地。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西藏的局部地区，主要是羌唐西北部地区，海拔一般是五〇〇〇米左右，气候条件相当严寒，给生物的生长带来一定的影响。即使如此，那儿仍然是广阔的藏北牧区的一部份。除此以外，西藏的绝大部份地区气候较好，四季明显，物产丰饶。

所以，西藏的自然景观不能笼统地说成是高寒、荒漠的。它具有许多异乎寻常的地理特点：既有巍峨挺拔的高峰，又有切割极深的峡谷；既有莽莽的雪原，又有滔滔江河；既有纵横交错的外流河川，又有星罗棋布的内陆湖泊；既有永冻的冰川，又有长青的林海。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好比“鬼斧”把东部地区自南向北横切了几刀，而唐古拉、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和喜马拉雅又好似“神工”把中西部地区由东向西塑造成几条带。那蓝色的雅鲁藏布江以及三江水系，便在这些崇山峻岭之间时而汹涌澎湃，时而静静地流着……。

千里草原载牛羊

畜牧业遍布西藏全区，即使在藏南农业区也占相当的比重。而纯牧区又主要是在藏北高原，包括羌唐西部地区也是有名的牧区，特别是羌唐中、东部地区，已属于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带，地势平缓，水草丰盛，畜牧业一向发达。所以西藏是我国著名的牧区之一。

每年夏秋季节，羌唐千里草绿如茵，到处是欢腾而肥壮的牧畜；主要是牦牛、绵羊、山羊；也有黄牛、犏牛和马、骡、驴

等，完全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整个羌唐草原里还有成群结队的羚羊、黄羊、野牛、野驴以及旱獭、扫雪和高原兔之类，它们的肉可食，皮可制革或制裘，也是一宗可贵的资源。

至于肉无膻味的冈巴绵羊、乳肉兼优的帕里牦牛和江孜地区的半细毛羊，向来是西藏的名种；民主改革前多半是封建贵族的“禁脔”，民主改革后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帮助群众发展畜牧业生产、推广优良种畜的对象。

藏南赛江南　到处是宝藏

在藏南地区，自然景观别开生面。除去广袤的草场，稀疏的湖泊和数百万亩农田之外，还有许多高山峡谷及宽谷平原；尤其在波密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因受印度洋季风影响，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堪与我国的江南媲美。谷区内引人入胜者常常是山中有云，云中有山，时隐时现，变化万千。就在这云山莫辨的下面，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森林之海。以云杉、冷杉为主的木材资源和其它生物资源异常丰富。原始森林过熟更新，更新又过熟，多少年来就是如此。森林中常有成群的猴子、獐子、茸鹿、狗熊以及其它珍禽异兽，如白马鸡、小猫熊、猞猁等等。

生物资源中又以药用植物为最丰富。据前人统计，药用植物有三百余种，名贵药材如三七、大黄、当归、贝母、虫草、天麻、党参、麻黄、喜马拉雅山东莨菪……，不少在内地如“凤毛麟角”，而在西藏却“俯拾皆是”。我们在亚东考察时，一天傍晚在南山脚下漫步，在路旁随便用手掘了两窝三七，根部很象串连着的小土豆，足可以焙制成半斤熟药。又如冬虫夏草，是内地稀罕的补品，而西藏每年出产达十数万斤！世界闻名的喜马拉雅山东莨菪，更是大量的蕴藏在山野。许多西藏药材不但在中药里享有盛名，而且还是炼制新药的优良原料。

此外，西藏的水生生物资源也是异常丰富的。

最为特殊的农业

沿着雅鲁藏布江流域，每年都有三春娇艳的季节。当念青唐古拉北麓还是白雪皑皑、寒气袭人的时候，而藏南谷地已经是溪水淙淙，山花遍野；特别是雅鲁藏布江两岸，早已“又是一年杨柳绿，依然十里菜花黄”了。

日喀则、江孜、山南和拉萨地区，是西藏农业主要分布区，田连阡陌，村落相望，不愧称为“西藏粮仓”。作物一般分布在海拔三六〇〇——四四〇〇米范围之内，主要的种类有青稞、小麦、油菜、豌豆、马铃薯和芜青等十数种。过去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产量很低。民主改革后，在党的领导下，产量逐步提高。现在一般亩产：青稞、小麦为一五〇——二〇〇斤，马铃薯、芜青为五、六〇〇〇斤。马铃薯从我国内地引种到西藏后不易退化，已引起生物学家很大的兴趣。

包括马铃薯、芜青与青稞，还有适应性强的小叶油菜，在藏南若干个局部地区，种植上限已达到海拔四六〇〇米，多数情况下能够高产、稳产，产量不低于内地的华北，实在是举世罕有的奇迹：须知，海拔四四〇〇米以上地区，即使在赤道上，气候条件也够恶劣；而西藏这样高的地区，适于作物生长的气候条件非常苛刻：降水量很少，霜冻频繁，无霜期极短，很多地方大于0°C的积温只有一〇〇〇多度，大于10°C的积温根本没有。

至于喜马拉雅山以南，特别是低海拔地区，生物气候显著变化，已经是稻谷、香蕉、柑桔等喜温作物分布区了。

由于西藏大部分地区日温差大，有利于根、鳞茎蔬菜积累养份，故二、三十斤重一个的萝卜，三、四十斤重一棵的白菜，在内地很难想象，在西藏则屡见不鲜。一些干鲜水果也宜种植，拉萨出产的苹果具有香、脆、甜特点。

既丰富又集中的水力资源

西藏主要的河流包括雅鲁藏布江和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此外还有上千个内陆湖泊，还有阿里地区的狼楚河、狮泉河及象泉河等，水利资源十分丰富。而且由于不少河流经过高山峡谷多，水流比降大，所以又有水能资源比较集中的特点。以雅鲁藏布江为例：年径总流量几近一〇〇〇亿立米。干流全长一八六〇余公里，总落差为四九〇〇米，平均单位河长的水能蕴藏量居全国首位。峡谷众多，急流飞溅，河水清澈，岩石坚硬，具有拦河筑坝和修建巨型水电站的优越条件。

未来拦河大坝出现之日，便是峡谷湍流消失之时，既有利于航运，又有利于工、农、牧、副业的发展；一旦电站落成，大量的电流输向城市和乡村，将使广大城乡人民的生活面貌顿然改观；到那时，昔日荒芜的峡谷，也将变成为绿柳垂荫，大量接待劳动人民、机关干部和边防战士休假的疗养胜地。……

科学工作大有可为

在西藏，组织多学科进行综合考察研究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至今还是系统地开展自然科学研究的空白区。根据我们的体会来看，在西藏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联系资源开发；一方面联系理论储备。

解放以来，农牧业、水电业、交通运输业和畜产品加工业等等均获得了空前规模的发展，当地生产管理部门和广大藏族人民，已经从生产实践中向我们提出来大量的科学问题，要求及早得出答案。例如：提高现有草场载畜量和建立人工饲料基地问题；就现有耕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适当垦殖宜农荒地问题；高寒地区扩大作物栽培问题等等。开展以上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多种科学部门协同作战的光荣任务，且可以带动许多学科向新

的水平乃至新的领域发展。

关于理论储备方面的研究课题，比之应用方面更为繁多。学术界经常议论的有高原太阳辐射和地球物理问题，生理生化与遗传问题等等。我们和有关方面的学者合作，只鉴定了一部份野外考察所得的标本，就已获得动物、植物和古生物方面的新种新属不下五十个之多，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整个西藏高原占据了大气对流层约三分之一，强烈地影响了高原表面的生物气候和其它自然因素，形成为特殊的自然环境，衍生出许多独特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所以无论从揭开自然的奥秘出发，抑或从充分利用独特的资源出发，在西藏开展科学研究都是英雄用武有地，大有可为：既可以为资源开发做出出色的成绩，也必将为丰富自然科学宝库做出出色的贡献。

（一九六四年第七期）

大江之源

贾　庆

伟大的长江源远流长。

若干世纪以来，围绕着长江发源地问题，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扑朔迷离，纷纭不一。

解放后，随着青藏公路的通车，一批批边疆建设者和科学工作者相继出现在高原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配合航空测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地面调绘、水文观察等工作，从而逐步揭开了这个长期使人困惑莫解的长江源头之迷。

去江源之路

到江源地区去，通常从青海省的西宁市出发，沿青藏公路西行，经格尔木，再往南约一百六十公里，就是举世闻名的昆仑山。昆仑山山体庞大，是长江和格尔木河的分水岭，也是通常所说江源地区的最北界。越过昆仑山的大门纳赤台，公路不断向上延伸，逐渐到达海拔五千米以上。过昆仑山口地势徐徐下降，眼前便展开了一片广袤无际的可可西里大草原。这一带的气候和内地大不一样，有时一天之中要经历风、雹、雨、雪和烈日几种不同的天气，真是瞬息多变。但整个地区给人的印象并不只是一片荒漠，因为在它的南、北两侧，有高山雪水向草原盆地汇集，形成了丰沛的水源，当人们沿青藏公路穿越这片高原腹地时，举目

四望，只见湛蓝的天穹下，草滩茫茫，成群的牛羊在河边湖畔悠闲地低头吃草，呈现出一派特有的高原美景。

高原大河

青藏高原上河流众多，仅青藏公路从昆仑山口至唐古拉山口一段，就越过三条大河。这些河流一般都河道宽阔，水流平缓，它们循着低矮的丘陵和坦荡的草地静静地流淌，很象平原河流的三角洲地形。河流经过的地方，沼泽与湖泊密布。在这个地区的河流中，以通天河最为有名，它是长江最上游的一段干流，繁多的支流分别自南、北两侧汇入。青藏公路在昆仑山口以南越过的第一条河流，就是通天河北侧最大的支流楚玛尔河，也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长江的北源。这条河发源于可可西里山东北的多尔改错（原名叶鲁苏湖）附近，向东南穿过约四百公里的大草滩，在曲麻莱以西汇入通天河。查看当地的水文资料，人们就会发现，楚玛尔河虽然流域面积较大，但水量不丰，而且冬季常常干涸，作为长江的源流，显然是缺乏根据的。沿公路继续南行，还要越过宽阔的沱沱河和尕尔曲两条大河。过尕尔曲后，紧靠公路的布曲和东边较远的当曲，都是高原上的重要河流。这四条大河均汇入过去被称为长江南源的木鲁乌苏河，但这四支水流中究竟哪一条应作为长江的正源呢？

神话与现实

很久以来，在江源地区的藏族牧民中间就流行着一个传说：上古时候，一只神牛犊降伏到青藏高原，它的两个鼻孔不停地流水，形成了长江。我国唐代地理书上更有“江出犁牛河”的记载。古犁牛河，据说就是通天河上游的木鲁乌苏河。这条河确有两个类似传说的源流，即尕尔曲和布曲。前者发源于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的岗加曲巴冰川，后者发源于各拉丹冬东侧的另一条冰川。两

河自西而东在青藏公路附近汇合，其汇口以上的长度，尕尔曲为一百四十余公里，布曲为一百七十余公里。但是不久以前，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专人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察时，发现比这两条河都长的沱沱河更应该受到重视，因为按照“河源唯远”的原则，江河的源头，应以上游最长的一条河流来确定。

近些年来，确也有人把沱沱河说成是长江的正源，但对它的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因为要察看这条河流，必须离开公路弃车乘马，深入到草原深处和冰川、雪山之中。

哺育长江的源泉

沱沱河最下游在青藏公路以东五十八公里的囊极巴陇地区。溯河而上，只见两岸地势开阔，河床宽浅，河底沙石松散，沿河小泉众多。距下游约二百一十多公里处有一葫芦形的湖泊，湖南横卧着一条东西向的祖尔肯乌拉山，河水自南而北由这条山脉的峡谷中冲出，然后折向东流，这就是一般地理书上所说的沱沱河的发源地。其实，只要穿过这道宽一公里、长三十公里的峡谷，就会看到，河流的上游还在继续向着南面的砾石滩地延伸，其最终源头则是在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的冰峰群中。

和昆仑山“远看是山，近看成川”的地势不同，各拉丹冬远看群峰耸立，此起彼伏，近看沟谷深切，山势更加险峻。它的主峰海拔六千六百二十一米，周围还有略低一、二百米的二十座山峰和以尕恰迪如岗为中心的十四座山峰。以山脊为分水岭，除南边属怒江水系，西边少量水注入赤布张湖以外，其余统统汇入长江。

在东西并列的各拉丹冬和尕恰迪如岗两组群峰之中，常年积雪面积超过七百五十平方公里，分布有五十九条冰川，其形态很象珠穆朗玛峰的现代冰川，上部冰斗高悬山腰，下部是造型奇异多变、景观壮丽的冰塔林。这片积累了千年万载的巨大冰川，夏日消融，冰水横溢，成了哺育伟大长江的不尽之源。

在各拉丹冬西南侧的姜根迪如山下，有两股冰川融水都从冰塔林中流出，相汇后约五公里，又与发源于尕恰迪如岗下的一股水流汇合，接着又先后接纳二十多条冰川融水，即是沱沱河的源头。它自南而北在两组群峰之间宽广的谷地上通过，流速缓慢，水流散乱，时分时合，组成辫状水系，约五十公里后，穿过祖尔肯乌拉山峡谷，到它的最下游，全长约三百三十九公里。

与此同时，尕尔曲出各拉丹冬雪山群东流，至青藏公路附近汇入布曲，布曲继续东行约五十公里，又汇入当曲。当曲是通天河右岸的一条大支流，也有人称它为长江的南源。它发源于唐古拉山东段海拔五千二百多米的霞日阿巴山下，自南而北、而东穿越大片沼泽、草滩，纳入众多支流、小溪。沱沱河接纳当曲的丰富水量后，就是波浪滔滔的通天河了。（按：当曲与布曲汇口以下，直至楚玛尔河与通天河汇口处，旧称木鲁乌苏河）

富饶的江源地区

河流、湖泊、雪山、草地，构成了江源地区人民广阔的生活背景。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勤劳勇敢的藏、蒙族人民就在这个地区进行放牧。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生产落后和封建牧主、头人的反动统治，江源地区人口越来越少，牧业生产日益下降。解放以后，经过民主改革，广大牧民在党的领导下，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据一九七六年统计，生活在这一带的牧民户数，已超过解放初期的八倍，各种牲畜增长了十倍以上。此外，在这片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原腹地上，不仅生活和生长着许多当地特有的动、植物；在上百米的冻土层、冰层下，我国地质工作者还发现了许多储量丰富的矿藏，如重晶石、有色金属、煤、铁等等。为了了解和开发这一带地上、地下的自然资源，近几年来，包括地质、地理、冰川、冻土、大气物理、地球物理、植物、动物等十多个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在这里

不断进行着广泛的考察、研究。在青藏公路沿线，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居民点，象五道梁、风火山、沱沱河沿、雁石坪等，都是过去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如今不仅有商店、学校、卫生院和机关，还有一些工矿企业。这些新居民点的出现，正是江源地区生产和人民生活繁荣兴旺的象征。

（一九七七年第四期）

穿行羌塘无人区

——西藏北部的科学考察

陈和毅

羌塘，藏语为“北方高原”之意，一般指昆仑山以南，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以北，西与克什米尔接壤，东抵怒江和西藏内陆流域分水岭的广大地区。它南北长七百公里以上，东西宽一千余公里，面积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约占西藏自治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羌塘高原，是青藏高原的腹心，一般海拔都在五千米左右，除东西两端及南部有以牧业为主的稀疏人口居住外，其余广大地区均杳无人烟。由于这里海拔高，空气稀薄，交通不便，环境恶劣，所以很少有人到无人区进行过系统的科学考察。一些外国学者根据一星半点的资料，主观臆断地认为羌塘高原是“干旱中心”、“不毛之地”，十分可怕。

去年夏天，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派出有三十多人参加的藏北分队，由南而北穿行羌塘无人区，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考察。

当地党委、藏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大力支持这次考察，给他们准备了一百多头驮运牦牛和六十四乘马。根据非常稀有的资料，要穿行羌塘无人区，会碰到缺粮、缺水、缺燃料以及其他意想不到的困难，人畜很少能完全生还。但是科考队员们都坚决表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

总理非常关怀的我国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科学工作者，不管要付出多大的牺牲，都一定要完成这次考察任务。

六月九日，队员们从班戈县其香错旁的色哇骑马出发。这里是无人区的边缘，从此往北就全无人烟。队员们个个身强力壮，都经过拉萨等地的高原环境适应，然而那毕竟与羌塘无人区有所不同，这里海拔更高，空气更稀薄，气候更恶劣，忽而蓝天如洗，忽而黑云沉沉，骤然电闪雷鸣，霎时满天飞雪，瞬息万变，更何况队员们的任务是要进行考察，搞地质的要上山，搞水文的要下湖，采到了标本还得随身携带，一个观察点的岩石标本就有好几斤重，一头藏羚就得用一匹马来驮。高原特有的强烈的太阳辐射把人们的脸晒黑了，前额、双颊、鼻子开始掉皮，嘴唇也开始暴裂。

尽管行军已经疲惫不堪，可是一到营地，还得卸驮子、支帐篷、埋锅做饭。在羌塘无人区卸驮子可不简单，要把五、六十斤重的驮子搬走、集中，远比内地扛二百斤还难。而且牦牛的脾气又怪，要哼起藏族民工那种小调才能接近它，要扳着它的犄角才能卸驮子。当看到呼吸都感到困难的科考队员哼着小调、抱起驮子劳动的时候，怎不令人感动！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科考队员的革命精神。就这样，行行重行行，历时近四十天，队伍方到达玛依岗日北面的双湖办事处。这里是一九七五年冬从南面迁来人口后才建立起来的一个居民点。

在双湖稍事休整后，队伍准备改乘汽车继续北上考察。可是，要乘车北去，那里有雪山、湖泊、沼泽，再加上紧下漫撒的冰雹雪霰，如果中途陷车困住，队伍不是会进退不能吗？但是，困难吓不倒科考队员。他们派出一辆越野汽车到前面探路，证明乘车可以考察，于是决定登车往北。

七月二十九日，队伍按计划带上防陷工具，分乘两辆小车、

两辆大车，再加上一辆专载汽油的燃料车出发了。一路上，青藏苔草遍野，紫花针茅茂盛。听见马达声，野牦牛立即逸去，可是那野驴却成群结队地和汽车赛跑，并常常从汽车前面横过，摇着尾巴看着汽车，好像在说："到底还是我们快。"

汽车本来是较快的交通工具，但在羌塘无人区，它也走不快了。从来没有车迹的地面，是经过冰冻融化后的暄土，人踩上去还要扑哧一下暴起灰尘，更何消说汽车压上。那青藏苔草更是东一丛、西一丛，毫无规则，使汽车上下左右摇个不停。驾驶员只好以低档慢速前进。可是稀薄的高原空气，使汽车水箱仅摄氏八十来度就开锅，高温影响了引擎出力，汽车更无法开快。最使人头痛的是那表面一层硬土，下面却是稀泥的地方，那里没有不陷车的。碰到陷车，队员们可就苦了，用锹挖，用千斤顶顶，用木板垫，用汽车拖，再加上人推肩扛，往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把汽车弄出来。

羌塘无人区给科考队员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那起伏不一的高原上，马先蒿、点地梅、马兰花、棘豆、水柏枝等植物，数不胜数，到处都是。藏羚出没在草原，盘羊、岩羊隐现在山间，火山附近是灰尾兔聚居之所，还有鼠兔、旱獭、田鼠……。那天上飞的棕头鸥、赤麻鸭、红脚鹬、白腰草鹬、代胜、朱雀、地鸦……，也是种类繁多。搞火成岩的，在这里发现了好几处新生代的年轻火山，有的呈现规模较大的岩流、岩波，铺盖在沉积物上；有的还保留了完好的圆锥形火山口，成群分布。搞地层的，找到了瓣鳃类、腹足类、腕足类等古生物的许多化石。油苗被发现了，煤线露头了。那星罗棋布的湖泊，大的小的，咸的淡的，深的浅的，古老的与年青的，更使从事地貌、水文、水生生物、土壤的科学工作者留恋难舍。

队伍到达了宁贡曲久隆，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道路难行，耗油太多，汽油不够用了。怎么办？党支部进行了认真

的研究，并发动全队同志人人献策。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燃着无人区里唯一的烛光，分析、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北上方案：派出两辆小车，十二名队员，趁两个降水过程中的间歇，抓紧时机，一定要到达目的地——羌塘高原北缘昆仑山脉的喀拉木仓山口；留下的队员的科考任务，都由这十二个人去完成。这是一个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打破学科界限，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方案。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型的科学考察研究关系。它把那种到了紧要关头，只顾自己捞取学术资料，不顾别人的资产阶级学风扫除净尽。

为了保证北上的需要，留下的队员宁可跑上十里八里，拾取牛粪、水柏枝，也不烧一滴汽油。北上的同志更是感到自己担子的沉重，任务的光荣。他们发扬"一怕不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胜种种困难，于八月十日登上了喀拉木仓山口。山口海拔五千四百米，风大，无水，不能宿营，他们只好移到山口东侧海拔五千三百三十米处住下。这一天，夜里的最低温度是摄氏零下十八度。他们不怕天寒地冻，不怕山高劳累，又连续到达海拔七千多米的木孜塔格雪山下的冰川和强巴欠日火山进行考察。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终于完成了各项考察任务。通过在强巴欠日山下找到的海百合、苔藓虫、层孔虫，以及属腕足类的蕉叶贝等化石，完全可以断定，这里的地层是属于距今二亿二千万至二亿八千万年前的二迭世地层。这一发现，为我国的地质图填补了空白。

当队伍穿行羌塘完毕，从昆仑山返回时，各个学科都采集到了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现在正在进行进一步的鉴定、分析和研究。就从地质专业提供的依据来看，马尔盖茶卡以北成陆时间较早，而其以南的成陆时间，当在距今约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侏罗纪中期以后；有的地方海生动物和陆生植物化石都有，估计为陆海交替的地方。从二十多个湖泊的考察中，我们看到，那里的湖面变

小了，湖水浓缩了。那分布在湖滨的一条条清晰的古湖岸线，成为人们研究高原隆起、气候变干的历史见证。那许多湖泊中的化学沉淀，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盐矿资源。从采集到的植物标本来看，整个羌塘内部，高等植物有三百种左右，远远超过一些学者认为只有五十多种的数量。从气象来看，那么多固态降水，估计年降水量当在一百毫米以上。羌塘高原上野生动物不少，考察队碰到的野牦牛群，有的多达二百头以上。它们要生存，食物从哪里来，难道“不毛之地”能够提供吗。比较古老的鱼类条鳅的发现，以及在山坡、湖盆未发现冰川痕迹，均说明所谓在近二百五十万年以来的第四纪期间，这里曾为统一的冰川所覆盖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穿行羌塘无人区进行科学考察的结果，不仅为那里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为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有关学科研究水平的提高，为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七七年第九期）

再探黄河源

贾玉江

一九七二年，记者曾到青海省黄河源头采访，并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发表了《黄河源头行》报道。这组报道否定了雅拉达泽是黄河源头的错误论断，但肯定一九五二年才找到黄河正源——约古宗列曲的观点，又引起地理学界的争论。对于河源地区两大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的位置，由于采用了国内二十多年来出版的地图的标法，而这种标法又与历史文献及传统习惯不符，因此使不少人提出疑问。

为了给黄河源头作出一个科学的论断，也为了解决河源地区地名的标准化问题。去年夏天，青海省革命委员会邀请我国地理、历史、测绘、地名等有关科研、大专院校的专业人员，到巴颜喀喇山麓进行考察，并在考察结束之后，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会议认为：我国人民历来对黄河源头十分重视，千百年来，多次考察积累了丰富的科学资料。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七世纪上半叶，在我国就已经有人认定发源于巴颜喀喇山北麓的卡日曲是黄河的正源。两湖的位置也应该按照历史文献和地理图籍的记载和群众的习惯叫法，改正过来。

河源地区的西部，有三条河流，分别从北、西、西南三个方向汇入星宿海。星宿海是公元一二八〇年元代至元十七年我国中央政府探河源专使都实到达过的地方。这一段黄河干流叫玛曲，河

宽水浅，流速缓慢。在距今二百七十五年以前，即清康熙四十三年，拉锡等为探河源也曾到达这里。他从星宿海往西走了两天，见有三条河水来会，曾认为三条河水都是黄河源。

三条河的名称，在历史文献上都叫同一个名字，即“固尔班索罗谟”，或“阿勒坦郭勒河”，现在则各有自己的名字，这就是北支扎曲，西支约古宗列曲，西南支卡日曲。

考察队仔细调查了这三条河流的自然情况，发现扎曲的流程很短，水量又小，只能算约古宗列曲的一个支流。西支约古宗列曲，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一直作为黄河正源对待的。这是一九五二年一个查勘队的结论，结论还说：在此以西约三十公里的雅拉达泽，应该是黄河的源头。其实，其间不仅有相对高差一百多米的分水岭，还有两条至南而北流入格尔木河的河流。现已查明，不仅清代的拉锡等就到过约古宗列曲，而且因为他们就是沿着这条流水考察的，因此在最后进呈给皇帝的《河源图》上，这条河流也划到最长，并且在源头北岸还注有一高四丈的巨石，名“噶达素齐老”。十三年之后，康熙皇帝为了绘制《皇舆全览图》，又派人“经青海，逾河源”，进一步认识了约古宗列曲。因此，说一九五二年才找到约古宗列曲是没有根据的。

卡日曲若干年来似乎已不大为人注意，但确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认识的黄河正源。因为沿卡日曲逆流而上，历来是我国内地通往西藏的大道。公元六三五年，唐太宗贞观九年，侯君集、李道宗奉命征吐谷浑，就曾沿此路“观览河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进藏，土蕃王松赞干布“率部迎亲于河源”，走的也是这条路，所指的河源，自然也是卡日曲。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一七八二年），因河南青龙岗黄水泛滥，皇帝又派遣乾清门侍卫阿弥达“穷河源，祭河神”。从阿弥达对于河源自然景观及河流走向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还是把卡日曲当作黄河的源头的。

综合分析和研究河源地区三条河流的自然地理及有关历史资

料，考察队认为一千三百多年以前，我国有人把卡日曲定为黄河源头，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因为论河流长度卡日曲较约古宗列曲长近三十公里，汇水面积多七百平方公里，流量也多出二倍以上，而且源头泉水旺盛，在最干旱的年份，也流水不断。

考察队由星宿海沿卡日曲向西南行进，沿途河道曲折，水清见底，游鱼成群，行程一百二十多公里后，水尽源出。伟大的黄河原来发源于一条面积广阔的山沟谷地，海拔4800米的各姿各雅山，象一座起伏的丘陵，横卧在山沟的南侧，分水岭平坦，高差二十多米，距离长江水系只有二百米左右。山脚下，几个泉眼溢出的清水，在绿草如茵的滩地上缓缓流过，蜿蜒曲折，约一公里后，汇成干流，折向东北，直抵星宿海和约古宗列曲汇合。有谁想到，在下游汹涌澎湃的黄河，它的发源地却是如此宁静、温顺。

河源地区的两个大湖——扎陵湖和鄂陵湖，是藏语名字，前者意为白色长湖，后者意为青色长湖；是当地群众经过长期观察，根据两湖形状、水色特点而命名的。经过实际测量，西边的扎陵湖平均深度约八米，水色灰白；东边的鄂陵湖平均深度约二十米，水色青蓝。考察队还研究了大量历史文献，发现早在距今一千多年以前的唐书上就有关于河源湖泊的记载。公元一七六一年，在清代地理学家齐召南编撰的《水道提纲》里，更作了详尽的描述，明确指出扎陵湖的位置在鄂陵湖以西。以后，在二百多年里，我国各种文献及地理图册，都以此为准。只是在一九五三年，我国报刊发表一个查勘队的文章和报道中，才将两湖位置颠倒，以后虽曾作过更正，但未被地图测绘者所注意，以致以讹传讹，造成错误，引起混乱。

考察队在河源地区工作时，得到了水利部南水北调调查队及南京地理研究所湖泊室同志的充分协助。大家经过认真调查，不仅取得了有关两湖形成和演变的大量丰富资料，而且搜集了两湖面积、蓄水量及水质的准确数据，还采集到许多鱼类及水生生物标

本，为开发、利用两湖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揭开罗布泊之谜

胡文康

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部的罗布泊及其临近地区，是一块吸引着中外史地学者的充满神秘感的谜一般的土地。

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变幻莫测的大内陆湖——罗布泊，我国先秦时期（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前）的地理名著《山海经》称之为“泑泽”。一世纪时的《汉书》描述它“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湖水的丰盈曾使古人误以为是黄河的上源。

这里，曾经有一个人口众多、颇具规模的古代王国——楼兰。公元前一二六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曾向汉武帝上书：“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楼兰城地当东西交通要冲，是古西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重镇，其盛名曾使古代诗人留下许多关于它的优美的诗篇。

这里，又曾经是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南路的咽喉和门户。玉门关外至楼兰而西，一度商旅仕宦不绝于途，使者僧徒相望于道，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曾几何时，繁华兴盛的楼兰，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盛极一时的丝路南道，黄沙满途，行旅裹足；烟波浩渺的罗布泊，也变成了一片干涸的茫茫盐泽。

罗布泊地区灿烂的历史和沧桑巨变，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吸引了各国一批又一批的探险家。他们都试图揭开罗布泊的奥

秘，然而由于种种局限和偏见，却又制造了许多讹误，形成了许多分歧和争论，遗留下一宗宗学术公案。如：罗布泊的游移问题，楼兰兴衰的原因，干旱区的环境变化和气候变迁，雅丹的成因，等等，给罗布泊抹上了新的神秘色彩。

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集中了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新疆地理研究所、新疆化学研究所的几十名科研人员，组成了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三次深入罗布泊地区，两次纵穿干涸的罗布泊湖盆，对地质、地貌、土壤、植物、动物、化学和历史地理等进行多学科综合考察，行程五千余公里，考察范围约两万平方公里，获得了大量资料、标本、实物和样品，还撰写了三十三篇专题论文。这是罗布泊考察史上历时最长、范围最广、科学内容最丰富的一次。

罗布泊及其临近地区，地势低洼，统称罗布洼地，是塔里木地台东部的一个沉降块体，形成于距今二百万年前的第三纪晚期。罗布泊又是洼地的最低处，成为塔里木盆地诸水的汇集点，丰水时最大水面曾达到五千三百多平方公里，是我国仅次于青海湖的第二大咸水湖。在历史上塔里木河曾经改道南流，经台特马湖、喀拉和顺湖，迂回注入罗布泊，致使罗布泊湖面也随之几度伸缩进退。一九二一年，塔里木河重新改道东流，径注罗布泊，它又短暂地恢复了古时风貌，湖面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又达到两千平方公里。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上游地区农垦事业的发展，塔里木河自阿拉干大西海子水库以下完全断流。罗布泊也就名存实亡，成了一片盐壳起伏的瀚海。

在罗布泊南部的阿不旦和喀拉和顺湖一带，曾居住过数千近代“罗布人”。他们信奉伊斯兰教，讲维吾尔语，但长期与世隔绝，以渔猎为生。一九二〇年以前，一场瘟疫夺走了他们大多数人的生命。一九二一年，塔里木河改道，喀拉和顺湖很快干涸，剩下的罗布人被迫迁居他乡。他们是近代罗布泊变迁史的历史见证人。

现在，整个罗布洼地广布着面积达两万平方公里的各类盐壳，构成一处积盐中心；有总面积达三千平方公里的雅丹。环境虽然恶劣，仍生活着许多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动植物，其中高等植物有三十六种，动物（不包括昆虫）一百二十七种，而且不乏特有种和珍贵种。如在亚洲大陆已近绝灭的野生双峰驼，这里尚有二三百头。

罗布泊综合考察除较全面、系统地调查了该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外，还对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做了重点考察和论证。

例如，罗布泊的游移问题是由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挑起，并经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等逐步系统化的。然而，普尔热瓦斯基的足迹从未到过罗布泊。调查证明，罗布泊始终是塔里木水系的最后归宿，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和孢粉分析鉴定证实，两万年来罗布泊一直有水存积。斯文赫定所谓一千五百年的游移周期是不符合事实的，“罗布泊是游移湖”的结论应予否定。

又如，五十年代末，苏联地质学家B·M·西尼村根据对罗布泊的考察，提出亚洲中部气候“日益变干”的论点，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实际上，形成于第三纪末的塔里木盆地的干旱气候，在人类历史时期仅存在一定范围的波动，并不存在越来越干的趋势。这里的完好保存三千八百年左右的干尸，以及古代、现代植物种类成份的延续性即是有力的证明。

关于楼兰和丝路的兴废，长期以来也众说纷纭。自公元三、四世纪以后，丝路多取道途经吐鲁番的北线，楼兰的政治、经济地位下降；加以河流改道，楼兰又无力抗拒由此引起的自然灾害终于逐渐衰亡。因此，对这一地区自然地理基本特征等等的详尽分析说明，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变化的综合作用，是产生这一历史变迁的原因，从而论证了人类在干旱地区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罗布泊科学考察还发现，水蚀作用，包括周围山地的阵发性暴雨冲蚀和湖水侵蚀，在塑造雅丹地貌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因

此，以往将雅丹地貌单纯作为风蚀地貌的片面解释，应予纠正。

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是在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公元四世纪，晋代高僧法显途经这里后，在《佛国记》中描写说："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目极望，欲求渡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剔除迷信和夸张成分，法显的描写仍足以说明这里自然环境的险恶。一千多年来，不断加深的风蚀，不断扩大的盐漠，更增加了这条道路的艰难。

在这里，年降水量不足十毫米，蒸发量超过三千毫米，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夏季酷热，气温高近摄氏五十度，冬季严寒，常在零下二十多度；风沙肆虐，每年八级以上的大风多达八十余次；现已滴水无存的湖盆，遍地是如利刃般突起的盐壳。凡此种种，对试图进入这个地区的人们无疑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其困难程度在我国野外科学考察中也是罕见的。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队长彭加木，就是在为考察队寻水时迷失遇难，殉身罗布荒原的。他献身边疆科学事业的崇高精神，激励着科考队员们以更大热情和毅力，去完成他所热爱而未完成的事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副研究员夏训诚，接过考察队队长的重担，以其二十多年野外工作的经验，继续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考察；他本人更曾五次深入罗布泊。在全体队员共同努力下，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终于历尽艰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罗布泊科学考察学术讨论会》，罗布泊考察的成果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们的高度评价。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和队长夏训诚，也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野外工作会议上，分别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野外工作先进集体"和"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斩断黄河的时刻

华 山

黄河落天走东海，

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三门峡工程进入了决战的高峰：切断黄河的历史时刻到了！成万吨的大小岩石，以每分钟一大卡车的速度向激流中心猛泻着。

正当峡谷进口的鬼门岛，是大决战的指挥中心，也是总攻击的进攻出发地，截流指挥台俯临危崖，截流公路从危崖下直拍神门河口。这就是三门峡的主流神门河，鬼门岛和神门岛之间的激流中心的禁区。从十七日上午九时开始，五十七台自卸汽车日夜不停地奔驰着，满载着一车车的岩石，从右岸横过鬼门河的溢流桥，驰上鬼门岛，一直开到危崖下的公路尽头，堆筑着指向对岸的戗堤。

二十日晨九时，六十公尺宽的神门河口已经被戗堤进占十二公尺。黄河暴怒了！一泻千里的大河，集中了它的主力，冲进神门河，恨不得把掐着脖子的戗堤和两岸的石壁一气冲垮似的。坝头刚刚堆起又崩塌了，刚刚堆起又崩塌了。可是一车车的石头还是不住地猛泻着，非要黄河认输不可！

三门峡摆开了锁住黄河的阵势……

峡谷当中，耸立着一道强大的混凝土高墙，这是一九五八年汛期以前抢修出来的，它顺着河势，一头枕着峡谷进口的神门岛，一头插进峡谷出口的张公石，把三门峡劈成两半：右边是滚滚的大河，惊心动魄；左边是以原人门河为基础，把半个峡谷切成的人工河道，里面横亘着一座一排十二孔的梳齿形廊道工程，把河道拦腰锁住。截流开始的前一天，人工河道还是一个长方形的岩石基坑大广场。整个汛期，防水线打退了九次大洪水的猛攻，硬逼着黄河让出半个河床。现在，当我们又要夺取另一半河床的时候，黄河回到左岸，才发现"人门河"已经不是当年的"人门河"了。往日的人门河、人门岛、梳桩台和唐代的岩石运河娘娘河、多少年来被惊涛骇浪劈成的悬崖峭壁、怪石奇峰，都已经从地面消失，变成锁住黄河的梳齿工程了。

在右岸，咬住鬼门河口的狮子头也削平了。鬼门岛成了突立河心的平台。岛上布满了十五吨一块的三角形混凝土块，猛然看去，活像一片密集的野营帐篷。这是大战黄河的"重型炮弹"。峡谷附近以及公路旁稍微宽敞的地方，也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炮弹"，有五吨重一块的，有穿成葡萄串的，有用铅丝笼装成一笼笼的。风钻手在大块岩石上钻着孔，插进钢条，让吊车能随时把它们吊起。机械群在石料场上欢叫着，"乌拉尔巨人"三立方电铲，捷克斯洛伐克二点五方电铲，工人们叫做"活跃的姑娘"的德国的一点二方电铲……准备大战黄河的石头，已经储存了八万立方公尺，开山炸石的爆破声还在轰然滚动着。我们要在短短十五天内，切断神门河口，切断神门泄水道，把世界上最凶猛暴烈的大河拦腰切断；要把整条大河赶进左岸的人工河道，硬逼着黄河放弃激流中心的禁区，把右岸的半个河床交出来。

我们要喝令黄河让路！我们要锁住黄河！我们要把万里黄河捏在手里！

是黄河终于低下头来，还是终于把戗堤冲垮？这是一场分秒

必争的恶战。为了这场扭转黄河历史的决战，一个激动心弦的战斗口号日日夜夜在人们心里沸腾着。这个口号就是“一切为了今冬截流！为三门峡工程提前一年拦洪，提前半年发电，提前一年竣工而奋斗！”

跃进一年的创议，是九个月以前在中共三门峡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好些工程技术人员觉得很突然，不可能，甚至不可想象。只是几个月后，人们考虑的已经不是能不能跃进一年，而是如何再来个大跃进了。

黄河似乎也感到决战的时刻已经来临，河水总是不肯消退。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流量还是在二千秒公方以上。今年秋天碰到了五十年一遇的丰水年。十五日晨，连绵四天的一场秋雨过去，流量干脆跳到二千四百以上。黄河硬是要下决心较量较量了。

截流是水利工程的成败关键，是技术艰巨复杂的尖端工程。要在三门峡这样河陡流急的地方，把世界上最凶猛暴烈的大河拦腰切断，面前的困难还无人碰到过。资本主义国家截流，公认为最困难的，是一九二四年加拿大在石规纳河的截流，头一次失败了，以后重新开河导流，推迟两个月，二次才堵住。可是流量只有715秒公方。流量和流速标志着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三门峡的主流神门河截流时，虽然采取了分段截流的措施，把河道分成了四股，可是最大跌水还有二点六七公尺，最大流速达每秒七点二一公尺。可是，明年将是黄河大坝大规模施工的一年。跑在洪水前面，修起一座堵住黄河的大山，这是跟黄河决战的第二个高峰。第二个决战的胜败，首先决定于右岸基坑的围堰能不能在今年春洪暴发以前抢修出来。切断黄河就是为第二个决战夺取进攻的阵地。不敢迎接困难，拿什么去和时间赛跑呢？

国际水平，也不过是人创造的吧，也不过是把黄河堵住的吧？中国有这许多大江大河，到处都在修筑水利枢纽。长江三峡这个世界水利工程的绝顶还等待着人们攀登。黄河要跟我们为难，我们

还要骑上黄河跑哩！

十七日上午九时，三门峡的流量2,030秒公方。总攻击的号炮响了！

一连三天，强大的车队日夜川流奔驰着，这样紧张，迅速，又这样的有节奏。虽然来来去去都是沿着一条二公里长的蜿蜒起伏的公路，都要通过鬼门河上的溢流桥，都要绕着危崖俯冲到神门河口。可是路上总是畅通无阻，在河口一掉头便准确地退到激流的边沿。几个月前那种急死人的窝车停车现象都看不到了。几十部自卸汽车简直就是一个电纽操纵着的。

世界上有许多动人的神话和传说。当大自然的威力还驾凌一切的时候，人们常常用神的力量来抒发自己的梦想和愿望，唯独大禹治水的传说，这个歌颂洪荒时代的英雄诗篇，不是用神而是用人的形象来概括人们征服黄河的愿望和英雄气魄。三门峡的梢公说得好："胆小的人，黄河上没有他的路；有黄河就有敢治黄河的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就是用黄河的惊涛骇浪来磨炼性格的。

人们把黄河叫做"害河"，"孽龙"，"败家子"，把黄河的洪水比喻最大的灾难。可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说出中国人民对于黄河的深厚感情。正如黄河下游的一个妇女人民代表所说：

"我们怕它，恨它，怨它，骂它，又舍不得离开它。打从我记事起，母亲便背上我跑黄河；我会走路了，父亲牵上我的小手跑黄河；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又背上自己的小孩跑黄河。可是洪水一退，我们又回来了。我们世世代代就是离不开黄河啊。没想今天我们要亲手治住黄河了。"

从世界屋顶下的巴颜喀拉山到太平洋西岸的渤海湾，黄河这样颠狂、暴烈，在亚洲大陆上奔流万里。洪水一来，千万亩庄稼眼巴巴看着被掳走了，顷刻间一片汪洋。可是洪水一退，又是千里沃野，撒下种子便是丰年。中国大平原就是黄河把黄土高原搬

到海里填成的。河里流的不是浊浪，而是土地，是庄稼，是浸透了血泪的乳汁啊！

黄河！黄河！你以文明古国的“文化摇篮”闻名于世界，用移山填海的气魄横贯中国大陆，暴烈的性格里深藏着慈母的心怀。当我们今天要把你抓在手里的时候，还有什么壮丽的图画能比眼前的惊涛骇浪更能激起人们的雄心呢！

二十日整个白天，激烈的争夺战一直在神门河口进行。载重二十五吨的大玛斯汽车投入了战斗，把“重型炮弹”抡到河里，炸起一阵轰然迸裂的恶浪，满盖住河上，瞬息间又消息了。眼前依然是一道激流的陡坡。硬顶着水头的上游堤角成了争夺的焦点。时间就是一切。汽车的速度加快了，五十秒钟一车，四十秒钟一车，三十秒钟一车。大块岩石如同冲锋的勇士摸到上游阵角，这个漂走了，那个跟上去；较大的石块压住下游阵角；小块石趁势占领中间的阵地，支援“冲锋阵角”的攻击。

可是堤头还是崩塌着。

“黄河上没有回头路”，不向前猛攻是站不住脚的。几千年来，黄河的船夫在三门峡找出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骑着大浪冲击。那怕当面就是一块石壁，眼看木船就要碰碎了，也要坚持，顽强，勇往直前。——只有充满自信的人，才敢照着石壁直冲过去，让大浪从石壁反扑回来，把船托过一边，正好顺流而下，——粉身碎骨的险境也过去了。

猛攻神门河的人，正是这种在困难面前充满自信的人。这一天，是戗堤塌坡最厉害的一天，也是戗堤进占最快的一天。到了二十一日晨七时，戗堤已经横断河口二十二公尺，把神门河的脖子掐得紧紧的。河水一旦冲出龙口，只吼的山摇地动，满河浪花。这时候，守望着龙口的梢公忽然说：“黄河乏了！没劲了！”虽然龙口越窄，河水越暴，可是冲进神门的大河，已经不是直劈戗堤，而是斜绕过去，以攻为守了。

可是猛攻黄河的人们并没有松懈下来，只是信心更大，也更觉得黄河可爱了。当你亲手和黄河打上几个回合以后，时间变得多么宝贵啊！

时间，时间，决定一切的还是时间！黄河还没低下头来，分秒必争的恶战还在进行。二十二日上午，指挥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是一个干脆，短促而又激动人心的小会：今天跃进三十公尺，一举切断神门河！

二十二日晚十时，神河终于断流了，又乘胜追击，用两天另七小时四十五分钟切断神门泄流道。至此，举世闻名的黄河天险就被我们控制在梳齿廊道和鬼门溢流桥的闸门里了。以这样短的时间切断这样湍急的大河，这是史无前例的。

三门峡水利枢纽从一九五七年四月开工，一九六〇年就可以拦洪和开始发电。它可以拦住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免除下游水灾威胁，还有110万瓩的发电能力。水库容量在300亿公方以上，下泄的水可以灌溉四千多万亩农田，使下游干流能通行五百吨的轮船。但是，它只不过是征服黄河的第一步，到一九六七年，黄河上将建立起四十六座大型水利枢纽。我们要让黄河发电，要黄河交出土地和粮食，还要黄河交出时间——我们要骑上黄河跑上长江三峡的世界水电事业的绝顶，骑上黄河追赶太阳。

（一九五九年第一期）

春风吹绿北大荒

谷 苏

完达山南北，兴凯湖和乌苏里江之间，一望无际的肥沃的草原上杳无人烟。在这里，有的地方黑土层厚达三、五尺。一九五八年，十万转业军人像一股洪流，从全国各地涌来。沉睡的北大荒苏醒了。

他们是来开辟农场的。茫茫的雪原上没有房屋，也没有木材和砖瓦，于是他们踏着没膝的雪到森林里去伐木，去割草……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春天姗姗来迟，冰雪终于开始溶化。雪水和烂泥使本来就不象道路的道路更难辨认了。

有一天，我在完达山麓发现五辆拖拉机陷在泥沼里，那些穿棉军衣的拖拉机手在漂浮着薄冰的水泥中搏斗，个个满脸污泥。直到深夜，拖拉机还没有"脱险"，他们就从河里捞起几尾鱼，一面在火堆上烤着吃，一面围在那里取暖。吃完了鱼，他们回到拖拉机旁，继续"抢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他们才把拖拉机拖了出来。

过了几天，我在草原上踏着绸带似的犁垅行走，又遇见了那些拖拉机手，他们对着我得意地微笑，他们的衣领上闪耀着坦克兵的符号。他们正驾驶着拖拉机开荒。一条条黑油油的犁沟揭开了荒野的秘密，茫茫的草原将变成麦浪滚滚的海洋……

夏天，北大荒像个花园。草原上到处是蓝色的马兰花、紫色的芍药、白色的牡丹和红色的野百合，金色的黄花菜更是满山遍野。在完达山的原始森林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那样多、那样粗，那样高的红松和水曲柳，还看到了受惊的黑熊和鹿群、名贵的白木耳和猴头。走出森林的那天，我遇上了从农场来的一队人。山里发现了磁铁矿，面积很大，他们是来开采矿石的。

后来我在七里星河遇见了打鱼队。嘿嘿，这里的鱼多得出奇。他们的大网拉上一半的时候，再也拉不动了。网内的水就象沸滚一样。他们忙了几小时，用许多小网兜从大网里舀出两万多斤鱼来；网内剩下的鱼还很多，但因一时运不完，只好放回河里去了。

第二天，我来到附近的一个开荒队。草屋门外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拖拉机号头、车长姓名和一天比一天高的开荒数字。但是拖拉机手今天都待在家里了，原来较干的草地已经开完，剩下来的一半沼泽地拖拉机一进去就陷在泥里。现在他们正在寻找对策。经过集体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方法：用木板加宽链轨，拖拉机居然能在水里开动了。

几个月以后，我坐吉普车沿着完达山麓前进。宽阔平坦的公路两旁，金黄的麦浪接着金黄的麦浪，愉快的歌声接着愉快的歌声。河岸上鸡鸭成群，牧场上牛马遍地，再也听不到狼嗥了。沿路有许多村镇，都是最近建立起来的。虎林是原来就有的县城，但农场在这里修建了发电、制糖、钢铁、面粉、木材加工、机器修配等工厂。从虎林到密山，农场修了一条铁路、当我乘火车去密山的时候，沿途又看到一些水库、煤矿、医院、学校、玻璃厂、缫丝厂、化肥厂、石油厂。

北大荒啊，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你已经不再是“北大荒”了！你应该叫做“北大仓”！

（一九五九年第四期）

在从前的荒原上

李千峰

到兴隆农场的路上，绿茫茫的森林覆盖着山谷，高大的木棉在万绿丛中吐露着血红的花朵。这里已经是海南岛的东海岸了，有时从椰子林的缝隙里，就可以眺望到蓝色的海水。

拦住公路是一座小小的市镇。有运动场、商店、学校、小工厂。房屋的颜色是雪白的，马达声和扩音器里放送的音乐声一齐震荡着草原。

这是华侨兴隆农场。

在招待所的会客室里，农场党委书记詹力之用加了牛奶的咖啡招待我们。他说："咖啡、牛奶都是我们场子里生产的，我们还种了可可，各种热带作物在这里都生长得很好。"

招待所是建筑在一个小丘陵上，从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大片的热带经济作物园林。这些园林遍布在一个个起伏的小山坡上，五色缤纷，使大地成为一个波浪形的花坛。

海南岛解放初期，这里还是一片茫茫荒原，兴隆镇原有的房屋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全部被毁了，肥沃的田野里长满了杂树和野草。

一九五一年这里来了一批勇敢的拓荒者，他们是在马来亚等地受到帝国主义迫害而归国的华侨。人民政府给予他们贷款，帮助他们消灭了可怕的疟疾，帮助他们建筑了房屋……于是草原上

响起了劳动的歌声，林丛逐渐变成良田。现在农场里有着三千二百多个工人，拖拉机、汽车以及各种加工厂几乎应有尽有。许多热带经济作物在农场的肥沃的土地上找到了最适宜的繁殖场所，去年在比较干旱的情况下，咖啡的平均亩产量仍然达到一百八十公斤。除去咖啡，这里还种植着橡胶、剑麻、油棕、胡椒、香茅、可可等等许许多多比较贵重的作物。

招待所附近有一座工人宿舍，在那里我们访问了五十二岁的割胶工人曾华和他的妻子肖英。他们是一九五一年来到这个地方的，当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在已能写信，看报和阅读一些通俗的书籍。曾华每月有四十多元钱的工资，肖英还要多一些，她是一个剑麻生产队的副队长，农场里的妇女先进生产者，参加过全国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们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在农场的小学里读书。农场里还办有一所农业中学，它将把这个农场职工的下一代培养成有文化有知识的农业工人。

肖英带领我们参观她的耕作区，我们从压弯了腰枝的咖啡树下经过，看到树枝上成串的紫红得发亮的果实。一场丰收又将要开始。这个女队员笑咪咪地说："在我们这里，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有收获。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扩大经营，所以去年秋天我们农场就和附近的另外两个国营农场和一部分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了一个人民公社。半山里的黎族和苗族同胞也参加进来了。今年我们的耕作面积要扩展到南北四十公里。"

（一九五九年第六期）

重登沂蒙

王复遵

我爱沂蒙山。

这是山东省中南部的一片群山，中有两座高峰遥遥相对：东曰沂山，西曰蒙山。其间纵横数百里，千嶂万壑，连绵起伏。十五年前，十数万蒋匪军，就覆灭在这里。

那是1947年，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进行了疯狂进攻。全部美械装备的六七十万蒋匪军，四面八方，压向沂蒙山。我人民解放军，登山涉水，转战在这一片群山中。在数倍于我们的强敌面前，在他们带来的无限灾难面前，整个山区的人民英勇机智，艰苦卓绝，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多少英雄的战士和不屈的人民，流血牺牲，终于歼灭了进犯的敌人，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这里。群峰依旧，却已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山区了。

山变了，水变了，村庄变了，人也变了。

沂山，当年裸露灰秃，不容易找到一块蔽日的树荫。如今葱葱郁郁，站在山坡上已看不到天空。无数的松树和洋槐，有的已经成材。登上顶峰：翠绿的山岭，镶嵌着碧玉一样的三个大水库。旧日我所熟悉的崖庄，正好在水库区中，已成为水晶宫。在岸边，却出现了新的崖庄。

这是沭河，在1947年临朐战役时，一场暴雨之后，汹涌的河

水，把我们渡河用的全部木材绳索，通通冲断。现在㳽河已变成温驯的清流。一位林业技术员告诉我：自从成林以来，全年的雨水，从地表迳直流掉的只占2.7%。再加上十个大水库，和星罗棋布的小水库，当然就把河流的面貌整个改变了。

我来到了天井村，这里曾是日本侵略者和蒋匪军在临朐县制造的无人区村庄之一。当年，在这片骇人听闻的无人区里，所有的村庄，都隐没在一片荒草中。有的地方，在房子里，老狼繁殖了几代小狼。天井村，当时就只残留着几个屋架和隐没在荒草中的几堵断壁颓垣，二三十个人，勉强地生活在里面。现在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整齐热闹的山村：依山而下，新房屋栉比鳞次，满山火红的柿子和山楂。从前，这里是有名的穷村，山高地薄，粮食亩产只200来斤。解放以来产量不断增长。全村人口，已达到1300余人。

沂蒙山区有多少个这样的村庄啊！不过几年的时间，医好了敌人破坏的伤痕，然后又与自然灾害展开顽强的斗争，赢得了越来越好的收成。在蒙山下的杨谢村，人们告诉了我几个数字：这是个370多户的小村，1957年，还需要国家供应四万斤粮食。1960年以来，已经向国家缴售大量的余粮。我在好几个场院里，都看到了座座的粮仓。

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精神生活上的变化。在临朐和平邑的县城里，我都看到过绘画和书法展览会。作品琳琅满目，不少是出自农民之手。生活好了，好多人都要装饰一下自己的家，在屋子里张挂些字画。书店里买，请别人画，有的人干脆自己动了笔。这样，展览会就增多了起来，书画的水平也就不断的高了起来。在平邑县的蒲芦村，我还看到青年农民张永良的藏书。除了毛泽东选集等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之外，还有现代和古典的文艺作品、农业技术、水利方面的科学论著。他并不是特殊的一个，我在其它农民家里，也看到同样的现象。而当年，这些村里很少有识字的人。

是的，过去的永远过去了，却不能忘记，在这里，我瞻仰了烈士纪念碑，并专门去了一趟临朐县的冶源村。当年，这里有一片零乱而荒芜的湖水，是由几汪泉水汇成的，当地人叫老龙湾。湖东，泉水出口处，有一座我永远难忘的破石桥。桥下，清清的流水奔腾不息。当时，我们曾惋惜这股泉水白白流掉。就在这座石桥上，一位战士在战斗中中弹牺牲。现在，人们在那片湖水上，另整修了几座精致的石桥，湖心是两座墨椽朱柱的凉亭，岸边，垂柳山花，林木森森。那座可纪念的石桥，也焕然一新。桥下的流水，泻入一条十里长渠，通到近万亩农田里去。

这能不能说是完成了那位英勇的战士的心愿呢？我不敢说，但我觉得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整个的沂蒙山，又是对那些在战斗岁月里牺牲的烈士们的最好的纪念。

（一九六三年第三期）

开发塔里木盆地

王复遵

我沿着滚滚的塔里木河，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塔里木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维吾尔语是伟大广阔的意思。它是世界最大的内陆盆地，西临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南倚昆仑群峰，我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便在它的怀抱里。塔里木盆地东西长一千五百多公里，南北宽五百多公里，等于我国五个浙江省，或者欧洲十七个比利时。这样辽阔的土地，从前却是杳无人烟的荒原。

现在，沸腾的人声，机器声，震撼着这辽阔的荒原，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在它的东北部，建立了一系列的国营农场。农一师先在它的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开辟了一批国营农牧场，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以后又沿着塔里木河两岸，像一字“长蛇阵”，开辟了十多个大型的国营农牧场，一直深入它的腹部。

我乘着汽车一路飞驰，瞻望这条巨大的“长蛇阵”。那绿森森的的林带，长河似的水渠，夹着宽阔的公路，垂直地伸向前去，像永远望不到头。同时，它不断的向两旁伸出同样笔直的镶有绿树银渠的大道，横一条，竖一条，划成了一个个整齐的方格，像棋盘似的，也望不到边。我来时，正值中秋时节，庄稼大都熟透。这一格里水稻铺金，那一格里棉花似雪，再是火红的高粱，金黄的玉米，各色相间，织成了一幅壮丽的天然图画。收水稻的康拜

因就如乘风波浪，运粮棉的拖拉机、汽车，像穿梭般来去。

塔里木盆地已被开发出上百万亩农田。这里是一片丰收的年景。胜利一场二队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队有一百六十六个劳动力，一九六三年可产粮食二百五十多万斤，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劳动力一年生产出粮食一万五千多斤。

这里的土壤含盐碱量相当大，经过用水压和挖了许多排碱沟之后，田里的棉花结出累累棉朵，每朵都有拳头那么大。我所看到的玉米穗子，像槌衣棒那样粗，每株有两三个。有一处，紧靠玉米地却是一片起伏不尽的黄沙，好像马上就冲过来，可是，它被一条茂密的林带阻挡住了。据说这条林带栽了六次，死了六次，第七次才成活起来的。

这里的畜牧业和园艺，也都具有相当的规模。除了几个专门的国营牧场外，每个农场都设有专业的畜牧队和园艺队，畜牧队大都拥有几千只羊，几百匹马和大群的鸡、鸭、鹅、兔。塔里木野生的草鹿、梅花鹿、天鹅和水鸭，品种优良的荷兰牛、瑞士羊、奥尔洛夫马、来亨鸡、北京鸭，也在这里大量繁育。各个果园里品种繁多的果树都是从全国各地引植来的名种。

不难看出，在这纵横数百里的方圆内，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靠近路的两侧，每隔七、八公里，就有一带绿林掩映着白色的房屋，那就是生产队的居民点。几个居民点中间，是一座簇新的市镇，设有百货商店、食堂、书店、幼儿园、中小学和医务所等。那些市镇中心还建设了两座颇具规模的新城。我曾经在其中之一的阿拉尔停留过，那里有设备齐全的大型医院，农业科学研究所、蚕桑试验站，还有一所正规的农垦大学。而这样规模的城市，它的建设历史还不到六年。

我所看的只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开发的范围，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个师在短短的几年里，开出了几十万亩土地，修起了几百公里的灌溉干渠，上千里的支渠及田间引水渠，建成了

一座大型的平原水库，收了上千亿斤的粮食和棉花。他们又修建了一百多万平方米的房屋，建设了数不清的林带和道路，但是林海清师长却对我说："这些都不过是开始，我们很外行，重要的是我们在和自然斗争中站住了脚。"

我到了盆地的深处看到那些将待开发的地方，才深深感到林师长的话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这真是一片无际无垠的洪荒古漠。塔里木，过去我也听到过有关它的介绍，但目睹以后，才真正感到它的荒凉。

我所走过的十几个农场，都是从这样的荒原上开出来的。

农场的同志们告诉我：1958年初，人们来到这里时，挖井取水，挖来挖去都是一些又咸又苦的盐碱汁。帐篷刚刚拉好，就被狂风卷去，在树林中撕成碎片。风沙来时，人们不管做什么事，都得坐下来，集中在一起，还要不时手牵手站起来换位置，不然就会被沙埋掉。在漫天的风沙或林海中，行动几步，就会有回不来的危险。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拓荒者们用箩筐担走了沙山，用坎土镘砍倒了林木，再用拖拉机拉走，开辟出一片片农田。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产生开发塔里木的雄心呢？

1949年，新疆刚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为了祖国的统一，迅速扑灭反动派的阴谋暴乱，大胆地作出了前人所不敢想象的决定：横穿塔里木盆地。部队出发后，黄沙蔽日，无路可循，无水解渴。马倒下去，马驮的东西由人扛上，鞋碎了裹破布，战士们互相搀扶，苦熬硬挣地急行军十七天，从阿克苏到达和田，创造了第一次千军万马横穿塔里木的奇迹。这支部队，就是今天开发塔里木的农一师的前身。他们在这次行军中，觉察了这荒原闪烁着强大的生命力。这里有的是一片片灌木丛、胡杨林和沙丘，而下面却是无际的沃土，那大量的裸露出来的腐植质，就足以证明。

他们是一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部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他们是红六军团，坚持了井岗山根据地的斗争，后来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在陕北响应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发了延安的南泥湾。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在西北战场扫清全部敌人后，又长驱进入了新疆，然后转战在农业战场上。

在胜利十六场，我拜访了这支部队的老红军温玉标。他真是一个忘我的人。他参加革命已经三十多年，1957年，正是六十岁。领导上再三让他选个地点去休养。他一再回绝。次年，才对领导说：“我选好了，请安排吧！”“哪里？”“塔里木！”“哪是个什么地方，怎么能休养？”“创造条件啊！”领导上再三不肯，但他坚持要去，最后只好答应了他，但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住招待所休息。到了招待所，他悄悄地每天早出晚归，一个人，一张坎土镘，开起荒来。等到大家发觉时，他已开出了二十多亩荒地了。领导上没办法，就派他去任园艺队队长，意思是让他去弄弄花草，清闲一些。不料，他又领着大家开出了几百亩地，种上了各种果树。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开出的荒地上已结出了果实。胜利十三场场长伍积禅也是一位老红军，他主动要求让他领导开发最难开的地段。那里含盐碱量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五十。他说得好：“这块地今天不开将来总是要开的。我们不能尽把困难留给后一代！”现在，那地里已长出了棉花、玉米和高粱。

老一辈的优良革命传统，正传给了从祖国各地来的千千万万的青年。在青年们的心中，把建设祖国边疆看成了光荣豪迈的事业。

(一九六四年第一期)

金县见闻

杨秀云

依山临海的辽宁省金县，地处辽东半岛南端，紧靠著名的旅大市。它东、西濒临黄海和渤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交通方便。全县有五十七万人口，除粮食外，盛产水果、海产品、蔬菜和花生。

前不久，我在金县访问了十一个公社的十六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看到了农村不少新的变化。

每人分得二十公斤油

在我国，植物食油多年由国家统购、统销，实行定量供应，城镇居民每人每年只有三公斤，农村与此相差不多。但金县董家沟公社城南大队，一九七九年每人分得豆油二十公斤。多数人家吃不了，干脆委托大队替他们卖给供销社。本来，社员自己到自由市场可以多卖几个钱，可是，他们谁也不愿花时间去赶集。因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天能拿到一元三角钱。

去年这个大队平均每人分得口粮八百斤。在全县，这是个唯一的单纯经营农业的生产大队。由于几年来坚持兴修水利，粮食连年高产、稳产。一九七九年，又获得了亩产一千五百斤的大丰收。

“财神”书记

万里公社万里大队，前些年平均每人一年只能分到现金几十

元。可是，一九七九年，平均每人分到了二百五十二元。社员们都把这一成绩归功于大队党支部书记孔兆恩。大家送他一个绰号——"财神"书记。孔兆恩从一九七一年就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他看到大队的土质薄、粮食产量低，提出多开办工副业的主张。可是，由于当时"四人帮"在我国推行极左路线，在农村搞工副业生产，往往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因此，孔兆恩的"生财之道"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调整了对农村的政策，特别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孔兆恩的经营、管理才能才得到发挥。他们先后办起了机械修配厂、砖瓦厂，还成立了汽车运输队。总收入由三十万元增加到一百七十八万元。附近王关寨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佩服孔兆恩的经营才能，硬是请他去帮助工作。仅一年，王关寨大队也改变了面貌。

大队办旅馆

金县有两家较大的旅馆：一家是国营的金州旅馆，一家是园艺大队办的园艺旅社。金州旅馆位于县城中心，离火车站很近，交通方便；而园艺旅社距县城五、六公里，离火车站远。可是，到金县的旅客们都喜欢到园艺旅社去住宿。这是因为园艺旅社环境清洁、服务周到，饭菜物美价廉，旅馆内还备有十几辆自行车，旅客随时可以租用。

园艺大队地少人多，平均每人只有三分五厘地。为了解决劳力出路问题，他们除开办这座旅馆外，还陆续办起了机械厂、建筑材料厂、水电器材厂、炼乳厂、棉织厂等十个小工厂和一座商店，走上了农工商综合经营之路。园艺旅社仅仅开办一年，就为大队收入十万二千多元。一九七九年，大队总收入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了一倍半，平均每人收入三百八十元，成为全县最富的队之一。全大队有八百二十户，百分之三十的社员有了电视机，四、

五十户人家用上了洗衣机。

于永德一家的苦乐

大魏家公社王家大队四十八岁的社员于永德，一家六口，妻子有病，孩子又小，只靠他一个人劳动，每年都欠队里的钱。他所在的王家大队是全县最穷的大队，平均每年每人收入不到五十元。于永德又是这个大队的最穷户。近几年，大队扩大了经营门路，还没有全部投产的砖厂，去年纯收入就达五十万元，超过了一九七二年大队全年的总收入。一九七九年大队平均每人收入三百元。于永德一家在扣除全家口粮、柴草钱外，也分到现金四百八十元，他简直有点不相信，一家人高兴得一夜没睡觉。

养鸡姑娘与老渔民

听说七顶山公社小朱家大队养鸡姑娘梅玉琴，一九七九年个人光是超产奖金就拿了八百元。到了大队才知道，有的姑娘比她得的还多呢。这是生产责任制带来的好处。过去这个养鸡场有活一起干，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责任不分明；饲料想用多少就用多少，鸡的死活都与个人无关。现在，饲料都按定额发到个人，节余有奖；小鸡成活率定出了指标，成活率高出指标有奖。这样，姑娘们的责任心明显加强，浪费饲料的现象没有了，鸡的成活率大大提高，姑娘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同样，大孤山公社红星大队有四个老渔民，包了一条船，队里规定他们今年生产总值是七千元，超产有奖，欠产要罚。结果，仅仅用了七个月的时间，他们完成产值一万一千元。怎么办？大队长孙兴林说："政策一定要兑现！"马上发给四个人奖金八百元。

如今，这种联系产量、产值计算报酬的个人定额管理的生产责任制，在金县已经普遍地实行了。

自告奋勇当队长

一九七九年三月，登沙河公社良种场大队第一生产队改选队长时，出人意料的是，长期在外做临时工、收入优厚的三十三岁瓦工韩成英，自告奋勇要当队长。乡亲们还在受穷，队里的经营管理不善，他实在看不过去，他提出了五项条件：一、全队每年收入一定从六万元提高到九万元；二、无论年景好坏，社员口粮分配和现金收入都要高过本大队的其他生产队；三、小队领导班子必须民主选举，但生产组长必须由我任命；四、在我任职期间，如果办事不公随时可以罢免；五、如果谁有办法使本队全年总收入超过九万元，我就马上把队长让给谁。民主投票的结果，韩成英得到百分之八十的选票，当选为小队长。

这一年，全队总收入是十三万元；社员平均每人分到口粮六百三十斤、植物油十七斤八两；现金二百一十三元。各项指标在大队都名列前茅。

王春菊的嫁妆

一九八〇年春节，二十里堡公社夏家大队女拖拉机手王春菊结婚了。小两口的三间新房，是王春菊用自己的劳动收入买来的。姑娘买房子结婚，还是新鲜事呢！

一千五百元的房钱仅仅是王春菊收入的一部分。一九七九年年终分配时，她共分得现金二千八百九十四元。除了买新房外，还给爱喝酒的爸爸五百元；妈妈五百元；未来的婆婆三百元。村里人，特别是那些年轻小伙们议论纷纷，都说：“找这样的姑娘做媳妇真不错！”

在这个大队，拖拉机手工分最高。他们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拖拉机手劳动态度的好坏、节油多少、车辆保养、有无事故，工分都有差别。王春菊认真、勤快、工作出色，在拖拉机手中收入最高。

金县，一九七九年是全面丰收的一年。全县的粮食总产量达到四亿二千三百万斤，比一九七八年增加百分之十六；油料作物总产达到三千零八万斤，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一点五倍；水果产量一亿七千万斤，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海产品八万吨，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县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由一九七八年的一百一十六元增加到一百六十四元。

然而，金县发展还不够平衡。目前，还有一些每年每人平均收入不足百元的生产队；全县农业人口平均收入在全国也还不算太高。尽管如此，在金县能够看到中国农村生产大发展的希望。

（一九八〇年第十二期）

方兴未艾的中国农业

吴　象

我国广大农村，五年多来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

这一巨变表现在，长期停滞徘徊的农业，已开始走上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持续、稳定发展的新局面。尽管一九七九年以来自然灾害并不比过去少，而全国农业总产值却以每年平均5.6%的速度增长。一九八三年农业生产又一次获得全面丰收，粮食总产量达七千六百亿斤以上，棉花总产量达九千二百万担以上。这是创纪录的数字，也是标志着我国农业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数字。今年夏粮产量又超过去年，秋禾长势良好，如无意外的特大灾害，各种主要农作物的总产量可望进一步增长。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向国家提供的农副产品、工业原料日益增多，多种经营日趋活跃，收入不断上升，生活显著改善。全国贫困落后地区，最困难的有十大片，二百三十多个县（全国有县、旗二千多个）。现在大部分已经或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的人均收入，已由一九七八年的七十多元增加到一九八三年的三百元以上。当然，我国整个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生产力的水平比较低，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不高，发展又很不平衡，至今仍有10%左右的农村人口没有完全摆脱贫困状况，必须继续认真帮助解决。但总的看，全国农村一直保持着蓬勃发

展的势头，正在方兴未艾之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历史性的巨变呢？主要的原因是，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其中关键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特点，可简单概括为：统分结合，联产计酬。

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普遍存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主观主义的瞎指挥，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分别包给社员去耕种，通过承包把集体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散经营结合起来，并以产量计算报酬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结合起来，把权、责、利结合起来。经营管理上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革，有效地克服了大锅饭、大呼隆、瞎指挥等弊端，使农民掌握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真正成为合作经济的主人翁，从而充分发挥出积极性和造创性。同时，统分结合，宜统则统（如兴修水利、开展科技服务、购置大型农业机械等），宜分则分（一家一户能办的事），就可以更好地因地制宜，使农村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使社会主义合作经济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特点的新形式。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随着实践的发展，认真总结群众中的新经验和新创造，使家庭联产承包制不断到得补充、修正和完善，也使曾经怀疑家庭承包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广大干部的思想逐步得到统一，深刻地认识到它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农民要求利用剩余的劳力和自己手里的资金去创造更多的产品，进一步改善自己

的生活，这就形成了农村经济新的巨大的推动力，推动着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向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推动着传统的农业向采用科学技术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化。

代表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新事物应运而生。最引人注目的是近年在全国各地先后成批涌现的有技术专长或经营能力的专业户、重点户。其中有的是从家庭副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的是承包集体的多种经营的某个项目转化来的；有的还按自愿互利的原则组成了新的联合体。这些专业户或联合体生产和经营的规模比较小，具有几点比较突出的优势：一是便于发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潜力，吸收较多的劳动力，特别是辅助劳力，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劳动时间和原有的简易建筑和设施。二是适应生产者现有的技能经验和管理水平，为广大农民施展聪明才智提供了用武之地。三是可以节约资金，降低能源消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态平衡。总之，其特点是规模小、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商品率高，适合我国农村现阶段的经济文化水平，是发展商品生产的好形式。到一九八三年底，全国农村的专业户、重点户已发展到二千四百八十万户，占农户总数13.8%。他们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勤劳致富的带头人，学科学、用科学的带头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带头人，对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必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商品生产的发展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呢？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所谓两极分化，是指一部分人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借此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进行剥削，另一部分人则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生产资料、大量工业品、银行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物质手段都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里，在这个条件下，尽管允许资金、劳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动，发展市场交换，却不会形成两极分化。担心两极分化，

主要是由于对共同富裕有误解。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决不是齐头并进，同步富裕。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的共同富裕，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今后也不会有。正是为了共同富裕，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才能带动和帮助大家走致富之路。目前，因为冒出一个专业户、一个专业村，带动全村或一片村子发展专业生产，很快实现了共同富裕，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如果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就会把致富的前进道路堵死，也就不会有什么共同富裕了。

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是关系能否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大问题。没有商品生产的大发展，农村富裕不起来，中国也富裕不起来。但是，办这件事，走这一步，比前几年实行家庭承包制要复杂得多，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也会更大得多。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认真调查研究，大胆实践探索，才能使商品生产更加繁荣，商品交换更加发达，促进农、工、商综合经营，农村经济全面发展，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所预料的："我国农村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一定会出现有利于因地制宜地发挥优势，有利于大规模采用先进生产措施，形式多样的更加完善的合作经济。"这美好的前景正在向我们招手！

（一九八四年第九期）

我们在中国的访问

杜波依斯

从我出生在美国这个意义上说，我是美国人，我的祖先在那里已经居住了两个世纪。我们在那里工作、投票、纳税和服兵役。我们对美国文化也曾做了一些贡献。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又是一个非洲人，在美国是第五代了。在十八世纪时一个荷兰商人把我的外高祖父从非洲西岸掳到新阿姆斯特丹（即现在的纽约乡），卖作奴隶。他因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英国作战，获得了自由。外高祖父汤姆·贝哈特的玄孙女和一位法国新教徒的重孙结了婚，这位新教徒是在十七世纪迁移到美洲的，他的后代有些人为了避免和英国作战移居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其中有一人娶了一位黑白混血的姨太太，他的孙子和我的母亲成了亲，生下了我，这就是我的法国姓的来源。我的妻子歇莉·格雷姆也生在美国，有着非洲和苏格兰——爱尔兰的血统。她的祖父是歇安族的印地安人。能够比我们更有权利自称为美国人的人是不多的。

可是我们这个民族为了要别人承认我们是美国公民，已经进行了三百年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当中有多数人过去是奴隶，或者是收入很低的农奴，替白人剥削者干活。许多白人参加了我们的斗争，因此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两世纪的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要的胜利。这个战斗仍在进行，而且一定要继续下去，直到黑人被承认为和其他美国公民一样平等时为止。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斗争呢？这是由于人的贪婪而引起的。因为新大陆虽然很富足，但有少数人发现了用奴隶劳动来增加他们的财富并借这种被剥削的劳动来加强他们的势力。当正直的美国人把新大陆想象为一个新民主的家庭，在那里工人们可以平等地分享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这时他们面临着黑人奴隶制度的矛盾。在他们宣布“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八十七年之后，这个国家仍然拒绝取消奴隶制度。后来，爆发了南北战争，其目的不是在取消奴隶制度，而是阻止这种制度发展到工人享有自由的地区去。等到奴隶们以自由为代价帮助了自由的耕种者之后，才达到取消奴隶制度的目的。这是在一八六三年获得实现的。

但是从那时起，这个国家还是没有让黑人奴隶享有完全自由，而是打算把他们变为有色人种的农奴阶级，这就是美国今天的所谓黑人问题。黑人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中是有进展的，但还没有取得胜利。原因是非洲贩卖奴隶的勾当虽已停止，而殖民帝国主义却产生了，它要把全世界大多数工人变为西欧和北美的奴隶，而且利用他们的被剥削的劳动来建设文化。对于这种阴谋，苏联和中国的日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美国的黑人群众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为了把共产主义的真相传达给他们，我和我的妻子已经在苏联和中国住了四个月，还打算在中国一直住到五一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九十一岁生日。对于我们所受到的同情和欢迎，我们深切地表示感谢。

像现在这样的访问，我和所有的美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当中早就应该进行了。诚然，我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九年访问过苏联，一九三六年我也曾到中国略微观光了一下。但是正当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兴起的知识感到最宝贵的时候，“冷战”发生了；十年来美国公民不但旅行权受到限制，而且对关于全世界蓬勃发展的革命真相的了解的权利也受到限制。我国书刊中充斥着关于社会主义失败和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的荒谬报道。

多数美国人相信社会主义已经失败，或者是在不久的将来要遭受失败。但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相信这样，欧洲人也只是极少数相信这样。今天的战争威胁是由于世界上有很多人相信私人资本主义已经注定要灭亡，而它正带着以降低世界上多数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历史从事垂死的挣扎。当现代文明正处在危机的时期，我们来到中国就是要了解事实。

（一九五九年第六期．作者系美国著名黑人学者）

我和我的家族

爱新觉罗·溥杰

说起我的身世和经历，真是有不知应从何说起之感。

我的祖父奕谖是清朝六代皇帝旻宁（道光）的第七子，长大成人后分封为醇郡王。后来因为载淳（同治）无子，把我祖父的长子载湉立为皇帝，即光绪皇帝，我祖父也被晋封为醇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奕谖的第五子，也就是在清朝统治垮台前夕的那个摄政王。我哥哥溥仪（即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他的长子，我就是他的次子，以下还有两个弟弟和七个妹妹。我大哥溥仪一九六七年死于肾癌；我大妹和我的三弟早就故去，其余一个弟弟、六个妹妹现都住在北京。

我哥哥溥仪三岁时，被慈禧太后立为嗣皇帝。在他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溥仪便为皇帝，年号宣统。不到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王朝。退位后的溥仪仍在皇宫里居住达十三年之久。以后移居天津，并与日本军阀勾结，于一九三二年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当上傀儡皇帝。我从一九三〇年起，多次去日本学习军事，最后在溥仪身边当中校侍从武官。

日本战败后，溥仪和我作为战犯，初时被递解苏联拘留，一九五〇年便转解到祖国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开始，我们都害怕会被处决，慢慢地就放心了，因为战犯管理所的目的是要我们

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溥仪和我先后被特赦释放，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溥仪的后半生中，最使我永不能忘的事，就是他从抚顺回到北京后，居然见到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我记得那是一九六一年，有一天溥仪非常激动地对我讲，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还一同吃了饭，一起照了相。

周恩来总理对我们的亲切关怀也是刻骨铭心至死难忘的。一九六〇年我从抚顺回到北京不久，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我和溥仪，我不由得兴奋紧张起来了。溥仪笑着对我讲："我在头一次去见周总理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这样紧张的。总理对于无论是谁，都是平易近人，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会发生一种家人父子间的轻松幸福之感的。你见了之后，就自然会知道的。"记得周总理见到我们弟兄俩的时候，讲到党和人民政府实行特赦，那是赦人不赦罪，他对我哥哥说道："你在清末当过皇帝，这不能归你负责。……，可是在伪满的那一段，那就完全是你的责任了。"接着，总理又问我："你希望将来做什么工作？"我硬板板地回答说："我愿意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厂、农村我都希望去。"总理笑道："这我知道。你说心里话，你真的希望将来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觉得心里热呼呼的，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一大半，于是回答说："我平生最喜爱的是文艺方面的任何工作。"周总理听了点了点头说："你还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好。"不久，我便分配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参与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一直到现在。

周总理对于我的家庭团聚问题也十分关心。我的妻子嵯峨浩是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女。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我们于一九三七年在日本结婚。当时，日本关东军视溥仪无后，企图通过这一婚姻来强化所谓"日满一体"。我们结婚才一个多月，关东军便起草了"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的弟弟也可以继承皇

位，显然这是一种“政略婚姻”，好在我和嵯峨浩互相信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被捕后，一九四七年，我妻子带着小女儿嫮生回到日本。长女慧生在战时就到日本外祖父家居住、上学。不幸的是她在一九五七年底，因爱情的烦恼，与男朋友一起在日本伊豆岛天城山自杀了。为此，我夫人写过一本书，名为《流浪的王妃》，写到长女的死和她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此书在日本曾再版了七次，并被拍摄成电影。

我被特赦释放后，一九六一年，我妻子带着二女儿嫮生来北京与我团聚，同来的还有我岳母嵯峨尚子，妻妹町田干子等。周总理特地接见了我们全家。当时，周总理对我们谈到我那死去的长女慧生生前的一件事：在我转移到抚顺不久，我那女儿曾瞒着她的母亲和嵯峨家全家的人，用中文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请求允许她与我通信，从此，我和我家属之间开始通信，这是伪满这批战犯中的第一例。周总理还说：“我很喜欢这样勇敢的孩子。青年人是需要有勇气的……”我和我的亲属们听了，都十分感动。

当时，我的妻子已决定留在中国。我和我妻子都很想把二女儿嫮生留在身边，而她因为从一懂事就生活在日本的姥姥家中，仍想回日本去，因此在我们父女、母女之间就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总理知道这件事后就在接见时对我二女儿讲：“你母亲是个日本人、和你父亲结了婚。你是个中国人，也可以同日本人结婚嘛！我许可你可以常来常往嘛！……”嫮生听了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临走的时候，她深情地对周总理讲：“我从心里尊敬您！”

一九七五年，我和妻子到日本去探亲，也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实现的。我记得在日本曾遇到一个“好心肠”的旧友，在饭后对我讲：“象您这样的人，在那里（指中国）恐怕没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言的吧？您今后在日本长住怎么样？我可以帮您的忙……”我回答说：“我谢谢您的好意。不过请您想一想看，象

我这样的人，今日能在日本见到您，没有自由能行吗？我希望您还是亲自到新中国去看一看的好。”他听了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明白了……”。

去年我女儿嫮生带着丈夫和四个孩子来北京探望我们，这种家庭团聚，也可以说是日益增进的中日友好往来的一个缩影。

现在，我每星期去文史资料办公室两次，其余时间或外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或在家整理资料，会见亲朋好友，从日本来的客人也不少。空闲时，我还喜欢练练书法，种点花木。去年我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虽然已经七十二岁，但在有生之年，我还要努力为人民多做些有意义的工作。“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句古诗，就是自溥仪到我们夫妇以及弟弟妹妹们的共同的心情。

（一九七九年第八期）

幻想和现实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印象记

叶华

一

记得我小时候最爱听童话故事。为了能够自己阅读这些故事，我五岁时就学会认字了。从此，我如饥似渴地读着，狼吞虎咽了一本本故事书。我完全沉醉在梦幻之中，生活在巨人和矮本又人、好的和坏的神仙、王子和公主中间。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都是我自己，我甚至急切地盼望有一天一位美貌的王子会来找我。

有一次我过生日——记不清是七岁还是八岁生日，比我大十岁的哥哥走进屋里，把早晨到的报刊和信件放在桌上，其中有一个是寄给我的邮包，上面贴着各式各样的外国邮票，绳子上盖了好几个浅红色的图章，用大红字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我急忙拆开一看，里面是一本书，封面上的字很古怪，我以前从没见过，每个字都象个小图画。书里夹了一封给我的信，开头写的是“亲爱的EVA”，信末签名是“中国皇帝”。“中国皇帝”用比较笨拙的德语写道：他见过我的相片，爱上了我，想和我结婚。并说，虽然我现在还太小，但是他一定等待我长大。为了使我把中国话学好，他今天送我一本中文语法书，作为生日礼物。看完信我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妈妈微笑着从大柜子里拿出一

块白底白花绸子，说这是真正的中国绸子，送给我做结婚礼服。那时候我整天都生活在梦境中，而这一切又完全符合童话故事里的幻想。这时我想，我盼望的王子会不会是中国皇帝呢？到了晚上，我这个梦幻就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这是我哥哥对我的幼稚的幻想开的玩笑。

这出小滑稽剧发生在一九一八年，也可能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八日。在那些岁月里，妈妈和哥哥平时谈论的都是什么国际文学、艺术、音乐等等，关于俄国革命我没听说过，德国革命他们也谈得很少。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肯定是若明若暗的。我坚信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中国已经成了共和国，他们更不会知道，早已退位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是个心狠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他们也不会知道，这个孩子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影响下，朝思暮想地要在中国复辟封建王朝。他们当然想不到，我后来几十年的生活和中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以后我将和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一个歌颂中国革命的诗人结婚，他们一定说：这人疯了。但命运的道路有时是很奇怪的。

二

一九三〇年我在瑞典搞摄影（我哥哥在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乐团当指挥），开始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和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我哥哥也有了很大进步，一九三四年秋，他送我一张去苏联参观的旅行证。十一月初，南方气候温和，景色美丽，在黑海之滨的苏联作家协会休养所，我认识了中国诗人肖三。大自然中，我最喜欢大海，无论它是宁静安祥还是波涛汹涌。十一月八日，是我二十三岁生日，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清晨，肖三在我的面临大海的餐桌上放了几十朵深红色的玫瑰花。爱情的种子已在我们之间萌发，不久我们就结婚了。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出生在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地方：立昂，一九三八年出生在莫斯科——当时世

界革命的中心；维加，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和平，一九五〇年出生在北京——新中国庄严的首都。

三

中国解放后，从一九五〇年起，我在北京从事摄影工作。一九六一年夏天，我们的朋友、智利画家约瑟·万徒勒里告诉我，他见过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并说溥仪经过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北京郊区劳动。这在我脑子里引起了闪电般的回忆，我不知不觉地对自己说：关于溥仪，我一定要拍一部纪录片。

一个“金色”的九月份的上午（我们称北京美丽的秋天为“金色”的），我和儿子维加站在政协大礼堂的台阶上，等待着给我们介绍和溥仪见面的人。太阳晒得很热，我闭着眼睛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想象：皇帝——虽然他早已不是皇帝——一定长个山羊胡子，戴个满清帽子，还有几十年前，我哥哥和我开玩笑的那封信……。不一会儿，政协礼堂的大门打开了，走出来两位穿干部服的男人：一个年轻人，另一个头发斑白戴着眼镜。两位都很热情地欢迎我们。我问：今天能见到溥仪先生吗？那位戴眼镜的说：我就是溥仪。同志们，到里面去喝杯茶，谈一谈。和几十年前一样，我觉得非常奇怪，这位谦虚朴素的人，难道就是过去那个娇生惯养，轻率、奢侈、直到八岁还喝奶妈的奶，自己的父亲应当称呼他“皇帝陛下”，兄弟应当称呼他“万岁”的小男孩子？难道就是那个他学习不好时，一个为他服务的男孩子替他挨打，以及无缘无故命令鞭笞别人的臭名远扬的皇帝溥仪吗？这真是难以相信的事。这一次，我们只谈了拍摄纪录片的计划，并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

过了几天，我和维加坐小汽车去找溥仪，并和他一起到北京郊区的植物园——他劳动的地方去。溥仪在温室和院子里劳动时，我拍摄了电影。休息的时候，溥仪仔细地向我们介绍各种植

物，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心一意地干着这活儿。他和同事的关系也是热情友好的。我真是难以想象，他就是那个到十四岁还不会自己洗脸、穿衣服，高高在上看不起老百姓的皇帝溥仪。那天，他约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我们高兴地答应了。

溥仪住在一个中国典型的平房四合院里。院子里栽有树木和主人喜爱的植物，花卉。当时，溥仪五十六岁，没有再婚。（不久，一九六二年，他和一个护士结了婚）他说，为了把时间过得愉快些，他还请妹妹及她们的丈夫和孩子来玩。他领我们观看他的书房——当时他正在写自传（即已经出版的《我的前半生》）亲戚们来了。孩子们热情地围住溥仪，最小的马上爬上了他的膝盖。我时刻都在想着他当皇上时那骄奢淫逸的过去，因而不能抑制看到眼前这种情景的惊奇。

在院子里的茶几上，摆着茶点和水果，我们和过去的皇帝家属同坐在一起，谈了中国由封建王朝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奇迹。这时候，溥仪的侄儿带来了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溥仪的文章。溥仪告诉我们：他现在比过去幸福得多。当皇帝时，生活在“紫禁城”（故宫）的小天地里，实际上是被囚禁的。退位后，虽然忠于他的人还称呼他“陛下”，他也完全是孤立的。从他继续给我们讲的，就可以理解这样一个历史悲剧：他终究明白了日本人为什么那样毕恭毕敬地尊重他，不过是为了让他当个傀儡，成为他们侵略中国的顺从的工具，一旦不再需要他时，他们随时会杀掉他，就像杀一只小鸡一样。说完后，他面部紧张的表情舒展了。他自豪地说：现在他是一个生活在六亿同胞中间的自由的公民。这种幸福感，不是每一个被推翻的阶级的人都能理解的。当时，我已经坚信他这句话完全是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看了他的自传后我更加相信，如果存在着什么社会主义改造的话，高傲自大、暴戾的末代皇帝溥仪变成一个崭新的人就是一个最生动、最好的例子。

在告别时，我不得不给他讲我七、八岁生日时，哥哥跟我开玩笑的那封信。并说，虽然我没有嫁给中国的皇帝，但我还是和一个在国内外有名的作家肖三结了婚。中国是我的第二个祖国。溥仪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故事，思虑地盯着我。可能他也和我一样瞬息间明白了表面上差别很大的我们两人共同的命运的转变：他从皇帝到公民，而且当选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我从一个轻率、空虚、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小姐成长为一个全心全意为进步而生活和奋斗的人。溥仪脸上呈现一种会意的微笑，他热情地拉着我的双手。这样，从童年时代起围绕着我的神秘的童话的光环合拢了。

注：作者叶华一九一一年生于德国。本文用德文写成，并由作者本人译成中文。溥仪于一九六七年死于肾癌。

（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

一对农民的婚礼

子冈

“哟！不巧下了雪，徐国仁和陈秀云还要行婚礼呢！”北京东郊辛庄的妇联主任说。一些青年男女往民校跑，为婚礼张罗；有些是去瞧热闹的。

春节前结婚在农村里很普遍，辛庄所在地的这一区在春节前有四百对男女自由结婚，徐国仁和陈秀云就是其中的一对。二十岁的徐国仁是不脱离生产的民校教员，比他小一岁的贫农女儿陈秀云是在他班上学习得很认真的一个学生。他俩白天共同在田间劳动，晚上又都在民校，日子久了，彼此就有了感情。徐国仁教课很认真，他父亲死了，家里没有人，忙里忙外，一点也没有耽误功课。陈秀云这时就从对老师的尊敬变成十分体贴，有时自动去替老师做点家务。

陈秀云的堂姐看透了这层，对她说：“徐国仁家里没人，你要是有心，两个人就明着谈一谈吧。”

“你比妈还懂得我啊！”秀云轻轻打了一下堂姐，笑了。

两人当面谈开了这件事，为了要在一块儿过好几十年日子，自然不能不把对方仔细品评品评。他们又相互勉励一番。男的下决心要搞好庄稼，更要教好大伙儿的书。辛庄的学习是有成绩的，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都得过红旗，作为民校的教员，他不能失掉这面光荣的旗子。女的保证：不只坐在炕上绣绣花，下地做些活，

尤其要好好学习——她是爱学习，才爱上徐国仁的。“谈判”圆满地结束了。

辛庄的人们已经习惯于自主的婚姻，对他俩从劳动、学习、生活各方面建筑起来的爱情和婚姻，更是把它当作全村的喜事来举办：年青的村长和妇联的委员们亲自来给他俩的门梁上悬挂大红彩球；民校的年青孩子们组织秧歌队帮助新郎迎亲。两家相距一箭之远，什么代步的工具也不需要。

陈秀云在婚礼那天早上刚一睡醒，窗上白亮白亮，揭开窗帘，发现白雪纷飞，“啊呀”了一声，推了一下在灶前安排早饭的母亲：“妈，这要是换在从前，人家又该说新娘子没有天缘了！”

母亲瞅了一眼女儿身上换好的新花布棉袄，嗔她道：“瞧你得意的，妈当新媳妇那会儿，先哭了三天三夜才上花轿呢！”

“为啥呢？”秀云天真地问。

“害怕呀！怕媒人扯慌，怕公婆难侍候，怕嫁个男人不合心，说不定还得挨揍！你呀，赶上这个自由的好年月……”

这里的习惯，婚礼要在露天举行。徐国仁当众报告了他俩的恋爱经过。秀云在报告新家庭的生产计划时，还强调要“结合学习”。跟着秧歌队把新婚夫妇送往徐家，送进一粉刷一新的新房。喜筵陆续在另两间屋子里摆开。来宾们调侃了新夫妇。他们在席上还谈到电灯将要安装到邻村的新闻；也谈到村里把互助组推进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他们向新婚夫妇举杯：“结婚以后，一点也不许偷懒，要帮助大伙儿学习啊！”

（一九五三年第三期）

他们十三个人

郑光华

一九五三年底，一个严寒的清晨，我来到齐齐哈尔市。新修的大马路上，两排街灯笔直地引向远处。在那远远的十字路口，一座小小的红色建筑物立在白皑皑的雪地里，上面点缀着电灯和红旗，显得十分夺目。走近一看，原来是座“光荣榜”，上面张挂着许多劳动模范的照片。

“瞧！董振远，”旁边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向他的伙伴说道：“相片可没本人漂亮！”

“怎么，你认识他吗？”

“咋不认识！他是咱们齐齐哈尔机床二厂的副厂长，原来是马恒昌小组的一个工人。”

提到马恒昌小组，真是鼎鼎大名，不禁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一九五〇年，这个模范小组曾在“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得到了集体奖状；他们的先进经验被推广之后，全国各厂矿又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马恒昌式”生产小组。可是，董振远怎么当了副厂长呢？马恒昌现在怎样了呢？组里其他工人又怎样了呢？

后来，我决定到机床二厂去访问董振远。他年龄不过三十岁上下，矮矮的个子，穿着一套黑布棉衣，和普通工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那双眼睛一眨一眨的，透露出精明能干的样子来。

“小组里共有十个工人，三个徒弟。”他开始向我介绍着当年的马恒昌小组。“一解放，我们就赶跑了工头韩坏蛋，推选马恒昌当组长，因为他的技术最好。那时候大伙儿光觉得生产的劲足，可是‘组织’啦，‘竞赛’啦，全都不知道。有一个干事——当时还不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咧，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小组团结得很紧，树立了自觉的劳动纪律，并且组织了三人技术互助组和中午研究会，想出了检查第一个成品的办法……”

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起，马恒昌小组每月提前完成任务，经常改进工具，创造新纪录，于是就逐渐成为全厂、全东北和全国的模范小组了。

董振远出生在贫农家里，从小放牛、拾粪，只捧过四年书本。十七岁就出来当徒工，受尽侮辱与折磨。解放后他从一个普通工人升为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一九五三年五月起，就当了副厂长。“一个工人刚刚做了厂长，不是没有困难的，每天都碰到许多新问题。”他这样地说。可是他熟悉车床上每一颗螺丝，了解每一个工友，不怕困难，善于向工人、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学习。就这样，他从“每天睡不着觉”而能“问题来了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几下轻轻的敲门声，进来了两个人。董振远马上站起来笑道：“给你们介绍一下。徐景荣、于宗山，都是马恒昌小组的老组员。他们到沈阳学习了一年，前两天刚回来，学了满身的本事。”

一九五一年冬天，徐景荣从小组长升为工段长，于宗山也担任了组长。他们一身手艺，却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更缺少技术理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厂里把他们送到一个技术干部学校去学习。现在他们不但能写总结报告，也学过代数、几何和三角，还学习了十二门机械工业的基本学科。

中午休息的时候，董振远邀我到他昨天才搬去的新宿舍里去看看。老远就看到三幢三层楼的新屋子，十分整齐可爱。我们刚下

汽车，一个高身材的中年人从一扇大门里走出来，看到董振远就打了个招呼。董振远向我说：这位黄焕瑞同志，也是当年的一个老组员，现在是第三车间的党支部书记。

我问黄焕瑞，他是不是也住在这里。他回答道："不。第三车间有些工友搬到这里来了，我来看一下，顺便也看看新宿舍的质量。"于是董振远插嘴笑道："房子不错。你这位前任福利科长可以放心了。"这时有一些工人走回宿舍，老远就在叫"老黄！老黄！"黄焕瑞答应一声，便匆匆地赶上去了。

当晚，全厂的年终发奖大会在新落成的礼堂里举行。共有二百三十七个单位和个人被评为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受奖名单中也有马恒昌车间和马恒昌小组的名字。

第二天，我到那个以马恒昌命名的车间去参观。一进门就在横梁上看到东北总工会等单位赠送的十七面锦旗。昨晚代表车间领奖的赵连科，原来也是马恒昌小组的老组员。一九五三年四月，他当了这个车间的副主任以来，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不仅是领导成百人的生产，而且要使这个车间成为全厂的模范。但这车间提前五十天完成了全年的生产计划，从这一点也可以了解到这位三十岁的领导者有着怎样的才能了。在这个车间里的老组员，还有章荣海。他也当了工段长，可以说是赵连科的"左右手"。

听说马恒昌小组里原来的徒工王连贵也在这个厂里，中午我就到宿舍里去访问他。刚踏进那间温暖的小屋，酸菜白肉汤的香味就扑鼻而来。王连贵坐在炕上逗着他的一岁半的小女儿，他的妻子正在准备午餐。他开始学徒时已是解放之后，所以没有吃过当工人的苦。他的师傅就是马恒昌，他们订了四个月的师徒合同，约定师傅教徒弟技术，徒弟教师傅文化。合同期满之后，王连贵成为一个正式的工匠；一九五一年六月起，他也开始带徒弟了。现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师傅恨不得一口气就把全副本领都教给徒弟，让生产上很快地增加新的力量。"他这样地告诉我。当他在沈阳

的技术干部学校学习时，他探望过马恒昌小组里当年的另外两个徒工李景峰和谭敬厚。李景峰在沈阳第二机床厂，谭敬厚在沈阳矿山机械厂，都已当了小组长，都已教出了两、三个徒弟。

过了几天，我又特地到沈阳去访问。在矿山机械厂里，马恒昌小组当年的组员除了谭敬厚，还有谢溪华。谢溪华已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升为计划科副科长。这个只在高小里毕过业的工人，“现在订计划的一套算已懂得，搞统计还不十分在行；对业务钻进了百分之八十。”他倒底是搞计划工作的，出口就是百分比。在这年终的时候，他正忙于检查全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又要拟定下年度全厂的生产计划。屋子里一片唰唰的计算机声，不时有人来找他批文件，谈问题。

在沈阳第二机床厂，马恒昌小组的老组员有三个人：李景峰、柳玉璞和祝普庆。柳玉璞已是工具车间的副主任；祝普庆却担任了该厂职工消费合作社的主任。

当祝普庆还在马恒昌小组里的时候，就是工会小组长。后来他做过车间工会主席和全厂工会主席。一九五二年三月间，合作社需要一个能干可靠的主任。厂里的领导者想来想去，终于选中了祝普庆。一年多来，人们对老祝的天才大为惊异，因为合作社已由一间小屋发展到四个门市部，备有一四五、六百种货品了。不久前，街道上普选时把他选为大东区的人民代表。居民们认为老祝替大家办过不少好事，又曾经是马恒昌小组的组员，“错不了”。

马恒昌本人的情况又是怎样了呢？他现在是东北工学院附属工农速成中学预备班的学生。我一走进学校，立刻就在一群打乒乓球的学生中间认出了他，因为他的照片我已在报章杂志上看到过不止一次了。他是辽阳人，贫农出身，十二岁时就开始替地主放牛，十七岁就当了徒工。在解放前的二十多年中，他挨过耳光，吃的是高粱，豆饼，橡子面和糠皮……。直到一九四八年底沈阳解放了，工人才翻了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一点成绩，

都会得到重视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他从组长调任工段长；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就升为车间主任。到了年底，政府又把他送来学习。

我们不难了解马恒昌的心情：快五十岁的人了，没捧过一天书本子，今天才进学校，行么？真是又兴奋又担心！但现在他已认识二千多字，六百字一篇短文写得挺不错了。半年之后，他可以达到高小毕业的程度，那时就将升入中学，然后三年学完六年的课程。他是全校年龄很大的一个学生，在学习上也树立了“老大哥”的榜样。最近他被选为人民代表；人们在候选人介绍书上说他学习踏实，尊敬老师，关心群众，爱好劳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甚至还重视体育活动。

离开了东北工学院，我一面走，一面在回忆几天来的所见所闻，觉得这十三个人的成长竟是几年来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迅速成长壮大的缩影。正象麦穗一样，马恒昌小组的每颗麦粒撒在泥土里，得到阳光和雨水的滋润，都生长了起来，成为无数支茁壮的麦穗。

（一九五四年第二期）

他们这对夫妇

郑光华

四年前的一天，袁诗咏刚到棉纺厂来实习，一进厂门就从光荣榜上看到了浦玉珍的名字。榜上写了她的先进事迹，却没有她的照片。“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呢？”这个小伙子不免有些浪漫的想像。等到他作“郝建秀工作法”实习时，车间主任领他到一个女工的面前说：“这是你的老师浦玉珍。”“浦玉珍！”袁诗咏一下子心慌起来。当天晚上，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一双手那样灵巧，眼睛又大又亮……只是下巴又短又尖……没什么，很平常。”

但是，日子久了，浦玉珍在袁诗咏的脑子里却变得越来越不平常。他看到她在劳动竞赛中把自己看的好车子让给别人，自己倒去看那爱出毛病的“死弄堂”。他看到她一星期后就“医”好了这个“死弄堂”。出的白花反而比别人少。他还看到她对人十分诚恳、热情，谁最落后就帮助谁。于是，渐渐地，他的感情“复杂”起来。

浦玉珍呢，最初对这种事情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十五岁就开始做工的姑娘，对知识分子一向有些“敬而远之”，对袁诗咏这个纺织工学院的毕业生当然也不例外。可是，慢慢地，她觉得他和她过去见到的大学生有些不一样：不论干活、学习或排戏，都和工人打成一片，还经常帮助自己学文化和科学理论。于是她

开始向小姐妹悄悄地说："这个人长得太高，矮一点点多好！"看不见他的时候，她心里就像少了什么似的。

不久，在公园的角落里，在僻静的马路上，朋友们撞见他们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星期天，袁诗咏还常到浦玉珍家里去享用她妈妈特意烧的糖醋排骨。虽说这样，袁诗咏并没有忙着要求结婚。他觉得自己在工作上还不能跟浦玉珍媲美。但是，他是一个深入现场的技术员，善于总结经验。当他一九五四年和浦玉珍结婚时，他也是一个先进生产者了。

一年以后，他们的女儿圆圆出世了。尽管他们是生产上的能手，抚育孩子却要从头学起。麻烦是够麻烦的了，但看到孩子的眼睛像妈妈，下巴像爸爸，这种乐趣当然是他们过去所不能体会的。由于兴致高，袁诗咏这个喜欢安静的人已在浦玉珍的带动下学会了跳舞，浦玉珍也在袁诗咏这个"家庭教师"的帮助下更起劲地学习文化。星期日，丈夫还经常在厨房里忙乱一阵，烧一份妻子最爱吃的鱼。

最近，朋友们发现袁诗咏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原来他正在拟订向科学进军的长远计划。浦玉珍也向人们表示，她将争取做一个更优秀的纺织工人。

（一九五六年第九期）

吴丹的一家

新以

依照年龄来说，六十一岁的吴丹可以退休养老了，厂里劝过他，孩子们也劝过他；但他却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我到汽车厂就是为了造汽车，汽车没造好我就休息，可太不带劲了。"

吴丹在十六岁学会了修理汽车，后来，他让两个儿子也干了这一行。几十年来，他摸来摸去都是些外国车子，早就盼望着看到自己国家的汽车。他快六十岁的时候，听说长春在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他就欢天喜地赶了来。他的一家人也跟着先后来到长春。

这一家十六口，四世同堂，都住在汽车厂的职工宿舍里，差不多占了三层楼的全部。全家除开老的小的，都进了汽车厂。

老吴丹在厂里管技术安全工作，他性子直，做事挺认真，对人对己从不马虎，因此很受大家尊敬。大儿子亚洲是试制车间的副主任。解放牌汽车出来了，全家是那么激动和兴奋，唯独他说："这还不是我们最理想的汽车，我们正在研究设计更新的车型。"他很留心世界各国汽车工业的新闻，谈到汽车的事，全家谁都不如他知道的多。二儿子汉忠是个幽默的人，什么事从他嘴里出来都变得很有趣，他常把自己工具车间的事说得娓娓动听。三儿子吴华是厂里的翻译，这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生是全

家唯一的知识分子。他不大爱说话，但特别喜欢听父亲和两个哥哥谈汽车的事。大媳妇张秀芝和二媳妇王俊在厂里做事务工作，晚上还在夜校学文化。这家人对汽车情感之深，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就连刚会说话的孙子毛毛也成天嚷"汽切（车）"、"汽切（车）"。或许是受了一家人的影响吧，连过门不久的三媳妇韩玉兰也进了汽车厂，在冲压车间做钻床徒工了。

平时，吴丹和他的儿子，媳妇们上班，大孙子、孙女上学，家里仍然安静不下来，几间房子立刻成了孙儿小保和毛毛的天下。他们跳上跳下，吵个不停。但这对七十九岁的老奶奶一点影响也没有，她照样安静地捻麻线或睡觉，因为她的耳朵聋听不见。五十六岁的奶奶可生气了："你们把我的头都闹昏啦！"这个有三个儿子、七个孙子的奶奶是全家的主妇。她不但要安排日常家务，遇到放假、过节，还要帮助大家筹划吃穿游逛。事情虽然不少，她也不显得太忙累，因为媳妇们总是乐意抽出时间来帮助婆婆的。

星期天，吴丹又带着亚洲和大保到郊外打猎去了。也许正是这个老习惯才使他的身体那么壮实。他们出去可不是每次都有收获。碰上打不到野物时，大保就很泄气，但爷爷依然兴致勃勃，因为他就是要在大自然里消磨半天，多吸些新鲜空气，多走些路，多看些一眼望不到头的青山绿树。

留在家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事。汉忠填平了门前的道路，就弹起从苏联带回来的曼德林。玉兰要考文化班，吴华帮助她准备功课。两个年轻的妈妈——秀芝和王俊收拾好了房间，赶着把自己、丈夫和孩子们的衣服洗出来。才进小学的小臻在楼下院子里和新同学拍皮球。原来在一起玩得好好的小保和毛毛又闹翻了，这倒不用操心，不多一会他们自己就会讲和的。

当我到他们家的时候，猎人们已经回来了。我特意把从千山带来的藤杖送给老吴丹，他接过去顺手放在墙角，笑着说："我

还得过些年才用得上它呢！”快吃晚饭了，我站起身来准备告辞；他一把拉住我，一定留我一道吃牛肉芹菜馅的饺子，并且特意告诉我说：“还有滷野鸡，就是上次打来的。咱们一块喝两盅。”我不能再推辞了，就和他们一家人度过了这个有趣的夜晚。

（一九五六年第十二期）

金福长的故事

孙毅夫

在沈阳市的上百个机械工厂都知道有个金福长。

金福长，绰号“刀具大王”，原来是沈阳重型机器厂的车工，去年提升为技师。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名气呢？

金福长对刀具很有研究。他创造的刀具大的得俩人抬，宽刃的达一尺多，有的刀具能提高效率几十倍。他有十七把宝刀，大大小小，车、铣、刨、钻，应有尽有。他还能根据不同的活，设计出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刀具。不管在哪儿，只要金属加工刀具方面有问题，金福长去研究研究，琢磨琢磨，一般的都能迎刃而解。根据他的技术经验和理论，已编写成“先进刀具选”一书。

但是，在三年以前，金福长却是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就回家的人，他的技术不过只在本厂起作用。可是，金福长的好朋友、沈阳高压开关厂的青年先进生产者吴大有曾和他一起工作过，对他的高超技术有所了解。

一九六一年，吴大有和另外几位先进生产者主动组织了一个技术协作委员会，专门推广先进经验和帮助解决各工厂的一些生产难题。有一次，他们被一个刀具难题难住了。怎么办？去请金福长！

然而，吴大有一连去请了五次也没请出来。第一次，金福长说：“我不行。”以后四次，他们一见面，金福长不是说：“再

想想”，就是说：“算了吧！”。他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技术协作要利用业余时间，又要定期活动，多麻烦；参加人都是先进生产者，我是个普通工人，算干什么的”。不过他心里想：“吴大有这人也真怪，三番五次找我，到家里找，到工厂找，在厂门口一等三个钟点，他到底为个啥？他不怕麻烦？”

吴大有五请金福长没请出来，心里特别着急，可是他没有泄气。第六次，金福长终于答应跟他走一遭。

过了两天，是技术协作活动的日子。吴大有到厂接金福长。技术协作委员会的著名先进生产者吴家柱、王凤恩听说金福长要来，老早就等在市文化宫门外迎接。金福长一到，他们就一拥而上拉着金福长的手，你一言他一语地亲切地说：“你可来了，金师傅，我们得好好向你学习。”金福长一听，羞得满脸通红，只是说：“我来得太迟了，你们分配任务吧。”

这天回家，金福长心里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这些著名的先进生产者对自己这样热情，这样亲切，这样尊重；难过的是自己为什么那么固执，要人家三番五次地请。“金福长啊，你这是做的什么事呀！想一想自己的技术又是怎么得来的？”

伪满时，金福长念了三年书就当学徒，有时被人打得鼻口流血，到头来什么技术也没学到。国民党统治时，生活困难不得不去赶马车。解放了，他才进厂当工人。一九五〇年，工厂让他参加高速切削训练班，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接触了先进刀具；后来工厂又派他到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的一些现代化大工厂学习和交流经验，他更了解国内外先进刀具。厂里又把他分配到工艺试验室，提供优越的研究和试验条件，于是他开始创造一些刀具。晚上想起过去这些，金福长翻来复去睡不着觉，他想：“要不是解放了，我不还得赶马车，上哪儿学技术去？有了技术不去多多发挥作用对得起谁？”

从那以后，金福长就参加了技术协作活动，主动传播自己的

经验。

有一次，技术协作委员会告诉金福长，沈阳鼓风机厂有一个刀具方面的难题，该厂生产的大叶轮有八吨重，直径三尺多，用大立车加工切削下来的铁屑长达好几米，不是不断头，就是往外“飞”，搞得车间不整洁，还容易出事故。金福长找了个熟人一起悄悄跑去一看，肩上好象立刻压了一块大石头。大叶轮用的钢材韧性大，现有的刀具全不行，必须设计新刀具。整整十七天，根据测量的数据，金福长亲自设计、制造、刃磨、试验，终于设计出三把比较简单、一把比较复杂的刀具，这些刀具都是新型断屑刀。

鼓风机厂听说“刀具大王”要来帮助解决难题，简直象过节一样地欢迎了金福长，领导人和工人都来观看，把试验立车围个紧。金福长有点紧张了，一试验，头两把刀都没有解决问题，第三把刀上好之后，转了几圈只听咔的一声，刀打了。周围的人都楞住了。这一声也在金福长的脑里轰了一阵，虽然他自已知道头三把只是试一下，第四把才有把握，可是打刀这事也有点出乎意料，他立刻和他同去的吴大有等人聚起来商量，找出了试验头三把刀时的断屑和走刀量之间的关系。等试验第四把刀的时候，立车一开，只听铁屑啪啪地有节奏的响着，原来不断头的铁屑乖乖地象指甲大小一节节地断下来。这时，周围的人哗地一声鼓起掌来，还有人高声叫“好！”大家的眼睛都看着金福长，热烈祝贺他的试验成功。

在回家的路上，金福长浑身轻快，他更深的体会到：“技术协作了不起，它能激发人的革命精神。以前的那些想法多可笑。应该感谢吴大有，是他帮助了我。我碰到困难，他比我着急；我获得成功，他比我高兴；刚才打刀时，他急得满头汗；成功时，他乐得比我在上。我们是好朋友，他关心我；可更重要的是他关心大家的生产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为了这些，他千辛万苦、赴汤

蹈火也在所不辞。他站得高，看得远。这就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吴大有，这就是我的榜样。”

这以后，金福长更积极了，决心把全部绝技献出来，他在市文化宫开了个刀具讲座，在每次讲课之前，总要准备上四、五个小时。他有好几百个学生，他的第一批学生又收了学生，真是桃李满天下。”看到这一切，他的情绪更高了。

三年来，金福长不仅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出色，而且还帮助几十个工厂解决了刀具方面的难题。不管是刮风下雨，也不管是严寒酷暑，三年如一日，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

看看现在，展望将来，金福长心里亮堂堂的：“我们工人一定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这都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啊！”想到这里，他决心参加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

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来到沈阳。他接见了沈阳技术协作委员会的一些成员，金福长也在内。彭真同志对工人主动组织起来的技术协作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彭真同志了解了金福长的情况以后，表扬了他。刹那间，金福长周身的血液好像都涌到脸上，眼里充满了热泪，他的感激、愿望、理想、决心……还有那心里的千言万语，一股脑儿都涌上来，可是这时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如今，金福长已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一九六四年第四期）

他们五兄妹

过桔新

我第一次到北京东唐洗泊街访问周同山五兄妹是在今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同院的一位大婶听说我要访问这五个孤儿，忙同我打招呼。她说："你若是星期天来就好了。平时，同山在变电站工作，同庆、同来、同贺都上学，同义上幼儿园。"说着，她邀我到她家歇歇脚。

这大婶叫田淑英，和同山一家是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于是，我请她谈谈同山一家的情况。

同山的母亲张秀明因患胆囊炎、父亲周永寿因患高血压半身不遂，医治无效，先后在前几年死去。那时候，最大的同山才十五岁，同义只有三岁。周永寿生前是一个煤球厂的工人。煤球厂为周永寿付了医药费，给了同山兄妹们一笔抚恤金，并且和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帮助料理了周永寿的丧事。同山兄妹们的生活费用和上学费用都由街道办事处代表人民政府负责供给，孩子们上学的照常上学。去年夏天，同山初中毕业，政府介绍他到变电站工作，同义免费进了幼儿园。

变电站的师傅、学校的老师、幼儿园的阿姨对这几个孤儿都特别关心。变电站的领导指定先进生产者孙全得当同山的师傅，孙师傅耐心地教同山技术，并且在思想上、生活上处处关心他。十三岁的姑娘同庆在文昌宫小学读书，班上的张少华老师不

仅在校内关心她，还特地在同庆家里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那些小朋友每天在课余时间来陪同庆复习功课，还帮她做些家务事。法华寺小学的李和平老师，在冬天大风雪的夜里，还到同贺家来帮她复习，同贺阅读的《中国少年报》也是李老师给订的。同来这男孩比较贪玩，在崔承京老师的耐心教导下，很快有了转变。谈到同义，田大婶讲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星期六下午，街道办事处干部田迈琴到幼儿园去看小义，想顺便接他回家，没想到小义被另一个孩子的妈妈领去过假日了。"

"唉！"田大婶忽然叹了口气："在旧社会，甭说是孤儿，就是有父母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也少不了挨饿受冻呀！有时候，我就告诉同山，他还有个姐姐和妹妹，解放前都是因为生病没钱医治而死的。今天，同山他们没了爹娘，在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他们和别的有父母的孩子们一样，过着愉快的生活。平时，有好多人探望、帮助他们。孩子们的房间经常有人帮着打扫，被子经常有人给拆洗。尽管孩子们自己都会料理，但大伙都觉得，不为孩子们做些事，心里总觉不舒坦。"

田大婶领我瞧了瞧孩子们住的房间，透过玻璃窗望去，洁白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两旁贴满了年画，炕上被子叠得很整齐，地上十分清洁，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这时候，我更想看看这几个孩子了。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再次来到同山的家。一进院子，就听到一阵阵歌声和笑声。田大婶见我来了，便叫道："同来！叔叔来看你们了。"这时，从一群玩得正起劲的孩子中间，跑出个十一二岁的男核，他带着红领巾，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朝我望了望，高兴地叫了声"叔叔好！"便拉着我到他们家屋子里去。同山忙招呼我坐下，正在帮同贺做作业的同庆也忙着倒茶，穿着小海军服的同义一面叫叔叔，一面爬上了我的膝盖，还嚷着要我讲故事呢！

同山告诉我："爸爸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们还不大会料理家

务。现在，做饭、炒菜、洗衣服都会了，这全是田淑英大婶耐心教的。这里十几户邻居，都热情地关心我们，连六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马升元大爷有时还帮我们提水。过春节的时候就更热闹了，街道办事处张景星主任和邻居们都来帮我们包饺子，……”突然，坐在我膝上的小义打断了哥哥的话，翘起小脚嚷道：“叔叔你看，这凉鞋是街对面杨奶奶给我买的。”同山笑了笑，接着说下去：“去年冬天，街道办事处怕我们冷，让田大婶陪我们去做棉衣。当磁器口服务站的阿姨知道我们没爹娘时，马上连夜给缝制，缝制的时候，站长陈玉珍阿姨看着里子布不够，她不愿意把我们多余的新布用掉，便拆了自己的一件旧褂子给补上了。我们取棉衣时，还拿到了阿姨们送的两双鞋。当时，我激动得真不知说什么好”。

同山拿出昨天才收到的两封工人叔叔的信给我看。一封信里述说写信人自己解放前的流浪生活，他为同山兄妹今天的幸福而激动。另一封信里还附着写信人在部队时得到的一张“荣誉证”，他勉励孩子们做革命的接班人。同山告诉我：“现在，我们经常收到一些来信，每当读到这些信，我们都受到很大的教育，我给弟弟妹妹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来报答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关怀。最近，学校老师向我谈到同庆、同来，说同庆曾经约了几个少先队员，早上提前到校，不声不响地把教室里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同来也主动帮助别的同学布置活动场地，我觉得这都是应该做的。”这时，不知是谁扭开了收音机，欢乐的歌声立刻充满了整个房间。置身在这些孩子中间，我同他们一样感到欢乐、温暖和幸福。

（一九六四年第十期）

失去双臂的工人

孙桂琴

出了医院，刘京生悲观极了。三个月前，这个北京造纸五厂的二十六岁电工在一次检修设备的事故中，被高压电夺去双臂。

尽管他有父母家庭，工厂还是在一条小河边给他安排了住房，派了三位工人和一位炊事员日夜照料他。

这个喜欢写诗、舞剑、弹琵琶、装收音机的活泼青年看看四位工人放下工作来为他服务，“天哪，我成了只能靠别人维持生命的废物了！”

热恋中的女朋友与他分手了。他想，一切全完了。

一天夜里，他在河边漫步。“活下去吗？前途漆黑一片。死，只要向旁边纵身一跳。”可是，他眼前浮现出在医院动手术时，厂里青年工人纷纷请求为他输血的情景。内中有一个矮小的姑娘被医生劝阻了，因为她的体重还不到四十公斤。他想：“我的躯体里流动着许多同志的血，这生命并不只属于我。难道国家和同志们是为了救活一个废物吗！？”

但是，怎样活下去呢？一位外地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先进工人顽强学习，用嘴衔笔写字的事启发了他。

他咬住一支笔苦练起来。能行，可是距离太近，时间长了就头晕眼花，口水也无法控制。用脚写，也行，然而距离又太远，还是不理想。于是他想到制造一个工具，使它代替手和臂，运动

身体来写。经过反复试验修改，好友为他做成一个工具。

哗，想写一个横，却划出一尺多长，纸也戳破了。他急得在纸上乱划一通。有人劝他："反正国家养你一辈子，不工作也不会少拿一分钱，何必费劲。""不，"他想："没有理想，没有事业，一个人就成了空躯壳，肉体虽存，精神已死。"于是，日夜苦练。

肩膀肿了又消，化脓了，敷药包扎仍然写。天热，痱子起了一茬又一茬，蚊子都来欺负这无法驱赶它们的人。

一天夜里，在附近值勤的警察走进他的房间。"真了不起呀，没有胳膊还写得这样好！""你们了解社会情况，给介绍一位书法家，我去学学好吗？"

过几天，警察果然介绍他到宣武区书法学习班去。他当场写字，受到那里师生的喝采。老师说："我都有点紧张，过几年他超过我，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他向工厂请求工作，领导答复："好好养养身体以后再说。"

出乎意料的是一位农村姑娘看中了他。她的父亲，一位乡村中医说："那孩子有志气。这是好事，你等于救了他，我一辈子治病救人。他能教你学文化，他不能干的事你帮助他。"厂里的职工为他刷房子，买东西。一位老工人说"这是全厂办喜事，小刘娶媳妇。"

婚后生活美满。妻子体贴入微，他身体越来越健壮。可是心里越来越不安：自己至今未工作，而她这农村工厂的工人却放下工作来服侍自己。"我成了家，却使她离开社会，我不能自私。我们一同去工作不是更好么。"于是他又请求工作，答复是："你能健康地生活就很好了，如果爱人在城里不习惯，可以在乡下给你们盖幢房子住。"

他愁得睡不着觉。爱人安慰他："别发愁，你干什么我都陪

着，别说你还有工资，就是没工资，我也能养活你。”他觉得她不完全理解他，但她是多么可爱呀！

他是共青团员，他写信给团中央。过几天，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局长——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同志来到他家。他对她说：“您一生为人民而工作，所以大家都尊敬您。我到了您的年纪，孩子们问我一生都做了什么，我怎么回答他们呢？”“你是对的，我和你们工厂商量一下。”他终于被分配去当工厂图书室管理员。

自从负伤，他不愿见人，不愿上街。这回，他昂首走进工厂大门。“我将自己走路，而不是让人‘背着’走了。”他想。爱人把书刊报纸取来，他登记卡片，办理借阅手续。

爱人怀孕后，他想尽量减轻她的负担。他把小扫帚套在脚上扫地，踩着抹布擦地板，用脚整理桌子上的杂物，铺床叠被。在这以前，他已能自己穿脱鞋、梳头、开门开抽屉。

四年过去了。如今，他已成为宣武区书法协会理事，北京市优秀共青团员、少先队校外辅导员。

北京市许许多多中小学及机关、工厂共青团请他去讲话，以鼓励青少年发奋图强。他还尽力帮助各种各样的残废青年。

北京团市委给他记了一等功。一位团中央书记对他妻子说：“你很辛苦，我们大家都感谢你，向你学习。”

（一九八二年第九期）

革命老人何香凝

黄谷冰

在何香凝老人的客厅里，有老人八十二岁时画的一幅《高松图》。陈毅元帅在画上题了一首诗，诗末四句是："绘画如其人，方向毫不误；画高寿亦高，但祝两繁富。"

看了这幅画和这首诗，想见何香凝老人的为人，我们省悟到确是"绘画如其人"。何香凝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情神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意志，充分表明了她像一株巍然挺立、老而弥坚的高松。

去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在这幅《高松图》前面，我们访问了何香凝老人。

八十五高龄的何香凝老人，脸上满泛着慈祥的微笑，用浓重的广东口音，向我们讲起她在六十年前怎样认识孙中山先生。

"我认识孙中山先生是在一九〇三年。"她说，"那时候，我和廖仲恺正在日本留学。我们夫妇是因不满清政府丧权辱国而东渡日本留学的。在到达东京后不久，我和仲恺参加中国留学生聚会，初次见到了著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并且打听到了他的住址。几天后，我和仲恺、黎仲实去拜访孙先生，倾听他畅谈革命，对他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主张，很是佩服和同情。不久，我和仲恺就向孙先生表示，愿为革命效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中国留日学生中

广为结交，物色有志之士。于是，我们就积极进行宣传联络工作。以后，孙先生还指示我和仲恺、朱执信联名写信给海外华侨，宣传革命，深得华侨同情。”

何香凝是中国同盟会最早的盟员之一。她告诉我们，她参加同盟会是孙中山和黎仲实介绍的，地点是她的家里。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在东京筹组同盟会，为掩护其革命活动，派人来商借何香凝夫妇租赁的寓所，作为集会和通讯联络地点。就在借寓所的第二天晚上，何香凝办了入盟手续。两个月后，廖仲恺从香港回来，也在这寓所里入了盟。何香凝为孙中山妥善收发信件。在孙中山来开会的时候，她就负责看门和照料茶水，还要把鞋子收藏好，因为按照日本规矩，进门要脱鞋，人多，门前的鞋多，容易暴露秘密。革命党人的起义，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他们家里部署的；起义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还是何香凝描绘和缝制的。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廖仲恺和何香凝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后来，他们帮助孙中山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反对北方和南方的军阀。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多次革命斗争失败之后，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孙中山的这些革命措施，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当时，何香凝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廖仲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工部长，他们都坚决支持孙中山。廖仲恺并且自始至终积极地参加了孙中山采取这些革命措施的筹划工作。孙中山发给列宁的函电，有些就是廖仲恺帮助起草的。当年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也是廖仲恺事先和越飞共同准备的。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右派阴谋推翻三大政策，暗杀了廖仲恺。但是，反动派的暴行并没有吓倒何香凝。她把悲痛化为力量。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二十多年中，她始终继承孙中山和廖仲恺的遗志，为坚持反帝，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在谈到这些革命的往事时，她说："我所以拥护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是因为我认识到：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忠实朋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人民群众都拥护它；工人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只有发动并依靠他们进行斗争，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她又说："我们中国过去受帝国主义压迫，今天自由了，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些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该同情和支持他们。"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何香凝老人的儿子廖承志和女儿廖梦醒也到客厅里来了。他们亲切地同我们打招呼；廖梦醒还挨在老人身边有时插上几句话。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的鲜血洒遍了全中国。何香凝多方营救被捕者，并且毅然脱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先到东南亚，后赴法国。廖承志和廖梦醒也在这时分别到了德国和法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何香凝遄返祖国，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廖承志和廖梦醒也在这前后不久回国。后来，廖承志两次被蒋介石逮捕，廖梦醒的丈夫、共产党员李少石惨遭杀害。但是这些都丝毫动摇不了何香凝母子的革命意志。1949年春，何香凝由香港来到北京。她和承志、梦醒母子三人，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们都把这传为美谈。现在，何香凝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还是全国妇联和美术家协会、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廖承志是中共中央委员，廖梦醒则在全国妇联担任着领导职务。

全国解放以来，何香凝老人以耄耋高龄，参加国家的领导工作。她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她当过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她对华侨事务十分关心。海外华侨只要来见她，即使卧病在床，也要亲

自接见，向他们介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平时，她对国内国际形势非常关心。我们访问她的时候，她正在日夜关注着加勒比海地区的局势。她对孙儿、孙女们很慈祥，要求很严格，常常讲过去的革命斗争，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且要求他们在学校里努力学习，重视劳动和节俭。老人有七个孙儿孙女，我们这天只见到了六位，还见到了廖梦醒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告诉我们：老人今天是四代在一起，只缺在东北上大学的孙儿廖恺孙。

在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何香凝老人以极其愉快的心情激动地说："今天，我们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站立起来，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不只已经实现，而且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孙先生和廖仲恺要是死而有知，也一定会同样感到高兴的。"这时，阳光透过窗帘，温暖地洒在每张幸福的脸上，挂在客厅里的孙中山和廖仲恺的遗像，也仿佛漾起了笑容。

（一九六三年第一期）

宋庆龄——中国杰出的妇女

爱泼斯坦

宋庆龄是本世纪以来世界上最杰出的妇女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年以来，她一直是国家领导人。在这以前，为求得中国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她从事过长期、积极的斗争。

宋庆龄出生于上海，十四、五岁起便在美国上学。推翻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爆发时，她正在美国一所女子大学读书。宋庆龄放眼于世界各国的精神文明，但她当时所写的文章表明，她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一心想把在海外学到的东西为祖国服务。

从少女时代起，孙中山便是她政治上的典范。孙中山是她父母的朋友。他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数十年，英勇奋斗，几经艰险，是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不久，革命的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篡夺了。宋庆龄决定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时，孙中山正亡命于东京。一九一五年她同孙中山结婚，成了孙中山亲密的战友。她作出这一决定时遭到家庭的反对，受到顽固的宗教人士和政敌的毁谤。

在其后的十年中，她常在孙中山左右，担负孙中山同国内外大量的机密书信来往的工作，在日本、上海、广州等地过着繁

重、紧张、危险的生活。他们在日本根据争取各被压迫人民的自由，并为此而终生奋斗的精神，同印度、朝鲜争取民族独立的志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孙中山几经失败后，一九二四年终于在广州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一个政治的和军事的基础。这一基础的核心除孙中山的国民党外，还包括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它不仅以中国自己的革命斗争及其失败的教训，而且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作为借鉴，来开辟新的前进道路。这一基础是在列宁对当代世界作了如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例如中国）的统治和掠夺是同先进工业国家的垄断资本在本国内对工人进行剥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各国的民族和社会革命也是互相联系的。孙中山，特别是在他的晚年，认识到了这一真理，并以此为指南来领导革命。在他亲近的战友中，献身于这一真理的无过于宋庆龄的了。

孙中山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北上寻求团结，但不幸于一九二五年因癌症病逝于北京。宋庆龄向全世界介绍了孙中山致同胞的遗嘱。不久，她亲自谴责了抛弃孙中山的原则的国民党右派。回广州后，为了打败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军阀、争取民族平等和社会进步，她积极投身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

当时著名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描写宋庆龄说："她温文尔雅，但性格坚强。……她对孙中山规定的革命忠诚不移，坚守孙中山关于联共、组织工农的遗愿……。她深深了解各种社会磨擦，尽量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因素团结在一起。由于她品格上的魅力，她甚至于从对手那里争得了协助，推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而为革命军北伐赢得了喘息的时机。"

一九二七年，工人起义把上海从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北伐军打开了道路，北伐看来势将告成。正当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对共产党人、工会工作者、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开始了法西斯大屠

杀。在武汉的国民党政客和军官不久也效法蒋介石大肆进行屠杀。他们杀害了无数农会会员。这些农会都是为反对地主压迫和支援革命军北伐而建立起来的。

斯特朗当时报道说："宋庆龄不愿让他们利用孙中山的名字来掩盖这一叛变……为了共产党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今天应该说为了整个中国的前途），她同自己的党断绝了关系。"

在南昌的革命军拒绝追随叛变，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这部分起义部队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后，发展成为后来的红军和解放军。由于前述原因，当起义军宣布成立行使革命政权的委员会时，宋庆龄的名字也在其中，也就不足令人奇怪了。

随后便是十年内战（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十年内战的头两年，宋庆龄在苏联和法国。在这一时期中，她是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反帝同盟中的一位著名人物。后来她回到上海。蒋介石政权企图用承认她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席位这种施加小恩小惠的办法使她默不作声。但是，宋庆龄严厉指责蒋介石对内用兵，相形之下对日本的侵略（以一九三一年九月强占中国东北诸省开始）却不抵抗的荒谬言行。

一九三二年，宋庆龄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装备上远远超过自己的日军，对其伤员进行了救护。此后，她致力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极力反对国民党迫害人民，公开援助政治犯，即使在自己亲密的同事遭到暗杀、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她不仅反对国内的法西斯迫害，同时也反对国际上的法西斯迫害。她谴责希特勒迫害德国进步分子和犹太人。她在上海举行的半公开的国际反战大会上发表讲话，谴责日益增长的侵略威胁。她歌颂西班牙共和。对北京等城市不顾迫害、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学生给以鼓励。国民党以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罪名传讯和监禁爱国救亡运动的七位领导人

时，她在法庭上大义凛然，目光逼视法官，并亲自到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一九三六年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后，蒋介石在西安被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扣留。宋庆龄是争取释放蒋介石的人之一，条件是蒋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蒋介石的诺言并不是可靠的，但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压力下，他也无法完全抛弃自己的诺言。

于是，十年内战结束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攻打北京附近的卢沟桥，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在八年（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的抗日战争中，宋庆龄致力于两项工作，即维护和加强民族统一战线和平等地对待各个抗日力量。她先在香港，后在重庆，发起和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吸收了中外人士参加，动员国际舆论和争取国际援助。她把在爱国、民主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国共合作，视为孙中山信仰的复兴，她欢呼国共合作的初步成就；但当蒋介石政权企图破坏这一合作时，她便敲起了警钟。保卫中国同盟从世界各地募集了医药和其他物资，并将其大部送往被国民党包围、封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支援反侵略的战士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美国政府大力支持下，再一次发动了内战。今天，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当时支持蒋介石是错误的。当时宋庆龄仍在上海从事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但将其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在工人阶级人数集中的上海搞救济工作，其中包括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并建立了第一所儿童剧院。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中国福利基金会也是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有着解放区的那种精神，它树立了一个同国民党贪污腐化的“救济”工作截然不同的榜样。它的工作人员以及它所服务的年轻人都盼望行将来临的解放，并为此而作了准备，他们为一九四九年接管上海出了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

主席、国家副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在国家最高机关工作。她多次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出访，她继续在国内外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在这一时期中，她的著作比以往多得多，充满了建设新中国的喜悦之情。她继续在中国福利会（其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中国福利会继承了保卫中国同盟的传统，在其出版的月刊《中国建设》上向全世界的朋友介绍中国人民在做什么和在想什么。《中国建设》用七种语文向全世界发行，宋庆龄经常为它撰稿。

总而言之，宋庆龄一贯赞成和坚持在前进道路上团结最广泛的人民和各种力量。她从不要求每一个人在一切问题上看法一律，步调快慢一样。但她却不能容忍那种倒拨时钟、损公利己的人。她在国内外有无数朋友，有广泛、持久的友好联系。同她一道工作过的人都了解她的民主、谦逊的精神。她身上没有丝毫“官架子”，她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是在工作繁忙、健康欠佳时，收到来信也是当天或隔天立刻回信。

宋庆龄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从少女时代起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爱国、公正、目光远大、原则性强、尔雅自然、幽默和待人热情的本色。

（载一九八一年第三期。本文作者曾参加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他在中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现任《中国建设》主编）

蔡畅——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

李定国

中国妇女界有位杰出的人物，在近四分之三的世纪里，忠心耿耿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尤其是为妇女的解放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她就是蔡畅同志，今年已是八十二高龄了。多少年来，中国人民都亲切地称呼她"蔡大姐"。

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四日，蔡畅出生于湖南湘乡永丰镇。她的母亲葛健豪自幼读过书，年轻时就要求进步，是一个敢于向封建势力挑战的女性。蔡畅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二姐不幸早亡；二哥蔡林蒸(麓仙)是共产党员，一九二六年于省港大罢工中牺牲；三哥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一九三一年冬初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蔡畅从小就受母亲和哥哥的进步影响。一九一三年夏，当她的父亲失业后，为生计所迫，要把她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时，在母亲和三哥的支持下，蔡畅跳出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火坑，跟着母亲、大姐一起跑到长沙求学。

当时长沙办有一所周南女校。蔡畅在该校初级班体操音乐专科学习，毕业后留校执教。她用微薄的月薪弥补家用，支持三哥和森的学习和革命活动，有时到了无以为炊的地步。在这期间，她

激情满怀地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签订卖国条约的抗日爱国运动，积极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走上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十月，在五四运动推动下和毛泽东，蔡和森倡导留法勤工俭学的影响下，蔡畅与另一位女革命家向警予一起，在周南女校发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团结了一批女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妇女界起了先导作用。她与向警予都被誉为“女中豪杰”。这年十二月，她同母亲、三哥、向警予等三十多人（其中女子六人）由上海搭乘法国邮轮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后来，向警予和蔡和森在法国结成革命伴侣。

在法国，蔡畅一面做工，一面学习法文，攻读马克思主义等进步书报；逐步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这期间，她参加了蔡和森、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反抗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勾结当时法国政府歧视与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二年春，她在里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于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党员。一九二三年，她和李富春结婚。一九二四年，当法国政府驱逐一批勤工俭学学生出境时，党组织派蔡畅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后，她立即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东，是北伐战争前期的革命中心。蔡畅在中共两广区委任妇委副书记，并在何香凝为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任干事兼妇女运动讲习所主任。她联合国民党左派，从各方面开展妇女工作，使各界妇女觉悟不断提高，热烈拥护我党主张，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蔡畅也于此时离开广东，先后在南昌、武汉分别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等职务。一九二七年四月，她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蔡畅仍然沉着地在武汉坚持地下工作。同年冬，蔡畅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在总工会女工部和中央妇委工作，并领导过沪西纱厂和闸北丝厂女工的罢工斗争。一九二八年六月，她作为江西省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以后又在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和中共江苏省委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她进入中央苏区，先后在中央和省级机关，担任过政治、组织、监察、妇女等工作，为支援红军，巩固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工农红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参加长征的队伍中，女同志只有几十位，蔡畅便是其中之一。她同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爬雪山、过草地，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胜利地到达陕北。

在陕北，蔡畅经常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建设基层政权。后来在延安，负责中央局的妇女工作，继又担任中央妇委书记等职务。一九四五年四月，她出席了党的“七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畅离开延安到哈尔滨，在东北局从事妇女工作，并着手筹备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一九四七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一九四八年，在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她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女工部长。这一年，她还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了第二届国际妇女代表大会。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三月，蔡畅随党中央进入北平。不久，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蔡畅当选为主席。九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蔡大姐更是一直在为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维护妇女儿童的切身利益而奔波忙碌。她多次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出国访问或出席一些国际会议，在国际交往中为新中国妇女争得了荣誉。三十多年来，她历任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代表、常委及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九七八年，在第四次全国妇代会上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总之，蔡大姐从一九一九年投身革命开始，就认定了自己所选择的正确方向。她经历过无数重大的革命斗争，在艰苦的环境中，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从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她热爱党，热爱党的事业，特别致力于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事业，坚持妇女运动的正确方向。

无论在艰苦的岁月或是胜利的年代，蔡大姐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党外人士，爱护广大妇女干部，时刻关心人民利益和妇女群众的疾苦。特别是建国以后，蔡大姐虽然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她经常教育晚辈，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早在几年前，她就把她和李富春同志的全部积蓄作为党费交给党，支援国家建设。

目前，蔡大姐虽然年老体弱，难以坚持工作，但她一如既往，时刻关注着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伟大事业。在一九八〇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她响应党和国家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决定，辞去了副委员长的职务。当她看到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实践经验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蓬勃发展，她由衷地感到喜悦，表现出一位革命老人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

次全体会议给蔡畅同志的致敬信，表达了全党同志对蔡大姐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一九八二年第十期）

刘伯承——身经百战的元帅

陈斐琴

身经百战的元帅，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承同志，从士兵到元帅，从十九岁到现在九十高龄，经历了漫长的七十一年军事生涯，从未脱下过戎装。

刘伯承同志一八九二年出生在四川省开县赵家场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十九岁时，他参加万县革命学生军，投身于辛亥革命。接着，他参加了讨伐北洋军阀袁世凯之役，以及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是一位英勇善战的爱国军人，曾被誉为川中名将。

一九二六年，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冬，在党的领导下，他和杨闇公、朱德、吴玉章等著名共产党人一道发动四川省泸州、顺庆（南充）起义，策应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他为暂编十五军军长。当三面环江的泸州城已被敌人包围的时候，他英勇地带着总指挥部人员乘隙进入该城指挥作战，至今留下了"一代名将战孤城"的佳话。一九二七年五月，泸州、顺庆起义失败后，他穿越虎狼挡道的川陕山区，绕道西安辗转到达武汉找党中央，随即又参与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参谋团参谋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反"围剿"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迭挫强敌，战功卓著，

并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同该师的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一道，率部转战华北敌后，发展人民游击战争，是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他和邓小平同志一道，正确执行党中央的军事部署。在一九四七年夏，率领十万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构成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光辉篇章。他在一系列重要战役中，特别是在上党、平汉、淮海、渡江战役中，在进军解放西南战役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遍体弹痕余只眼"，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元帅。

从三十年代初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红军大学校长起，到解放后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止，他长期主持军事院校工作，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桃李满天下。建国以后，更为培养我军的高级指挥干部付出了辛勤劳动，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直到双目失明。他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在戎马倥偬中，他"孤灯耿霜夕，穷山著兵书"，写出了大量的军事著作，翻译和校订了大量的外国军事著作和军事译文。他博览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持恒地总结革命战争经验，而约之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不愧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

刘伯承同志是一位品德极为高尚的革命军人。他的高尚品德，表现在他富有坚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就以抗日战争而论，八年中他呕心沥血，用尽才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残酷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他所面对的，在军事上，是日本侵略军集中了"九·一八"以来最残暴最毒辣的铁壁合围、抉剔扫荡、梳篦战术、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三网政策（特务网、碉堡网、交通网）等等战术；在政治上文化上，是日本侵略者

亡我国灭我种的奴化征服；在经济上是全面掠夺我人力、物力、财力的强盗行为。刘伯承同志本人，在一九四二年夏季空前严酷的反“扫荡”中，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他自己也险遭以“刘伯承的头”为战斗目标的日寇挺身队的突击谋害。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八年抗战中，他一如既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陈毅元帅热情地赞颂他“守土古范韩”像宋代的爱国名将范仲淹、韩琦那样尽力保卫国土。

刘伯承同志的高尚品德，还表现在他始终站在人民方面，从不忘本，从不居功骄傲，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勤务员。当解放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即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候，报纸赞扬他的战功，根据地人民代表团前来慰问，给他献“常胜将军”的锦旗。他却说，九个月来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帮助下，这个地区已尽了应尽的责任。这是谁的功？是老百姓的功，我和其他的人都不敢掠人之美，贪天之功。我们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吃的是你们送来的，穿的是你们送来的，你们的文化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我们看到你们像看到家里人，像孩子看到妈妈。他始终以人民的儿子自居，人民的勤务员自居，胜而不骄。

刘伯承同志的高尚品德，更表现在他具有坚强的党性。他所鞠躬尽瘁为之奋斗的，是党的事业，是毕生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别无私人的贪图。他不遗余力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教诲每一个革命军人，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他常常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我从旧军人成为一个革命军人，完全是由于党的引导、党的培养的结果。他不愧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刘伯承同志因年高久病，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之际，以全会名义给刘伯承同志致敬信，表达全党同志对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

访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

尚志　格来

我国有许多少数民族著名人士，为祖国的团结统一、民族的繁荣富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不久前，我们访问了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人。

阿沛·阿旺晋美一九一一年出生在西藏一个贵族家庭。那时，西藏落后得没有什么正规学校，这位贵族少年上了几年私塾，十七、八岁时，从藏文大师喜饶嘉措学习过诗歌和文法。三十年代中期，他与贵族宇妥家的姑娘才旦卓嘎结了婚。阿沛·才旦卓嘎现在是全国妇联副主席。

在拉萨东部的工布江达县，阿沛家的庄园有土地一万克（亩），管家、佣人、农奴共约三千人。这位年轻的贵族为人热情、正派、诚恳、爽快，是一位比较开明的贵族。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的西藏高原上也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一九五〇年，中央人民政府通知西藏“噶厦”（地方政府），要他们派代表来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当时，西藏不少上层人士疑虑重重，举棋不定。阿沛则积极主张派人进行和谈。不久，西藏东部昌都地区的总管听信了一些反动分的子煽动，任期未满就辞职了。“噶伦”（噶厦的最高官

员）中，谁都害怕危险，不愿去昌都，“噶厦”就将阿沛升为“噶伦”之一，兼任昌都总管。

一九五〇年十月，昌都解放了。阿沛亲眼看到了纪律严明的人民解放军的好作风，加上先遣支队司令员王其梅同志对他耐心解释政策，使他深受教育，他写信给妻子要她带身边小孩来昌都，一起迎接西藏的解放。

一九五一年，西藏“噶厦”派出以阿沛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阿沛夫妇到达北京时，周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总理亲切地同他们谈话，解释党的民族政策，使他们不仅初步了解了祖国的整个形势，而且懂得了许多新道理，增强了为祖国和平统一作贡献的决心。

五月二十三日，阿沛等人在北京同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代表团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谈到这段历史，阿沛副委员长显得很激动，他说：

“协议签订后，‘噶厦’一些人声称，他们不同意协议内容，阿沛签字无效。我倒要为此说明几点：第一，我到昌都后，派人送信给‘噶厦’，催促他们派人同中央进行和谈。因我已在解放区，所以一再表示我不能做代表，请他们另派人。可他们回电坚持委派我做首席代表，怎么说我签的字无效呢？第二，协议签订后，达赖还给毛主席发过致敬电，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这说明他们当初也是承认了协议的。”

为了尽快贯彻协议，阿沛很快就返回拉萨。在路上，他经常对爱人才旦卓嘎谈起毛主席、周总理对他讲的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们共产党是为了帮助你们把帝国主义赶出西藏，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去当官，不是为了办坏事。如果有汉族干部欺负你们，你就来找我们两个人。”回到拉萨，他们就把在国外学习的孩子们叫了回来，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

习，表达了他们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信赖。

西藏和平解放后不久，阿沛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国家一级解放勋章，还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五九年，西藏一些上层反动分子悍然发动了一场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他们对阿沛·阿旺晋美软硬兼施，又是拉拢、利诱，又是威胁、恫吓，扬言要把他置于死地。在这紧急关头，阿沛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他大义凛然，英勇不屈，表现了以祖国、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铮铮铁骨。他和党亲密无间，与中共西藏工委密切合作，团结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同这一小撮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维护祖国团结统一的西藏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

每当与人谈到这件事，阿沛总是意味深长地说："自古以来藏汉人民就有着传统的团结和友谊。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事迹一直受到后人的钦佩。特别是七百多年前的元朝时代，西藏就正式纳入了祖国的版图，藏汉人民成了一个大家庭的亲密兄弟。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所以西藏人民坚决站在解放军一边，很快平息了叛乱。"

平叛后，阿沛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民主改革的方针。他虽然出身贵族，但觉得民主改革是西藏走向繁荣、进步的正确的道路。他带头为民主改革贡献力量，在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和人民的心目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他们说：阿沛不会做对不起西藏人民的事情，他从来不说假话，而且说到做到。平叛后，阿沛担任了政协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等职务。一九六五年起，他一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

阿沛非常关心西藏的建设事业。一九七九年八月，西藏自治

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和自治区的同志都希望他去拉萨参加大会。这时已六十八岁的阿沛，眼睛刚动过手术，正在北戴河休养，一听到这个消息，便马上返京，踏上了去拉萨的路途。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后，他深入一些地方作了几十天的调查研究，觉得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西藏有些事情做得不符合三中全会的要求。他回到北京后，便向中央写了报告。

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刚成立，胡耀邦、万里同志便亲自去西藏实地解决问题，并约请阿沛同行。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提出要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的奋斗目标，还提出了为实现这个总目标应做好的六件大事。阿沛见中央采取这样果断的行动，感到非常激动。他听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对汉族干部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很严格的要求，深感西藏工作搞得不好，藏族干部也应有自我批评，便在随后召开的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也对藏族干部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加强团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前进。许多干部反映，阿沛副委员长总是团结的模范。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胡耀邦、万里同志返京后，阿沛又留在西藏几个月，做了大量工作。他不顾高龄，冒着恶劣的气候，奔波在西藏高原上，几十天跑了八、九个县，深入农牧民的家庭问寒问暖，鼓励大家为建设新西藏而奋斗。许多农牧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一九八一年，阿沛又担任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这一年，他到西藏时，由于年龄大，工作劳累，在那里病倒了，只得返京治疗。每谈起此事，他周围的同志都感慨地说："他人老了，但为祖国、为民族的心还不老。"阿沛对我们说："党的十大，为全国各族人民描绘了十分动人的建设蓝图。西藏和祖国其他省、区一样，正在迅速前进，这使我常想起现在仍在国外的

一些藏族同胞。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语，鸟宿归林，叶落归根，寄人篱下总不是滋味。我希望他们相信党的不计前嫌、爱国一家的政策，回转家园，与我们一起携手建设新西藏。”

（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教育工作六十年

陈　垣

目前，暑假即将来临，我们高等师范学校将为国家输送出成千上万的教师；同时，又将有更多的青年考入高等师范学校来。在这送旧迎新的时候，不仅使我看到了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使我想起教师在过去的种种遭遇。

教育工作在我国受到重视和尊敬只是解放以后的事。在旧社会，教师是被人看不起的。那时，教师没有政治自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生活保障，精神上经常受到威胁和迫害。我看到过不少教师，仅仅是为了爱国、为了民主和自由，就无辜受害；也看到过不少教师为饥寒所迫，走投无路。我们学校史学系曾有一位教师，是我的好朋友，因为上课时讲了些爱国的道理，就横遭逮捕，虽经我们营救出来，终究被迫离开了学校。我的一个学业很好的学生，毕业后在中学教书，一月工资不够维持半月的生活，只得在几个学校兼课，终日疲于奔命，后因贫病交加，饮恨而死。那时，对教师的欠薪是家常便饭，有时竟拖欠至一年以上。每到寒暑假，教师就担心能否接到下学期的聘书。到解放前几年，物价一日数涨，上午领到工资，下午就贬值，很多教师只得兼做小生意，来增加一些收入。

过去，很多教师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们想把学生教育成材，希望学生对国家做出一点贡献。但在那时这种理想是难以

实现的，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大多数又不得不重复着和自己相同的命运。

解放后，教师和全国人民一道，结束了过去的悲惨生活，他们受到党和政府的无比关怀和尊重，他们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他们再没有失业的威胁，也不必担心全家的生活。除按时领工资外，生病有公费医疗，儿女多的有“多子女补助费”，子女上学有教育费用补贴等等。

教师们解除了经济顾虑，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专长，并在团结互助的精神下，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我有时面对着目前教育界欣欣向荣的景象，想起过去，实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第一次教书在六十年前，那时还不满十九岁，开始时教蒙馆，后来教小学、中学，以至大学，在北京各大学任教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可以说是饱经沧桑。教学上我很难找到人共同切磋；科学研究不被重视，甚至研究论文都无处发表；生活上也是“提襟见肘”，我曾因为女孩生病没有钱住医院，无可奈何把《明实录》卖掉，后来又曾卖出《大藏经》、《道藏》等大部头的书籍。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大藏经》，有一部就是我在北大教书时卖给他们的。

我在教师岗位所以能坚持下来，一方面固然由于自己不愿在反动政界工作，一方面也是由于教育工作给了我无穷乐趣。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永远和青年在一起，教师教育着青年，同时，青年也给教师以影响。青年人富于理想、活泼热情、朝气蓬勃，对新事物有敏感，遇到问题，总要追根究底，我常常是从同学提出的问题里得到启发。当我在讲台上看到同学们凝神倾听我讲授的时候，我就感到了强烈的责任感。当我在夜深灯下批改作业，在其中看到同学一天天进步的时候，我就感到无比的喜悦和安慰。自己的年龄虽然与日俱增，但青年们却时刻激发着我不

断向前，奋发蹈厉，不知老之将至。几十年来，在我身边成长了无数青年，今天，他们有的刚刚做教师，有的已担负着领导工作，有的在科学研究上有了很大的成就，有的则已是“桃李满天下”的老教授。

我在过去几十年里，看到当政者都极端腐败，所以我一直不问政治。解放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彻底改变了旧中国腐败落后的面貌。追忆往昔，更觉今天的幸福。我对共产党，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不了解到钦佩、拥护和爱戴，我确信只有共产党才是为人类谋幸福的政党。因此，我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献身于这最伟大的革命事业。

在我入党要求获得批准后，学生们纷纷向我祝贺。我自己也感到极大的光荣。我深自庆幸在耄耋之年，能够赶上如此伟大的时代。我愿在这“百年树人”的教育工作岗位上，为党的事业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一九五九年第十五期，作者原为北师大校长）

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

魏璐诗

根据一九五三年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台湾省未统计在内）。在这之前，人们总认为，我国人口在四亿至五亿之间。因此，六亿这个数字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的。

在旧中国，进行人口普查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人民不会予以合作，因为不但儿子将被拉去当壮丁，而且更将巧立名目，横征暴敛。

毛主席在划时代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这以后的几年间，中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伤，社会秩序日趋安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口增加，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有一位经历了中国三个朝代的经济学家，研究了新的情况，认为需要对这过于庞大的人口采取对策。他就是马寅初教授，今天已经九十八岁了，当时是七十多岁。他生于清朝的一八八二年。他见过一九一一年成立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丝毫没有减轻中国人民的苦难。抗战时期他看到蒋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压迫人民，出卖民族利益，和贪污腐化、巧取豪夺。他勇敢地向蒋介石进行公开的抨击，因此被投入监狱。马寅初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九四九年成立人民共和国，他欢欣鼓舞。他考虑着应当

做些什么。

马寅初教授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六年在美国求学。在旧社会，马寅初主要是从事教育工作，研究解决中国贫弱的办法。在新社会，他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又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常委。因而他能够有机会在他出生的浙江省作数次考察，所到之处几乎遍及全省。每到一地，他都能发现人数众多的儿童。在上海，那里儿童的人数更令他吃惊。中国有如此巨大的人口，政府如何能够积累足够的资金，把整个国家从落后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政府又怎样能够使这么众多的人吃饱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又把国家建设起来？马寅初感觉到这是出现在新中国面前的新矛盾。于是他就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种新的矛盾。

在一九五五年，他准备了一份报告，供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如何做到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使消费部分能有所减少，而积累部分却能有所增加？这个提案显然是合情合理的。马教授并没有立即把这个提案递交人大全体大会，而首先交付他本省出席人大的代表团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只有少数人同意他的观点并且支持他。相当多的人没有发表意见。不少人声嘶力竭地说他是一个马尔萨斯论者，尽管有些提法不尽一样。马寅初遭受了当头一棒。他怎么可能是一个马尔萨斯论者？马尔萨斯的理论是，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却是以算术级数增长。多余的人只能由战争、瘟疫等等来解决……马尔萨斯用他的理论来为英国政府对劳动人民所犯的罪行作辩护。马寅初在他的报告中，列举了新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各种好处，并且希望这些好处能好上加好。儿童死亡率有所降低，对疾病采取了预防措施，已经不再需要生育众多的孩子以“保晚年”等等。马寅初喜欢把他的文章叫做《新人口论》。考虑的是如何改变全国人民的生活。但是马寅初是一位明智的，有忍耐心的中国公民，他悄悄地把他的

报告收了起来。两年以后，也就是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他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提到，作各种计划必须从六亿人口这个事实出发。于是，马教授才又把他的报告递交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今天看来，报告提到的十个方面是有充分根据的，有远见的，并且把各个问题都讲得很清楚。报告列举了粮食生产的数字，并且作出了恰当的统计和对比，特别是和苏联的比较。苏联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

马寅初教授曾经建议，在一九五八年或一九六三年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并逐年积累资料，以便确切了解人口增长的速度。因为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论者”，因此报告的第四点说明，马尔萨斯论是如何的恶毒，又是如何的错误。在第五点中，马寅初教授详细说明，他的出发点和马尔萨斯的出发点又多么地不同。他考虑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要让农民从物质的和文化的落后中解脱出来。他要让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而同时国家又可以积累建设所必需的资金。

他明确地提出对人口加以控制。把人口增长的数字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中。需要进行一次规模巨大的宣传，告诉人民，孩子多了是一种累赘，而不是幸福。国家要支出一万元去让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只有当科学和技术为广大阶层所接受，进步才有可能。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办法不是用堕胎的办法，而是用科学的节制生育的方法。第十点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建议，特别令人感动，因为他令人信服地说明，这是为了民族的健康，为了建立更好的保健设施，并且也是为了减轻国家为数不多的医生的负担……

是令人信服吗？今天看来，是的，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当时却被认为是“反动”的，于是马寅初遭到批判，他被迫辞去了北

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大字报和报章杂志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

二十二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人口已经从一九五三年的六亿增加了三亿七千五百万，达到九亿七千五百万（包括台湾省）。几乎每个人都提出这同一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没有听这位老人的话呢？他所说的是完全应当说的，是应当照着去做的！”而今天也确实在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运动，来宣传晚婚和节制生育。每一个单位都有负责这方面的部门。在城市，出生率已经有所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只要一个孩子。有的省市，独生子女可以领取补助。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五届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四川省（全国人口最多的省）和上海（全国最大的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如何降低的。并指出：“他们的经验应该在全国城乡推广。今年我们要力争使全国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今后要继续努力使它逐年下降，一九八五年要降到千分之五左右。”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庆祝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国庆节的二十六条口号中的第八条是：“大力开展计划生育运动，把人口增长率降低到百分之一以下！”

马老很幸运能够活着看到他的理论得到证实。他从没有向压力屈服，虽然他的一些朋友曾经劝过他放弃他那“有争论的”观点。一九七九年九月，当有人正式通知为他和他的《新人口论》平反，并任命他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时候，他感到很高兴。马老差二年就是百岁老人了。他活着见到真理取得了胜利。理论可以发表，各种想法可以交锋，以使得出正确的理论，没有个人恩怨,没可诋毁中伤。许多年以前,马寅初认为，虽然他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党员，但是他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中国有这样一些正直的爱国人士，他们敢于站出来，为人民的利益说话。当马寅

初受到批判时，有人责问他是“哪家的马”，他始终坚持是“马克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

今天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他的批判完全是教条主义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口论自始至终贯穿着真正的辩证法。在一九五七年已经有人感到，六亿人口带来了不少困难，现在人口已经超过了九亿七千五百万，所以困难就更大了。但是，勇敢、聪明、充满热情的中国人民，像解决别的问题一样，将很好地解决这个庞大人口带来的各种问题。“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只要领导有方，他们是乐于担当任何艰难任务的。人口控制是一个辩证的问题——人口少一些就可以改善更多人的生活。中国目前的情况说明，这个辩证法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他们终于行动起来，有效地实行人口控制。从六亿到九亿七千五百万，这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作者系本刊德文版专家）

我所认识的马海德

路易·艾黎

我第一次同马海德大夫见面时大约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时，他的名字叫乔治·哈特姆。我们是在上海史沫特莱家里见面的。他当时的情景至今我记忆犹新。他是一个壮实、机灵、乐呵呵的美国小伙子，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发生兴趣。后来，他参加了德国进步人士海因茨·西晋——中国名字叫“西帕”——在上海领导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抗日战争时期，海因茨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山东，在沂蒙山被敌人杀害。

马海德到上海时，我正在上海公共租界从事工厂劳保稽查工作。电镀克罗米是对受剥削的工人为害很大的一个行业。我急于想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以便对此有一深刻的认识。于是我请马海德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调查。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起，马海德作了广泛的研究。研究的情况后来由中华医学会予以发表。马海德对电镀克罗米的问题提出了大量的改进意见，同时他对上海这一工业城市的劳动状况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从而给他不久前所获得的政治概念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初红军需要医生时，他也就能毫不犹豫地马上说：“我去！”当时，宋庆龄女士便向上海的中共党人推荐他去。

他独自从上海乘火车前往西安，在西安按事先的约定等候了二十天，但一直没有接上关系，因而不得不再返回上海。后来，他又

离开上海到西安，遇见了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经红军驻西安的主要联络员刘鼎的安排，他们一起离开西安，安全到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当斯诺又回到保安同红军领导人交谈，为他的《西行漫记》进一步搜集素材时，马海德便随同聂荣臻将军率领的部队前往甘肃协助尚在长征途中的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安全到达陕北。朱德、贺龙、任弼时、徐向前和萧克等都是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杰出战士。当时马海德还不懂中国话，工作时需要翻译帮忙。他不习惯吃配给战士的粗粮。会师后的一天，四方面军的廖承志请他饱餐了一顿。吃的不过是廖承志在村子里弄来的一条野狗，用地道的广东烹饪方法做的一顿狗肉宴而已。

部队到了延安后，马海德一直在军委卫生部当顾问，还担任过中央外事组、新华社等部门的顾问。三十年代末，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到延安时，马海德已经能讲流利的中国话了，并且有了很好的办事经验，因此对白求恩帮助很大。其后，他又协助来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疗队进行工作。一九三九年我因开办工业生产合作社而到延安时，我应邀住在他的窑洞里。我发现他已完全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工作十分愉快。一九四〇年三月，他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周苏菲结了婚。从此，苏菲便成了他的同志和帮手。她现在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现在，儿女都已成家立业，都有了第三代。

谈到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马海德的身世。乔治·哈特姆，一九一〇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一个炼钢工人的家庭，祖籍是黎巴嫩人。乔治在孩提时代就受到一位医生的激发。这位医生在一次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传播期间，不但到他家里防治疾病，有时还给他家里捎来急需的食物。乔治立志长大也要当医生。随着家庭状况的好转，乔治上了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后来到瑞士和贝鲁特深造。二十三岁毕业后，果然当了医生。他在贝

鲁特时听说中国需要医生，并且他想从事热带病的研究，于是动身来到上海。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随解放军进入北京这一段战斗的岁月中，马海德的事迹多得说不完。他给许多人治过病，挽救过不少人的生命，仅仅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他诊治伤病就达四万多次。人们赞美他一心扑在中国解放事业上的精神。一九五〇年我同他在北京重逢。他一直是我的好顾问和真正的朋友。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一直担任中央卫生部顾问，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五十年代，他主要在中国边疆地区从事消灭性病的工作。五十年代末，这一工作完成后，他又投身到控制麻风病的工作中去了。中国麻风病患者约有二十万人，主要分布在沿海某些省分。这种病仍亟需防治。一九六六年，他正忙于解决消灭中国麻风病的问题。但多年的动乱使他不得不停止这项工作。现在他又重新来做这项工作了。如果现在采取正确的步骤，对于在本世纪末解决这个问题，他抱有信心。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对中国人民来说将是又一巨大的胜利。

一九七一年马海德带领一个中国医护小组到瑞士给他弥留不起的老朋友斯诺治病。七十年代中期，马海德疾病缠身，连续做了三次手术，而且其中两次是大手术。一九七八年三月底出院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和苏菲一起去美探亲，以促进中美人民的友好关系。

近几年来，马海德除了从事医务工作外，还费了很多心思，作了很大的努力，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对一些来访的有识之士做细致的解释工作，说明中国对世界所具有的影响。

当今的美国人之中没有一个像马海德那样全面通晓今日中国的情况。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时期，他作为一个参加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参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在革命的道路上一直

保持着信心。通过长期的斗争，马海德已经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他又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的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是他所有的朋友，特别是美国人，应引以为荣的。随着时光不断向前，作为当今促进中美相互了解事业的杰出人物，他的形象将会变得越来越高大。

马老——人们这样亲昵地称呼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远远没有做完。

不久前，在马海德七十寿辰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在北京为马海德大夫及其一家举行了宴会。在宴会上，他宣读了叶剑英委员长的贺信，还宣读了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副委员长的贺信。宋庆龄副委员长也表达了她的最好的祝愿。

在他七十寿辰时，我为他写了几行诗：

他参加了战士的行列，
现在仍是进军中的战士。
他是这样的人，
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就全力以赴；
他是这样的人，
相信中国革命和它带给人类的希望。
……

（一九八〇年第十二期）

来华五十年的回顾

魏璐诗

五十年前我离开故乡维也纳，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来到中国上海，打算作六个月的学习考察，并准备为维也纳的几家报纸写稿，报道我的旅行见闻。中国，这个地处远东的国家，我很早就爱上了它——通过在展览会上看到的它的艺术，通过古斯塔夫·马勒根据汉斯·贝特格意译的中国唐诗谱写的《大地之歌》。

在当时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我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肆意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腐败，以及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新西兰的路易·艾黎领我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工厂。我看到，那些破烂不堪的小工厂里根本没有任何劳动保护，这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我感到这个社会必须加以推翻。使我感到幸运的是，在上海我结识了许多中外进步人士，如宋庆龄，鲁迅，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通过与他们的交往，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他们还给我指明了方向——进步与革命的方向。

一九三五年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这以后的中国现代历史我都亲自经历过。这种“历史学习”对我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因为在中国理论与实践是相结合的。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到了中国的大后方四川省，先在成都工作了六年，后来又在重庆生活了两年。我曾在

华西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等单位进行教学和工作。我在四川生活的八年，中国正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斗争。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前赴后继的动人事迹使我深为感动。但是国民党政府对抗战采取消极态度，同时却大肆反共反人民，残酷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当时大批学生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流亡到四川，因而成都各大学的学生人数激增，学生中的救亡活动甚为活跃，纷纷成立战时服务队。我担任了一个由几所大学的学生组成的战时服务队的“顾问”。在这个时期，每个善良的、愿意革命的人都可以为抗日战争、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我决定留在中国，并于一九三九年取得了中国国籍。那时我们经常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及时告诉中国朋友，我们还办了一份英文刊物《成都新闻》，此外我还协助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创办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做些工作……四川本来是个很闭塞的地方，可是我在那里通过与人民的接触，通过一些抗日活动和工作却大大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一九四六年我到了美国，并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代表团到联合国来抗议美国干涉台湾，我一有时间就到安理会去旁听。这时我感到，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我要求回到中国，亲眼看看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中国人民一起共享胜利的欢乐，并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投进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九五一年底我来到北京，受到政府和人民的亲切关怀，并在新闻出版部门工作，一九六四年以来一直在《人民画报》社工作，为向国外介绍新中国，为促进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尽了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力量。一九五五年我重新加入中国籍，正式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员。这些年来，我每年都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去旅行，亲眼看到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新精神面

貌，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取得的新成就。

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我还为我们自己的刊物《人民画报》，为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日报》，以及香港和国外的一些刊物撰写文章。我觉得我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这使我联想到西方。在那里，老年人往往是多余的，老年人对自己也感到厌倦。在中国则不然。这里老年人受到尊敬，他们可以满意和安静的心境来欢度晚年，继续规划自己的工作，用不着为明天的生活而担忧。一个人在晚年还能继续为社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这是一种极大幸福。在我来说主要就是传授外语知识。尤其是我的母语德语，以及我称之为“后天母语”的英语。此外，我还打算写些东西，因为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而今天的青年人对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则一无所知，因此我有义务把当时的情况告诉青年人，使他们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五十年前我原只打算在中国作短期学习考察，结果在这里长期扎下根来了，并感到自己也是属于中国的，感到对中国的命运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在许多同志和朋友的帮助下，很久以来我就建立了这个深挚的感情：“中国就是我的家！”

（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横川次郎

王　德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是国际主义战士横川次郎同志的八十三岁寿辰。从三十年代中期至今，他在中国已经度过了近半个世纪。

横川同志生于一九〇一年，一九二五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早在高等学校读书时，他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后，在帝大学习期间和毕业后到宇都宫高等农林学校任教期间，他都继续钻研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做宣讲工作。为此，他被当局以“赤色教授”为由而开除公职。

一九二九年以后，他在东京靠写作和翻译外国书籍为生。他将曾任中国南京金陵大学教授的美国人罗森·巴克所著《中国的农业经济》一书译成日文并首次在日本出版，还翻译了德国共产党人维特·福格尔关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一些著作。横川同志说：“我对中国的某些认识，是从这时开始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横川同志离开笼罩白色恐怖的故土，来到中国的东北，进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任职，从事资料工作和农业调查工作。在此期间，他从一本在上海出版的美国人办的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西安事变真相的文章。文章给他的印象很深刻，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是死对头，但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竟会把蒋介石释放了，感到中国共产党真了不起，是

一个伟大的党！”

一九四二年，横川同志被日本宪兵队以“宣传共产主义，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入狱，先后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吉林等地关押近三年时间，直到日本战败前夕才被释放。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他决心留在中国。一九四六年，他在长春参加了“日本人民民主联盟”。当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春时，他和夫人辰子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撤退到了哈尔滨。此后，他被派到鹤岗煤矿，动员和组织日本矿工为支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多生产煤炭。一九四八年，他来到刚刚解放的沈阳，在东北统计局从事经济和资源的调查统计工作，为新东北的经济建设准备和提供必不可少的数据和资料。此后，他在北京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

一九五七年，横川同志从北京来到四川省成都市，在省农业厅做农业经济调查工作。同时，经常撰写文章，向国外介绍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变革。日本的一家出版社将他写的七篇论文结集出版，书名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问题的研究》。

一九六一年，他来到北京，进入当时的外文出版社，担任《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以及其他书刊的日文版的改稿专家。横川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二十多年，除了改稿外还热心帮助中国同事们提高翻译业务水平。

前几年，他在担任《人民画报》社编辑委员会委员期间，还经常对编辑部的工作提出很好的建议，遇有工作的错误和缺点，他的批评也是十分严厉而尖锐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把中国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他的建议和批评都是对中国热爱的表现。

近年来，横川同志由于年事已高而退居二线，但是他仍然十分关注《人民画报》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同时，他还热情地关注

着中国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并且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研究，把研究所得写成理论文章。

近半个世纪以来，横川同志长期生活在中国，同中国人民欢乐与共，休戚相关。他是中国人民的同志，是中国人民难得的诤友！他经常这样说："虽然中国共产党过去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它正在改正这些错误，不断地前进着。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的党。"

横川同志的夫人横川辰子，也是长期在外文图书出版社担任日文改稿专家，现已年逾七旬退居二线了。他们的两个孩子都是在中国出生的，而且在中国读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目前，长子横川健在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工作。次子横川伸在东京的一所大学讲授汉语。所以，横川同志一家两代人都是为中日友好，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王光英和光大实业公司

孙毅夫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香港，以及在日本和美国的一些报刊和电视节目中，传播着有关王光英和光大实业公司的新闻，有的甚至称他是“袭击香港的旋风”。

王光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光大实业公司的董事长。他现年六十五岁，头发已经花白，但身体健康，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

他，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他原是天津市的一位资本家；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中，入狱八年；出狱后担任过天津市的副市长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全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他又外出经商，一九八三年带了一些人到香港开办公司，与世界各地的一千三百多家金融及工商业企业建立了业务联系，做了一些大生意。正是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位新闻人物。

他说：“我所以要办公司，目的是为中国的四化服务，要在香港为国内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协助国内各地进行经济开发工作，同时也为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香港是一个做买卖的好地方。它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与东西方息息相通，能以最短的时间与各国联系，洞察世界经济动态，做生意的条件是其它地方难以比拟的。”

正是在这个地方，王光英与他的同事一起，紧张工作，大展

宏图。一年来，已为国内引进二十多项技术设备。如：为云南引进B20微型计算机的技术，为武汉、河南引进纺织后整理设备、食品机械和包装生产线，为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和大庆也分别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他们还为国内建设购置了急需的二手设备，从智利购入了一千五百辆载重汽车，从新加坡购入了具有八十年代水平的一百三十一台瑞士宽幅织机。

同时，光大实业公司还参与了国内的区域开发工作，如深圳南头开发、珠海北岭工业区开发等。

珠江磨刀门的开发，是我国一项规模最大的填海工程。它是光大实业公司与水电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和珠海市的合作项目。磨刀门是珠江的第二大出海口门，其泻洪、排沙量居珠江八大出海口门之首，河口不断淤塞，每逢汛期，多有洪水泛滥，淹没良田。为变害为利，现已开工的磨刀门工程，将疏通河道，建坝填海，造地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王光英满怀信心地说："在这片新造出的土地上，将种植甘蔗以及多种经济作物，养殖鱼虾贝类；兴建糖厂、酵母厂、造纸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厂。磨刀门一定会成为一个农业、工业、航运、旅游各业都兴旺发达的先进地区。"

光大实业公司勇于进取，现已有八个子公司。它还与日本熊谷组株式会社合作，成立了"光大熊谷开发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将在内地、香港、东南业承包大型项目，包括为地下铁路、海底隧道、水坝、电厂等工程提供建设资金和设备。它还和新加坡，美国的一些公司合作。光大实业公司已置身于世界大公司的行列。

（一九八四年第十二期）

在中国的大地上

——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古 进

北京，暮春的夜晚，多么静谧！为了庆贺爱泼斯坦七十寿辰和在华工作五十二个春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显得格外隆重、热烈。爱泼斯坦从洋溢情谊的会场回到西郊住处，独坐小客房，不禁思潮翻腾。

七十年前，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于华沙。他两岁时，随父母由欧洲辗转先后到达日本、中国，五岁到天津定居。在那里，爱泼斯坦度过了童年和学生时代。他牢牢记住父亲的教导："我们犹太人是受歧视的，我们不能再歧视任何人！"从小养成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美德。

十五岁时，他进入英国人在天津办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社。从校对，编排、采访到编辑，样样工作都干过。这为他终生从事新闻工作奠定了业务基础。一九三三年，他发表了关于《远东的战线》的书评以后，特地到北平西郊拜访了该书的作者、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有采访经验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从此，年长十岁的斯诺成了爱泼斯坦的良师益友。

一九三五年冬天，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斯诺和他都积极支持；后来，在斯诺家里，爱泼斯坦读了他的新著《红星照耀中国》的初稿，也看到他拍摄的和翻拍的许多照

片，了解到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爱泼斯坦还看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人从西安写给斯诺的信，了解到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实行兵谏（通称“西安事变”），迫使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实行抗日政策的真相和意义；斯诺还介绍爱泼斯坦阅读毛泽东、宋庆龄、鲁迅等著名人物的一些文章……

今夜，年届古稀的爱泼斯坦，习惯地又点燃了一支雪茄，坐在沙发上，继续沉思、遐想。往事如烟，纷繁复杂，却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正如他几个小时之前，在盛大的祝寿招待会上说的：“是中国人民哺育了我，教育了我，并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一九三七年夏天，北平城外，芦沟桥头，爆发了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京津沦陷了，爱泼斯坦的双亲，忍痛离开心爱的独子，远渡重洋，到美国躲避侵略者的统治。二十二岁的爱泼斯坦独自留在中国大地上，以美国合众社记者的身份投入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洪流。有一天，斯诺以外国记者身份护送一位名叫“知凡”太太的中国中年妇女由北平西山疗养院来到天津，要求爱泼斯坦接手继续掩护这位热爱祖国的太太和她的同伴从天津坐船南下离开敌占区。他同船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山东。很多年以后，爱泼斯坦才知道，这位中年妇女竟是赫赫有名的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同志。

爱泼斯坦从沉思中抬头看了一眼那窗前摆着的精致花篮。这是今天晚上在祝寿招待会上，身为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赠送给他的礼物；邓颖超同志还即席发表讲话，回顾了彼此的交往。听到邓大姐（中国人民，从国家主席到普通市民都这样尊称她）这亲切的讲话，他自然回想起那遥远的往事。

在幽静的小客房里，他斜靠在沙发上，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国内外闻名的另一位杰出的中国妇女——宋庆龄。新中国成立以来，她一直是国家领导人之一；在这以前，为求得中国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她从事过长期的斗争。爱泼斯坦永远难忘他第一次看见

宋庆龄的情景：

一九三八年，他在华东古运河畔、台儿庄战场上采访了中国军队总指挥李宗仁将军之后，随着战局的转变来到了华南重镇广州。白天，敌机开始狂轰滥炸；入夜，无数的人们高擎火把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正在街头采访的爱泼斯坦惊奇地发现，在这抗战洪流的前头，火光映照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不禁肃然起敬。

当时，宋庆龄从香港来到广州筹建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爱泼斯坦应邀参加了分会的工作。广州沦陷后，他转移到香港，在宋庆龄直接领导的同盟总部工作，负责编发英文的《新闻通讯》。一九四一年冬天，香港沦陷后，逃出集中营，偷渡到中国大陆。后来转移到重庆，继续在宋庆龄领导的同盟总部义务工作。

一九四五年，为了让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抗战的实情，为了架设中国人民友好的桥梁，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告别了宋庆龄等众多的中国朋友，前往美国从事新闻报刊工作。在那里，他俩积极参加了美国进步人士的活动，新中国诞生的当天，他在纽约街头兴奋地高唱他三十年代在天津街头第一次听到的“义勇军进行曲”，并且教美国朋友们学唱这支已是新中国的国歌。

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个春天，应宋庆龄的邀请，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一起，从美国辗转回到中国，参加筹办她领导的《中国建设》杂志。一九五七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他加入了中国籍。三十多年来，为了办好这个刊物，为了搞好对外宣传工作，爱泼斯坦夫妇贡献了全部精力和心血。一九八一年，宋庆龄不幸与世长辞。他到处搜集她的资料，现已着手写作，并准备在明年年底写好宋庆龄的传记。

在半个世纪，记者生涯中，他最难忘却的是：一九四四第夏

天，他参加中外记者团的延安之行，在黄土高原上凉爽的窑洞里分别会见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以及许多久经沙场的将领的情景。在延安和晋西北，经过四个月的访问，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这使他至今还珍藏着当时的采访笔记本和毛泽东用毛笔签名赠送的石印肖像。

夜阑人静，孩子们早已进入梦乡。他轻步走进自己的卧室。记忆犹新，四十一年前，在战时的重庆，他与志同道合的埃尔西·邱茉莉结婚。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与邱茉莉同享欢乐、共患难。在十年浩劫中，夫妇两人都蒙受了极大冤屈，被隔离关押了将近五年。平反后，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集会上，周总理当众向他们赔礼道歉，并举杯勉励他："继续奋斗！"于是，他俩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对外宣传工作，不知老之已至。年近八旬的英籍老专家邱茉莉，去年九月因病不幸长辞人世。挥泪办完爱妻的丧事，第二天爱泼斯坦就乘车南下武汉参加已故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学术讨论会。

入睡前，他习惯地想了想明天的工作。几小时之前，在祝寿招待会上，他致答词时，激动地宣告："在我有生之年，我将比过去更加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第七期）

上海的人民游乐场

柯 灵

你可曾听说过，上海有一个最大的娱乐场所，叫做“上海人民游乐场”？没有，那么，“大世界”呢？

知道上海的人，大概很少不知道“大世界”的。第一次来到上海的人，观光“大世界”往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今天的“上海人民游乐场”，其实就是当年的“大世界”。但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要改名？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里说一说过去，恐怕是必要的。“大世界”包括一座四层楼的大厦和一个露天表演场，从开办到现在已经有整整四十年的历史。它的位置是在过去的法租界，紧靠着一个车水马龙的十字街口。在过去，这一带的“繁华”景色是以如下的成份构成的：大大小小的旅馆，名目繁多的妓院，各色的宵夜店、浴室、按摩院、乃至燕子窠——鸦片馆。它们正如众星拱月，把“大世界”围在中心。因此，“大世界”就成了娼妓、流氓和小偷出没的场所。

在“大世界”的十几个表演场里上演的，有京戏，有江南的一些主要剧种，还有北方曲艺、杂耍、歌舞等，应有尽有。可是，别看“大世界”的名气这么大，当时它的演员却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有些能耐的，总是千方百计往外跳；而一个有点名气的艺人，一落到“大世界”，就意味着潦倒穷途，以后可能落个

沿街卖唱的下场。在红氍毹上，他们含着一肚子酸辛，打情骂俏，强作欢颜；但开出幕来，他们首先要向看官们打招呼："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今天给诸位孝敬一段，好与不好，请诸位多多包涵，多多指教！"

现在，情形当然大不相同了。在人民游乐场里，不但看不到妓女和流氓，不但不必担心小偷扒手，就连各个表演场的演出，也真正作为高尚的艺术而和观众见面了。这里出现了全国知名的演员，有些曾被选拔出来，到苏联、波兰、朝鲜等国家去表演。有两个杂技演员不久前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城市里演出以后，那儿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谈论他们的天才。

这里的游客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以前，一般人有一种观念：规矩人最好不逛"大世界"。至于妇女，进去了还有被误认为娼妓的危险。现在，每天到人民游乐场来的有一万多游客，假日多到四五万人，都是正派的男女老少。

谈到这里，你自然会明白，为什么"大世界"改称"上海人民游乐场"了。由我看来，"大世界"这个名称比人民游乐场要好，而且大家也叫顺了口。可是熟悉"大世界"的上海人，似乎一提"大世界"就联想到那些肮脏的东西。说实在的，这也很难怪他们。

人们喜欢现在的游乐场，不只因为花很少的代价就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花样，主要还因为它热闹，它使人欢乐。这一点，你从游客的愉快满足的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觉得，游乐场还应该更热闹些，里面还可以再增加点新鲜有趣的游戏，使游客随时都像对着那门口的"哈哈镜"一样，笑一个痛快。

（一九五六年第年十期）

东安市场

阿·霍夫曼

“从一个胡桃里可以窥见全世界”，这句话正好是北京东安市场的写照。这里不但买得到世界各地的货物——中国丝绸、德国照相机、日本珍珠、美国钢笔——而且这个市场本身就自成一个世界，它是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北京城中的一个小城。

东安市场的面积约有两公顷。市场里货摊挨着货摊，商店连着商店，在那连在一起的顶篷下面，到处燃着几百支光的电灯和霓虹灯。市场里的买卖的确值得一个陌生人欣赏：这里没有仓促的交易，每个人都仔细琢磨要买的货色；一个主妇要是在这个货摊上买不到中意的饭碗，她可以到别的货摊去，在那里同样仔细地挑拣一番，直到把那个称心如意的东西买到手。

顾客买好了东西，可以到市场里的饭馆去喝杯冰镇酸梅汤，或者吃一顿远近驰名的“东来顺”涮羊肉。这里的许多饭馆能做南北名菜，也做得出日本和欧洲的大菜。假如有人喜欢娱乐，那么市场里有戏院、弹子房，可以任他选择。

也许有人喜欢到大百货商店去买东西，但他们不知道北京人多么喜爱这个传统的市场，就像柏林人喜欢圣诞节市场一样。其实不光是北京人，中国其他各地的人来到北京，有机会也总少不了要去观光一番。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般劳动人民只能带着新奇的眼光到这里来“瞧一瞧”，商人们争顾客、抢生意是很剧

烈的。

现在，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市场里六百多家形形色色的店铺都已经公私合营，或者组成了合作社。每种货物都标出公道的定价，诚实成为交易的最高原则。有时卖货的人还会指出顾客没注意到的货物的缺点。在这里，友好合作代替了激烈竞争；两千多从业员都尽力帮助他们的同事，遇到顾客要买自己店里没有的东西，就把邻店里的货拿来代卖。

劳动人民也早已不是只来“瞧瞧”的人了。他们购买漂亮的服装，在旧书店里寻找别处买不到的文学珍本，光顾那些从前专为有钱人开设的饭馆。有时还可以看到年轻姑娘在仔细挑选宝石别针或珊瑚项链，并且再三问她的朋友，这种首饰是否和她相称。

数字虽然枯燥，有时却可以给人一幅比语言更具体的图画。东安市场今年上半年的每月平均贸易额比一九五五年上升百分之八点七，比一九五四年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二。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人民对这个市场的喜爱和他们购买力的提高。

去年年底，东安市场对面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国营百货大楼，它的货色齐全，应有尽有，人们很喜欢到那里逛逛，但它对东安市场却也并没有什么妨碍，人们还是照样的喜欢东安市场。古老传统和新生事物同时并存，古老的东西会吸收新生因素，最后自己也成为新时代的一部分。不是吗，我们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

（一九五六年第十一期。作者原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建设中》（画报）总编辑）

上茶楼去

周园

广州人讲究饮食，更喜欢上茶楼。人们常常说“三茶两饭”，所谓三茶就是早、午、晚都要饮茶。广州市的茶楼现有百多家；在广东省乡下，一个七八千人的村镇，就有一两个茶楼。

茶楼里除了各色名茶应有尽有外，还出售精美的点心，种类达百多种，而且每周更换。每个茶楼还有几种特出的点心，如“莲香”的莲蓉包，“德昌”的咸煎饼，“陶陶居”的虾饺等都各具特色。一个地道的广州人会告诉你，吃哪种点心该到哪个茶楼去。这些点心分成小碟，用笼子或托盘盛着沿桌叫卖，听凭茶客选购。

在茶楼泡上一壶茶，你可以坐几个钟头。有些茶楼还有艺人清唱粤曲，或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茶楼营业时间十分注意茶客的特点：一般的是清早、中午、晚上茶客最多；靠近码头的通宵营业，以方便车船旅客；专为夜班工人和小商贩服务的茶楼则天未亮就开始营业。

在茶楼的大厅里，虽然是百多人坐在一起，可是茶客们仍然如鱼得水，不论谈心论事，读书写字，都各得其所，旁若无人。

建国初期，有些人怕上茶楼被人说是游手好闲，茶楼业曾出现一个萧条时期。近年来，这种情况已完全改变过来。不久前广州还举办了名茶美点展览会，许多老厨师临厨表演，交流经验，提高点心的质量。

现在的星期天，你要不早一点到茶楼去，就很难找到座位了。

（一九五七年第三期）

粗心的人和细心的人

万　流

北京市的实物招领处真像一家备货齐全的百货店。贴墙的玻璃橱里摆着上百副眼镜和各式各样的小皮包，屋子正中几个架子上是成捆的五颜六色的毛衣、绒衣、围巾、手套……楼上的一个柜子里发出嘈嘈切切的细响，原来这里面放着几百只正在走动的钟表。另一个柜子里放着三千多只各种牌号的钢笔。这些东西还只是招领处待领失物的一小部分。全部待领的东西有四十大类，如果以失主计算，它们大约属于一万多个粗心大意的主人。

这些失物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是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手里：一个三轮车工人会把乘客丢的钱包送到附近的公安局派出所，一个电车售票员会把乘客遗下的金饰交给电车站，一个小学生会把马路上拾到的钢笔交给站岗的警察。这些失物最先是被送到各个街道或是公共场所的失物招领部门的；如果在当地没有人领取，就转送到各个总的招领处来。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过去许多人把拾到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意外收获，而今天就能主动地送还别人呢？答复只有一个：这是一种新的社会风尚。我们在失物招领处看到一只贵重的手表，表的背后附了一封信，那是一个十二岁小学生写的："我叫周纪信，我上星期日和我哥哥周纪云还有同学刘佩良到天桥去玩……我们刚走到一个卖书的地方，我觉着脚下踩着一件东西，低头一看，是一只手表……我就和我哥哥

把这表送到派出所里了。”有些拾者在失物招领处连名字都不愿留下，以致失主要想对他们表示谢意都不可能。

四面八方的失物都被送到招领处来，这就给工作人员带来繁重的责任。为了避免损坏，钟表要上弦，有些东西要翻晒、擦洗。然而这些都还容易办到，最困难的是要为这些失物一一找到原主。如果失主自动上门查找，那还好办，否则就只有根据拾到的时间、地点和物品的特征，去探求失主的踪迹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在电话机旁喊哑了嗓子，可以看到他们为推敲一个失主的地址而紧锁双眉。也正因为这样，你也可以看到，当他们把一件东西归还原主的时候，他们是多么高兴。今年四月，一个外县小商人王林在前门大街丢了钱包，他的焦急自然不必细说。然而这时，营理失物招领的马荣秀也在发急，因为他收到一个乡下人用的钱包，里面尽是一捆捆的小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找出失主。后来王林前来领回钱包，道谢不已；马荣秀也好像心上卸下一块千斤大石头。

也有许多失主还没有来得及寻找，招领处就把失物送还他们了。北京基本化学设计院的设计员苗延秀丢掉了刚刚领到的薪金，薪金袋上只有职务和姓名而没有机关名称。招领处收到这笔钱，只好到所有邻近机关去查访，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技术员的住址。不用说，当她重新拿到自己的薪金袋时，她真是又惊奇，又感激。

（一九五七年第八期）

北京的古文化街——琉璃厂

邓 拓

到过北京的中外游客，大概都知道这里有一条古老的文化街，名叫琉璃厂。

为什么琉璃厂会变成文化街呢？这个变化经过了三个历史时期。

当公元一二七七年，元世祖忽必烈刚刚统一中国的时候，山西潞安府有一个姓赵的人家，为了发财的目的，把他开办的一座琉璃窑，搬到当时元代的“大都”，就是现在北京城的附近。他在城西郊门头沟的一个村庄建立了琉璃窑。后来这个村庄就叫做琉璃渠村，这个琉璃窑却变成了元代朝廷的官窑。当时城里用的琉璃瓦和其他琉璃制品，都要从城外运进来。

公元一四〇六年，即明成祖永乐四年开始兴建北京宫殿以后，明代政府鉴于门头沟的琉璃窑离城太远，城内宫殿建筑所需要的大量琉璃瓦供应不便，于是又在北京城南门外的海王村，另设一座琉璃厂，名为内厂，比门头沟的外厂规模更大。

到了公元一六九四年，清代康熙三十三年，因为京城宫殿大体修建完成，只要留下门头沟的琉璃窑，就已经足够供应宫廷的需要，于是海王村的内厂就被取消了。从此以后，海王村琉璃厂旧址才逐渐改变面目，终于形成了一条文化街。

最初描写这一条文化街情形的，是清代乾隆二十三年，即公

元一七五八年出版的一部书，名为《帝京岁时纪胜》，作者是北京大兴县的潘荣陛。他在“琉璃厂店”的一则记载中写道：

“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厂制东三门，西一门。街长里许，中有石桥。桥西北为公廨，东北楼门上为瞻云阁，即窑厂之正门也。厂内官署、作坊、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树林茂密，浓荫万态，烟水一泓。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数十仞，可以登临远眺。门外隙地，博戏聚焉。每于新正元旦至六十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

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不难想见，当时琉璃厂还遗留着原先取土烧窑的“窑坑”，并且日渐形成了一片烟水，点缀以石桥、土丘，似乎别有风光。至于这里的图书、宝玩，以及其他货物，仅仅是在春节期间才集中出售，平时却很不热闹，固定的书铺等也还不多。

但是，为时不久，在乾隆三十四年，即公元一七六九年，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李文藻描写琉璃厂的情形，就有很大的改变。他在《南涧文集》的一篇《琉璃厂书肆记》中，列举了三十一家书铺，还有出售古董、法帖、字画、印章、眼镜、笔墨纸张等等各种文化用品及其他有关的商号。可见那个时候，这一条文化街已经相当发达了。到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三年，清高宗网罗天下文士，编辑四库全书，开设“四库馆”以后，琉璃厂文化街就更加繁荣起来了。

清代学者翁方纲，在《复初斋诗集》的一则注释文字中写道：

“乾隆癸未，开四库馆。……每日清晨，诸臣入院……午后旧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

他特别着重介绍当时的书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书店历来是琉璃厂文化街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书店中，曾经出现了一些“专家”，他们熟悉图书资料和各种版本，往往成为许多学者和著作家的助手和好朋友。比如这里提到的“五柳居”和“文粹堂”等几座书铺，在乾隆年间就有老陶、老谢、老韦，还有其他几位被称为“晓事”的人，对于许多学者的研究工作，都曾有所帮助。

比如，那位老韦开设了“延庆堂”书铺。从李文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老韦是非常熟悉版本目录学的专家。在十八世纪的六十年代，这个七十多岁的老韦，有一天遇见一个穷苦的学者周书昌来买书。老韦知道他因为买不到宋代学者吴棫的“韵补”而苦闷，就向他介绍康熙年间的学者邵长蘅所著的“韵略”，并且向他说：“韵补的材料，全都吸收到韵略中了。”周书昌后来研究的结果，完全证明老韦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有许多例子，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我想应该提到一九五九年逝世的原“通学斋”经理孙殿起老先生。这位从书店学徒出身的人，写下了《贩书偶记》、《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等好几本可贵的资料，受到现时许多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欢迎。从上面这些例子看来，从古到今，琉璃厂文化街，对于我们祖国学术的发展确实是有相当贡献的。

不但这样，在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琉璃厂文化街也曾发生过重要的作用。

朝鲜十八世纪中叶的著名学者洪大容，在公元一七六五年，即清代乾隆三十年，随同朝鲜使节团到了北京。他在琉璃厂买书的时候，认识了中国学者严诚，谈论天文、历史、社会问题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后来严诚死在南方，洪大容听见严诚的死讯，从朝鲜托人寄来一篇非常沉痛的哀辞，恰巧在严诚逝世二周年的日子寄到严家。当时的人称颂他们的友谊，叫做“洪严生死之交。”

另一位朝鲜的学者朴齐家，两次到北京，都去琉璃厂买书。他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是公元一七九〇年，即乾隆五十五年，中国学者孙星衍正好住在琉璃厂，校勘《晏子春秋》。他把自己书斋的名字叫做“问字堂”。朴齐家到玻璃厂的时候就近去看孙星衍，并且亲笔写了“问字堂”三字匾额，送给孙星衍。当时与朴齐家同来中国的，还有一位朝鲜学者柳得恭。他在琉璃厂“五柳居”遇见了中国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建立了友谊，彼此经常通信。

一八五八年，清代咸丰八年，朝鲜进士任庆准，在琉璃厂遇见中国作家史梦兰，结为朋友，感情很好。第二年任庆准派人再到琉璃厂，买走史梦兰著的《全史宫词》数十部。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并且也有别的国家来中国游历的许多客人，都曾在琉璃厂文化街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在过去几百年间，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有不少是经过琉璃厂文化街而实现的。

不幸的是，琉璃厂文化街和中国整个国家的历史一样，经历过一段悲惨的命运。一八六〇年英法侵略军攻陷北京，后来清朝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承认了帝国主义的许多特权。从那时起，琉璃厂文化街也不可避免地蒙受了污辱，逐渐带上了浓厚的殖民地化的官僚买办资本投机垄断的商业色彩。在这里曾经出现过劫掠中国历史文物的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出现过许多勾结帝国主义盗卖祖国文物的奸商，出现过弄虚做假敲诈勒索的无赖之徒，把琉璃厂文化街的风气完全败坏了。清末光绪年间李虹若编的《朝市丛载》中，有一首打油诗写道：

“唐宋元明样样陈，
满墙字画尽名人。
由来俱是捧持货，
不必深追问假真。”

这虽然仅仅说的清末的情形，而且仅仅说的字画一个行业的情形，但是，也可以表明清末以来整个琉璃厂文化街的坏风气，曾经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只有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这个古老的文化街，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迅速跃进，才彻底改变了它的面貌，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属于人民自己的文化街。现在，这条文化街还在继续整顿，努力发展。在这里，人们将会看到，这个古文化街的优良传统，一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现它的青春，显示出新生的活力，更好地为光辉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一九六二年第五期）

佳节话中秋

散木

暮霭和残暑渐渐地收了，微风带来了田野时豆叶的清香。门外晒谷场上，我们叫着闹着、吃着月饼和纯白、正圆、正面有“玉兔捣药”等彩色人物故事画的月光饼。慢慢地，东边灰蒙蒙的山顶上亮了起来，接着，冉冉地推出一轮明月来。它又大又圆又亮，好像一面白玉盘。顿时，整个天地就象浸在水里一样，清凉、明澈。于是，我们唱起了“月光光”的儿歌。……

每到秋天的月夜，我的思想就不由回到儿时的中秋去。

中秋是我国传统的节日，时间在我国农历的八月十五（今年当公历九月十三日）。这天，月色特别明亮，外出的人有回家团聚的习惯；因此，它又有“八月半”、“团圆节”等名称。

这个佳节的起源很早。在唐诗中，就有大量中秋赏月或中秋怀人的篇章。有一个神话说，中秋节这天，鄂州人罗公远侍奉唐玄宗在宫中赏月，罗邀请玄宗去游月宫，他将手杖掷向天空，化为一道银色的桥。两人在桥上走了数里，见一大城阙。罗告诉玄宗说，这就是月宫。当时有仙女数百，素练宽衣，舞于广庭。玄宗暗中记下仙女的舞曲，回来后命人加以整理，这就是唐代有名的“霓裳羽衣曲”。

推原中秋的产生，大概是：这时秋收已了，瓜果已熟，而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正是庆祝丰收、尝新和娱乐的好时节；加上

人们对月的爱好，月色在这烟凝云敛、潦尽潭清之际，又出落得分外精神，于是，皓月正圆的八月十五，便自然地被选作了一年一度的佳节。

“此夜若无月，一年虚度秋。”唐代司空图的诗句说明了我国人民对中秋夜月的重视。这个节日的活动是拜月、赏月以及由此引起的饮宴游乐。

拜月今天已不流行，但赏月及饮宴游乐，则从古到今，盛行不衰。据记载，北宋京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在节日前，市上堆满了新上市的蟹和石榴、梨、栗、葡萄等水果。各店都修饰门面。扎牌楼，并开始出售新酒。中秋夜，市民争上酒楼，以先睹月色为快；儿童在街上彻夜游戏；夜市喧阗，通宵达旦。

其后各代，中秋的景况大抵和宋代相似。只是元代末叶开始，增加了吃月饼的习俗，清代或其以前，在北京等地又盛行“月光纸”和“兔儿爷”。

月饼的形状模拟满月，有大到直径一尺的。在从前，月饼在祭月后按人数剖开，阖家分食，意思是希望一家人永远团圆如月。现在，这种分食的习俗已不多见，但月饼却一直是中秋最重要的节日食品，而且花色愈来愈多。今天，它有苏（州）、广（东）等式，甜、咸、荤、素，各种馅子，共几十个品种。

“月光纸”是拜月用的彩绘画纸，小者数寸，大者一丈左右，上面绘有趺坐莲花上的“月光普照菩萨”，莲花下是月轮桂殿，殿前有人立的白兔，举杵捣药。“兔儿爷”以泥塑成，或贴金涂彩，或衣衣冠。它是节日的儿童玩具。其形状，有张盖如高官的，有带甲如将军的，有骑虎的，有默坐的，色彩缤纷，仪态不一。

提到“月光纸”和“兔儿爷”，不能不一谈关于月亮的神话。神话说，月亮是神仙居住的地方，那里有琼楼玉宇，名叫“广寒宫”。宫中住着美丽的仙女嫦娥，原是上古射日英雄后羿的妻子，是偷吃了丈夫向仙人西王母讨来的不死灵药，从人间飞

升到那里去的。广寒宫前有株高大的桂树，一位名叫吴刚的仙人正在砍伐它。但桂树的创伤随砍随合，永远无法被砍倒，因为，吴刚曾犯清规，故此被谪罚来做这徒劳无功的苦差使。吴刚的一旁，有一只在臼中捣药的白兔。这个月亮的神话古今广泛地流传着。其中的人物被写成诗和小说，被搬上舞台，被作成画、雕塑品及各种工艺品。中秋的活动既以赏月和拜月为中心，很自然，这样神话就给这个节日带来了神话色彩和无穷的趣味。

但是，旧社会的中秋——正如那时的春节一样——一方面既给人们以欢乐，另一方面也给人们以苦难。因为，按传统，中秋节是结帐的日子，这天，雇主可以自由解雇他们的工人、职员、雇农，债主可以要求债户清偿务（北京旧民歌：中秋佳节月通宵，债主临门不肯饶）。由此可见，这个佳节对当时很多穷苦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日子。

今天，对这些苦难，年长的一辈或许已淡忘，年青的一辈或许不知道，十几度的中秋已使它成为历史陈迹。今天，每逢中秋将临，家家户户就忙考虑怎样过好节日，市场上满是各种时令食品，出售月饼的商店往往拥挤得水泄不通。中秋这一天，以赏月为中心，吃月秋、游览胜景，……形成欢腾的节日浪潮。由于地区和各人爱好不同，赏月方式也不同，按古老的习惯，有登高的，泛舟的、游览名胜的；在赏月时，有阖家一起聚餐名“吃团圆饭”的，有观湖的，有划船的，……这天在城市，剧场演出“嫦娥奔月”等戏文，报纸刊登中秋的故事或月球的常识，电台播送“平湖秋月”、“月儿高高”等古典名曲，机关、团体和文化娱乐场所有各种月光晚会或赏月晚会、有各种体育运动的表演赛，……

☆　　☆　　☆

玉露生凉，银蟾光满。现在，一年一度的中秋又到了。在这节日之夜，在这皓月的清光下：

有多少人登山临水或推开高楼的窗户！

有多少人谈说月宫的神话和月球的科学知识！
有多少人将歌唱欢笑，掷向宁静的夜空！

（一九六二年第十期）

热鬧的厂甸

孙桂琴

北京人过春节最有趣的活动项目之一是逛厂甸。厂甸春市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了。那是一片露天市场，只在春节的头十天或半个月内开放。出售的多半是吃的玩的小商品以及各式各样小杂货。它们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节令特色。

看吧，在这些日子里，全市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带有厂甸归来标志的人。一盒盒小吃、一篮篮水果，灯笼，年画，玩具自不必说，那一米多长的大糖葫芦，是最若人注目的。红红的山楂串在荆条上，挂着一层晶莹的糖衣。它是厂甸特有的风味，最富有节日的色彩，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回荡着一种说不出的喜庆气氛。最开心的是孩子们，那嗒嗒作响的彩纸风车，那嗡嗡旋转的空竹，还有或威武或滑稽的戏剧面具以及花枪、风筝等等使得他们心花怒放。平日大人去市场尽可能把孩子留在家里，而逛厂甸么，孩子往往是主角。他们打扮起来，由父母或者还有祖父母率领着。举家逛厂甸，是极普遍的。然后就是满载而归，皆大欢喜。

虽说大人是主要为了孩子去逛厂甸，可是自己的兴趣也得到了满足。老头儿们带着花镜在书摊前入神地翻阅着珍本古籍。这种闹中静比那书店不一样，别有一种惬意的滋味。老太太们可以挑上一支红艳艳的小绒花别在发髻上，再买一盆馨香迎人的兰花

或一缸摇头摆尾的小金鱼。吸引青年男女的则有精致的工艺品，多种文化用品，新出版的书画等等。也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想买什么，至少还没有一定的目标，但还是兴致勃勃地进去走走。因为那花花绿绿、熙熙攘攘、喜气洋洋的空气也是够陶醉人的了。

今年的厂甸可说是盛况空前。七百多个彩棚排列在和平门外的马路两旁。北京的各个著名商店、手工业合作社和郊区的人民公社老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不仅是北京的种种特产，连远地的驰名货：杭州剪刀、宜兴陶器、福州漆器、广东藤器、浙江兰花……都被组织进去。还特别邀请来一些著名艺人。“面人郎”的女儿郎志丽大约十分钟就为顾客们捏出一只手眼欲动的小面人。湖南棕编艺人易正文用片片棕叶编出维妙维肖的虫鱼鸟兽。老北京说今年的厂甸是三多：摊多、货多、游人多。市场结束后一连好多天，人们还在谈论着厂甸如何如何，它给人们留下了愉快而又深刻的印象。它是反映我国奔腾的建设和生活的一个小小的面。

（一九六三年第四期）

公园的早晨

叶君健

北海公园在早晨五点半钟就已经开门了，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在准备迎接游客。事实上，它似乎还没有怎么睡醒呢！它那广漠的“海”上，经过一夜的蒸发，现在正弥漫着一层薄薄的烟雾。除了那座高耸入云的白塔像一片孤帆似的浮在半空以外，这时什么东西也不大容易看得清楚。但公园并没有睡觉。听！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鱼跃的声音。这些生物积蓄了一夜的力量，无处发泄，现在要欢闹一下，迎接这已经到来的早晨。

于是烟雾慢慢地消散了。湖边的垂柳，周围的山丘，山丘背后的果园和树木以及这其间的长廊、楼台和亭榭，也开始露出它们的轮廓。但只有当太阳出现了的时候，它们各自的形态、色彩和位置才和谐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一幅风景。而太阳却是那么悭吝，偏偏在这里出现得那么晚。这是因为这个公园原是古时皇宫的一部分。它四周围着一道很厚的红墙，太阳要爬过来得走好大一段路程。但正因为如此，这个公园虽然是处在北京市的中心，它却特别显得幽静，而且与其它的公园不同，它还能保持住一个相当长而且荫凉的早晨。

北京的市民非常珍爱这样的早晨。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人和年轻人。烟雾还没有消散，他们就已经进入了公园，成为这里的第一批“游客”。说是“游客”，事实上也不尽然。他

们的态度要比那积极得多。果树和花木在散发新鲜氧气，湖水在吐出清凉。那些饱经世故的老人知道怎样爱惜这种在夏天说来比蜂蜜还要甘美的东西。他们要享受它。所以他们有的静静地站在树底下做气功，有的在健步如飞地爬山，有的在湖边平地上不慌不忙地打太极拳……他们要尽量地吸取这个公园里能提供给的一切“补品”。在这种情形下，大自然不是他们的身外物，而是他们营养的一部分。

至于年轻人呢？对他们说来，那湖光、那山色和那依依垂柳则完全是客观的存在，不过只有当他们到场的时候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这里所说的年轻人当然是指那些每天来得最早、最忠诚、最坚定的年轻游客。他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店员，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士兵，有的是机关干部。他们的职业虽然各异，但他们的趣味则是相同。他们一到来就选定一个僻静的处所，换上必要装束，伸着脖子，毫无顾忌地（也可以说是“旁若无人”地）高歌起来。有的唱女高音，有的唱男中音，有的则哼老头儿的低调，他们把大地当作舞台，把树木当作看客，让他们珠玉般的声音在湖上跳跃，在山间回荡。有的年轻朋友在唱得最高兴的时候，甚至还翩翩起舞呢。有一位姑娘就这样在一个亭子里做出唐代美人杨贵妃醉酒的姿态。另外有一位复员军人，穿着一条现代步兵用的半旧的草绿色军裤，一件崭新的布衬衫和一双古老的布制白色高底武士靴，正在长廊里模拟公元前三世纪的楚霸王和虞姬诀别的情景。在这里，我想读者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解释就已经明白他们在干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在练戏——全国、乃至全世界驰名的京戏。而北京又是京戏的发源地，所以毫不奇怪他们把这门艺术喜爱得入了迷。真的，谁能预言他们之中某一天不会有人成为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

但在目前这个时刻，他们响亮的声音却是起着一种晨钟的作用。北海在他们的歌唱下，现在彻底醒过来了。那山、那树、那

一泓湖水、那楼台亭榭，似乎都在洗耳静听。偶而之间，一阵微风吹来，在水上拂起一片皱纹，像蹙额，也像微笑。当然，谁也不能肯定，这种表情算是代表公园对这些歌声所起的感情上的反应，但无论如何，整个公园由于这些老年人和年轻朋友的活动而变得活跃起来了。它现在是有声有色，生气勃勃，充满了生命。这时游客们点缀在它的怀抱里，成为它整个画幅中的一景。

当然，这种境界形成的时候，太阳已经爬得相当高了。那些练身体的老先生们，饱餐了秀色和吸足了空气中的营养，在感情上已经得到了充分满足，现在要回家休息去了。那些业余艺术家们，尽情地做了一早晨的表演以后，身心舒畅，也要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了。但北海并不因此就失去了它的生动性。做完了家务的家庭主妇，结束了当天暑期作业的小学生，正在休假的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或者带着毛线，或者拿着暑期读物，或者持着钓竿，都陆陆续续地走进这个公园里来。他们选定他们最喜爱的位置把自己安顿下来，享受湖上吹来的凉风，或看那白塔上变幻着的白云。北海虽然暂时失去了那些震动心弦的歌唱，但却换来了使人留连忘返的和平与安静。就这样，北海几乎每个时刻都在变化，而每个变化都是那么迷人，凭它的这个特点，它从早到晚吸引着无数的游客，成为我们首都居民的一个享受、游览和休憩的中心。

（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

西双版纳的节日

沙博里

汽车飞速地驶过了亚热带的深山密林后，西双版纳便映入了眼帘。此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开阔平坦的澜沧江河谷。澜沧江向南不远流入缅甸，便是著名的湄公河。我们一行共约五十人，除陪同的中国同志外，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共十一个国家。

我们来到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我没想到这样一个边远地区竟有现代化的建筑和宽阔的街道。自治州下辖景洪、勐海、勐腊三县，面积二万五千平方公里，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为森林复盖的山区，人口六十二万，百分之三十为傣族。此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散居山区。

自治州是一个山地，就是傣族称之为“坝子”的河谷平地，海拔也高达五百至一千三百公尺。这里每年只有旱、雨两季，年降雨量约为一千四百毫米，平均温度为摄氏二十二度，气温宜人’坝子平地种植稻米，山坡上则栽种玉米、经济作物和热带果木。据称西双版纳内地常有虎、象出没，我们幸而没有碰上。

西双版纳，傣语意为“十二行政单位”。景洪在傣语中意为“黎明之城”。关于“黎明之城”的来历，有一个民间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魔王见到景洪平坝土地肥沃，强行占夺，并霸占了七个美丽的傣族少女为妻。人民对他恨之入骨，这七个少女也千

方百计想把魔王除掉。一天，第七个少女想出了一条妙计，她向魔王摆盏劝酒，百般恭维。

“大王真了不起，”她软语轻声地说，“你一定是刀枪不入。”

“唔，差不离，”魔王自吹自擂地说，“只有从我头上拔一根头发，绕住我的脖子一勒，才能杀害我。”

一会儿，魔王喝得酩酊大醉，鼾声大作。这个少女趁此将魔王的脑袋勒落在地。这个魔王原来是一个火魔，脑袋滚到哪里，哪里便烈焰腾腾。这七个少女和群众齐来泼水救火，并把魔王的脑袋扔进了澜沧江，于是景洪才开始了黎明，并称为“黎明之城”。千百年来，傣族人民每年都举行泼水节，庆祝灭魔除害。我们到西双版纳时，恰好赶上这一盛大节日。

泼水节共三天，是傣族的新年。但在傣族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汉族（汉族占中国数亿人口的绝大多数，也一同庆祝）。

第一天，我们一行来到了澜沧江边。在江边近一英里长的宽阔平坦的沙坝上聚集了约三万名身穿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的各族人民，观看赛龙船、放高升、跳舞、赶热闹。

炮声一响，龙船比赛开始。每次有四条船从对岸横过激流驶来。船首刻有龙头，每船各有桨手六十至八十人，或男或女，分成两排。船尾一人掌舵，另有二、三人用腿有节奏地击拍船首，增加船速。观众挤近江边观看自己生产队或民兵组织的选手进行比赛。优胜者载歌载舞走向奖台，饮一小杯传统的米脂佳酿。对桨手讲来，一小杯烈酒算不了什么，可是却苦了那位县负责人，他对每一优胜组都得陪饮一杯，因此不到半天，早已是醉眼朦胧了。谁取得了最后胜利，我不知道，大家对此也不在意，只要玩得高兴。

与此同时，放高升比赛在江滩下面欢快地进行着，高升是一种土制火箭，比赛时看谁的火箭飞得又高又远。中国人早在许多

世纪前便发明了火箭。大多数火箭飞得又高又快，少数火箭似乎还有助推器，飞得更高。

人群随着刀舞、龙灯舞、孔雀舞、傣族舞和哈尼舞不停地流动。民族服装令人赏心悦目。一套艳丽的民族服装加上各种饰品价钱不小，但显然姑娘们都买得起。

第二天参加泼水。我们来到一个傣族公社的曼听生产队。人们聚集在一片开阔的广场上，每人都备了一个泼水用的小面盆。

跳舞开始了，六个头裹紫红绸巾的小伙子，穿过人群，围成一个圆圈，一边跳舞，一边有节奏地拍击象脚鼓。

人人都参加跳舞。汉族人，外国人笨手笨脚地学着优美的舞姿。社员向干部和驻军泼水，干部和驻军也笑脸回敬。水花四溅，没有种族之分，没有职位高低之分。我们一行，人人自顶至踵浑身湿透，我很难记得我曾经经历过这样欢闹的时刻。

泼水节的最后一天是赶摆（即赶集、赶热闹）。我们到曼景洪公社所在地参加了这一活动。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傣族，但也有哈尼族，汉族和不少中学毕业后从其他地方分配来此的汉族青年。

我们沿着寨子里的街道漫步，社员像星期日一样在赶摆。他们在商店购买从牙膏到半导体收音机在内的日用品。有的妇女则坐在路边售卖自己种植的西红柿、胡椒以及辣酱和冷食。价格自定，有时较国营商店的价格高一些，但通常较低。

在节日里找对象是当地的一种风俗。年轻的小伙子推着自行车在街头慢慢地走着。如果小伙子停下来同姑娘拉话，而姑娘又同他搭腔，那就表明这个姑娘认定他是自己可能的对象。天黑之后，小伙子手拿电棒（过去的老习惯是拿火把），再来寻找这个姑娘。如果这个姑娘还在原处，同时又愿意，那么这个小伙子便让她坐在自行车座后面的车架上，送她回家，并同姑娘的父母见面。

这一天，我的妻子和我在一对傣族青年夫妇家里吃午饭。傣族的住宅过去都是竹楼茅草屋顶，现在则用更为坚固的木材和平面薄瓦建成，式样之优美仍然不亚于原样。我们见到了主人的两个长得很结实的男孩，一个八岁，一个三岁。大孩子已上学。傣族学龄儿童百分之九十六已上学。在学校里教学、读、写都用傣语，根据傣族人民的要求，学童也学习汉语。少数民族上学、治病一律免费。疟疾发病率已下降到千分之六，天花、霍乱已消灭。

男主人能讲一点汉语。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妻子都下地干活，每年除去各种开支外可以储存一百五十元左右。

自治州盛产香蕉、芒果、木瓜、油棕、优质木材，民族手工艺也很精致。目前，由于没有铁路，这些产品尚不能大量外销，但交通条件的改善已经为时不远了。

“欢迎五年之后再来，”当我们离开景洪时主人这样对我们说：“我们将有更多的东西让你们参观。”

我相信主人的话。西双版纳有着巨大的潜力。

（一九七八年第七期）

3,000,000辆自行车

孙桂琴

我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了解到：北京有三百万辆自行车，平均两个半人一辆。几年前，我在报上曾看到，周恩来总理对来访的外国朋友说，将来我们的工业发达了，也不提倡私人买汽车，我们还是鼓励人们骑自行车。的确，骑自行车不耗费能源，不产生污染，可以锻炼身体，并且存放简便。这经济、灵便的交通工具在中国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北京自行车特别多

我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上海，但北京的自行车却比上海多。这是因为北京胡同多，有名字的就有三千六百个，还有没有名字的。这些小胡同，公共汽车无法通行，而自行车则可畅通无阻。北京自行车多还因为地势平坦，如果在山城重庆就没有这个条件。我刚到北京的时候，骑车的也没有这么多。那是一九五〇年，我们全国一年只不过生产一万八千八百辆自行车，加上进口，不超过四万辆，一个北京市的自行车能有多少呢。那时，街上见得最多的是人拉的黄包车、脚蹬的三轮车，还有"丁当，丁当"响声震天的有轨电车和半天不来一辆的公共汽车。后来公共汽车不断增加，其余几种交通工具还在六十年代就被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无轨电车、三轮摩托、出租小汽车和空前稠密的自行车，以致有

人称北京是自行车的丛林。

于是围绕自行车出现三个问题：买、修、管。

买

去年秋天，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全国轻工业产品展销会，会上出售的几千种商品中自行车还是首屈一指的畅销货。一九七八年北京销售三十万辆，全国生产九百五十万辆也还是供不应求。目前自行车在我国是计划供应商品。商业部门按职工比例将自行车购买证分发给各单位，各单位只能将购买证发给最需要自行车的一小部分人。一辆自行车的价钱相当于一般职工两三个月的工资。北京居民普遍一家一、二辆。有的四、五辆，甚至一人一辆。

修

一辆自行车一千四百多个零件，长年累月地骑，不摔不撞也有磨损，加上各种预料不到的事故，一出毛病就得进“医院”。一进“医院”都想快修,快好。许多自行车修理门市部都体谅人们这种心情，订出快修项目。我家附近的社会路自行车修理门市部有十四位工人，每天修车一百多辆，百分之九十都当场修好，大修也只需一天。为了方便顾客，他们比一般机关、工厂早上班一小时，晚下班一小时。象这样的门市部北京有二百多个。每个门市部的门前都放着电动气管，免费提供过往自行车打气。骑自行车的职工每月还可以从国家领取维修费二元。

管

自行车给广大群众带来方便,却给交通管理部门带来了烦恼，百分之六十——七十的交通事故是与自行车有关的。汽车司机对自行车特别头疼，他们常常被突然横插过来的自行车吓得魂不附体。丢失自行车的事情也屡有发生。公众场所门前成千上万辆自

行车的停放关系到社会秩序和市容。所以，如何管理好自行车就成为交通管理部门的一个难题。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尽量使机动车和自行车分道扬镳，中间栽上花草树木，或用水泥桩隔开，窄马路上的斑马线则经常刷新；存车处也越来越多。西长安街六部口的交通民警王义是全国人大代表。他告诉我，为了维护首都的交通安全，他曾经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逐步限制北京自行车发展的提案。但是，商业部门和广大职工还是希望多要些自行车。目前，上下班时间的十字路口，自行车跟潮水一般从四面涌来，最多的一小时要通过三万辆以上。他们要不断总结经验，摸规律，才能指挥所有的车辆尽快地安全通过。他们还经常帮助遇到困难的人。一天夜里，民警孙乃义值班时发现两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一个骑车的不仅犯规带了人，被带的人还推着另一辆车。原来他们是郊区的人进城来看戏，一个人的车带跑了气，如果步行回去得走几个小时。孙乃义把他们领到自己办公地点，帮他们修好了车，两人高高兴兴地走了。后来写来感谢信，表示以后一定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骑在自行车上的北京人

初到中国的人如果站在天安门前观察一下从眼前闪过的自行车洪流就可以摄取北京人民生活的一个侧影。清晨，这股迎着朝阳的洪流里面有工人，有教师，有学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的相貌不同身份不同，目的却是一个——去开始新的一天工作。洪流中不时出现在一旁带着小拖斗的自行车，拖斗的小窗子闪现出小孩的活泼头影。哦，这是带着孩子上班的母亲，她把小宝贝带到机关（或工厂）的托儿所，下班再一块回家。

假日的自行车则另是一番景象：有奔赴名胜古迹游玩的，有省亲访友的，有去河边垂钓的，还有一家老小结成车队去郊游团聚的。人们沿着林荫道、河边、山脚轻松地骑着自行车，不仅解

决了交通问题，而且有一种精神上的愉快和享受。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喀什风情

陈和毅

维吾尔名城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是维吾尔民族风味最浓的城市，古老的民情风俗和传统都有所保留。城市面貌也是那般古老，深街小巷，泥砌的土房，陡斜的楼梯，在我看来仿佛是中世纪的陈迹，但在维吾尔人眼里却总是那么亲切。连逛逛那铺面狭小而又五光十色的巴扎（市场），看看那穿着袷袢的男子和罩着褐色面纱的妇女，听听当地人如音乐般的语言，他们也觉得是一种满足，是一种赏心乐事。难怪未来之前一位维吾尔朋友对我说："去喀什吗？你要不去喀什，就等于没到过新疆"。

喀什城市不大，人口只十余万，多数是维吾尔居民。城建在克孜尔河畔的高阜上，纵贯全市的是一条整洁平坦的水泥马路，两侧则排列着喀什的主要建筑。城东有一座颇为幽静的公园，维吾尔大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就长眠在这里。市中心的艾提尕尔寺是新疆乃至全国最大的清真寺，据说能容纳八千名穆斯林做祈祷。

寺里的阿訇多系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除对《可兰经》、圣训、伊斯兰教法学、哲学有精湛的研究外，还通晓历史和突厥文、阿拉伯文，有的因到过麦加朝圣而被尊称为"哈吉"。历史上，喀什的文化就比较发达，直到当代也仍然是新疆南部的一个

文化中心，不断培养出一批批维吾尔知识分子。伊米尔·赛音·哈孜是驰名全疆的维吾尔学者，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却也精神矍铄，顽强从事著述。

疏 勒

古代的喀什名叫疏勒，它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两千一百多年前。那时的居民，主要是属雅利安人种的伊兰人，可能还有少量的羌人、匈奴人和大月氏人，他们在部族的基础上组成了一个名叫疏勒的国家。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汉王朝（公元前二〇六年—公元八年）西域都护府的设置，给疏勒带来了繁荣。

一世纪中叶，正是西汉、东汉王朝（公元二五年—二二〇年）的交替时期，中原一片混乱。于是匈奴奴隶主势力在新疆趁机发展。东汉建立后，派班超前来新疆，他迅速安定了局势，击退了匈奴势力的多次骚扰和进攻，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他长期住在疏勒，并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安息，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的友好交往做出了重大贡献。

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的疏勒就更为繁荣了，东来西往的商队络绎不绝。据载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求法后回国，就是随着一队商旅自塔什库尔干来到这里的。当时的疏勒不单是一大商埠，还是安西四镇之一的疏勒都督府的治所，即同时是一政治军事要地。唐大将高仙芝领兵万余人度塔什库尔干去中亚，就曾经过这里。不过那时的疏勒并不在现今的地址，而是在其东约三十公里的一片洼地间。我们前往寻访，只见直径数公里的面积上都留有数量极多的红黑陶片，略微挖掘，便露出许多猪牛羊骨、铁器残块，以及项链珠子、饰物雕象、古代钱币。靠西面名叫莫热墩的地方，还残留有高高的佛塔和寺庙建筑，也许玄奘法师在这里住过呢。

回鹘人西迁

九世纪中叶，鄂尔浑河一带发生了多次暴风雪，游牧在那里的回鹘人面临饥饿和疾病，内部纷乱四起，黠戛斯人又来进攻。一度强大的回鹘部落遭到削弱并被迫西迁，有的去到河西，有的来到巴尔喀什湖以南，有的则来到吐鲁番、库车、喀什。

到达巴尔喀什湖的回鹘部落融合了那里的葛逻禄人，势力逐渐强大。十世纪中叶，他们建立了包括喀什在内的地方割据权权喀拉汗朝。大汗驻八拉沙衮（今吉尔吉斯坦阿克白西姆），副汗则驻喀什。不久，喀拉汗朝改奉伊斯兰教，又四处征伐，消灭了包括崇尚佛教的于阗李氏王朝在内的许多政权，控制了整个南疆。后来，契丹人和蒙古人又先后来到这里，他们也都改奉了伊斯兰教。各民族的长期相处，语言、文化、风俗的渐趋统一，促进了包括当地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融合，久而久之，一个以回鹘人为主的现代维吾尔族便诞生了。

维吾尔人在鄂尔浑河时期就有自己的文化，并有古老的回鹘文字，到了喀拉汗朝时期则有了辉煌的发展。十一世纪出生于喀什的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写出了名扬阿拉伯世界的《突厥语词典》，同时代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喀什用突厥文写成了长达一万多行的名著《福乐智慧》。

喀拉汗朝的王宫遗址就在今喀什以东不远的哈勒沃依，在维吾尔语里，哈勒沃依就是王宫之意。哈勒沃依不远的伯什克然木，原是皇家的果园，现在则是喀什的瓜果之乡，每当夏秋，凉荫蔽日，蜜桃、石榴、葡萄、苹果结满枝头，四处飘香。

维吾尔风情

维吾尔人的主食，是一种发酵后不加碱的烤饼——馕，就着茯茶或瓜果吃。他们很好客，凡有客来必倾其所有，或用拉条子、或用抓饭、烤包子热情接待。男子多戴皮帽，也有戴绣花小帽或素色小帽的。外出多骑毛驴。妇女多着艾提尼斯绸裙，随风

飘洒，美丽多姿。

维吾尔人多系穆斯林，而喀什的伊斯兰教徒又更多一些。有些风俗习惯则带有宗教色彩，比如妇女带面纱，别处不易见到，而喀什则随处可见。斋月里，穆斯林在白天不能喝水就食，名曰封斋，喀什封斋的人也比别处为多。

在喀什，我们参观了建筑工人阿卜乃提和帕蒂曼的婚礼。这是一起保留着不少古老风习的婚仪。结婚那天，双方家庭准备了丰盛的糖果、蜂蜜、油馕及抓饭，然而新人均不露面，只由双方父母分别接待客人。待到黄昏，新郎才在伙伴们的陪同下去迎新娘。等待着的新娘由母亲和伴娘陪着，登上结彩的汽车，由舞乐队伍前导，吹吹打打来到夫家，但却不下车，等到夫婿拿出地毯，由四人各抓一角，把她抬入洞房，婚礼才告结束。

维吾尔人每年有两次年节，一次叫库尔班节，一次叫肉孜节。肉孜节紧接斋月之后，所以又叫开斋节。那天清晨，穆斯林们就不约而同地来到响起唢呐皮鼓的艾提尕尔寺，举行节日祈祷。随后，便在寺前跳起古老的喜庆舞。

肉孜节最主要的活动还是亲友间相互拜年，当地汉人也遵从这个习惯。我们来到新结识的一个维族朋友家，向他致节日祝贺。那天，他们全家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妇女们的衣服更是色彩鲜艳。屋子布置得干净明亮，窗帘洁白，地毯铺地，上面铺了块大食布，摆满了各类丰盛的节日食品。人们有说有笑，一片欢乐。及到兴意阑时，主人取出都他尔，弹起轻松的乐曲，于是小小的屋子里又跳起了民族式的邀请舞。汉族朋友也受到邀请，看来他们实在也没有舞蹈的天才，动作显得笨拙可笑，不过谁也不在意，反而感到亲切。

（一九八〇年第十期）

西双版纳记游

悌思·温兹

悌思·温兹，现在《人民画报》社担任英文润稿工作。今年一月，她与其嫂摩利·麦金曾去云南游览。摩利及其丈夫加里·温兹现在成都科技大学教英文。下面是她写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游记。

这是中国最大的节日——春节。我和摩利动身前往云南西双版纳。多年来，我听到过关于西双版纳的传说和中国这个亚热带田园的优美风光。这些一直使我为之神往。我要卸下北京的冬装去享受和煦的阳光，在澜沧江江畔漫步和攀登山峰。然而，我首先还是要去看看这个遥远的边疆地区和那里的人民。那儿居住着好几个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衣着和语言同人口占多数的汉族迥然不同。

我们从云南省省会昆明乘飞机至思茅，然后再乘七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才到达这个与老挝和缅甸接壤的亚热带地区。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位于澜沧江畔。在去景洪路上，我们见不到一片平展的土地。以前，我从书本上了解到，西双版纳地区百分之九十六是山地。沿途看到几处茅舍村庄，其余的尽是茂密的丛林。这里盛产菠萝、香蕉、椰子、咖啡、橡胶，以及有名的普洱茶。我们没有碰到过大象和猴子，也没有碰到过巨蟒。据说，这一带真的有这

些动物！

到景洪下车时就象同家里人分手一样。同车共七十人，还有二十几只鸡和一大堆香蕉。我同他们相处共七个小时，并且同周围的人交谈过，但我对他们却产生了一种友谊。下车后，人们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们多彩多姿的服装和他们修长、文雅的身材。这里的居民三分之一是傣族。他们看到两个挎着背包的外国人在大街上行走虽然有些好奇，然而他们却不是张开嘴巴呆呆地盯住你，让你感到不舒服。你一接触到他们的目光，他们马上就报以热情的微笑，使你感到你就是本地人。人们的热情、温暖的气候、与郁郁葱葱的青山相连接的碧蓝天空、山谷中的田野，还有长长的澜沧江，这些都使我流连忘返。

在宾馆里安顿下来以后，我们沿着城外的道路走到河边的一个傣族村庄。村民都居住在雅致的竹楼里。妇女身穿鲜艳的花裙和紧身上衣，腰间系着银带，乌黑的发结盘在头顶上。她们有的下地劳动，有的在塘边洗菜，有的挑着大筐香蕉。三个七八岁的孩子来到我们跟前。我们五个人结伴穿过热带树林。在林边拍摄了色彩缤纷的蝴蝶。我们相互把自己推下陡峭的沙岸，随着水牛渡过澜沧江的一个支流。

忽然，三个孩子咯咯地笑个不停，把衣服扒了下来，跑入河中。我和摩利坐在沙滩上远距离拍下他们戏水的镜头。二十分钟后，我们五人随着水牛沿着澜沧江继续行进。不久，他们中的一个孩子翻过竹篱笆，穿过一片果园，跑到香蕉林边上的一个竹楼里去了。他拿来一把大刀和五根甘蔗。孩子们教我们怎样削皮，吃后吐渣。吃完甘蔗，孩子的母亲邀我们进屋同家里人见面。我们不会说傣语，他们也听不懂我们讲的汉话。我们比比划划交谈，向他们介绍我们家里的情况，以及我们在澜沧江江畔和在北京生活的情况。我们坐在竹楼外面，吃着甘蔗，沐浴着午后的阳光，感到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十分和蔼可亲。

第二天，我们向另外一个方向出发。我们在景洪城外搭上了一辆卡车。站在卡车驾驶室后面，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清风拂面，顿时一种印第安纳的乡情便油然而生。此情此景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拿定主意跟着车跑。汽车奔向山里，越爬越高。经过几个村庄，汽车终于在山顶附近的山路尽头停了下来。这里有一片三四十户的茅舍村落。司机的家就在这村里，他和他的妻子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喝糖水、吃花生。这时，村里的人都出来欢迎我们。二十分钟后，我们就变成了"自己人"了。我们同二十多个小孩子和青少年爬到山上去看瀑布。两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司机家里吃饭。屋里是泥土地，没有自来水。饭前就在屋前由山间奔腾而下的溪水中洗手。饭食虽简单，却很可口。主人还留我们歇宿。中国人好客真是没法说了！

当地居民较贫苦。大多数四至八口之家居住两间茅屋，壁缝用报纸糊着。同住屋相连的是一间当厨房用的茅屋。村子里有一所公共建筑。大多数成年人不会书写。但据说大部分孩子都在附近的学校读书。他们从事简单的耕作。这里也不通公共汽车。席间我们靠了摩利几句汉话延续到晚间十一点钟直到大家有了倦意才散。

我们在哪里歇呢？嘿！我们住的是一间新房。我们的两个新朋友刚结婚不久，有一间新房，房里有一张双人床，床上铺了草垫，有蚊帐和双喜枕套。墙上贴满了印有孩子、青年夫妇的大型招贴画。

第二天太阳还没有出山，村子里的人已在门外等我们出去玩。随着新年的鞭炮声，我们起床外出游玩。傍午，我们照了几张相后便向主人告别，约好我们准备一年后再来拜访。司机将他家的两辆自行车让我和摩利骑回景洪。车后各带了一位新交的女朋友，说好到了景洪她们骑车回去交还主人。回景洪是下坡路，乘自行车花了一个半小时。我们纵情歌唱故乡的民歌《这是你们的土地》。

景洪热闹非凡。看来农村里的人都到城里来过年了。我们在市场上来来去去，躲闪鞭炮，欣赏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等群众花花绿绿的衣饰。人们购买芒果、香蕉、衣服和鞭炮。妇女在路边煮卖米粉。路边一字排开一尺来高的小桌和八寸来高的长凳，人们可以坐下来吃粉条。我吃了一碗。猪和鸡就在我们身边走动。吃罢米粉后的甜食是一段两尺长的甘蔗。

在西双版纳的最后一天，我们沿着澜沧江漫步几个小时。我们在江畔野餐，在阳光下的沙滩上入睡。忽然，我醒了过来。有个孩子身上套着一个充气的汽车内胎，嗖啸一声漂流而下。多么惬意！下次再来时，我们也得试试。

这天夜晚，我们坐在外面很久，捕捉晴空的流星。真不愿第二天就离开这里。我不想结束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充满东方情调的旅游。

（一九八二年第九期）

春的使者

李滨声

童年，我很爱放风筝，不过当时是有着季节限制的，一般都是从新春正月到清明前后，那是明清以来的民俗。春天来了，蛰居一冬的儿童冲出了“樊笼”，沐着春风奔跑嬉戏在庭院里、广场上，翘首高瞻扶摇直上的风筝，有利于体育活动又启迪他们的智力发展。

风筝的种类很多，儿童最喜欢的是“人型”风筝，因为他们常把对神话中人物的羡慕，寄托在自己操纵的风筝上。记得我最初选放的风筝便是腾云驾雾的孙悟空和脚踏风火轮的哪吒。女孩子们多是喜欢放“蝴蝶”、“花篮”和“美人”。至于成人却喜欢放尺寸较大的鹰、燕、八卦和蜈蚣（龙），放起来又高又远最有声势。特别是风筝上装置有锣、鼓和风琴等特制乐器的，受风鼓动还能发出有规律的悦耳音响，很是好听。此外，还有一种最简单的用席篾绑成一个交叉，上面贴一张纸，专供幼儿牵引跑放的小风筝。北京人对它昵称“屁帘”（因形状和幼儿系在臀部挡风的围裙一样），放起来非常活泼有趣。

提起旧时的民俗，有的是荒唐可笑的。清明节家家户户到郊外扫墓、踏青（等于春游），放风筝也是一项活动，不知为什么染上一层迷信色彩。成年人总是最后故意把风筝放跑，任其飘摇逝去，寓意是放走了“晦气”，而那断线的风筝降落到谁家的屋顶或院内，谁家就认为是“不吉祥”的征兆，必须把那风筝捣毁

才能“逢凶化吉”，你说可笑不？

风筝是雅俗共赏的玩具和工艺美术品，可放飞，也可以观赏，因之喜欢放和研究风筝的人比较多。多少年来戏剧界和美术界有过不少位知名人士都是风筝专家。已故画马著名的老国画家马晋先生就是扎糊绘放风筝的高手。

至于专业制作风筝的民间艺人，北京也有几户世家。已故金福中老先生和他的妹妹金淑琴（现年八十三岁，是位老小姐，人们都尊称她“金大姑”），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朋友郭敏的后人。金氏兄妹是满族，在辛亥革命以后自食其力，便把昔日酷爱的风筝艺术，当作了终身职业。五十年代，中法合拍的儿童故事影片《风筝》中的“孙悟空”形象就是他们兄妹合作的作品。金氏风筝的特点是造型雄伟，画功粗犷，飞翔最能钻高。代表作是《黑锅底》、《瘦沙燕》。北京风筝世家还有“风筝哈”，这是我从童年便听说的：哈家的风筝曾在一九一五年巴拿马赛会上得过奖。作品特点是骨架精巧，画工严谨，绚丽多彩，观赏价值较高。不久前，哈魁明先生曾应邀去法国讲学并传授技艺，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

风筝的故乡是中国。早在春秋时代墨翟所造能飞三日的木鸢就是风筝的始祖。不过据分析那可能属于在特定的条件下滑翔的成绩，与风筝有定向、能放能收不同。民间传说，韩信发明风筝，用于军事载人放飞，侦察敌情，涣散军心，是令人可信的。到了五代，李邺在宫中制放纸鸢游戏消遣，又是风筝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过去放风筝有季节局限，早已打破了。风筝爱好者通过实践，不论风和日丽的春季，或者寒风凛冽的冬日，都能随心所欲驾驭风筝适应风向风力，扶摇直上青天。

今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四季都有五彩缤纷的风筝翱翔，象征着伟大的祖国春常在。

（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北京冬天掠影

王 德

我在北京已经度过三十二个冬天了。刚来北京那几年，住在东城一个名为“冰窖”的小胡同里。那些年冬天是很冷的，而且常下雪。在雪后的夜里，万籁俱寂。偶而能听到走街串巷卖“心里美”萝卜的悠长的叫卖声：“买萝卜哟，赛过梨……”

如今和老北京们聊天，都说这些年气候变了，冬天不冷，雪也下得少了。确实，旧北京那种啼饥号寒、“倒卧”横街的惨象早已绝了迹，衣食饱暖似乎也就不觉得冷了。入冬，天还不太冷，四合院里的住户们早早就生起了煤炉，工厂、机关、学校和宿舍的暖气也在十一月中旬就供热了。国家规定，烧煤炉取暖的，每个职工一冬发十六元煤火费，用暖气的免费供应。所以即使到了隆冬季节，外边滴水成冰，在屋里身上穿件厚毛衣也就过得去了。外出时穿上棉袄、大衣或者时髦的太空服什么的，也并不觉得寒酷。

然而，冬天的干燥，却令人苦恼。北京冬天常刮西北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伯利亚寒流”。五、六级大风把天空中的水气吹得干干净净，总是万里无云的大晴天。偶尔刮上两天东南风，从海上带来一些湿气，才会下上一场雪。这几年尤其难得下雪，真是冬雪“贵如油”了。所以，一到冬天，人们总盼望多下几场雪，以滋润一下这干燥的空气。另外一方面，是“瑞雪兆丰

年”的期望。

冬天的雪，给北京人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一旦下了雪，男女老少都高兴。孩子们堆雪人、抛雪球，小手冻得通红。青年人、老年人在雪地里跑步、打太极拳，或者登上城里最高处景山去浏览古城雪景，或者到中山公园的兰室去赏花，还有许多人涌到北海、什刹海、颐和园去溜冰。提起溜冰，讲两段古罢。

据清朝的野史记载，每到腊月隆冬季节，八旗兵都要去太液池（今北海）表演“冰嬉”——掷冰球、射冰球，皇帝还要亲自坐在冰床（爬犁）上率领文武百官来检阅，对比赛优胜者还要颁赏。

到了清光绪年间，宫廷还组织“冰鞋处”表演滑冰。其中有个叫吴桐轩的，把自幼学得的武术结合到滑冰技术里，常在太液池表演，深得西太后赏识。一九四七年这位老人因当工役遭裁汰不服，与人争斗而被拘押，终因急病交加瘐死狱中，他的冰上绝技也就随之失传了。

现在滑冰已成为北京人在冬天的一种群众性体育活动。

北京冬天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些钓鱼瘾特别大的人，大冷天在冰面凿个洞，顶风冒雪下杆垂钓，自得其乐。也有更不怕冷的人，干脆脱光了衣服，跳到冰水里游泳。这就是近几年兴起的冬泳活动。还有一件时兴的新鲜事儿，老头子和青少年一起参加春节环城赛跑。

当然，冬天冰天雪地也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麻烦。下雪天路滑，行车速度慢，上早班的人要比往常起得更早，以免迟到。骑自行车要顶风冒雪，那滋味很不好受。乘公共汽车也更显得拥挤。而且由于路滑，常常有人跌伤或发生车祸。

北京人在大冷天也喜欢吃些带有“冰”、“雪”字儿的食品，例如冰糖葫芦、冰棍、雪糕之类。北京特产的冰冻柿子，更是妙不可言。那是远郊山区出产的一种大而扁型的柿子，深秋成

熟，收摘下来放在室外冰冻。人们买回家来待它融化，用嘴去吮吸里面粘稠、甘甜又冰凉的果肉，另有一番风味。北京人管它叫“喝了蜜”，真是恰如其分！

北京的冬天是美好的，北京人的冬季生活也是满有趣的。

（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水乡甪直

王庆恩

甪直镇在江苏省吴县和昆山县交界处。全镇五千人口，面积一平方公里。它北倚吴淞江，西靠甫里塘，四周湖荡星罗棋布，有岛屿式江南水乡小镇之称。

水乡河多桥也多。“甪直”这个名子，就是指的六条小河穿镇流过的意思。相传镇上过去曾有小桥七十二座，现在仍然有五十多座。

这些桥，大多年代古老，造型小巧玲珑。其中有宋代（公元960—1279年）建的石桥一座，明代（公元1368—1644年）建的十一座，清代（公元1644—1911年）建的十七座。有的桥，每块桥面石上都刻有图案，桥洞两侧还有石刻对联。有一座明代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建的东美桥，半个桥拱露出水面，半个藏在水下，这是我国桥梁史上罕见的全圆型拱桥。

站在这些桥头向两边望去，沿河是热闹的埠头和乌瓦粉墙的房屋。河埠头就是停靠小木船的石头台阶。有的人家后门也有石级，主要用于下河洗菜、浣衣。

街坊道路为江南水乡特有的一河两路格局，一般为前街后河。这里的街道只有二、三米宽，卵石铺的路面，两厢是一间间带阁楼的古老店铺。由于甪直地处鱼米之乡，加上小镇水路四通八达，自然形成为物资集散中心。现在全镇三条主要街道上共有一

百三十三家国营、集体和个体经营的商店，从日用百货、南北杂货、蔬菜门市到理发、照相、饭店、茶馆等应有尽有。根据当地居民赶早集的习惯，这些商店每天凌晨三时半即开门营业。其时，商店里灯火辉煌，顾客盈门，店门外的街道两旁是来自四乡的农民摆设的一个接一个的菜摊、货担，小河里则挤满了送货、乘人的小船。据说，有的菜贩乘船来自上海郊区，有的来自更远的浙江、安徽。

与这种热闹的街市截然相反的是那些幽静可爱的小巷。有的小巷会引你来到镇梢，周围的景物又会使你想起“杨柳巷陌”这几个美丽的字眼。

角直镇历史悠久。据地方志记载，春秋时期，这里是吴王夫差的别宫所在地；后来历代有不少文人逸士在这里隐居并躬耕唱和，如唐代的陆龟蒙、皮日休等。镇上最珍贵的名胜古迹是保圣寺。这座江南名刹建于梁代天监二年（公元503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普通的水乡小镇一度引起蔡元培、顾颉刚等文化界人士的注意，当时，他们或者从苏州乘坐乌篷木船来到这个小镇探幽访胜，或者在镇上定居。我国著名作家叶圣陶早年曾在这里当过小学教师，他许多作品中的景物描写都取材于这个小镇，反映了当地的风俗民情。

角直镇附近农副水产资源十分丰富，地方经济很有特色。传统的手工业有米、面加工、榨油、酱坊、铁木竹盆橹作，还有珠宝、刺绣、织席、造纸、纺织等。酱制品角直萝卜香脆可口，行销全国。

（一九八四年第十二期）

香山红叶

平　林

正像春天到中山公园看牡丹，秋天，北京的人们喜欢到西郊的香山看红叶。

春天，从江南到塞北，次第花开；而秋天则由北及南，霜林点染着大地。

北京人赞赏香山的红叶，苏州人夸奖天平山的秋林，在辽阔的田野上，江枫似醉，乌桕铄金，和成熟了的庄稼，交织成一片如锦如绣的奇景。

“霜叶红于二月花”，从古到今，吟诵红叶的诗篇何止千数，但人们往往想起唐代诗人杜牧这佳句来。当你走在香山道上，那明净的蓝天底下，层林尽染，沿着上山的小径走去，朱红、浅绛、金黄，一丛丛艳丽的色泽扑面而来，真似身入花丛。

关于红叶，还有动人的故事。据说，唐时有一个宫女在深宫中看见红叶飘落，就在一片红叶上题了一首诗，放入沟中，红叶随水流出宫外，被一个应试的青年人于祐拾得。他受到诗词的感动，也将另一片红叶写上诗句，从沟的上游，放流入宫去，而恰恰又为那个宫女捡到。过了几年，宫女出宫，由亲戚介绍，和一个士人结婚，而那人却是于祐。婚后双方发现了彼此珍藏的红叶，从此情爱更笃。

这个故事距今已一千多年了，旧时代少女们的哀愁已像流水

般一去不复返。今天在那灿若云霞的红树底下喁喁低语的青年男女们，当然不用在红叶上题诗来寄托他们的情愫。但是那络绎不绝的游人仍然那么细心地捡上几片红叶，带回城去。

（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竹　楼

林斤澜

西南边地多山，山上到处是竹子。

筒裙曳地的傣家姑娘，上河汲水去，肩上颤颤的，是一根竹子扁担，挑着一对两对竹筒。赶街的时候，地上摆得满天星一般的货物，全都装在圆的方的、编起来的砍出来的竹篓子、竹罐子、竹筐子、竹盒子里边。卖水果的簸箩片上、卖熟食的煎米糕上边，也插着一根细细的竹笺。无论群情奋发，手舞足蹈的场面，或是两情相对，难舍难分的时候，竹子就出来说话了。箫、笛、笙、簧，用最好听的声音，表抒出最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情感。就是这样，竹子和傣家人生活结了不解之缘。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那大方轻巧，实用美丽的竹楼。

高树矮树，宽叶窄叶，霸王鞭、仙人掌、缨丹花、含羞草，从地面到半空中，盛满了绿色。如果说这好比满登登的一湖水，那轻巧的竹楼，就是湖面上的一叶扁舟。可是坐在荫凉的竹楼里边，又仿佛这一叶扁舟，不是飘在湖面上，倒像潜入湖水里边了。

窄窄的楼梯边上，清晨，一声声舂米的声音，雪白油亮的大米，紫微微的糯米，在舂臼里苏苏地翻身。黄昏，方方的凉台上，姑娘手里的纺车，呜呜地旋转，旋转，转个不断线。在所有这些声音里边，竹楼都微微地发颤，快活得颤颤不住。

竹楼中间，都有一个火塘。老人家爱在火塘边上，席地而坐。顺手煮茶，就近点烟。用不着床，也不用椅子板凳，坐倦了，竹席上一歪一卧。这火塘边，也是个待客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可以听见说，不过十多年前，蚊子扑面，仿佛撒过来一把糠。疟疾死绝了一个寨子，逃光了一个坝子。还会听见说，有钱有势人家的一个小孩子，叫黄蜂蛰了一刺，硬说是哪穷人家出了“琵琶鬼”，钻到小孩子身体里边去了，只许人家穿一身衣服，给撵到荒山野林子里去。在这里，随时听得见，用竹子一般爽直、朴实、明朗的语言，感谢党和毛主席。不会养猪的地方，养了猪。不习惯施肥的地方，因为施了肥，粮食产多了，办起了合作社，有了自己民族的学校。谁家小姑娘，当上了医生。哪个寨子的小伙子，竟开起拖拉机来了。

夜深人静，火塘暗红，仰卧在颤颤的竹楼之上，清楚听见外边水田里，一声两声蛙鸣。可是这是冬月呀，多么丰满肥盛的地方。那铜铃一般，银笛一般，则是穿户走寨的青年男女，长短呼应的笑声，多么快乐康健的人们呀。

（一九六三年第六期）

东北的冬天

骆宾基

东北的冬天，是冰雪的世界，到处是白茫茫的雪原，冻冰的河道。夜里没有月光，却几乎什么都看得见。那乌黑乌黑一片是什么呢？那是东北有名的樟子松林，还有脱光了叶子的树木，在大自然中袒露着赤条条的枝柯，又苗条，又有风姿。那些披着雪的枝柯，半黑半白，仿佛出自名家的木刻版画一样。而黎明的阳光，是那么朦胧，围裹在轻纱里似的，只见白白的一团儿圆晕，给人一种月夜般的感觉。

落鹅毛大雪的时候，是一点风儿也没有的天气。那雪就这样静悄悄的落着，静悄悄的落着，静得可以清楚的听到树林间的坠雪声，或是给雪压断的枯枝落地声。

这时候，冻结的河流，埋在雪底下了，道路也埋在雪底下了。这鹅毛大雪从黄昏落到天明，又从天明落到黄昏。屋顶都压在雪底下了，大草垛也覆盖在雪底下了。墙垣、篱笆上都挂满了一层厚厚的雪，整个村庄，仿佛在雪原上消逝了。在雪原上赶路的人，就得依靠雪里露头的成排的草丛，辨认道路，依靠远处的炊烟，辨认村庄或是家屋的方向。突然听见脚底下一声公鸡打午鸣的叫声，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在高崖子上，崖底下就是村庄，那原先看作是高岗的，却是埋在雪下面的大草垛。进村子里看看吧，不管走到哪一家去，屋子里都是温暖如春，热烘烘的。妇女在暖

炕上扒着线麻，猫儿在窗台上弯着身子正舒适地打着鼾声。男人呢？原来不是上山打狍子去啦，就是赶着雪橇到林区拉木材去了。

"好大的雪呀！"如果你这么说。

"瑞雪兆丰年呀！这雪落得好呀！"东北的农家，对雪是怀着这样一种亲切的感情。

大雪之后，往往是风和日暖的天气，太阳露面，就是三月般的艳阳天。街道上积雪消融，闪耀着愉快的光辉，家家的屋檐底下滴着水，窗玻璃上的霜花也融解了，挂着闪光的水珠儿，这是往地里运肥的好机会。猪圈啦，马棚啦，到处是起肥装车的男女。要是积的粪肥冬天运不出去，开春融雪一化，不仅道路全是泥泞，不好走，而且春耕还需要牲口，哪能拴那么些车去拉肥。

孩子们呢，在雪后的艳阳天，像遇到节日一般，成群结伙到河沟里去滑冰了。一个一个的小脸，冻的又红润，又鲜艳，越冷越是精神奋发，他们讲究在冰道上滑得麻俐，滑得稳，有时一条腿滑，另外一条腿儿一抬一落，这叫"老头儿铡草"。在滑行中转着身子，就叫"老鹞子翻身"。如果，这时候有谁摘下帽子来，那么他头上的热气就蒸腾如烟，哪里还感到冷呀！

要是有人在河崖底下发现野鸡的足迹留在雪上了，那么说明天亮时候，它还在这里栖息过，因为天亮时候雪才停止。顺着踪迹追寻吧！一声吆喊，那野鸡就扑楞楞的从柳茅子中飞起来了，开头它能一气飞出半里路，二次就只能飞出二、三十步远了，再追，它就离不开地面了，连飞带跑，最后，只好把头插到雪里去啦！因为大雪一连落了几天几夜，什么草种子啦，榛子啦，都埋在雪底下了，要不是饥饿，它哪有胆量敢飞到村庄附近来，从草垛上找谷粒吃呢！

大雪之后，是猎人最活跃的日子。在白茫茫的雪原上，哪里的榛树林子、柳茅子丛中有野生物活动，雪地上总要留下踪迹。要是发现了狐狸从这里走过的足迹，那么往往它还要从原路上走

回来。在它以为这是最安全的通道，却不知它这种小心翼翼的活动规律，已为猎人所掌握，在它归来的路上早已下了套子或者带着诱饵物的铁夹子了。如果这是只紫貂的足迹，那么顺着这条踪迹，就可以找到它所栖息的岩穴了。紫貂的机灵，又不同于狐狸，为了混淆它所留下的足迹，从这个岩穴窜进来，它又从那个穴口跑出去，绕过几圈子再回来，但不管雪地上的踪迹多么乱，还是瞒不过猎人的眼睛。于是，墙般高的立网，把这岩石圈起来了。黄昏圈起来，有时要守候到天亮，往往是三五人轮班值更，只要听到网杆上的铃铛一阵响，就奔向响处，扑倒立网，那狡悍的紫貂就只能在网底下挣扎了。冬天夜晚，尽管是那么寒冷，捕貂人的眉毛挂着白霜，胡子挂着冰溜子，但他们的脸上却现出春日般的笑容来，到底没有白挨一宵冻呀！

雪后，林业工人，项后搭着一根带子，两端吊着无指手套，纷纷出动啦！伐木场的木材要归楞，拖到楞场去集中。运木材的拖拉机轰轰的响着，河道上的冰面，压的咔巴咔巴直响。因为河流冻结了，冰面上可以走雪撬，山坡上的积雪已经开出冰道，这是林业运输的黄金季节。在楞场上，人们说话的声息，形成一道道白烟般的雾气，一点风儿也没有，雪后多么好的天气呀！这时候，所有的脱光叶子的树木，都挂着霜，仿佛一些巨大的白珊瑚，晶莹闪光，东北人叫做“树挂”。哪怕是一棵有生命的枯草呢，也挂着霜，如果一点霜也不挂，那就说明这是一株失掉生命的枯树了。

在东北的城市里，冬天的早晨，那马路两旁的树木，一色都是这样的挂着霜须的树挂，构成了一个银色的世界，美得出奇。

东北是祖国有名的重工业基地，不管是哪个工厂，也不管是办公大楼，还是厂房车间、食堂、托儿所，冬天，窗户都关着，双层窗户中间，都塞了五寸高的锯末子，用来吸收雪水，门道外头，都安装上一个岗楼式的风门，不仅是为了挡住风口，还为了工

人们进屋之前，把两只棉靴底上的雪留下来。一进走道门，就听见暖气管的嘶嘶叫声了，室内室外，简直是两个世界。

东北又是祖国的谷仓，冬天，正是向国库运输公粮的日子。走冰道的马匹都挂着掌，带着项铃和串铃，不管是在结冰的河道上，还是山道上，车队那些牲口奔跑的铃铛声，汇集在一起，有时在二三里外就听到了。白天在店里打尖，夜间还得拉黑走。这时候，汗水在马匹胁下也凝结成冰须子，仿佛一些水晶坠子一般，珰琅作响。赶车的人呢，眼睫毛上也挂着白霜了，大衣领子下，同样搭着一根带子，吊着两只无指手套，要干点什么，就得脱出手来，工夫久啦，绳子解不开，就得搓搓两手，在嘴巴底下呵呵热气，要是手指还僵，就得捧把雪，搓着，两手磨擦着，还得说："吓！好烫手呀！简直是块火炭！"果然，一会儿两手就发热啦！

东北的冬天，尽管寒冷，东北人民在劳动中却生活得豪迈，顽强，而且有风趣。他们不说，"今天好冷！"他们却说："今天冷得够劲儿！"要是碰到雪后的艳阳天，简直是当作春三月过呢！

（一九六四年第二期）

一颗永远燃烧着的心

——记巴金

罗 荪

一九七九年五月，在巴黎的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巴金热”。法国作家们真挚而热情地欢迎巴金，在各种场合的祝酒词中表达出对他的尊敬，他们称颂巴金为当代文学大师。

作为欧洲文化窗口的巴黎，过去对中国现代文学介绍很少。近年来连续翻译出版了巴金的三部长篇小说：《家》、《寒夜》和《憩园》，受到了法国文学界和读者的热情赞扬，并开始使法国的知识界“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巴金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是“展示了封建家族灭亡的历史画卷”，是“被压迫者和正义的捍卫者”。一时间，在法国各地大书店的橱窗里，将巴金的三个法译本陈列在显著的地位。

早在半个世纪前，即一九二七年到二八年，巴金曾在巴黎学习过，当时他住在拉丁区一家古老的小旅馆的五层楼上。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在这人地生疏的巴黎，过着寂寞忧郁的生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巴黎圣母院悲哀的钟声，沉重地锤打在他稚弱而孤独的心上。此时此地常常使他产生一种感情冲动，觉得“我有感情必须发泻，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从而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的道路，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

他多次在法国朋友的集会上，表示了真挚的感情。他说：我这次重访巴黎，是为了表示对法国老师的感谢。他说：我在巴黎学会了写小说，我从左拉、雨果的身上学到了正义，懂得了爱和憎。他对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作了这样的评价："《灭亡》不是一本革命的书，但它是一本诚实的作品。……它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

"诚实"正是贯串了他几十年来写书的"灵魂"，他的书都是写他自己所见到的、认识到的和感受到的。

法国朋友关切地询问巴金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所遭受的折磨和灾难。他是这样讲的："他们（指"四人帮"）用种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对付我，处心积虑要使我以后永远不能再拿笔"。张春桥公开叫嚷："象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他们妄图把中国变成一个"无声的中国"。

历史的辩证法并没有按照反动派的意志行事，"四人帮"这个毒瘤终于被人民给切除了。

"永远不能再拿"的笔又回到了巴金的手里，他悄悄地在翻译着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说："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黑暗里行路，我象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从一九七三年起他就坚持不懈地从事翻译这部一百几十万字的巨著，表现了译者的坚强性格。

当重新拿起笔来的时候，他继续履行着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写他内心要说的话。虽然已经是七十五岁高龄了，但他表示还要至少写上五年。除了坚持译完这部巨著外，他还要完成两部长篇小说，写他所熟悉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同时继续写他的《随想录》，第一集三十篇即将在香港出版，并且准备每年出一集。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起，五十多年来，除了

“四人帮”横行时期之外，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

一九二七到一九四六年，这二十年可以说是他写作的旺盛时期，他写了二十部中长篇小说，十几部短篇小说以及散文和游记等，同时，他还翻译了十几部世界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十四卷《巴金文集》，可以说是他在解放前二十年创作成就的结集。

巴金说《灭亡》是“一本诚实的书”，我说这十四卷文集，也是一部诚实的书，因为在这部书里倾泻着他的真实的感情，倾泻着他对周围世界的爱和憎，他的笔并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在“诚实”，对客观事物怎样认识的，就怎样写出来，既不矫揉造作，更不作违心之论。

巴金说他的书不是革命的书，但是不少人读了他的书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我曾亲自听到一位元帅就是这样对他讲的。一部作品影响读者投身革命，这是对书的最好评价。

他说：“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他还在《家》的后记里写过：“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

他于一九〇四年出生在四川的封建地主的大家庭里，他在这个大家庭中度过了最初十九年的岁月。他对自己的书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实在是太熟悉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他写《家》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对于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这时才有机会倾吐出来。他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信念鼓舞着我写出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出这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正如屠格涅夫评论赫尔岑的书所说的：“它象一团火似的在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巴金的心中也有着一股扑不灭的火，

不断在他心中燃烧，也在燃烧着别人。

全国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这位老作家。他怀着无限的激情，迎接一个崭新的时代。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住地在心里说：我要写，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民，我要歌颂伟大的领袖"。他说："我用那支写惯痛苦和黑暗的秃笔为新社会服务。我就这样地继续写了十七年"。

为了使他这支笔能为新社会服务，他曾不断地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革命老根据地去熟悉他所不熟悉的生活，特别是他曾两次到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生活了一年光景。他说："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的大家庭，精神上受到的冲击当然很大，然而同时我感到温暖，受到教育。指战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这正是他的努力达到了这一点，使他"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的境"，"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那个革命家庭吸引了我环心"。这正是他写出了《团圆》、《坚强战士》和《杨林同志》的源泉。

他并没有虚度这十七年，他那支勤奋的笔，始终在为新的时代服务。他说："十七年中间我的笔底下再没有忧郁、痛苦的调子了；不管我那些文章怎样软弱无力，但字里行间也或多或少地闪耀着人民的胜利和欢乐"。

正当他不断地努力熟悉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时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恶浪，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专政。巴金和其他作家一样，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包括写作的权利。

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终于垮了台。巴金又拿起那支勤奋的笔，开始了他的新的战斗历程。

"我的笔绝不会放下"。这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的坚强的誓

言。他的壮志未已，充满信心地要用他的笔，写下他所熟悉的时代、生活和人，为了美好的未来。

他在《谈<家>》的文章最后是这样写的：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对我来说，它永远是鼓舞的源泉。”

（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不倦的战士

——记茅盾同志

于　逢

茅盾同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是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一八九六年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一个姓沈的大家庭，原名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从一九二七年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幻灭》开始使用的笔名；此外他还使用过近百个笔名、如郎损、玄珠、M·D、止敬、蒲牢、东方未明等，写作政论、评论、杂文、散文和特写。他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开始了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六十多年来，以其辛勤的劳动和巨大的成就，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推崇和尊敬。人们每当提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总是不禁联想到茅盾同志的名字。

茅盾同志说过：“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而现在，并且同时一定是不倦的战士。他的作品，不仅反应了现实，而且一贯着他那时代的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他提出了解答。”不错，茅盾自己就是这样一位“不倦的战士”。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茅盾文集》十大卷，但远没有包括他所写的全部文章。茅盾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个中国古文学家，选注过《淮南子》，编过《楚辞选读》，写过《中国神话研究A

BC》；他又是个翻译家，很早就翻译了俄国和洲欧弱小民族的进步文学，介绍给中国人民；他也是个文学研究家和评论家，一九二五年就写了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了诸种文艺现象。他的书法娟秀刚劲，众所赞誉；他为教育文学青年所写论及艺术规律和美学的大量书信，至今未及收集整理。这都是中国革命文学的财富。当然，他所作最大的贡献，是文学创作，是中长篇小说。中国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的社会斗争，几乎都可以从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找到了真实而生动的反映。王若飞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专文祝贺他五十寿辰说："茅盾先生的最大成功之处，正是他的创作反映了中国大时代的动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创作的中心内容，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是相联系着的。"事实的确如此。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充满着惊涛骇浪和风云变幻的历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写下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总名为《蚀》，反映了大革命时代的现实斗争和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向往光明而又苦闷彷徨的矛盾心情。接着是长篇小说《虹》，描写一个女性曲折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展现了从"五四"到"五卅"的历史画卷。从三十年代起，茅盾参加并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开始了自己的创作黄金时期。以中篇小说《路》和《三人行》为开端，他写了革命现实主义杰作《子夜》；之后又写了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以及中篇小说《林家铺子》等。这一系列的作品，刻划了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变化。特别是长篇小说《子夜》，它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从民族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封建地主、国民党军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市民、工贼、到工人、农民、革命者等，通过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当时的城市和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并批判了当时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它揭露的社会问题如此深

刻，展开的时代画面如此广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少有的，毋怪一出版就震动了全国文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茅盾仍然以战斗的笔锋，剖析中国社会的矛盾。十年之间，他写了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和《腐蚀》，以及剧本《清明前后》等。《腐蚀》在香港连载时就引起了轰动，《清明前后》在重庆上演没几天就遭到反动当局禁止，因为它们控诉了当时国民党封建法西斯统治的滔天罪行，揭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凶狠面目。这些文学创作，充分表现了茅盾作为战士的勇敢精神，和他作为艺术家的高超技巧。

为什么茅盾的作品能够始终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呢？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九一六年，二十岁的沈德鸿来到上海，正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前后。他主编和革新了《小说月报》，与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组织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参加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和《新青年》的撰稿人。“五卅”反帝运动爆发，他走上街头呼号；北伐战争前夕，他来到革命中心广州，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导下，编辑《政治周报》。他经历了大革命的风雷震荡，三十年代又投入了如火如荼的社会斗争。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十二年间，他风尘仆仆，南来北往，跑遍了国民党统治区，深入边疆腹地。他生活上历尽了艰难困苦，心灵里注满了人民的血和泪。他从“冒险家的乐园”来到了珠江口外的小海岛，又从天山脚下的戈壁滩奔往巍峨的黄土高原。他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歌颂党和歌颂人民，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女留在了革命根据地，只身回到国统区。以后他到处奔波，为的是开辟走向光明的道路。他从鹰犬满布的重庆来到香港，又从硝烟漫天的香港回到阴冷的桂林山城。他不去欣赏漓江的秀丽山水，却在斗室里对着昏暗的桐油灯，继续写他的烽火诗篇。抗战胜利的鞭炮声

没有使他过份喜悦，在艰难的解放战争岁月里，仍然拿手着笔进行战斗。

茅盾同志健康原来不很好，眼睛有病，视力较差，但他既是刻苦勤奋的劳动者，又是满腔热忱的园丁。他主办种种文学刊物，总是给新人提供篇幅。他和文艺青年一直有广泛的接触。几万字以至几十万字的原稿送到他手上，他总是从头到尾地认真阅读，提出意见，或介绍出版，或为文推荐。全国解放以后，他肩负着繁重的国务工作和文艺领导工作，仍然长年不懈地为培养青年作者而尽力，《鼓吹集》、《鼓吹续集》和《夜读偶记》、《读书杂记》等，就是为此而写的。今天我们看到，不是有一大批青年作家都曾在他具体的帮助和扶持下才成长起来的吗？

建国以来，茅盾同志是历届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历届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他长期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他曾多次率领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在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期间，他以沉默作反抗，坚持了革命气节。现在，他已是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了，但勤奋仍旧，斗志不减，正在奋笔疾书文学回忆录。他的名著《子夜》至今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十多种外国文字，《茅盾短篇小说集》和《腐蚀》也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去，日本还出了不少研究茅盾的书刊；美、法等国近来也出了类此的书刊。一个革命者，只要为祖国人民而战斗不息，他也必将属于世界人民。

（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记老作家丁玲

杨桂欣

举世瞩目，丁玲是中国革命文坛上一位杰出的作家。半个多世纪来，她始终为人民所系念。一九七九年，当她以七十五岁高龄，捧献新作重现于文坛时，人们又惊又喜，慨叹这位优秀的女作家实在是一位既经得起苦难、更经得起委屈的坚强的人！

众所周知，丁玲的苦难和委屈，是中国人民和中国老一代革命者，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妇女的苦难和委屈的一个缩影。她于一九〇四年生在湖南省临澧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四岁丧父，跟随坚持走自立道路的寡母在常德长大。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洪波涌到了常德，丁玲和大同学、好朋友王剑虹、王一知等人，积极投入了革命，她毅然剪掉辫子，参加辩论会，慷慨激昂地为如何免当亡国奴、妇女怎样求解放等大课题陈词。二王主办贫民夜校，她充任了最热情的小教员。常德偏僻，文化落后，丁玲热切地要求“飞”到广阔的世界去。这一年，她在母亲的支持下，到达长沙，进入周南女子中学。在这里，她读了很多新文学作品和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的《最后一课》有力地打动了她年轻的心，使她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她学着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湘江日报》发表过她的习作。但是，丁玲仍然要“飞”。一九二一年，随王剑虹和王一知到达上海，进入共产党人主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同陈

独秀、李达和瞿秋白等人直接交往。不过，早期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尚未吸引住这位十七岁的少女。封建主义加半殖民地的上海，使丁玲深感失望。于是，她又“飞”到了北京。她渴望到青年们心目中的圣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去听大师们讲课，但北京并不给她温暖。她自己读书并学习绘画，过着艰难窘迫，近似流浪儿的生活。一九二四年，她在北京结识了学徒出身的青年诗人胡也频，彼此深情地热爱着。

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失败了。丁玲回顾说：“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于是我写小说了。”从此，丁玲成为一个作家，她的小说“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莎菲女士的日记》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披露了年轻女作家的艺术天才，是她的成名之作。一九二八年，她和胡也频到达上海，加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群。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在左联存在的六、七年中，丁玲曾担任它的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又曾担任它的党团书记。一九三一年初，蒋介石秘密枪杀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五作家，使丁玲陷入极大的悲愤之中。她把未满百日的男孩送到湖南，寡母支持她挺直腰杆继续革命。回到上海以后，她以当时全国十六个省的大水灾为背景，以家乡的一群贫苦农民为主人公，写成中篇小说《水》，深情地描写了中国农民无穷无尽的灾难和他们的觉醒、团结、抗争。《水》标志着丁玲创作的新进展。一九三二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正当她创作自传性长篇小说《母亲》尚未完稿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秘密绑架她，囚禁她，明令查封和禁售她的全部作品。

一九三六年秋天，丁玲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的囚禁，立即“飞”向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热烈地欢迎她。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她当过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领导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编过《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丁玲追忆说："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最大的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走过来的这一条路，不是容易的，我以为凡是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路的崎岖和平坦的。"在这条道路上，丁玲的足迹遍及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广大乡村，她的心始终和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心一起跳动。她不但努力写作，而且登台唱歌、演戏。在这个时期，她的短篇小说集有《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后来，作家自己从这两个集子中精选了五篇，编成《延安集》）。她这时候写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一直为人们所争论；在肯定其为革命的杂文的前提下，由历史去继续检验它的是非功过，是正常的现象。而她反映一个村子土改运动全过程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中国新文学树起了一座坚实的丰碑，则是确凿的，它荣获过斯大林文学奖金，被译印成许多种外国文本。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领导中央文学研究所，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培养新生力量。她当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还是全国妇联的理事。作为中国作家和中国妇女的一名代表，丁玲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积极地活动着。事务缠身，但她仍然沉缅于创作。新中国的明媚春光，使她欣喜，心头充满希望，她决心用多情的笔墨描画和歌颂自己人民的新生活和新斗争。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丁玲从一九五五年起便遭受厄运，先被指为"反党集团"头目，后又戴上"右派"和"叛徒"的帽子，一九五八年被发落到黑龙江垦区，其全部作品（近一百

五十万字）又遭到封禁。“四害”横行之日，连《桑干河上》的版型也被明令毁弃！一九七〇年，林彪和江青之流把丁玲和她的战友、丈夫陈明（共产党员、电影剧作家）关进监狱，囚禁了五年多。在巨大的委屈中，丁玲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光明的处境里开辟出一条光明的路来”！开头八年，在王震将军和农场干部的妥善安排下，她力所能及地劳动着，喂猪、喂鸡，当扫盲委员、夜校老师，编写墙报、黑板报、做家属工作……全心全意，兢兢业业，很快地获得了身边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创作没有发表的希望，她却醉心于创作，相信死后总有交给人民的机会。十年浩劫乍起之时，她的十几万字小说稿和几十万字生活笔记，统统毁于一旦。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损害了她的健康。但是，在浩劫中，她更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的人民是可爱的，他们往往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一下子就闪现出人的黄金般的本色。这使她看到了光明，心中牢牢地保存着对于人民的信心和希望，实现了同苦难和战斗的人民紧密而完美的结合。在狱中，丁玲顽强地锻炼身体，用自制的“蓝球”——破毛巾包扎着卫生纸，往墙上掷去，掉下来，接住，再掉下来，再接住！囚室孤居，她抓住这机会通读了马列的主要著作，补上了有生以来未能通读这些经典的课程。

一九七五年，丁玲和陈明得到“无罪开释”，定居于山西省农村。次年年初，周总理逝世和邓小平同志被贬，使丁玲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她甚至失望起来，觉得自己在有生之年不能以人民的身份去为人民服务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唤醒了她，拯救了她，她又动手创作了，准备用自己的新作同人民一起迎接新的春天。一九七九年，在她回到首都几个月以后，党中央批准为她平反，她幸福地回到了母亲——党的怀抱。好心的人们劝她不必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了，更不要去干予文坛的事务，“坐在家里养老吧”，或者，“就写你自己的一生吧”。丁玲回

答说："写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的，也可以写，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还是写活在我脑子里的那些老百姓吧。"今年三月，医生割除了她的乳腺癌。五月间，右臂的刀口虽已愈合，但尚未消肿，丁玲却奋笔疾书起来。她希望自己现在是六十六岁，然而光阴无情，所以她说："我将奋起我最后的余力，为党、为人民、为人类的未来，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课题：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孜孜不倦地写作。"

（一九八〇年第十期）

我所知道的三联书店

萨空了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1932年——1982年），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本世纪三十年代，这三家书店先后创立。我是1935年秋由北京到上海办《立报》，才逐渐结识了三书店的许多同志，并在此后的艰苦岁月中曾与他们同舟共济。

生活书店由邹韬奋（1895——1944年）创立。周恩来总理在他逝世五周年时题词说："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邹韬奋是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中摆脱出来转到无产阶级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1921年，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五年后，接办《生活》周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抗日烽火中觉醒，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因《生活》周刊每一期间隔太久，他和戈公振、杜重远、胡愈之、李公朴等集资拟办《生活日报》，但遭国民党当局的反对，甚至连当时已发行十五万五千份的《生活》周刊也被检查扣压，1933年底被密令封闭。这年7月，邹韬奋在白色恐怖下，被迫出国。

1934年2月，《新生》周刊继《生活》之后问世，由杜重远主编，胡愈之、艾寒松负责实际编辑工作；至1935年5月，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反动当局无理勒令查禁，杜重远被捕入

狱。

1935年8月，邹韬奋考察欧美后回国。11月创刊《大众生活》。“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全力声援。12月1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版了十六期，又遭封闭。3月，又创办《永生》，继续宣传抗日救国。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于上海，他被选为执行委员。7月他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的电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22日深夜，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袖在上海被捕，后移到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直到1937年7月才获释放。

生活书店最初为生活周刊社，成立于1932年7月1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迫，朝不保夕。邹韬奋与胡愈之决定在内部组织一个生活合作出版社，宗旨是为进步事业努力，确定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赢利归全体等三条原则。193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社员大会，选出邹韬奋、杜重远、徐伯昕、王志莘、毕云程为理事，邹韬奋为理事会主席。生活书店出版周刊《生活》、《新生》等，也出过《文学》、《世界知识》、《太白》半月刊，还出版大量文学书籍和许多丛书，团结了大批作家。从1932年成立到1937年，生活书店由一种周刊发展到十种期刊，图书由几种到四百多种，就靠了这个集体力量，宣传了进步思想。

抗战爆发后，邹韬奋主编《抗战》，后和李公朴等编的《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成为抗日青年的指导性读物。同时，书店工作人员纷纷奔赴西北、华南、西南各大城市，筹设新店，一时生活书店遍及祖国大陆各地，香港以至新加坡也办起了生活书店。

读书出版社的创办人是李公朴（1900——1946年）、柳湜、艾思奇、夏征农、黄洛峰等，他们原在上海《申报》办读书指导部，后才独立。

新知书店的创办人是钱俊瑞、孙冶方、徐雪寒、姜君辰、张锡昌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一批人。1934年他们就出书《中国经济情报》周刊。1935年，创立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创办后都各自独立经营，到1948年10月才全面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并且一直继续到今天。半个世纪来，三联书店致力于社会进步，为广大民众谋利益，宣传真理，培养人才，发展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不老的艺术家盖叫天

吴祖光

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仗着他的一付好身手，一条杆棒，一柄单刀，在舞台上纵横驰骋了六十年。去年十一月度过他的七十花甲之辰。

六十年来无数的观众看过盖叫天的表演，他们的记忆里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盖叫天丁字步站在台口，他的神光焕发的眼睛，隆起的胸脯，像生铁浇成的难以撼动的脚跟，使你感到一切邪恶力量都会在这位威严凝重的英雄面前低下头来。

作为京剧武生，盖叫天达到了近代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他继承了先辈的传统，又大大加以发展。他塑造的英雄人物无论是武松、十一郎、任堂惠，都充溢着特殊的光彩。他把惊人的武功和人物性格紧密结合起来，精确地表现出这些古代英雄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

盖叫天在表演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揣摩、勤学苦练的结果。他忠于艺术，热爱艺术甚于生命。他在十七岁时就曾为演戏折断左臂，不等痊愈就登台。一九三四年他已经四十八岁了，在一次演出快终场时折断右腿，他用一条左腿亮相，坚持到闭幕才倒下来。他想的是"不能躺下，人死了可以，艺术丑了可不行。"当他的腿骨被庸医接反影响演戏时，他就自己把腿折断重医，腿好以后照常练功、演出。

盖叫天生来就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这位七十岁的老演员是那样诚恳、热情，像一泓清泉淙淙流淌。你跟他无论是谈戏、谈生活，都会被他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感情所陶醉。你会记起关于他生平的许多故事：在旧社会里，他曾不止一次地为了正义，为了不甘屈辱，为了路见不平，狠狠地打击过那些压迫人的坏人。你会不由得联想起他扮演的英雄武松的豪迈、热情、刚直不屈和见义勇为的性格。

今天，这位艺术家正以他无限的青春的力量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演戏，他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的演员，一切他能够出一把力量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政府在他七十岁生辰颁给他的荣誉奖状，代表了全国人民的祝贺的心愿。我们衷心地祝老人永远年轻，永远健康。

（一九五七年第二期）

京剧名丑萧长华

王誉之　钮　骠

八十高龄的萧长华老先生是我国京剧舞台上杰出的丑角演员，也是京剧教育界的元老。七十年前他就投师梨园名宿徐文波、宋万泰学戏，得到不少当代大师的教诲。后来他常常和名演员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合演，所演的方巾丑和袍带丑（统称文丑）最负盛名。在"审头刺汤"、"卖马"、"贵妃醉酒"等剧中，他和合演者配搭得严丝合缝，无懈可击。

丑角是观众喜爱的角色，它在我国戏曲中历史很久，公元七世纪的参军戏就和丑角有密切渊缘。在京戏中更几乎每一出戏都有丑角。萧长华老先生继承了我国丑角表演艺术的传统，特别善于细腻深刻地揣摩人物身份、个性和所处的环境，从而以现实的表演手法创造出有筋骨、有血肉的人物形象。他演的蒋干是个满身儒气、自作聪明的谋士，而不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傻瓜。他演的汤勤是一个奸险阴辣、恶毒龌龊的势利小人，但仍不失那种通文墨的风雅气态。他演的"连升店"店家是一个胸无点墨、趋炎附势的市侩，把店家那种前倨后恭的面孔刻画得淋漓尽致……七十年来，他扮演了一百多个角色，都各具特点，无一不精。他的表演技巧运用得既得心应手，又分寸适当，不温不火。因此，他饰的角色无不进入化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正是他一直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原因。

萧长华老先生在我国戏曲教育事业上也有很大功绩。早在一九〇四年，他就和叶春善合作主持“喜连成”科班（后改为“富连成”），担任总教师，除了教授小花脸外，还教授生、旦、净诸行各戏。他边演边教，辛勤不辍，四十年来培养的学生遍于全国，凡是有职业京剧团的地方，都有“富连成”的弟子。现在许多名演员如雷喜福、侯喜瑞、于连泉、马连良、马富禄、谭富英、裘盛戎、叶盛章、叶盛兰、袁世海等都是他的门墙桃李。

近年来，萧老先生除了和梅兰芳等合作演出外，还担任中国戏曲学校的教授和副校长，教学热情更胜过当年，每天都亲自到校上课。他已给学生们排演了“四进士”、“群英会”、“审头刺汤”等数十出优秀传统剧目，最近正在给学生们排演一出将要失传的老戏“取南郡”。

萧老先生舞台生活的一生给青年一代树立了为艺术事业献身的榜样，但他还时常谦逊地说：“我学艺一生，只不过是略窥门径而已，要继承和发扬我们祖先留下的优秀戏曲传统，还要大大地努力才行。”

（一九五七年第七期）

梅兰芳的新戏——穆桂英挂帅

许姬传

最近，梅兰芳先生在北京演出了《穆桂英挂帅》，这是梅先生二十年来的第一出新戏，也是目前我国戏剧界的一件新事。

解放十年来，梅先生不辞劳瘁，兴致勃勃地到全国各地为广大人民演出，虽然他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伟大的时代使他回复了青春，在舞台上显露出新的艺术光芒。

近年来我国各种戏曲，在百花齐放方针的指导下，群芳争艳、蓬勃发展。梅先生深感自己的戏曲艺术，有必要增添新的内容，由此想到演出新戏。他首先想到穆桂英这个人物，早年他曾塑造过她青年时期的英雄形象，为了使活在人民心目中的穆桂英更加丰富完整，决定再塑造她二十年后重上征鞍、统率三军的英姿，这就是梅先生演出《穆桂英挂帅》的来由。剧本是由袁韵宜、陆静岩编写的，执行导演郑亦秋。

穆桂英是民间故事里一员出色的女将，相传是宋朝名将杨继业的孙媳妇。杨家将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几乎全家为国牺牲，却得不到宋朝皇帝的信任，穆桂英也被迫退隐。挂帅的故事发生在她退隐二十年后，当时边关又传警报，皇帝下令在校场比武以选帅才；奸臣王强力保他儿子王伦为帅，穆桂英的女儿杨金花、儿子杨文广参加比武，当场刀劈了王伦；皇帝传旨穆桂英挂帅，姊

弟二人奉令捧印回家；穆桂英看到帅印，引起多年来对朝廷忠奸不分的愤懑情绪，严斥儿子不该多事，并且准备绑子上殿缴还帅印；经杨继业的夫人佘太君再三勉以国事为重，穆桂英才接受帅印，登坛誓师。

在演出之前梅先生观摩了其他剧种有关穆桂英的戏，取其所长，使人物刻划更臻完善；在排演过程中，体会到穆桂英是一个从饱经忧患、退隐闲居的家庭妇女，一变而为统率三军，智深勇沉的英雄，因而表演技艺，由淡而浓，由静而动，这样就层次分明地创造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形象。

接印一场是全剧的高潮。唱完"二十年抛甲胄未临战阵"那句以后，台上顿形活跃。在这里梅先生以哑剧式的动作表现穆桂英在挂帅之前的全盘谋虑过程：用挥动水袖、迈开青衣罕用的夸张的台步、做出执戈杀敌的姿势，表明她是"曾驱十万帅"的老将；用双手在眉际做揽镜自照的样子，暗示她年事已长，今非昔比；用左右指点的身段，暗示部曲凋零、缺乏臂助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心踌躇。与此同时，场面上以打击乐的强烈节奏为衬托，表达她在国家安危关头的沉重心情。这番思想斗争中，"为国为民、一片忠心"的信念终于占了上风。当听到鼓角齐鸣时，她抛开了一切顾虑，转过身来，脸上豁然开朗，仿佛回到了当年大破"天门阵"时，她眉飞色舞地捧着帅印，唱出了"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豪语。行腔时，梅先生老来愈加嘹亮的嗓音，震动了全场观众的心弦。

梅先生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鼓舞之下，以极大的辛勤成功地塑造出这个令人难忘的古代英雄形象，博得观众热烈的欢呼。但梅先生并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他认为艺术是无止境的，象往常一样，他对这个戏正博采众见，在舞台实践中不断修改，以期达到更高的艺术境地。

（一九五九年第十六期）

谈谈梅派艺术

许源来

梅兰芳先生的表演艺术，风行了几十年，成为广大观众最熟悉、最喜爱的流派。象他那种具有综合性的卓越艺术，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完的，我只是择要地谈一些它的特点。

梅先生的歌唱，行腔婉转自如，韵味无穷，吐字清楚有力，合乎音韵规律。他根据传统的唱法，加以新的发展，老戏里的“南梆子”，一向是花旦唱的。青衣、闺门旦也唱“南梆子”，是梅先生编演第一出新戏《嫦娥奔月》时创始的，后来大家纷纷仿效了。还有，旦角唱“反西皮”，也是他开的头。他虽然编制了不少新腔，然而他一直抱着既尊重传统又发扬传统的宗旨。歌唱里以抒情为重，不以炫奇为能，特别是他有一条刚柔相济的好嗓子，能高能低，又宽又亮，因此，他清脆圆润的歌声，使人听后历久弥甘。

他的面部表情，主要是能用眼神传达出剧中人的思想感情，目的性非常准确，可以说是箭无虚发，他看到哪里，观众就能了解他的意图。例如，《霸王别姬》里项羽战败回营，虞姬急忙出迎，双手扶着项羽，用眼睛上下打量他的丈夫是否受伤，这种神情，真切地表达了虞姬当时的心情。《白蛇传》的“断桥”里，白娘子的善良、多情的性格和对许仙又恨又爱的内心活动，也都从他眼睛里告诉了观众。

他身上的动作，恰如其分地和音乐紧密结合，给人一种极其舒适的节奏感。特别是手的姿势，早已脍炙人口。一九五二年冬，苏联芭蕾舞表演艺术家乌兰诺娃访问中国时，看了梅先生的《贵妃醉酒》后说："他刚才和我们谈话，还是一位将近六旬高龄的、毫无倦容、毫不忧郁的美男子，忽然一瞬间，我们在舞台上看见一位年轻艳丽的女人，她等候着她的主子，感到万分寂寞，以酒浇愁。我们从她的两手动作，从她的眼光，从她的台步上，都看出了那种情节。可是主要的还是两手的动作。当梅兰芳演完这一场以后，我忍不住请他把手伸给我看看，想借此获得他那运用两手表情的力量的"秘诀"。当然，这是很难看穿的，因为这些微妙的动作和姿势，是高度劳动和创造天才的结晶，也就是民族戏剧遗产的精华的集中表现。

他扮演神女、天女时，当他缓慢地走到台口，一只手用"兰花指"式扶另一只手举着的拂尘，这一刹那静止的形象和在极快的节奏中做出观音合掌、龙女抱瓶、仙鸟飞翔等优美姿势，都会使观众联想到云冈、龙门的古代雕塑，所以人们都说他扮演的神女、天女有仙气、有诗意。

一个穿着带水袖的"帔"的家庭妇女，她手里却要捧着黄布包的方形的印匣，做出各种身段，这是不可想象的。梅先生在排演最后一个新戏《穆桂英挂帅》里，碰到了这个课题，他以丰富的舞台经验，创造了抱印、捧印、托印各种富有雕塑美的姿势，并且从这些姿势中表达了穆桂英对这颗帅印的亲切热爱，同时也体现了这位女英雄忠诚爱国的精神。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称梅先生为"真正的演员——美的创造者"。的确，他的表演艺术已达到真、美、善的境界。我来举三个例子：1.梅先生演《贵妃醉酒》里的杨玉环，三次进酒后，她将要走出百花亭，扶着桌子有呕吐、失足等身段，使人相信她是醉了，但却从醉眼朦胧中显示出"醉态的美"。2.她演

《宇宙锋》的赵艳容，在她父亲面前装疯，揪着父亲的胡子不放，从睁大的一双眼睛里，已经看出她是个疯子了，但观众还可以领略“疯态的美”。3.他演《游园惊梦》的杜丽娘，当她入梦时，一手托腮，闭上眼睛，按说这是无戏可做的了，但梅先生脸上仍然流露出杜丽娘正在做一个好梦，使观众欣赏到“睡态的美”。

他不但善于继承传统，而且勇于革新。他早年就从流传很久的神话故事和名著《红楼梦》中选取题材，创造了载歌载舞的古装戏。这种服装，大都取材于古代绘画、雕刻、塑像等美术品上的妇女装束，因为要适合舞台上的表演条件，还作了恰当的剪裁。它比传统的以明代为基础的戏曲服装，时代要早得多，人们因而称之为“古装”，现在已被各剧种普遍采用了。他在舞蹈方面的创新，都是有生活依据的。他看到古画中天女身上有两条风带，象征她御风而行，他就利用这两条风带编制了《天女散花》的绸舞。我们不是有一句“长袖善舞”的古话吗？他就运用了旦角的各种水袖身段，汇合而成为《麻姑献寿》的袖舞。他学过“太极剑”，就在排演《霸王别姬》时，把京剧中原有的舞剑身段加以提炼变化，和中国武术中的剑法混合起来，给虞姬编了一段剑舞。此外，他还有扑萤舞、花镰舞、拂尘舞、扇舞、盘舞、羽舞等优美舞蹈。

音乐方面，旦角增加二胡伴奏，是他开始的。在净化舞台面上，他也有不少的贡献：乐队隐蔽在纱幕内；检场人的工作服整齐，非必要时不出现在台上，革除了演员跪拜时扔垫子的老习惯；他还以身作则地不在台上“饮场”。

以上所说，都是梅派艺术的一些优点，它影响之广，不限于京剧，其他如昆剧、汉剧、川剧、秦剧、豫剧、赣剧、湘剧、粤剧、越剧、评剧等剧种，也全向这一园地采花酿蜜，提高本身的质量。

凡是成功的艺术家，必然要广泛地向各方面吸取营养来丰富

自己。梅先生一生喜爱美术，审美力很强，他对绘画下过工夫，每逢看到一幅名画或是一件精致的雕塑品，总要再三把玩，舍不得离开。他还爱养花，常从一种开得五色缤纷、鲜艳夺目的牵牛盆花身上，对色彩复杂的戏曲服装如何配合，研究出浓淡相宜的多样图案。围绕梅先生身旁的老朋友，有文学家、考据家、剧作家、书画家、雕刻家，在相互切磋下，对他的帮助也是很大的。

今年八月八——十一日，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文联举办了"梅兰芳逝世一周年纪念演出"；由梅派传人张君秋、杜近芳、梅葆玖、杨秋玲、李玉芙等演出了梅先生经常演的《宇宙锋》、《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大登殿》、《天女散花》、《二堂舍子》等十多个剧目，从前陪梅先生演过戏的名演员姜妙香、马连良、谭富英、袁世海、梅葆玥等也参加了演出。售票前一天，人民剧场票房门口就排成很长的队伍。范经理对我说："这种盛况就和一九五五年梅先生在这里开幕演出时一样。"每个剧目演毕，观众掌声不绝，"叫帘"多次。我还听见观众这样说："看了今天的戏，好像梅兰芳还活着，梅派艺术留下来了。"梅先生桃李满天下，这次上海、南京、武汉、昆明、兰州各大城市都举行了纪念演出。我相信，梅先生的艺术光彩将永远照耀着后一代。

中央文化部在梅先生生前给他拍摄了几部彩色的舞台纪录片。梅先生逝世后，又规定了多项纪念活动，如拍摄传记电影《梅兰芳》、举办《梅兰芳艺术生活展览》，发行纪念邮票，复制《梅兰芳唱片选集》，刊印《梅兰芳文集》，这些都在今年八月和观众见了面。政府对这位大艺术家的隆重纪念，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怀想。今后，大家还要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从梅派艺术吸取营养，对梅派艺术的特点做有系统的整理、纪录工作，让这一流派得到更大的发展！

（一九六二年第十期）

漫谈京剧

翁偶虹　黄　励

京剧是我国民族戏曲艺术之一。最早介绍给世界一些国家的，是梅兰芳的访日（一九一九年）、访美（一九二九年）和访苏（一九三五年）演出。他的优美精湛的表演艺术，在国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三二年程砚秋访欧，进行了一些艺术交流活动，并曾在瑞士举行过讲座，也使一些外国朋友对京剧艺术得到了一些了解。

解放以来，中国京剧代表团先后到日本、欧洲、拉美、美国、非洲等地访问演出，把富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京剧艺术介绍给更多的外国观众。

京剧艺术，是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在内的综合艺术。它的表演手段是唱、念、做、打。它的唱有固定格式，但旋律丰富，徐疾抑扬，变化多端，能表达各种人物在不同情景下的心理、感情。念白有对话、有独白，有时用音乐化的"韵白"，有时用普通话语音的"京白"。一段痛快淋漓的念白，常博得满堂喝彩。这说明念白在京剧表演中的重要性。

做，也就是身段、表情的统称，理髯、正冠、抖袖、抬足都有所谓"程式"，也就是精简凝炼了的舞姿。在表演时，细加体察，既成了观众与演员都能理解的共同"舞台语言"，同时又通过细致的变化，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和不同的思想情绪。

打，无论是徒手，还是披甲执杖，也紧紧地配合着剧情。如“打焦赞”和“雁荡山”一个比武，一个是格斗，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京剧表演的人物可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

化妆根据行当的分工，各有不同、最特殊的是“净”“丑”的两行的勾画脸谱和“旦行”中贴片子。勾画脸谱是用各种色彩的线条，在面部勾画出各式各样的脸型，由于有一定的构图与规格，所以叫做“脸谱”。“贴片子”是用假发做成的各种发片，贴在面部边际，可以改变脸型，削瘦的可以变为丰腴，肥胖的可以变为清秀。

乐队分“文场”（管弦乐）和“武场”（打击乐）。打鼓的为乐队指挥，根据演员舞台演唱的需要用鼓板来指挥乐队。

京剧的服装，不论表演哪朝哪代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穿戴明朝衣冠。剧中人如皇帝、文臣武将、平民百姓、才女、公主、书生、侠客、男女老少、忠奸正邪，各色人物的服装都是和他的身份与性格特征相称的。

武打中的兵器，刀枪剑戟，大都是美化了的，至于布城、幔帐、掌扇、以至车旗、马鞭、船桨、和一些笔砚、茶壶等道具都不拘泥于表面的形似逼真，而是为了便于演员的表演。

京剧的产生得从清朝的乾隆皇帝说起，他多次去江南巡游，对地方戏发生了兴趣。一七九〇年，他庆祝自己八十寿辰，把各地戏班征调到北京演出，此后，所谓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留京献艺，这刚健清新的徽调逐渐取代了原来流行于北京宫廷与上层社会的昆曲的地位。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湖北的“楚班”到京，常和徽班同台演出，既有二黄腔，又有西皮腔，统称为“皮黄戏”，也就是后来的京剧。它在发展中又广泛汲取了各剧种的长处。从那时到今天约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当时最有名的演员是老生程长庚，他对京剧的发展，很有贡献。因此被京剧界奉为元勋。十九世纪末叶，一位叫沈蓉圃的画师，所画的同光“十三绝”，就是当时享盛名的十三名京剧演员。程长庚之后，最有名的演员是老生谭鑫培，他艺兼文武，造诣深湛，开创了对京剧有极大影响的谭派。

与谭鑫培同台的旦角演员王瑶卿，丰富了旦角的表演艺术，使京剧跨出新的一步。许多著名的演员如梅兰芳、程砚秋等都出自他的门下。渐渐地旦角在舞台上和多年来占着舞台重心的生角，分庭抗礼。后来，又各自发展成新的流派。如“梅派”、“程派”、“尚（小云）派”、“荀（慧生）派”等。“老生行”谭鑫培之后，有“余叔岩派”、“马连良派”、“麒麟童——周信芳派”等。“净行”、“武生行”、“小生行”、“老旦行”也都出现了各种流派，各具特色。例如“净行”的“金（少山）派”、“郝（寿臣）派”、“侯（喜瑞）派”，“小生行”中有“姜（妙香）派”，“武生行”有“盖（叫天）派”，“老旦行”中有“龚（云甫）派”，“李（多奎）派”，“丑行”中有“萧（长华）派”等等。

为了培养京剧演员，光绪末年叶春善等创建喜连成（后改为富连成）科班，后来，程砚秋创建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培养出许多著名演员。

京剧剧目有的出于昆曲，如《林冲夜奔》、《武松打虎》；有的出于梆子（河北、河南、山西等地一些地方戏曲的统称），如《辕门斩子》、《春秋配》；有的出于民间小调如《小放牛》。最早的专为京剧而写的剧本是三庆班演员卢胜奎所编全本《三国志》。后来，许多名演员各自编演各人擅长的戏。京剧在发展中，受到反动统治的影响，也有了不少不健康的成份。

抗日战争开始，有些演员如梅兰芳、程砚秋等退隐了。有些演员辗转流离，京剧日渐凋敝。

一九四三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业余京剧工作者编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编演了《三打祝家庄》揭示了旧剧革命的开端。

全国解放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文艺工作者整理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如《将相和》、《三岔口》、《闹天宫》等，使之焕然一新，又编写了新的历史剧如《杨门女将》、《海瑞罢官》等，也创作了革命现代戏，如《红灯记》、《沙家浜》等。表演艺术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京剧艺术正在迈开新的步伐向前发展的时候，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所有传统剧目都被诬为“毒草”。“四人帮”覆灭后，一些优秀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重登舞台，京剧又焕发了它的青春。

（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

歌唱艺术家郭兰英

赵 沨

任何艺术必然具有民族的特点，我们常说德国音乐重视结构，法国音乐重视表现，这正是德、法民族不同的社会历史生活、风土人情……在音乐文化中必然的反映。除开艺术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先不谈，就是在艺术形式上，根植于社会生活之上的审美习惯，便是民族艺术传统的实质的集中表现。我国民族声音文化有着久远的传统，在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特点，在技法上也有着自己的体系。特别在美学观点上，我国古代和当代的民族声乐家更有着许多独创的见解。声乐文化和民族语言有着血肉的关联。欧洲声乐的意大利学派和德国学派的分歧，重要因素之一便是语言的不同。我国民族声乐理论在公元十三世纪的元代便有专门著述出现，远溯到唐代，一千多年前的诗人们便讨论着歌唱艺术中“唱声”和“唱情”的关系，我国民族声乐理论一直发展着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声情并茂”。唱歌要“唱声”更要“唱情”。但“唱情”的基础是“唱声”，“唱声”的目的是为了“唱情”。这是歌唱艺术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字正、腔圆、板清、情真”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所谓“四绝”。字音要纯正，声音要圆润而且要和曲调象水乳交融般地溶合在一起，节奏要正确而且句法要妥贴，最重要的是表达情感要充沛和真实。

郭兰英的声乐艺术便是遵循着这样的传统和美学原则发展起来的。在旧社会，郭兰英是一位饱受压迫剥削的传统戏曲艺人，她擅长"山西梆子"，是一位能歌善舞的戏曲艺术家，我国解放前夕，她参加了革命文艺工作，在新歌剧的舞台上创造了"白毛女"这样一个坚贞、勇敢的少女形象。在"刘胡兰"这个歌剧中她塑造了一个"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女英雄的不朽形象，她的歌唱艺术在我国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受广大群众爱戴的一位民族声乐歌唱家。

传统的长河总是汇集着许许多多的支流而愈来愈波涛壮阔地奔腾前进，继承传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传统。继承不是目的，如果为继承传统而继承传统必将保守不前。但任何艺术上的"创新"总不能离开传统的基础，离开传统基础的"革新"便可能走向主观臆造的绝途。郭兰英歌唱艺术之所以为我国广大群众所热爱，不仅因为她歌唱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这种特点便是因情而遣声，这种特点便是语言、情感和美声紧密结合。但更值得特别称道的是她在"山西梆子"唱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的创造，她广泛地从我国现代声乐创作、民间各种戏曲、各种地方曲艺（说唱音乐）中吸取营养，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这样，在曲目上她掌握了"河北梆子"、"河南梆子"等多样风格的唱法，也掌握了现代民歌风格的创作歌曲特别是新歌剧的大量文献。而这一切又是根植于深厚的"山西梆子"的工力之上的，由于根底厚基础深，不仅没有因为掌握多种体裁、样式的文献而使风格斑驳不纯，相反地能够在"山西梆子"的高亢有力的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这种风格便是粗犷中有情韵，高亢中见婉约，婀娜有致而仪态万方。

当然，郭兰英还年轻，她在艺术上还有广阔的前程。我们不能说她的歌唱艺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而且在如何充分发挥她的声音的特征——声惊四座、光彩照人的风格上还应该再

下一番工夫，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她的歌唱中，不仅看到了我国古老的传统声乐艺术的无限生命力，而更重要的是，她的成长的道路清楚地说明了我国“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的无比正确，只有“百花齐放”才能促进艺术的无限繁荣，也只有“推陈出新”才能使艺术工作更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时代变了，人民的生活变了，艺术表现的内容变了，表演艺术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这才能使歌声中体现出时代精神，这才能为万紫千红、繁花似锦的民族声乐艺术开辟出无限广阔的天地。

（一九六四年第二期）

《希尔薇娅》在中国

李升恒

在月光如水的林间空地上，希尔薇娅等众仙女在小溪中戏水沐浴。牧羊人阿蒙达躲在爱神塑像后边窥探。突然，阿蒙达被发现了。希尔薇娅又羞又恼，竟向爱神塑像射出一箭，却误中了牧羊人的胸膛。这一切均未逃过爱神的眼睛，他向希尔薇娅回敬了一箭，既是惩罚又是对真诚爱情的祝愿。

黑神对希尔薇娅垂涎已久，乘机将她劫回洞府。爱神装扮成巫师，救活了阿蒙达。

在洞穴中，希尔薇娅坚决拒绝了黑神的求爱，却假装殷勤劝酒，将黑神灌醉。蓦地，山开石裂，阳光射进了洞穴。爱神搭救了绝望的希尔薇娅。

在狄安娜神庙前，由于爱神的帮助，阿蒙达找到了希尔薇娅。黑神妄图再次将她劫走，牧羊人挺身而出与之搏斗。女神狄安娜一箭射死黑神，保护了希尔薇娅和牧羊人，却不谅解他们之间的仙女与凡人的爱情。爱神劝说狄安娜回忆她自己也曾与另一位牧羊人相爱的经历。她无言以对，只得同意这对恋人享受人间幸福。

这是由中国艺术家在北京演出的著名法国芭蕾舞剧《希尔薇娅》的故事梗概。

这部歌颂自由与忠贞爱情的古典芭蕾舞剧，是根据十六世纪

意大利诗人塔索描写希腊神话的名作《阿蒙达》改编的。编剧为巴比埃和德·雷纳克、编舞为路易·梅兰特、音乐则由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曲家列奥·德里布创作。乐曲与剧情丝丝入扣，细致入微，为浪漫主义芭蕾音乐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一八七六年在法兰西芭蕾学派的摇篮——巴黎歌剧院首次演出，以后成为该剧院专有的保留节目。

根据中法两国在去年十月签订的文化交流计划，法国方面委派巴黎歌剧院首席舞蹈明星莉赛特·达桑瓦尔夫人、舞台美术家贝尔纳·代德先生和芭蕾舞大师帕斯卡尔·万桑先生来北京，帮助我国中央芭蕾舞团根据原版排练这个大型舞剧。近三十年来，在法国国土之外，由巴黎歌剧院的艺术家们亲自指导排练这个剧，还是第一次。这是中法两国人民和艺术家之间深厚友谊的生动体现，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一九二四年，十二岁的莉赛特·达桑瓦尔在巴黎歌剧院初学芭蕾时，就爱上了《希尔薇娅》，并扮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从一九四一年以来，她曾扮演剧中女主角达一百多次，成功地塑造了仙女希尔薇娅的艺术形象。当巴黎歌剧院通知她来中国帮助排练此剧时，她毫不犹豫地连声回答："好！好！好！"这位具有丰富经验的首席舞蹈明星，于六月初来到北京后，每天都到现场精心指导。她说："当我看完三幕连排之后，我为中国演员在三个星期中取得的进展感到惊讶！水平很好。中国演员，特别是独舞演员技术发挥得非常出色！"她现年六十八岁，膝盖经常疼痛，对北京盛夏的炎热也很不适应，但是她说："在这些勤奋、好学的演员面前，我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疲劳。"

舞台美术家贝尔纳·代德曾为欧美各国许多大剧院的三百多个剧目，创制过布景和服装，多次荣获各种奖赏。这次来北京与我国舞台美术家们合作，他的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十分感人。他一下飞机就去察看舞台场地。天桥剧场不如巴黎歌剧院剧场宽

大，全部布景都要相应缩小。为此，他每天要进行大量的计算、测量等工作，一直忙到深夜。“枫丹白露”艺术流派是这个戏整个舞台美术设计的基础，布景和服装十分绚丽而优雅。尤以第三幕布景最美，立体感强，色彩鲜明，使观众恍如亲临仙境。在正式公演时，帷幕刚一拉开，剧场里便掌声四起。观众为布景的优美热烈鼓掌，这在我国是少见的。

总排练师万桑为了使这个优秀的舞剧早日与中国观众见面，四月份就来北京到芭蕾舞团任教。他亲自作示范动作，经常汗流浃背，每天都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虽然他的腰病复发，但每天仍坚持排练。中国方面派了一位有经验的中医大夫，每天到旅馆为他按摩治疗。他说：“我对演员要求严格，但和中国同行合作得很好。演员们学习刻苦，进步很大，精神状态很好……对指出的每个细小缺点，他们都认真改正。”

法国艺术家们除了赞扬我国著名芭蕾舞演员白淑湘等人的基本功扎实，并具有勇敢精神之外，还非常欣赏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如张丹丹、李茂才等，认为他们是中国芭蕾舞未来的明星和希望。他们特选二十二岁的张丹丹担任第二组女主角。莉赛特·达桑瓦尔指出：“张丹丹体型很好，跳得不错，当然还要实践。如果她去巴黎演出，我们的记者将为之倾倒。”

这些法国艺术家在北京同中国艺术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合作是非常亲密和令人满意的。达桑瓦尔夫人的一段话表达了三位法国朋友的共同感受：“到中国来，是我的宿愿……一踏上中国的大地，我就感到自己好像沉浸在友谊和微笑的海洋之中，这给我带来巨大的喜悦。”

情节曲折动人、舞姿生动典雅、音乐脍炙人口、布景宏伟壮丽、服装华美多彩，尤其法国民间舞色彩鲜明，是这部典型的法国古典芭蕾舞剧的主要特点。在三位法国艺术家热情指导和具体帮助下，中央芭蕾舞团全体演职人员同心协力，使这部三幕大型

舞剧，仅仅经过两个月的排练，就正式公演，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员们将具有浓郁抒情性的独舞、双人舞表演得细腻、优美、入情入景；将气氛热烈的群舞，表演得生动活泼、动人心弦，均博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一些法国朋友希望中国的《希尔薇娅》能去巴黎演出，把这个中法两国友谊的结晶，介绍给法国人民。

（一九八〇年第十期）

电影

《马可·波罗》在中国拍摄

袁华清

颐和园佛香阁下方的一个院子。几架仿制得莫辨真伪的古代天文仪器在阳光下熠熠发光。一群身穿元代服装的男女老少在廊庑下轻声交谈。

“安静！准备！开拍！”一个五十来岁的外国人喊道。

全场寂然，一位元朝官员和一个碧眼金发的小伙子徐徐走到院子中间。那位官员对小伙子说：“马可，有许多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去做……友谊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

“停！”

这是大型故事片《马可·波罗》在北京拍摄的一个场面。

多年夙愿

“到中国来拍摄《马可·波罗》，在银幕上再现这位十三世纪伟大旅行者的形象，反映意中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这是我们的多年夙愿。”《马可·波罗》导演兼编剧之一朱里阿诺·蒙塔尔多先生曾这样对我说。

马可·波罗被德国著名学者、现代地理学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冯·洪堡特（1769—1859）誉为“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最伟大的陆上探险家。”他的伟大，在于使西方人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热情好客，勤劳智慧，

他们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用地里挖出来的黑石头当燃料……”他的伟大，在于增强了中意友谊，促进了中西交流。

意大利人用各种方式寄托他们对马可·波罗的怀念。各种版本的传记相继问世，他在狱中口授的《游记》一版再版，威尼斯机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位于威尼斯市中心玛丽勃兰剧院后面的一栋小楼——据传是波罗家族的宅邸——得到妥善保护……

四年前，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提出把马可·波罗的事迹搬上银幕，到中国来摄制这部影片。著名脚本作者文琴佐·拉贝拉教授花了三年时间，精心研究史料，与英国人戴维·巴特勒和意大利人蒙塔尔多合作，写出了电影剧本。一九七九年秋，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提出合拍这部影片的建议，中方欣然同意。

《马可·波罗》是一部大型故事片，共分八集，每集长约一小时；前三集在意大利和摩洛哥拍摄，后五集主要在中国实地拍摄。这部影片对布景、服装、道具的要求极严，演员来自中、意、美、日、英等国，双方摄制组人员共达二百五十人左右。这些因素致使影片成本高达260亿里拉（约合2,200万美元。）美国的《每日新闻》说它是“电视影片历史上最雄心勃勃、最壮观的一次创举。”

一丝不苟

《马可·波罗》既是一部历史故事片，就必须忠实历史。为此，中意双方对剧本、情节、人物、道具、衣饰等进行了反复研究。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蒙古史和元史专家，仔细阅读了剧本初稿，反复查证有关史料，提出了修改意见。拉贝拉教授根据中国同行和专家的意见，数易其稿，保证了影片既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又基本符合历史真实。

为了再现元代建筑的风格和特征，中意双方的美工设计师实地考察了元代历史遗迹，查阅了大量中外文献，搭出了一个个逼真的和具有时代感的内外景。

年近六旬的总化装师劳伦蒂先生给饰演忽必烈的英若诚化装时，不用简便的胡子套，而是把胡子一根根粘上去，这样能经得起大特写镜头的考验。

服装师萨巴迪尼先生不惜时间和工本，设计缝制出两千多套元代服装，连盔甲、鞍、鞯、銮铃都用真材实料制作，从不用代用品。

群英荟萃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把协助意方拍片的任务交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该厂抽调出优秀的制片、导演、美工、化装、服装、道具人员，组成中方摄制组，配合意方工作。

意方承拍该片的是展望国际电影公司。导演朱里阿诺·蒙塔尔多先生以擅长拍历史题材的影片而闻名于世，迄今为止已导过十来部影片，曾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制片主任弗兰科·克里斯塔尔迪博士是展望公司总裁、国际电影制片者协会现任主席。总摄影师帕斯夸莱·德·桑蒂斯先生驰骋影坛三十余载，两度获得奥斯卡奖。意方摄制组的美工师、照明师、音响师、服装师和总化妆师也都具有二三十年的专业经验。

《马可·波罗》的演员中既有几十载盛名不衰的成熟大师，又有近几年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饰演主角马可·波罗的是美国影坛新星、二十九岁的肯·马歇尔；他在美国电视片《西方败北记》和意大利影片《皮肤》中的卓绝演技使他跻身于当代第一流演员之列。元世祖忽必烈的扮演者是中国著名舞台艺术家英若诚，他的精湛的演技、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口流利的英语深得意大利朋友们的赞扬。真金太子一角由近年来蜚声日本电影界的石田纯一担任，他虽然只有二十七岁，但已在木下惠介导演

《父亲啊，母亲啊》、中岛贞夫导演的《反抗》以及其他五部在日本轰动一时的影片中饰演过重要角色。配角演员中也不乏誉满欧美影坛的明星，如美国的伯特·兰卡斯特（饰罗马教皇），安·班克罗夫特(饰马可的母亲)，凯瑟琳·道玲（饰南宋诗人杨固的养女、意大利人莫妮卡）和郭邓如鸾(饰忽必烈的皇后察必)；英国的约翰·吉尔古德（饰威尼斯总督），邓荷姆·艾略特（饰马可的父亲）和托尼·伏格尔（饰马可的叔叔）。

仅仅是开端

意大利摄制组在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从去年七月中旬在长城开拍中国部分开始，花了不到五个月时间，完成了在北京、锡林浩特、承德和桂林的全部摄制任务。预计再有几个月的剪辑和配音时间，这部举世瞩目的大型历史故事片就能和各国观众见面了。到目前为止，已有七十多个国家购买了播放权；美国的NBC公司和日本的NHK公司都已决定把它纳入一九八二年五、六月份的播映计划。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白石老人

艾青

在年老的画家们当中，我们经常地想起毕加索和齐白石。尽管这两个老人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互相也没有见过面，两人所继承的传统和所发展的道路也不同，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长期地以自己简单的工具和最节省的笔墨，描写他们自己对于外界的感受，对人生都采取肯定的乐观态度，以自己持久的劳动给人类创造精神的财富，以惊人的毅力从事艺术。

这两个老人都经历了这个世界的巨大的变革，经历了几次把整个人类都卷进去的战争，也都亲眼看见了人类光明的前途。

他们都关心和平，关心人民的幸福。

而他们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是这样高的境界，使我们觉得传统的艺术和未来有了联系。

白石老人已经九十三岁了。他已劳动了七八十年。他还继续在劳动着。他从一个农村的牧童、一个砍柴的孩子，开始他的人生道路。他学过木工，做过雕花匠，很晚才接触到绘画。

他从小就生活在劳动人民中，学会了刻苦勤劳，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气质。他所画的，是人民日常所见和所喜爱的东西：肥大的白菜和萝卜；成群的小鸡，充满稚气，鼓起小翅膀，飞奔争吃地上的小虫；沉甸甸的谷穗。金黄的稻子。银白色的老玉米；

绿到发黑的荸荠叶子，和在叶子下面活动的青蛙。

一群水中游动的虾，以细长的触须去测量自己的空间。

各种各样的草虫，细到连绒毛都可以看见，但它们是活的，有感觉的。蜜蜂的翅膀在扇动，使人看了，可以听见嗡嗡之声。

各种各样的草，和各种各样的花。

他歌颂生命。

而他作画的方法是独创的，别出心裁的。他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良传统，经过自己缜密的构思，创造新的画风。他的写意画是有坚实的写实的基础的。他的画，在繁复中有条理，在单纯中有变化。

他的观察精细而又周密，他嫌弃委琐，反对抄袭，勇于探求和创造。

他处理题材富有想象力，使一切东西在他的画面上都有呼应。

而他又是这样的熟识工具的性能和所描写的对象的特征。

他决不枯索技巧，也不卖弄技巧，他的技巧是为了正确传达自己的感觉而服务的。

年轻的画家们，应该学习他的对于对象细心钻研的精神，构图时的丰富的想象，熟识工具和运用工具的能力，以及不断的劳动和创造的毅力。

（一九五三年第二期）

李可染的艺术

张 仃

中国独立的山水画，形成于唐代（六一八——九〇七），至五代（九〇七——九六〇）荆浩集其大成。宋代（九六〇——一二七九）董北苑在技法上更有所发展，他在山头重加墨点，添以渲染，画出江南真山真水。及至元代（一二七九——一三六八）四大家（黄子久，王蒙，倪云林，吴镇），以竭笔湿笔并用之法，使云烟变幻、雾霭苍茫之景，得到了丰富的表现。

元代以后，尤其明（一三六八——一六六一）清（一六六一——一九一一）之际，山水画家大都以"南宗"为榜样。以四王（王翚，王时敏，王鉴，王原祁）为代表的一派，在艺术上占有统治的地位。他们重师承、少创造、形成锢闭风气，使中国山水画走向衰落。以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渐江为代表的明遗民画家和扬州八怪以及近代的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等则是另一派，他们重传统，更重创造；师古人，更师造化；他们虽被当时权贵与正统派斥为异端，但为传统增加了新的血液，为中国绘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中国近代画家中，齐白石以"奇"胜。他的奇，并不是故意眩奇、卖弄江湖手段，而是永远保持艺术上的朝气和清新感，不断向生活探求，来丰富艺术上的想象。在构思与表现方法上，永远避免因袭，不断创新，甚至极力避免与自己习惯的表现方法

雷同。黄宾虹虽然胸中丘壑万千，但从画面上看，往往极为平易，不似齐画之雄奇。但他的笔墨之苍郁浑厚，却是近代画家所少有的。

李可染一九〇七年生于江苏徐州，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及杭州国立艺专学习国画与油画。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了北京，师事齐白石和黄宾虹，现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他的作品继承了齐、黄两位大师的优点，而又得到了一定的综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一贯反对自然主义，创作时常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为座右铭，他的意思是：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敢于突破与创造。他以极大的热情拥抱自然，并明确的认识到，所谓意境是情与景的结合、主客观的统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正是可染艺术的灵魂。

中国水墨画，在艺术效果上要求“似”与“不似”、“拙”与“巧”、“虚”与“实”、“朴”与“华”的统一，在笔墨上要求“苍润”、“健拔”、“沉雄”、“淡逸”……离开一定的主题思想与具体艺术形象，都会变成抽象的形式主义。

从可染的水墨山水写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尊重中国绘画中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同时又是怎样重视生活的。在运用和发展传统的表现方法中，可染力求写出祖国江山的多娇，力求写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他的艺术，使统传与现实生活、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挂上了钩！

可染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为了表现它们的新面貌，启发和鼓舞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劳动热情，自一九五四年以来，他遍历祖国南方的名山大川，画了不少好画，经过艺术实践，他突破了艺术上许多难关，有了很高的造诣。可染的艺术，可算是近代中国画在推陈出新方面跨出了一步！

（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

中国现代木刻版画的足迹

李 桦

中国的古代木刻有着极光辉的成就，但中国的现代木刻版画却只有三十年的历史。中国的现代木刻是由于革命的需要，在党的领导和鲁迅的提倡扶植和进步木刻家的努力下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九年初，鲁迅开始把外国的进步木刻介绍到我国，一九三一年八月，鲁迅为了帮助青年们学习木刻，举办了“暑期木刻讲习会”，从此学习木刻的人日益增多，他们纷纷组织起木刻团体，参加当时的左翼文艺活动，于是形成了中国现代木刻运动。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可以说是现代木刻的童年时期。当时在上海的木刻作者组织了木刻团体，从事创作、研究、展览和出版等工作。他们的作品经常发表在各种进步刊物上面。那些尖锐地反映民族危机、救亡情绪、阶级矛盾和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作品，自然引起了反动派的不安，于是在白色恐怖下，木刻团体被破坏，展览会被查封，刊物被没收，有的作者被逮捕了。

但是，木刻运动已深深播下它的种子。一九三四年广州和北平又出现了木刻团体。这两个团体在一九三五年元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这个充满了抗日救亡气息的展览会，在当时已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变成“特殊化”的北平展

出后，并巡回到其他城市，有力地鼓舞了广大观众抗日救亡的情绪。由于这次流动展览的工作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上海的木刻运动又活跃起来了。一九三六年夏，木刻工作者组成了“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木刻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更为广泛，较小的城市里也有木刻作者的足迹了。

这个时期的木刻艺术虽还幼稚，但它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与当时的革命运动紧密地结合着。木刻作者大多用粗犷的线条，有力的黑白对比，充满热情的画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刻划出我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苦难生活，表达和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情绪和战斗的意志。

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是中国现代木刻的壮大和成熟时期。这个时期的木刻发展分成解放区的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两个部分。

解放区的木刻工作者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经过改造和锻炼，迅速地成长起来。他们开始摸索着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计划地把作品编成墙报，送到市集、城镇、部队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去，张贴在工农群众的面前，倾听他们对作品的评论，然后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改进自己的创作。他们学习民间水印的方法，创作出版了大量的木刻年画；他们又为报刊刻制连环木刻、漫画、题花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他们还刻制了无数传单、标语，在敌后游击战中，设法散发到敌军的营房里，或贴到敌人的碉堡上，以瓦解敌人的士气。在残酷的敌后战争中，有些木刻作者光荣地牺牲了。

延安当时是中国革命的司令台，也是解放区的文化中心。延安的木刻，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更显出了新的面貌。它们歌颂新社会的新人新事，深刻地反映了解放区的各项革命运动。这些作品由于具有新

的感情和民族风格而受到人民普遍的欢迎。

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木刻运动，虽仍处于被迫害的状态，但木刻作者以“全国木刻协会”为中心，坚持过去的革命传统，从事展览、出版和举办函授班等工作。那些富有战斗性的木刻作品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严密统治之下，仍能透露出人民的呼声，并深入群众。一九四二年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木刻作者，逐渐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及至抗战末期，当他们与延安方面交流作品，得以欣赏解放区的木刻之后，创作风格上起了很大的变化，积极而含有激昂情绪的作品代替了消极暴露的作品；明朗的色调代替了阴暗的画面；洋化的味道也为民族形式所代替了。在抗战胜利以后，木刻家更以作品积极参加了反内战、争取民主的各项革命运动。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随之而获得更大的发展。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木刻作者会合起来，并有一批后起的新生力量，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努力从事新的创作，从此，木刻版画进入了新的繁荣阶段。

（一九六二年第三期）

长征中的真实图画

平　林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追兵，击溃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克服了人类遇到的最大的困难，终于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里发表的十二幅图画是长征中的真实写照。

画的作者黄镇同志，是长征的参加者，长征时，他在中央红军宣传部门工作。作者谈到，在长征时，他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当时只有一个不移的信念，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胜利。尽管遇到无数困难，但大家都不怕，而是在紧张的行军和战斗中间抓住任何一点时间，不知疲倦地进行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革命的主张，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发动人民起来斗争。绘画的同志同时也拿起笔，在战斗和行军的间隙里，画下不少画。而当时绘画的条件是很差的。纸只能是拿到什么纸就用什么纸。往往十几张画就有好几种不同的纸。墨也往往没有，更多的是用锅底灰。有时毛笔也没有，自己用麻扎起来代用。可惜的是当年很多同志的作品都已散失了。黄镇同志所作的也只留下极小的一部份。而这些画的原稿，现在也还没有找到。这里发表的是根据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出版的《西行漫画》复制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画：

《夜行军中的老英雄》，描绘的是林伯渠同志在黑夜行军中的英雄气概。作者谈到，这是在长征初期，离开江西革命据根地后，数十万敌军包围堵截，敌机整天骚扰，红军多在夜间行军。有时大雨滂沱，泥泞路滑，有时翻山越岭，一夜只能翻一二座山，走一二十里路，夜晚十分辛苦，白天也睡不好觉。在夜行军中有的同志边走边睡着了，有的同志边走边碰在前面同志的背上，有的同志被后面的同志轻轻推醒，继续前进。在这样的情况中，年已五六十岁的老同志：林老、董老、徐老、谢老等处处以身作则，不怕艰苦的模范行动，给青年同志以极大的鼓舞。像林老，白发如银，又是近视眼，但总是婉谢青年同志对他的照顾，自己手提马灯，气宇轩昂地前进。因此作者怀着深深敬爱的感情画下了《夜行军中的老英雄》。

遵义是长征路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在这里，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而红军依据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展开了高度机动灵活和集中优势兵力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游击性运动战，取得节节胜利。在《遵义大捷》这幅画中，作者记道：“遵义的伟大胜利，俘获敌官兵数千，吃饭前的情形。”显然这幅画记录了遵义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一战役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吴奇伟部和其他杂牌部队共二十个团，轰动了全国。画的左边在台上的是红军，着墨不多，但昂扬的气概跃然可见；台下是一大群俘虏，这正说明反动派必然失败。关于这幅画，作者还谈到，许多俘虏兵经过阶级教育，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欺骗和压迫，就要求参加了红军，有的还很快地成为英勇的战士。这又说明，反动派是如何地不得人心。

《背盐人》（贵州、四川的干人儿）和《彝族向导》两幅，

描绘了红军长征途上穷苦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少数民族的形象。作者回忆创作这两幅画的心情时说到，在云南、贵州、四川一带行军时，一路上总是看到很多穷苦的老百姓，在深秋的寒风中没有衣服穿，很多人只用一块破布围着下身。十七八岁大姑娘没有裤子穿，或一家人轮流穿一条裤子的情况是很普遍的。这些穷人的家里真是穷得什么也没有。但另一方面，在村子里也往往有几座突出的高楼大宅，这就是地主豪绅的家了，在这些房子里又看到成串的腊肉，成囤的大米，吃的用的花样之多，不能想象。从这强烈的对照中，可以看到反动派对人民的剥削残酷到什么程度。这些情形，使作者十分愤慨，形之于笔墨，就产生了被压迫受苦难的背盐人的形象。作者还谈到，很多穷苦人民，就在红军经过的时候，踊跃参加了红军，走上解放自己，解放全中国人民的道路。《彝族向导》画于通过彝族地区时。红军在湘、桂、黔、滇、川等地行军时，通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接触了苗、瑶、壮、彝、藏等兄弟民族。正是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严明的纪律，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才击破了由历代统治者所造成的民族之间的隔阂、猜忌，少数民族人民也有史以来才看到一支把他们作为自己人的军队——红军。因此大军所至，备受欢迎。红军通过地势险要，山高水急，不辨路径的彝族地区时，也是依靠了彝族同胞的带路。这画面上一个彝族向导的喜悦，正是这动人的民族关系中一个生动的镜头。

安顺场和泸定桥是长征路上发生两次著名战役的地方。安顺场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从这里渡河未成而失败之处。这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连绵数百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极易为敌人伏击包围消灭。因此反动派曾叫嚷红军将蹈石达开复辙。但红军却以无比的英勇冲过河去，占领了渡口，随后南北两岸红军夹河而上，以神速的行军和勇猛的战斗，飞夺泸定桥。数万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安顺场》一幅，作者

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写出了十八勇士渡河突击的关键性时刻，画上乱云低压，浪涛汹涌，一叶轻舟正无畏地冲向敌人扼守的对岸，令人想见当年战火纷飞，红军气夺山河的气概。《泸定桥》一幅，一桥高架，铁索悬空，远处雪山隐现，桥下浪花卷雪。当年红军勇士就是在敌人已撤去桥板的情况下，攀着铁索，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向对岸，抢占了这座著名的天险铁索桥的。

红军在长征途上，不仅以无比英勇的战斗，击败了前阻后追的无数敌人，而且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了险恶的自然环境所给予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这一方面作者为我们留下了《老林之夜》、《翻夹金山》、《下雪山的喜悦》、《磨青稞》、《草地宿营》、《草地行军》等珍贵的画面。

《老林之夜》描写了红军在原始深林里过夜的情景。这里森林黝黑，气候寒冷，战士们燃起篝火，围坐休息，以乐观坚毅的精神，度过这漫漫长夜，迎接着胜利的明天。

雪山两幅，可以对照起来看。作者谈到当时情况说，雪山高耸入云，空气稀薄，越往上走越困难，到了积雪地带，气候变化无常，眼看着丽日当空，忽然间狂风骤起，雪花飞舞，不辨东西，冰雹像骤雨般地打下来。在上下雪山，通过积雪地带那段路程中间，不能坐下来休息，一坐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过一次雪山就等于和敌人进行一次战斗。在过雪山时，进入积雪地带之前，就必须作一次好好的休息，等向导说走，然后强帮弱，大帮小，互相搀扶着，努力上山下山，走出危险的积雪地带。《翻夹金山》那幅具有中国传统山水画风味的正是描绘了雪山的高耸奇险，大队红军首尾相应，向雪山进军。另一幅是红军翻过雪山之巅，在一片冰雪世界中大步下山；胜利在望，而风暴冰雹的威胁仍然存在，所以战士们又紧张又兴奋，此情此景，十分真实生动。作者写道："雪山高，铁的红军铁的意志更高。"这发自红军心坎的豪言壮语，将永远像号角一样地响亮和激动人心。

后面的三幅，是关于红军过草地的。关于草地，一位长征的参加者有过这样的描写："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举目一望，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茫的浓雾，不辨东西南北。草底下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道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我们只能跟着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艰难地前进。"

看了这一段描写，再来看这几幅，就会有更深的感受了。我想，画面上所显示的草地，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种恶劣环境。但作者显然着重地表现了红军战士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全副武装，身背粮食，大踏步前进的红军战士的气概，那互相照应着前进的队伍；那草地宿营的情景：被单架成的篷帐，里面有人在休息商谈，也许是商讨工作；帐外有人在挑水，捡柴火；作者还谈到有篷帐的只是少数，草地夜间常常下雨，更多的同志是戴着斗笠或打着伞，互相依靠着到天明的。所有这些都是极其感人的。正是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士，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风雨、泥泞、寒冷、饥饿，战胜了茫茫的草地，取得了胜利。

这里再谈一谈《磨青稞》那幅画，画中表现的是过草地前准备粮食的情形。作者谈到，他和其他的一些同志在毛尔盖准备过草地时，大家忙着把青稞磨成面，烤成饼，备好十多天的粮食。当时只能找到一个石磨的上半片，那石磨的下半片是他用马刀在一块石板上一刀一刀锻刻出来的。许多同志就用这块石磨把青稞磨成面。这就是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奇怪的石磨的由来。从这段小故事，也可以看到参加长征的同志是如何克服着一个又一个不能料想的困难。

这些画，是伟大长征的片断记录，是真实的革命史料，也是珍贵的艺术品。　　（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

黄宾虹山水画

张 仃

历代中国山水画家，多为文人士大夫，他们往往因为与当时统治阶级的矛盾，隐息山林，寄情笔墨；在意境上，就常以荒寒、萧瑟为上。到了清代，过重临摹，忽视生活。道光咸丰之世（公元一八二一——一八六一年），艺术上柔靡成风，俗甜邪恶，轻薄促弱，山水画在思想上、艺术上已走上危途。黄宾虹（公元一八六四——一九五五年）原籍安徽歙县，出生于浙江金华，他诞生时正是清朝日趋衰败的同治年间。他幼年时期就喜爱绘画，青年时期，外出谋生，往返于浙江金华、杭州、江苏扬州等地，得有机会看到许多古代文物，并结识了一些有名画家，扩大了艺术眼界。他在三十一岁时（公元一八九四年），遭逢中日战争，眼见清廷不战而溃，悲愤交集，希图倡办教育以救国。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他回到故乡，垦耕十年，专心研究书画，以后又遍游名山大川，写生作画。由少及壮，由壮及老，艺术上不断精进，在美学思想上也逐渐成熟。他处于那样一个国势不振，画风衰颓的环境，由于热爱祖国，博览群书，精研传统，加以长期的艺术实践，于是提出"浑厚华滋"极有概括性的美学要求，以此与"轻薄促弱"相对立。从传统看来，他说"唐画刻划如缂丝，宋画黝黑如椎碑，力挽万牛要健笔，所以浑厚能华滋"；从生活看来，他经常赞叹："中华大地，无山不美 无水不秀，美

在于：山川浑厚，草木华滋。”这是朴实的美，深厚的美，内在的美，一种健康的审美观念。这种美，为爱国主义的山水画家黄宾虹深刻地体验到了，并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出来。

“浑厚华滋”的美，具体的体现于他的意境笔墨之中，他作画不同于当时一些公式化的山水画家，形式地理解“黑白”、“疏密”、“繁减”等艺术法则，他认为这些法则只是表达意境的手段，他说：“虚当以实求，实当以虚求，作画不能只言疏密，先要求之以意境。”关于运用以上艺术法则来表达意境，又概括为“虚实”关系，并辩证地运用“虚实相生相克之理”，使虚实互为作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至于掌握虚实规律，他又明确地主张，并在艺术实践中，先实后虚，虚从实中求。

他在晚年作画，尤喜用重墨，画了又画，加了再加，峰峦起伏，云雾弥漫，在至密处透出一线光亮，则通体虚灵。

他主张书画同源之说，认为画先于文字，书诀即画诀，用笔要：“肥不臃肿，瘦不枯羸”，他常以焦墨画山水素描，并追求“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的艺术效果。他的用墨方法很多，更长于用积墨宿墨之法。

黄宾虹山水画的艺术成就，除了他求得健康的美学观，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师古人又师造化之外，更由于他在艺术劳动上，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他一生中，几乎无一日不作画，仅国内收存作品，不止万张，由于他的作品，违反当时的一般欣赏习惯，未能为更多读者所认识，但解放后的中国人民，对他的作品，兴趣已愈来愈大，今后他的作品将日益发出更大光辉。

（一九六三年第三期）

印紐雕刻

王朝闻

几幅印纽雕刻的彩色照片引起了误会，有人只看照片而误认为印纽就是一只正在爬动的昆虫。因为生动的艺术形象可以乱真，误会的引起不见得只怪人们看得粗心。

石材的颜色不纯，即所谓瑕瑜并见，在一般情况下看来是原材料的严重缺点。用汉白玉石材雕刻人物肖像，意外地在作品接近完成时才发觉这种缺点，比如说在人物脸部出现异色的斑痕，这是十分令人感到为难的。这种难于弥补的缺憾，可能导致艺术制作的前功尽弃。然而这些印纽雕刻，特别是那只黑色甲虫的处理，恰好是艺术家王鲁桓善于支配原材料的缺点，使缺点转化为优点的结果。看来在王鲁桓的艺术构思里，与其说一心要刻出一只令人感到逼真得可惊的甲虫，不如说石材墨绿色的斑痕促使他产生了创造一只甲虫的愿望。所谓“巧做”，是我国玉雕艺人对待原材料斑痕的一种优良传统。王鲁桓用他自己的构思创造性地继承了这种传统。

我对这一印纽很感兴趣的原因，不在于作者刻出了一只足以乱真的甲虫，而在于作者在构思中把墨绿色的斑痕看成一只未来的甲虫的想象。非常明显，如果这种斑痕的大小或颜色的深浅与雕刻家心目中的形象对不上号，他那“巧做”的愿望难免落空。当然，滥用“巧夺天工”或“化腐朽为神奇”的褒语是可笑的。

但借用这些褒语来称赞这一印纽的构思及其体现，看来和它是有其适应性的。如果不是像它这样由墨绿色的斑痕引起“剥出”一只甲虫的灵感，而是把刻好的甲虫胶合在不同的颜色的石材上，不论他的刻制技术怎么高明，也难于这样引起观察者的惊叹。作者依靠自己那在被动中求主动，变缺点为优点的才能和智慧，服从同时又突破了原材料的局限性，表现了艺术家的才能。

这些印纽雕刻，不都是利用了原材料色彩的对比美的，但小红甲虫和它的环境的色彩的对比也是有趣的。这些印纽雕刻，例如蜗牛、鳖以至蛇，好在利用了色彩的调和与照应，把生物与它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表现得很动人。说到底，这种在实际生活里引起可厌以至可怕之感的爬虫，一旦成为王鲁桓印纽雕刻的题材，其固有特征在构思中经过提炼取舍；某些特征例如皮肤那图案画般的花纹，笨拙而又灵巧的动态，在雕刻形体中居于显著地位而显得有趣；另外某些令人感到不愉快的特征被淘汰了。正如把甲虫这么平凡的素材变成不平凡的题材那样，这标志着这位一九六九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年轻的雕刻家进入了艺术才能趋于成熟阶段。王鲁桓这样继承和发挥了传统印纽的创造性，同时预示着尊重生活而不为生活所约束的艺术前景。

（一九八三年第九期）

一幅珍贵古画的复制

王庆恩

木版水印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印刷工艺。用它印制中国绘画，能够较好地再现原画绚丽多彩的特色和风格。这里发表的《韩熙载夜宴图》（以下简称《夜宴图》），就是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北京荣宝斋书画店用木版水印技术复制的。

流传千载的人物画杰作

这幅画，画的是我国五代（公元九〇七——九六〇年）时期南唐大官僚韩熙载私生活的一个片断。韩面对政治动乱的局面，不愿出任宰相，便借纵情声妓、夜饮行乐来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疑忌。皇家画院画师顾闳中奉后主之命，深入韩宅，窃窥韩府夜宴，回来凭观察和记忆绘成此图，李煜看后，终不敢再委韩以重任。

这幅画作为中国古代人物画杰作，笔法简洁精细。在设色上，它选用浓郁而绚丽的重彩，并予基本色调以丰富微妙的变化。而流传千载的岁月，又在画幅上留下痕迹，使之古趣盎然。复制这样一幅作品，自然是非比寻常。

传神入微的勾描

木版水印的生产过程，要经过“勾、刻、印、裱”四道工序。“勾”，是将一幅画进行分解式的摹拟勾描。比如一幅折枝

花卉，可以将红花、绿叶、紫枝分别描成三张图稿，一般最多描四、五十张。而《夜宴图》复制时却勾描了一千六百六十七张图稿。这些图稿，有的是勾描的人物轮廓，有的是勾描的背景器物，有的是反映的不同颜色，有的是显示的粗细线条。大至整个床帐陈设，小至琴上一丝一弦，无不分解勾描得细致入微。勾描用的是映写法，即将一张张透明的雁皮纸蒙在临摹好的画上，一笔一笔地复摹。但这不是简单的复写，勾描者必须有很高的书画造诣，才能将原作轻、重、疾、徐、刚、柔、顿、挫的笔趣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时要用高古游丝描法，有时要用刚健的界画技法。虽不能悬肘挥毫，亦须运腕空灵，勾到曲线或转折处，画笔在手指间不停地转动，使线条不滞不涩，流畅生动。

刻版一千六百多块

一千六百多张勾描图稿，意味着雕刻一千六百多块版。图是反贴在木版上的。刻版用的工具主要是一把锋刃呈月牙形的刻刀。刻者下刀必须准确有力，手腕又要十分灵活。如刻眼睛里的一个光点，犀利的刀尖在半个米粒大小的圆点里轻轻地一转，两转，就完成了。刻胡须就没有这么容易。从原作看，主要人物的胡须厚密而蓬松，光洁而不乱，很有风度。按照事先研究好的计划，这部分胡须刻了三块版：一块是较粗的胡须，一块是细胡须，还有一块是胡须下面的阴影。刻每根胡须都须使它上、中、下之间，线条的粗细变化起伏弯转十分柔和自然。此外，还要考虑到印刷。当刻到胡须的下部时，刻刀要稍稍向下偏斜，使一根根胡须下部向版内微凹、上部相对隆起，印刷的时候，上部印得重，线条实，下部只轻轻地和画幅接触，印成一条逐渐变细变虚的胡须尖。

三千多次套印

一般木版水印画都是用宣纸和油烟墨印制，《夜宴图》则完

全忠于原作，采用加工成古旧颜色的细绢印。墨是用的清代（公元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乾隆御墨，再加以脱胶处理，为的是印出来的墨色发乌而不发光。其它颜料如石青、石绿、蓝靛、朱砂、金粉等，大部分是故宫珍藏的清代皇家贡品，质量很高。

印刷在一张长方形的桌案上进行，版子用膏药作粘合剂固定在桌面上。一块版印完后，取下来换上另一块版。当人和物的大的轮廓印毕，就要在里面寻找套印细部线条和颜色的部位。人的五官位置固然不容有丝毫偏差，即使一道衣纹、一片阴影，也不能印得和原画走样。其次，要注意敷色。象韩熙载击鼓时的眼睛，眼神忧郁而迷惘，透露出他内心的矛盾。因此，这块版敷墨时就要在他的眼睑内边敷的有浓有淡，才能印出传神效果。

印刷中的另一难点在于绢和颜料之间的矛盾。绢是表面有纹路的丝织物，而颜料则大部分是矿物质的细小颗粒，这两者恰恰是不易结合的，弄得不好，颜料堆积在绢的表面，绢画不成其为绢画了。解决这一矛盾，主要是靠多印，即把一种颜色分多次印到画面上，由浅变深，使颜料逐渐渗透到绢丝里，同时在印的过程中还要不断调色。整个《夜宴图》的复杂画面，就是这样一块、一块版子套印了三千多次完成的。

这幅画在装裱形式上，也仿照原画装成手卷。前后加绫锦边饰，外盛以嵌银丝红木长盒。从复制动工到装裱结束，历时八年，由一位国画家和两位富有经验的师傅担任主要工作，共完成三十余件。其中大部分将供给全国各大博物馆展出或收藏。

（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从敦煌壁画看历代人民生活

常书鸿

敦煌是甘肃最西的一个小县份，纪元前二世纪还是匈奴占据的地方。汉武帝为了防击匈奴侵入中土，攻占了敦煌一带，于纪元前一世纪始辟了河西走廊，并设置了敦煌群；从此敦煌形成总绾东西交通的要隘，跟着也就繁荣起来了。

在第四世纪初期，敦煌成为佛教的圣地之一。千佛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地理的条件下创建起来的；其间经过隋、唐、宋、元各代的增修。在唐朝最盛的时候，有佛寺千余个。现在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统计，还有四百六十八个。这许多佛洞的内容，主唐是佛经传统中的经变故事的绘画与塑像。它们都是一千五百年间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是民族艺术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从那些丰富的壁画与造像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人民生活的真实形象。

一九〇〇年敦煌石室藏经被发现后，美、英、法、德帝国主义者曾先后劫夺了文书、绘画、雕塑等数万件之多。清代的昏庸官僚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各种民族宝藏的大量盗运出口，不但不加禁止，并且擅自准许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在我国从事发掘、收购，造成民族历史遗产的重大损失。

西北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根据政务院颁布的有关文物法令，将敦煌壁画加以慎重的保存。文化部文物局直接

领导下的敦煌文化研究所，正在该地搜罗散佚，整修洞窟。这些具体措施都表现了人民政府对文物遗产的重视。——编者

伟大祖国的人民，在五千年悠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个时代都留给我们丰富的，用祖先自己的血汗与智慧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反映了各个时代人民的生活状况。

敦煌壁画是创建在四世纪中叶（南北朝），当鲜卑族从西北侵入内地，统治中国北部的时候。随着印度佛教的东渐，敦煌当时是内地首先接触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同时也是汉文化从东往西的总关口。在那里，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印度佛教艺术的传统还保持着若干原来的作风；而汉代以来的中国艺术也在那里存留下极重要的代表作品。

如第一图所示的尸毗王本生故事，就表现了印度的作风。为了救活一只将要被鹰伤害的鸽子，尸毗王割了自己的股肉来赎回小鸟的生命，以致“气力不接，失跨堕地”牺牲了。提倡这种教义，是因为当时五胡十六国封建割据，纷争不已，无数善良的人民，在“尚寐无讹，不如无生”的怨怼声中过活。当时北方的统治集团之——北魏拓拔氏为了预防广大人民不满现实，群起反抗，因此拿这种消极的“行善”故事来作佛教徒（魏太祖拓拔氏就是以如来佛自居。）牺牲的典型。

然而这种麻醉政策，并不能消磨人民的意志。在当时社会生活中，虽然有专事清淡与风流潇洒的“骑士”，但也有从阴森可怖的佛教教义中解放出来、英勇仗义的战士。“战斗”一图，在变了色的黝黑的背景中，闪耀着生动的力量。“射鹿”是这个时期的“骑士”们，在山明水秀的原野中的行猎图。

唐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之一。那时的经济、文化都在稳步地向前发展。“唐代修建图”正显示这个建设时代是怎样由无数劳动人民的力量建设起来的。这里有优游自在的“郊游”，

有冠盖如云的“宴会”，却也有表现当时被压迫阶级的“纤夫”，正如当时的诗人杜甫所说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五代和北宋初年是一个动乱的时代，那时人民是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日的。敦煌因为僻东西陲，人民的生活还比较的安定，其中就有“典雅”的作品出现。从“马厩”与“挤乳”两幅壁画的人物中，我们可以看见“文质彬彬”的风格。“耕地”“收割”“扬场”，是一幅表现三个场面的，宋初的壁画，那是描绘着农民们辛勤操作的生产过程。这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怎样地以自己的血汗来建设我们的祖国。

（一九五一年第二期）

宫伎图

郑振铎

唐寅（公元一四七〇——一五二三年）字伯虎，一字子畏，晚号“六如居士”，吴县吴趋里人，是明代中叶伟大的画家之一。他和沈周、文璧、仇英三人并称为“明代四大家”。早年的时候，中应天乡试第一，为同考的人所牵累，从此不再去考试，也不出去做官吏。他靠卖画为生活。他的画很得人民的欢迎。四方慕名的人，无日不诣其门征索。山水人物，都很精妙；而唐解元“美人图”尤受世人的重视。宁王朱宸濠（明代藩王之一），以厚礼聘请他到江西去。他不惯藩府的生活，不久即回家。他有诗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起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又作《野重惘言图卷》，写江南人民遭受水灾的流离颠沛的情况。他是关心人民大众的痛苦的，是清勤自励、自食其力的。这幅《孟蜀宫伎图》，写五代时蜀后主孟昶宫庭中的宫人生活。所谓宫伎，就是宫庭中奏演音乐伎艺的宫女。图中，二宫伎着道衣，戴莲花冠，旁有二侍女捧持酒果，在侍应她们。画得很生动，很工丽；作风清逸，而格律谨严；可以说是一笔不苟。唐寅所作的标准的《美人图》，也是元明清三个时代里最好的人物画的代表作。唐代有些女道士像女诗人鱼玄机生活都很风流放荡。蜀后主把他的宫人装扮作女道士的样子，可见他宫庭生活的放浪糜烂。唐寅在这幅画上的题词，就已指出了这一点。（一九五二年第九期）

韓熙載夜宴图

郑振铎

五代（公元九〇七——九六〇年）的人物画，承继了唐代吴道子、张萱、周昉的作风，而更加发挥光大。蜀中、江南二地，大画家尤多。江南的人物画家著名者有周文矩、李景道、李景游、顾闳中、顾大中、郝澄、王齐翰诸人。在其间，顾宏中画的《韩熙载夜宴图》，独盛传于世，后人摹本甚多。闳中（约公元九一〇——九八〇年）事李氏为待诏，善作人物画。李后主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北人仕江南，颇受疑忌。“多好声伎，专为夜饮”。后主“欲见其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之上。”（宣和画谱）这就是我们所见的这幅《夜宴图》。明代朱存理《铁网珊瑚》和清初吴升《大观录》，卞永誉《式古掌书画汇考》所著录的一本，有元人赵升、郑元祐、张雨、钱惟善诸人题跋的。又安仪周《墨缘汇观》所著录的一本，有文征明标题，周天球书传的，今均不复见。疑皆是摹本。今所传此本，朱、安诸人未及见。卷首有宋高宗题语（残存二十一字），卷末有“绍兴”一玺，并有元人班惟志一跋（公元一三二六年），清初王铎一跋及梁清标藏印。疑早入明宫庭，清初始散出，为真定梁氏所得。后复入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卷三十二）。当即是宣和画谱著录的一本。画心高二八。八公分，长三三二。五公分。全图分为五段：第一段写韩熙载及

诸客宴饮，听李家明之妹按胡琴；第二段写王屋山舞六么，熙载为击鼓；第三段写诸客散后，熙载与诸女妓休息之状；第四段写熙载易衣坐，听诸女妓奏管乐；第五段写客之尤妮近者和诸女妓调笑言情之状。第一段和第二段写得最好。主和客或静听，或注目于弹琴者的手上，舞六么者的身上，击鼓者的鼓槌起落上，令阅者仿佛如见其状，如闻其声。闳中的是写生高手。在衣冠文物制度，乃至樽俎灯烛，帐幔乐具，床椅桌屏之类方面，也无不足为历史学家的考据的最好资料。所以，《夜宴图》不仅是一幅艺术高超的作品，且也是表现封建社会生活的资料丰富的纪录。

（一九五四年第三期）

千里江山图

叶恭绰

北宋（公元九六〇——一一二七年）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石渠宝笈”列入上等，现藏故宫博物院。王希孟历史无可考，仅从蔡京在本卷跋语中，知其在北宋政和（公元一一一一——一一一七年）中为画院学生，经宋徽宗（赵佶）指授于政和三年（公元一一一三年）画成此卷，年仅十八岁，其早慧可想。宋牧仲论画绝句有云：“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自注云：“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作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其遗迹只此耳。”此卷计长一一八八公分，高五一。三公分，用一幅绢画成，卷中亦无题款。

考赵佶当时建立画院，分待诏、祗候、艺学、画学正、学生各级，以时考试定其高下，为升进之阶。其考试题目如：“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之类，皆皇帝自行命题。赵佶极重写实，如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脚、鸟类以漆点睛等，其体物之精，赋色之巧，实超出一般画人。故优秀画家多由其亲自教导，宜其画风盛极一时，成材日众。观希孟以髫年入学，由皇帝直接训诲，不一岁即成此卷，虽由其人本具天才，而画院教导之得宜，师承之得力，概可想见。

此卷优点，在千里江山一气写成。不重复亦不断续，不粗漫

亦不拖沓，无弱笔亦无犷气。水村山郭、幽岩邃谷、市肆舟航、波涛烟霭，草树禽鸟，无所不有，亦无处不工，毫不显其复杂凌乱，宛如一幅自然风景。与《清明上河图》在构图上有异曲同工之美。《上河图》地仅二、三十里，且意在表现人物之殷阗，民俗之殊异，故于二者加以渲染，而略于山川风景。因此图中人物虽多，但觉其丰穰，而局势不形局促。此图即命名江山千里，地形辽阔，故注重山川风景，仅以人物、屋宇舟车等互相映带，令观者等于卧游，而不觉其空廓。其实寸人豆马，皆穷工极巧，则两者相同，不过此因千里之大，一切皆须压缩，故尤觉因难见巧耳。

余旧藏北宋燕文贵山水长卷，细入毫芒，而笔笔精到，无一懈处，可云独步，但究觉气势韵味，均嫌平浅。此卷精密处与燕文贵抗衡，然气势活泼，韵味深浑，实为北宋第一件大着色的写实山水画。

至于局部优点，则见仁见智，固各不同。即以所着青绿色而论，其中有树的青绿，有山水天空的青绿，其法不同。效果亦各异。又如树干用没骨法，房屋本用界画，有时亦带写意；人物极为精细，几于衣褶动作均能表现，但仍绝不平板，其技巧殆臻绝顶。宜乎卷末溥光和尚跋语云："睹此卷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也。"

（一九五七年第四期，作者原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主席）

宋人花鸟

于非闇

宋代（公元九六〇——二七九年）是我国花鸟画最盛的时代。画家描绘花鸟从写生入手，要求尽情、尽理、尽态，在技巧上达到简练传神，反对一味的工巧柔媚。当时各派画家辈出，留下很多优秀作品。单是《宣和画谱》中著录的宋人花鸟画就有一千六百七十幅。

宋徽宗赵佶的《芙蓉锦鸡》图是一幅诗、书、画俱绝的作品。从歌颂锦鸡的题句上可看出作者是先有了诗情，然后进入画意的。他用迎风飞舞的芙蓉花，衬出五色缤纷的锦鸡，锦鸡又凝视着双双蛱蝶，巧妙地表现出一片艳阳天气的场景。

马远的《梅石溪凫》图笔法简净，每一梅枝、苔点，都斟酌再三然后落笔。而笔情墨趣又活泼有力，可以想见画家对一溪一涧无限热爱的感情。

李迪的《鸡雏》图是一幅生动活泼的作品。他虽只写两只鸡雏，但使人充分体会到春暖花开、万物繁荣滋长的意境。

无名氏的《红蓼水禽》图捕捉住蓼岸边一瞬间的动态。鸟是鹡鸰，以小鱼小虾为食。画家从鸟的特征，联想到秋水明净、水中事物的隐现，因而水面上用“双勾”，水皮里用“没骨”的两种技法，尽情尽理地得到了物态的统一完整和生动有力。

（一九五七年第七期）

永乐宫壁画

郑振铎

我国壁画具有悠久、光辉的历史。在辽阳、望都的汉墓里今天还可见到汉代壁画，敦煌千佛洞大量保存着北魏到元代的壁画，西安出土的几个唐墓里也有很精采的壁画。此外，在荒僻的古寺庙里也保存了很多壁画。

永乐宫位于山西永济县城东南一百二十里，靠近黄河北岸，相传是九世纪道教仙人吕洞宾的故宅。唐代在故宅建吕公祠，宋、金时改祠为观。元中统三年（公元一二六二年）观被毁于火，在原址重建“大纯阳万寿宫”，规模极为宏大。现存五进建筑，除大门是后代重建的以外，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和七真殿都是原来建筑的一部分。在这四进建筑里都有元代壁画。

无极门里的壁画损毁十分严重，今仅存东梢间东北壁上一小块，所画天丁力士等神情威猛，衣带飘飞。

三清殿是永乐宫主殿，面宽七间，进深入椽，其四壁及神龛内外满绘壁画，高达四公尺二十六公分。相传所画为三百六十值日神像，实有二百九十一人，以八个主神为中心，围绕着仙伯、真人、神王、力士、金童、玉女等。主神作帝、后装，神情肃穆或立或坐，形象优美。侍立的男、女、老、少、文、武，或执笏，或执武器，或持伞扇，或捧宝物，或慈颜悦色，或怒目圆睁，或安静宁谧，或意兴奋发，或左顾右盼，或有所申诉，或直立倾听，

表情和衣饰都各有特色。这幅宏伟杰作充分表现了画家的创作气魄。

纯阳殿四壁的“纯阳帝君仙游显化之图”，是吕洞宾传说故事的连环画，以五十二幅画面构成，描写平常人物形形色色的活动。假如说三清殿壁画是富丽堂皇的话，那么这五十二幅便是精雕细斫的生活记录了。三清殿壁画上有泰定二年（公元一三二五年）六月“马君祥长男马七待诏”的题记，纯阳殿壁画也有至正十八年（公元一三五八年）禽昌朱好古门人李弘宜、王士彦等人的题名。这些画家都是新发现的人物，他们的创作在我国绘画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七真殿亦名重阳殿，四壁的壁画描写王重阳和他的七个弟子的故事，以四十九幅连环画构成。这些壁画和纯阳殿一样，是研究宋、元社会的重要资料。

永乐宫壁画是最近几年发现的古代优秀壁画之一，不但画的内容千变万化，无所不有，其风格之高超，人物之传神，都是值得我们画家、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加以深入细致研究的。

（一九五七年第八期）

游 春 图

宗白华

如果我们把隋唐的丰富多采、雄健有力的艺术和文化比作中国文化史上的浓春季节，那么，展子虔的这幅《游春图》便是隋唐艺术发展里的第一声鸟鸣，带来了整个的春天气息和明媚动人的景态。这“春”支配了唐代艺术的基本调子。如果我们把唐代艺术文化比拟欧洲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那么，展子虔这幅《游春图》就相当于十五世纪意大利画家菩提彻利(BOTTI CELLI)画的《春》和《爱神的诞生》。在意境内容和笔法风格上，两者都可做有趣的比较。展子虔这幅画里的“春漪吹鳞动轻澜”（原画后冯子振题诗）可以和《爱神的诞生》里两个风神在空际吹着春风、水上涟漪粼粼的景态相通。《游春图》里的“桃蹊李径葩未残”（冯题句）也可以和《春》里的满地落英缤纷相对映。展子虔用笔尚未脱尽六朝以来山水画的稚拙纤细的风味，菩提彻利也一样。正是这种稚拙味令人玩味不尽，给予后人深刻的感受。但展画和菩画也有不同处，这就是后者仍以人物(裸体女神)占主要地位，而前者已以一望无边咫尺千里的开阔山水为主要对象了。中国山水画在六朝已经萌芽，《游春图》正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幅完整优美的山水画，它在我国艺术史上具有极大的价值。

关于展子虔的事迹，我们知道的不多。他生活在第六世纪下半叶。公元五八九年隋文帝在东都设立“妙楷”、“宝迹”二台，

藏古字画，展子虔曾从江南去服务。他擅长山水、人物、台阁，也画过不少壁画，他用笔虽未尽脱六朝遗意，但已摆脱了佛教的悲观出世情调。他用细致遒劲的线条描绘形象，尤长于以青绿色作主调。如这幅《游春图》便用青绿钩填，所画春山花树、殿阁游骑，线条纤细活泼，色调明快秀丽，看了令人喜爱山川，珍重生活。

宋朝大批评家董逌在《广川画跋》里赞扬他画的马说："展子虔作立马而有走势，其为卧马而有腾骧起跃势，若不可掩复也。"在山水画中，他也抓住了物的内在生命，表现出山川的全面景象和这景象里的流动气氛——春。

（一九五八年第三期，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刘松年山水画卷

唐兰

刘松年的山水画卷分四段，设色描写四时风景，很工细。第一段是一座别墅，前有小溪，桃花正开，主人将游春，饮食器皿都已备好，担子歇在门前，仆人坐在门廊向里望，像在等候主人出来；另两个仆人正牵马过桥来。第二段是湖边风景，湖中开着荷花，小岛上有凉厅，主人靠在厅中匡床上，悠然自得。厅后联结长廊，隐入山林中。第三段的红叶表明是秋天，主人端坐屋中凝想，两个童子忙着烹茶。第四段是雪景，主人骑驴出门，正在过桥，一个童子牵驴；家里的童子拉开窗帘看雪，露出半面，像是怕冷。栏柱顶上都盖着雪，但河里面还有水纹。可见是在江南。

刘松年是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的画家，钱塘（现在的杭州）人。他和李唐、马远、夏珪，合称“南宋四大家”，都是画院里的领袖。公元一一八〇年前后他做画院的学生时，名气已很大。公元一一九〇年以后，成了“画院待诏”。后人推崇他是“院人”中的绝品。宋宁宗时（公元一一九五——一二二四年）他画过《耕织图》，皇帝很满意，赏给一条金带。

李、刘、马、夏四家，代表了南宋院画的三个时期，李是北宋徽宗时人，在画院里是前辈，刘、马差不多同时，夏略晚一些。南宋的院体画着重细处的描写，刘松年尤为突出。可惜他的画流

传下来的真迹不多（相传不满十幅）。这个画卷是画了几年才成的。他用心精巧，笔力细密，楼阁界画极其工整，人物寥寥数笔，神气逼肖，富有院画的特点。明代画家像唐寅的作品就是从这一种画派加以发展的。刘松年处在南宋后期，小朝廷已没有恢复疆土的要求，他所见的又只是江南山水，因此画题范围不够广阔，只限于描写当时士大夫的闲居游赏，虽然如此，他的画还是反映了一些当时的现实生活，加上描写的一笔不苟，所以每幅都能引人入胜。这是后来一些反对院体者的画里所找不到的。

这个画卷在清初人的著作里提到过，绢上有“太监梅氏图书”的印，可能在明朝皇宫里收藏过，现藏故宫博物院。

（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作者原为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

虢国夫人游春图

唐　兰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张萱的作品，但原画已失，这里发表的是宋代（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杰出画家赵佶的摹本。它是研究唐代人物画的重要范本之一。

唐代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当中，是最辉煌的时代。由于唐初实行一些缓和阶级矛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特别是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封建经济很快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到了“盛唐时代”（公元七一三——七五五年）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不仅诗歌发展到高潮，艺术也有灿烂的成就。在唐代，人物画极为普遍，杰出的画家辈出，如阎立本，吴道子，卢棱迦和韩干等，都是“写真名手”。张萱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画家。在唐代的人物画中，不仅显示出画家非凡的技巧和独创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画家以当时现实生活为对象的进步的创作思想。

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所描写的是唐玄宗贵妃杨玉环的三个姊姊虢国夫人等贵族生活的一个片断。画面上只画着九人乘马逡巡前进，在最前面引导的是一个穿长袍的小官吏，两个穿红衫的侍女跟两个白袍皂靴的侍从则前后簇拥着三个穿长裙的贵妇人。左边穿绿裙的妇女，勒马回头，照应后面，她的整个丰满而美丽的脸庞，突出地呈现在画面上，显然她是这幅画的中心。整个画面除了人骑以外，没有别的陪衬，但从这些人的春装和安

闲的态度，充分表现了他们正在春游的情趣。画家从现实场面中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作集中的描绘，可以看出作者手法的高明。至于人物形态的生动、描写的细腻与色彩的艳丽，也都表达出唐代绘画的风格。

这个摹本对于原画来说是得其神髓的。

（一九六〇年第十二期）

中国古代绘画的光辉艺术成就

邓　拓

中国古代画家的许多杰出的作品，在人类艺术的宝库中，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现在我们纪念的中国古代十大画家，都有作品传世；他们在艺术创作上的伟大成就，尤其值得重视。

这里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晋代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画家根据三国时代（公元二二〇——二八〇年）魏国的诗人曹植的《洛神赋》，画出了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的动人情节。这是通景连续的画卷。画家的美妙想象和艺术手法完全结合在一起；他描绘山水和人物的精湛技巧，从这个画卷上也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看吧，这个画卷的第一段出现了洛水岸畔暮霭苍茫的景色。楚襄王和他的八个侍臣正在水滨眺望。这个楚襄王的形象，实际上是诗人曹植（当时位居东阿王）的化身。洛水上这时出现了女神宓妃。这个美丽的宓妃的形象，实际上是曹植内心锺爱的饱受折磨而死的女人——甄氏的化身。诗人描写这个洛水之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而画家笔下的这位女神的神态也恰如其分。你看她含情脉脉，似有无穷幽怨，把岸上的人弄得呆住了。这个时候，天上飞过一对鸿雁，青龙也在飞舞，月亮正躲在云彩旁边，轻风吹拂着岸上的树枝，水波荡漾，芙蓉开花。画家以行云流水般的彩笔，

把诗人无限缱绻之情，完全形象化地表现无余了。

顾恺之的艺术造诣和他自己的“迁想妙得”的绘画理论，显然是一致的。所谓“迁想妙得”恰恰是在实际生活基础上的想象和夸张的结果。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一书中评论顾恺之，说他“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这是一点也不错的。元代汤垕在《画鉴》一书中也说：“顾恺之画如春蚕吐丝，……有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者。”这也是很恰当的论断。

但是，顾恺之的主要成就毕竟是在人物的传神写照方面，至于山水画的主要成就却应该归功于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的画家李思训。

我们且把李思训画的九成宫纨扇来做说明吧。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位大李将军的独创风格——金碧山水和界画的显著特点。

大家知道，唐太宗贞观年间，曾把隋朝（公元五八一——六一八年）的“仁寿宫”做了一番修理，改名为“九成宫”，作为避暑的行在。李思训画了好几幅九成宫图，这一幅在纨扇上的图画，集中地表现了九成宫的壮丽景色。他用界尺来画宫殿建筑，用金粉来勾勒各种轮廓和线条，用青绿朱砂等重彩来装饰全部画面，形成了后来所谓“北宗”山水画的重要流派。这是李思训在继承六朝彩画的基础上富有创造性的一个巨大发展。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这就是说，山水画在吴道子手上已有某些变化，而李思训和他的儿子李昭道却完成了这一发展。吴道子和李思训是同时的人，而李思训用笔工细，在这一点上更胜于吴道子。汤垕在《画鉴》中进一步肯定了“李思训画山水，用金碧辉映，为一家法。”这个评语直到今天难道有谁能够加以否定吗？又有什么必要加以否定呢！

从李思训开始的北宗山水画派，在宋代又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画家，王诜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娶了宋英宗的女儿，身为“驸马都尉”的画家，传世的作品已经不多了，有一幅“渔村小雪”是近

年来人们比较熟悉的。看那雪后的江村，隐约地有一些阳光照射着山崖水畔，渔夫冒雪捕鱼，冲寒撒网。画家对于树石的勾勒和皴法，不但接受了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的衣钵，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其特点是对于青绿重彩的用法，不像前人那样呆滞，而有所控制，比较灵活，因此气韵相当生动，能够较好地表现客观的自然美。

在山水画中别开生面的画家，还必须承认是宋代（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的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他们二人用泼墨画云山，烟峦飘渺，树影迷离，淋漓尽致，生动非常。可惜他们传世的作品极少。米芾又是宋代著名的大书法家，他在珊瑚帖上画的一个珊瑚笔架，当然不能算作正常的图画；但是，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却还保存得比较完整，很可以代表他们父子共同的云山真面目。如果我们把后人学习米家的云烟墨戏和推陈出新的成就，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那末，米氏父子对于中国山水画影响之大就不难想见了。

宋代还有一位李公麟，也是我们今年正要纪念的十大画家之一。他本来什么都画得很好，不过人们公认他画的鞍马和人物最能传神。我们看他临摹的《牧放图》吧。在一个画面上集中地画出了一千多匹马和一百多个看马的人们，而构图却很精妙，这种技巧不能因为它是临摹而加以抹杀。事实上，李公麟画马是他平素深入观察群马的结果。据说他每过马廐，"必终日纵观，至不暇与客语"。即便卧病在床，他也要用手指在被子上点划，练习作画不稍停，可是他多么刻苦用功啊！

绘画发展到元代（公元一二七九——一三六八年）情形又有新的变化。当时很多士大夫文人和艺术家，对于元朝的残暴统治极端不满。他们自己又是封建阶级，对广大农民反抗元朝的武装起义不但不敢参加，甚至还要反对。这样既不满于现实又不赞成农民起义的矛盾心情，就造成了他们逃避现实、提倡超逸的艺术倾向。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倪瓒就是这种倾向的最突出的代表。例

如，他画的《秋亭嘉树图》，同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完全反映了他那荒凉幽寂的精神状态。从这幅画面上，你可以看出，他用的是干笔，蘸着淡墨，以侧锋皴擦和点染着疏林、远山、浅水、茅亭。他的山水画和他的题诗相同，又严谨又萧散，具有所谓天然幽雅的特色，似乎真的没有人间烟火气，而在幽寂中寄托他的被压抑的感情。

后来有许多山水画家都喜欢学习倪云林，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画派。元末明初的王绂便是师法倪云林的一位画家。但是，王绂却比倪云林留下了较多的写实作品，燕京八景图卷就是一个证明。这里只举出其中的《蓟门烟树》一幅为例，由此可以仿佛想见当年北京德胜门外的郊野景色。你看他的笔墨运用，虽然处处都还是写意的，而它以写实为基础却很明显。

到了明代（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画坛上出现了徐渭这个大画家，把水墨画推上了新的高峰。他不但用泼墨写意的方法画出牡丹、葡萄、芭蕉等各种花卉，都极其神似；而且同样用大写意的方法来画人物，寥寥几笔，神情便活跃在纸上。例如，有一幅《驴背吟诗图》，笔墨奔放淋漓而又刚劲有力。这幅画笪重光题为吟诗图，其实并非吟诗图。看那只驴子的四条腿和四只蹄，充分表现了它在迅速奔驰的动态，驴的耳朵和尾巴也正是我们在农村中常见的“跑驴”的特点。他用非常简练的笔墨勾划了一个老头，戴着一顶毡帽，两眼耿耿有光，正在注视着前方；他提起了缰绳，催促驴儿急速前进；秋风迎面吹来，掀动他的袍袖和帽带都向后飘拂，树上的枯枝、野藤和残叶也摇曳在风前。这幅画很足以代表徐渭自己的性格。他对明代封建统治的不满和自己在坎坷的遭遇中养成的坚韧而豪放的精神，在这个画面上充分流露出来了。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八大山人的作品。这个出身于明朝宗室的贵族子弟，对清朝的统治极端不满，力图反抗。在这样的基础上

就产生了他的绘画的特殊风格。正如郑板桥所说的，八大山人以及和他同样的几个画家的画，都是“墨点无多泪点多”，这是完全恰当的评语。在这里，我们只要举出一幅《四喜图》就足够说明一切了。这幅画是用了淡彩色的，在八大山人的作品中极为少见。但是，画面上的枯树、危石都是光秃秃的，一点生意也没有。四个喜鹊有两个在那里哀鸣嚎叫，有两个已经悲伤欲绝了。这简直不是什么“四喜图”，而是“四哀图”啊！他的作品大都是这样愤世嫉俗的，极力暴露和讽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他创造了新的绘画风格，给予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画以巨大的影响。

看了中国古代十大画家的作品，我们应该对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光辉成就感到自豪。既然有这样丰富的艺术遗产，我们怎么能够不百倍努力把它继承下来，并且加以发展呢！

（一六九一年第六期）

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

邓　拓

我国湖南零陵以西，为潇湘二水合流处。山水平远，风景清幽。历代诗人、画家，多有吟咏、绘图，流传至今。苏东坡所作潇湘竹石图卷，可谓古画中杰出作品之一。

展开全图，隽逸之气扑人。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石头，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渺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会，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

记得苏东坡曾作六言诗一首，题惠崇潇湘芦雁图曰：

“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

欲买扁舟归去，故人云是丹青。”

今观东坡此画，恍惚置身于潇湘洞庭之间，似乎比惠崇画中意境更为深远。

还应该记得，东坡曾题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三首，诗云：

“西征忆南国，堂上画潇湘。照眼云山出，浮空野水长。旧游心自省，信手笔都忘。会有衡阳客，来看意渺茫。”

“落落君怀抱，山川自屈蟠。经营初有适，挥洒不应难。江市人家少，烟村古木攒。知君有幽意，细细为寻看。”

“咫尺殊非少，阴晴自不齐。径蟠趋后崦，水会赴前溪。自说非人意，曾留入马蹄。他年宦游处，应话剑山西。”

其中许多诗句，用来题咏东坡自画之潇湘竹石图，其实也无

不可。

东坡学问、事业、文章、品行及一生遭遇，彰彰垂于青史，人所共知。然于诗、文以外，东坡之画流传绝少。实则，东坡能画，而且擅长于画竹、画石。据宋代何薳《春渚纪闻》所述，东坡作画，有不少动人故事。何薳字子远，福建浦城人，生当十一世纪末期至十二世纪初叶，为东坡晚辈，所记当较确实。据载，东坡时常作画，可举二例为证：

“先生戏笔所作枯木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薳家所藏枯木并拳石丛篆二纸，连手帖一幅，乃是在黄州与章质夫、庄敏公者。帖云：某近日百事废懒，惟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后又书云：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是公亦欲使后人知之耳。”

“先生临钱塘日，有陈诉负绫绢钱二万不偿者。公呼至，询之。云：某家以制扇为业，适父死，而又自今春已来，连雨天寒，所制不售，非固负之也。公熟视久之，曰：姑取汝所制扇来，吾当为汝发市也。须臾扇至。公取白团夹绢二十扇，就判笔作行书、草圣，及枯木、竹石，顷刻而尽。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偿所负也。其人抱扇泣谢而出。始逾府门，而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后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胜而去。遂尽偿所逋。一郡称嗟，至有泣下者。”

由此可见，东坡作画，简直随手拈来，自成一格。无论在纸上、绢上，随便用墨、用笔，如同写字一般。细看此图所画潇湘竹石，更加证明东坡画法具有极大创造性。画石用飞白笔法，画竹用楷书及行书撇、捺、竖、横等笔法，而稍加变化，画烟水、云山、远树则用淡墨点染，气韵生动。黄庭坚说：“东坡居士作枯槎、寿木、丛篆、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诚非虚言。而此画寓意深远，尤为难得。想见东坡当时心境，大有屈子

离骚情调。卷末题“轼为莘老作”五字。莘老与东坡际遇有相同之处，堪称同调。五字题款语句简练、亲切，与东坡文章风格一致；字体古朴、浑厚，一见而知其为真迹无疑。

当时东坡好友孙觉、刘挚二人，都以莘老为字。东坡题款称“为莘老作”，究竟是哪个莘老？似乎不便武断。因无论孙觉或刘挚，都有一个时期，在政治、思想、感情上，与东坡十分亲近。以致后来孙、刘二人，与东坡同样，被列名于“元祐党籍。”《东坡集》中有许多诗、文、书札，或寄孙莘老，或寄刘莘老。不过，孙莘老又是东坡同年友，比较而论，苏、孙之交比苏、刘之交更加深厚，则可断言。

按东坡生于公元一〇三六年，死于公元一一〇一年，估计此画创作时间，当在公元十一世纪后半期。当时北宋画院尚未成立，以东坡等人为代表之文人画派，运用直接观察方法，概括客观事物特征，自由写意，不受拘束，所以在画史上发生深远影响，后人得其作品，无不珍如拱璧。

九百年来，如此伟大作品，辗转保存至今，历代收藏家之功，固然不可抹杀。而此画左下角及其后幅有历代题跋文字三千余言，凡二十六家，更足为研究画史者之重要参考资料。此二十六家为：湘中杨元祥、天台叶湜、浙右李烨、闽郡郑定、吴郡钱复、钱唐高让、庐陵吴勤、檇李钱有常、庐陵蔡源、古籓李景让、华亭吴仲庄、豫章包彦肃、永嘉陈琦、温陵张仲宾、宜隐轩、独善、云安后学、钟山幻居师、南昌熊冕、复庵、赜庵、月坡道人、临川黄阳、升庵杨慎、松泉夏邦谟、古濠胡桐。题跋最晚之时间截止于明代嘉靖辛酉，即公元一五六一年。自此以后，一直秘藏于金陵李家，不肯示人，故无人得知，而为明清以来著录家所未见。

读各家题跋，实际上便是一部专题著录。其中有许多名家墨迹，为今人所罕见。如元代福建十大才子之一——闽郡郑定之墨

迹，便是一例。郑定字孟宣，号澹斋，福建闽县人，为人有豪侠之气，论文讲武，善击剑，工篆隶，能诗词，著有澹斋集。此处题跋以草书写七绝一首，笔舞龙蛇，令人想见其舞剑之雄姿，非常难得。其诗曰：

“苏老才名重古今，人间遗墨若南金。山云挟雨溪头过，石上琅玕起夕阴。”

再如，高让、吴勤题跋墨迹亦属难得，高让字士谦，仁和人。明代洪武初年，曾任西湖书院长，累官至翰林院编修，能画，工墨竹。其题跋系一首四言诗，句云：

“秀毓峨眉，文鸣韶武。永叔齐名；与可为伍。竹比翔鸾；石如蹲虎。适兴一时，清风千古。”

吴勤字孟勤，庐陵人，居永新，少负英名，明洪武初试经学第一，除武昌教授、开封府教授，召入史馆，门生满天下，著有《巨山樵者集》、《黄鹤山樵集》、《幽翁集》、《六义斋集》。所作诗文，温淳平易，不为险刻峭厉之言，写字有晋人风格。此处题诗墨迹便是最好证明。原诗写道：

“坡仙昔在黄州时，居闲每访孙莘老。竹石曾将写赠之，遗墨到今真是宝。”

又如，明代著名学者杨慎，用七言排律题一首竹枝词，尤其值得珍视。杨慎四川新都人，字用修，号升庵，于正德、嘉靖两朝，因抗疏、撼门力谏，廷杖，下狱、削籍、流放云南。嘉靖戊午，公元一五五八年，升庵时年七十，乞归老于新都之桂湖，途径泸江之阳，游江山平远楼，遇金陵李甲峰，出示东坡画卷，升庵即席题诗曰：

“东坡学士湖山暇，南国清游继颜谢。舟楫行供苕霅吟；云烟坐入潇湘画。越人翠被雨波寒；官奴锦瑟歌声阑。挥毫写尽风中态；掀舞犹疑掌上看。琅玕落纸珠生唾，画绝名缣诗寘和。未论名价重三都，先遣风流惊四座。仙翁去后几百秋，江光清澈鱼龙

收。三湘夜冷黄州梦；九疑云远苍梧愁。君从何处得真迹？云是世传珍且惜。金陵携来到江阳，卷示当风开盈尺。江湖散人天骨奇，抹月批风画里诗。散花楼上新知乐，且共离筵听竹枝。”升庵与东坡，相去五百年，彼此身世之感，仿佛如一。当升庵题东坡画卷时，云南巡抚已奉嘉靖密谕，以缇骑追捕升庵，重返戍所。翌年六月，升庵遂死于昆明。此竹枝词长跋流传至今，可谓升庵稀有之遗墨，岂不可贵！？

还有其他许多题跋内容，恕我不能一一介绍。但是，总观二十六家题跋，都非泛泛应酬之作，而是针对东坡之潇湘竹石图立论。如叶湜说："百年翰墨留真迹，应写潇湘雨后枝。”李烨说："好似湘江烟雨后，令人不厌倚蓬看。”复庵（即梁复初）说："天高洞庭月，地远潇湘云。”月坡道人（道号起宗）说："有兴正忆孙同年，起来淋漓泼醉墨，写出一幅潇湘烟。”特别是历任工、户、吏三部尚书之夏邦谟，在题诗中更将潇湘景色作形象化之描写，说道："东坡逸迹天下奇，竹石点染潇湘姿。恍惚二妃倚薄暮，林间或有泪痕垂！”读此题诗，更令人引起无穷感慨。

现在东坡作品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就此进行多方面的分析研究，还是刚刚开始，有待于文物鉴赏家、艺术评论家、国画家、收藏家及其他热心人士，大家共同努力考证、解释，更进一步接受这一份可贵的文化艺术遗产。

（一九六二年第六期）

岭南画派

黄笃维

近百年来我国的绘画有着很大的变化，名家辈出，赵之谦、任伯年、虚谷、陈师曾、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他们均在吸收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大胆创造，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同样，广东的绘画也起了变化。擅绘花鸟草虫的画家居巢、居廉兄弟，因其作品重视表现生活，格调新鲜而影响广东的画坛。近代著名画家高剑父(公元一八七八——一九五一年)、陈树人(公元一八八三——一九四八年)便是居廉的得意门生。当他们跟居廉学画的时候，正值二十世纪初欧洲现代绘画各流派兴起，日本的绘画也受欧洲艺术思潮影响而在改变。高剑父、陈树人除向居廉学画外为了追求新的东西，后来又到日本去留学，学习了西洋绘画的技法。因为受到了各种艺术的熏陶与启示，他们回国后便与高奇峰(公元一八八九——一九三三年)积极倡导新国画运动，并努力造就人材。当时剑父创办“春睡画院”，其弟奇峰设有“天风楼”，他们主张绘画应在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新，试图在创作中吸取外来技法的营养，创造新的形式。他们重视写生，以造化为师，由此也扩大了作品的题材范围。

他们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大胆进行创造，但在当时却引起了社会的种种非议与指责，说他们的作品缺少传统的笔墨，指责他们“东洋味”，并称之为“折衷派”等等；可是，他们并不因此而丧失信

心，相反，却把这种革新的精神继续坚持下去。由是作品渐为人们所理解，影响逐步扩大，这一派绘画也随之发展起来，声势日大。

广东位于五岭之南，因为气候得宜，四季如春，百花长开，人民风尚与生活习惯的不同，也构成了艺术上鲜明的地方特色；这在广东文化 艺 术 史 上有不少鲜例。一个画派的形成，当然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并应为群众所承认，否则便失却它的力量与作用。人们把这一派绘画称之为“岭南画派”，不是没有原由的，因为他们的作品能突破前人的窠臼，表现新的感情，并且又显示出一定的地方色彩，而有别于同时代的画风。像高剑父的作品，用笔豪放泼辣，色彩丰富明丽，常以单纯的笔墨描绘出复杂的对象。从作品《昆仑雨后》可以看到画家的功力与艺术气派，显示出无比的生命力。高奇峰所绘花鸟，笔墨浑厚，墨色之刚、柔、厚、薄，无不讲究。他善于渲染，使色彩既富于变 化 而 又 显出特殊的效果，《梨花双鸠》可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这一派画家中陈树人的作品则别具风趣，章法新颖，境界清新，花鸟富丽而脱俗，山水雅淡而奇趣。作者不仅长于绘画，也善诗词，因而他的画可当诗读。《鼎湖飞瀑》以新的表现方法描绘出具有南方特色的景致，充满了诗的境界。他们的作品，不仅在渲染方法上显出独有的特点，同时对色彩的应用也甚讲究，因而使得画面湿润、华滋的气氛和情调更为突出。从总的来看，他们在表现方法上虽有共同的地方，但在艺术效果上仍然明显地保留着每个人独特的风格。

岭南画派经过不断的努力逐步得到发展，不仅在广东画坛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并引起了全国美术界的注意。解放以后，美术界对岭南画派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做了许多研究工作。高剑父的弟子方人定、关山月、黎雄才等，除了师承外，从作品的内容或形式，艺术构思与表现技巧，都有了新的造诣，使这一画派，能得到继承和发展。

（一九六二年第九期）

明代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

唐 兰

沈周(公元一四二七——一五〇九年)是明代中期以后绘画家的领袖。他和他的弟子文征明都享高寿,先后获得重名,后世称为"文沈"。他们都是苏州人,学习他们画法的称为"吴门派"。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晚年自号白石翁。祖父和伯父、父亲都工诗文,能画。他从小继承家学,以诗文著名。在绘画方面,还得过当时名画家杜琼和刘珏的指授。他家里收藏过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以及其他有名绘画,在亲友中也有很多收藏家,所以见闻很广。他一生不愿做官,专心于研究诗文和绘画,把诗和书法绘画艺术融合起来,得到很大的成功。

在沈周前的大画家戴进(公元一三八八——一四六二年)学习南宋马远、夏珪等的山水画而有所发展,被称为明代第一手,是浙派的领袖。沈周的山水画则以元代四家为宗,初学王蒙、黄公望,晚年专门学梅道人(吴镇的别号)。从四家又上推五代的董源、巨然,并及北宋许多名家。因此,他的临摹功夫很深,笔力坚实,年青时多画小幅,很精工。四十以后,才画大幅,比较粗率,但是显得天真与朴素,笔墨酣畅雄浑,是别人不易学到的。

苏州在明朝是经济与文化中心之一。沈周虽只是一个不仕的人,但所交游的都是地位很高的有名文人,他的门人弟子中像文征明、唐寅等也都有重名。他是一个全能的画家,花卉、鸟兽、人

物，都有很高的成就；在功力方面，在他先后只有戴进可以相比。但沈周的文学修养比戴高，绘画里大都题有诗句，诗画双绝，是戴进所不能及的。由于文人们的重视，沈周的声名逐渐超越戴进，所以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吴门派的绘画盛极一时，浙派画家逐渐不被人重视了。

明代中叶，政治方面的黑暗虽已逐渐暴露出来，但社会还比较安定。文人们大都自命高雅，绘画题材以风景为多，尤其是描写游览山水诗人雅集以及园林风景等题材最为普遍。此外，则是祝寿、贺考试中选之类的应酬作品。沈周作品里有时也描写一些农田景物，比当时一般画家为突出，但他的一生过着悠闲平淡的名士生活，因此，他们绘画，终究只是文人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从艺术风格来说，他在承继与学习宋元绘画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沈周的作品很多。今年是他诞辰的五百三十五周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他的绘画展览，《桐阴玩鹤图轴》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幅带人物的青绿山水，设色极为淡雅。在两株梧桐树下，一个高人正在纳凉，对面石桥上一只白鹤徐徐过来，写出了一种悠然自得的闲适境界。《东庄图册》是沈周为他的好友吴宽画的，所写的是园林中的实景，也是沈周的代表作品。

（一九六二年第十期）

洛神赋图

钱 浩

《洛神赋图》相传为东晋（公元三一七——四二〇年）顾恺之（公元三四六——四〇七年）作，是根据曹植（公元一九二——二三二年）的《洛神赋》作的。现存的为宋人摹本。

曹植字子建，东汉（公元二五——二二〇年）末年曹操（公元一五五——二二〇年）第三子，他诗赋文章名重一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帝王之家，骨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权力斗争。他受到他哥哥曹丕的猜忌和打击，一生不得志。《洛神赋》是曹植为他热恋的不幸的甄氏而作的。甄氏很美，曹植非常爱慕她。但甄氏却成为曹丕的妻子，后甄氏遭谗，郁郁而死。曹植以在洛水之滨遇见洛神——宓妃的故事，以铺张的手法，优美的词藻，塑造了极其美丽的洛神的形象；并通过似梦似幻的境界，倾诉了作者对甄氏的思念、爱慕，无从结合，而不得不含恨分离的悲痛之情。《洛神赋》文情并茂，是赋中的名篇。

《洛神赋图》中，洛神多次在画面上出现。第一段描绘洛神凌波现身，似来似去，飘忽无定，曹植在暮色中伫立，凝睇相视，可望而不可即。接着是洛神和神女们在山崖水畔嬉戏，旌旗隐现，似忧似喜。然后是洛神乘六龙云车冉冉离去，水中鲸鲵，天上禽鸟，上下扶持，出现了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世界。后面是曹子建乘楼船追寻，表现了“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

慕”的留恋缱绻的情景。

顾恺之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留有画迹的画家，诗文也很出色。他为建康（今南京）瓦棺寺作壁画维摩诘像，揭幕之日，观者似潮，得捐钱过百万。他传神写照，神形兼备。同时代名画人谢安说他在绘画上的成就“自苍生以来所未有”。人们称赞他作画用笔如“春蚕吐丝”，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美丽而且自然。《洛神赋图》把曹子建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绿波”的洛神的美丽形象和神人之间的真挚爱情体现在画卷上，开创了绘画和文学结合的范例。

中国古代绘画，人物画早于山水画。现存或出土的汉以前的壁画和墓室壁画内容大多是统治者的宴饮、畋猎、出行仪仗及宗教故事，神仙佛像等。东晋以后，山水画才逐步发展起来。《洛神赋图》中除了人物外，对奇禽异兽，车船马驾，山水云树都作了描绘。从这幅图画中可以看出，对人物的描绘神情宛然，衣带飘潇，已达到完美的境界，禽鸟车马水波等在技法上也已相当成熟，但画中山石云树还只是作为陪衬而存在，带着稚拙简朴的风味，在比例上也“人大于山”……但在同时代或早一些的绘画中，尚未发现更成熟的山水画图。顾恺之所处的时代，在绘画上是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时代。从这时开始，绘画从无名的画工逐步转到有名的文人画家身上。与顾恺之同时，中国就出现了一批有名的画家，可惜留下的画迹极少。《洛神赋图》不仅以它杰出的艺术成就，成为我国古代绘画中的瑰宝，而且对于研究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与变迁，也是极为重要的。

（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清明上河图

杨臣彬

在中国绘画史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卓越的风俗画。

张择端是北宋末年杰出的画家，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宋徽宗(一一〇〇——一一二五年在位)时为翰林待诏，供职于内府画院。《清明上河图》是他传世的唯一不朽之作。画家以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娴熟精湛的笔墨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十二世纪的社会生活，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作品描绘了北宋"承平"时期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清明时节的繁华热闹景象。画卷一开头展现出汴京东郊的村野景色，在那轻烟薄雾中有疏林翠柳，村舍茅屋，野店酒家，溪桥扁舟和田园阡陌，充满风和日丽的芳春气息。其间有驱赶毛驴小队进城送炭者，有骑驴或荷物步行者，有骑马乘轿扫墓踏青者。村边道路上那乘二人抬小轿四周还插着杂花柳枝，体现出特定时节的特有风俗。中间部分以一座规模宏大，状似飞虹的无柱木拱桥为中心，展现了汴河两岸的风光。沿河两岸有许多酒家店堂，家家店门洞开，伙计们在接待来往客人。河中水流湍急，波浪翻滚，满载货物的漕运大船舳舻相接，有的停泊岸边正在装卸货物，有的正在行驶，船工们吃力地拉

纤、摇橹、撑篙，繁忙而紧张。桥上商贩群集，行人、车马、轿乘往来如梭，不少人站在桥上凭栏观看，特别是桥下激流中一艘载满货物的漕运大船，放倒桅杆逆流而上，准备穿过桥孔，为了避免船桥相撞，艄公们与激流展开了一场紧张而惊险的搏斗。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吸引了大桥上下众多的看客，他们也为之呼应支援。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是此画中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此图的后部，以一座高大雄伟的城楼为中心。展现出汴京市区内外的街景，使画面进入另一个高潮。这座名为“东角子门”的城楼，在汴京内城东南角，城楼两端连接着厚厚的夯土城墙，城墙顶端杂生各种树木。护城河上的一座平桥，紧挨城门。城门内外两侧，街道纵横而宽广，房屋楼宇鳞次栉比，有各种官私店家，并以精细的小楷书标店号，各家店铺都在招揽生意。大街上车水马龙，毂击肩摩，热闹非凡。有骑马乘轿的官吏和衣冠楚楚的仕绅，有跟随官绅的仆役、走卒，有肩挑、摊卖的小贩，有看相算命或代写书信的先生，还有车夫、轿夫、作坊工匠、说书艺人、理发师，也有贵家妇女、顽皮的儿童、道人、化缘僧人和衣衫褴褛的乞丐等等，他们身份各异也各有忙闲，苦乐不均。整个画面描写极为生动而有情致，内容丰富多采。

此图采用传统的长卷形式，以全景鸟瞰式构图和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的景物，远近、大小、疏密、动静等都处理得极为妥贴，使整个画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在笔墨技巧上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线条细而不弱，工而不板，劲健有力，色调柔和清丽而古朴淡雅。画家描绘事物，纤毫不失，可见他观察和摄取自然景物的洞察力和表现力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九八四年第五期）

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

郑振铎

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一九五八年纪念七位世界文化名人，我国元代（公元一二七一——一三六八年）大戏曲家关汉卿是其中之一。

在元代，旧的地主阶级垮台了，新的地主阶级还不曾完全形成，农民的生活有了暂时的改善；同时，久已闭塞的东西交通大道畅通无阻，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等等大量运往西方，这就使城市手工业工人生活得很好，也使农村生活得到了提高。因此，在金、宋两代就已经发达了的戏曲，这时就更为兴盛，产生了很多剧团和伟大的戏曲作家，而这些戏曲作家又都是有天才的诗人。在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一位乃是关汉卿，而且他象希腊大悲剧家阿史齐洛士创造"悲剧"一样，创造了"杂剧"这末一种戏曲体裁。

关汉卿是北京人，大约生于一二一〇年左右，曾经做过医生。在相当早的时期，他就开始为剧团写作戏曲剧本。他对各式各样的社会生活都很熟悉，都观察得很细致深入，因此，他的剧本就能够包括各个方面的人物，而且写得异常生动活泼。他又有异常高贵的心情，深切地同情所有被压迫、被侮辱的人，而且毫不隐瞒地表达出他对统治者和坏人坏事的愤怒和责备。他是属于文学史里最伟大的诗人之列的，具有满腔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精神。

他写悲剧，也写喜剧。他的喜剧逗引人笑，同时也引人深思。他的悲剧令人看了不禁落泪如雨，产生悲戚、愤恨和对于被害者的同情之心。

他的悲剧，当以《窦娥冤》为代表。窦娥很小就被迫到蔡家作童养媳，后来丈夫死了，就和她的寡居婆婆一同住着。婆婆放高利贷为生，有一天，被一个欠债的赛卢医所谋害，但被张驴儿和他的父亲救了命。后来张父娶了蔡婆；张驴儿也想娶窦娥，却遭到了她的拒绝。张驴儿买了毒药想害死蔡婆，以便顺利地逼迫窦娥，不料误害了他的父亲。这时张驴儿就乘机诱迫窦娥，但遭到了更坚决的拒绝，于是他便到官衙控告窦娥毒死公公。在黑暗的审判过程里，窦娥不得已而被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她曾向监斩官要求挂一条丈二白练在旁边，并说自己委实是冤枉，因而刀过头落时热血将飞溅在白练之上，三伏天将会下一尺厚的白雪，当地还要大旱三年。她死后，她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后来她的父亲做了官，捕获了真正的杀人犯，才为她雪了冤，而这结局并没有减弱悲剧的效果。这个故事已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一般冤狱的典型之一，直到今天还以各种不同的戏剧形式在舞台上演唱着，赚得观众的眼泪。

关汉卿的另一个悲剧是《鲁斋郎》，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般人民受压迫、被损害而无可告诉的暗无天日的现象。鲁斋郎很有权势，他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老百姓畏之如虎。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银匠李四的妻子长得漂亮，就把她抢去了。后来，他又看见张珪的妻子十分美丽，便强迫张珪把她送给自己；这时，他已对李四的妻子发生厌恶，所以就把她赏给张珪了。张珪发现这个女人原来是李四的妻子，就让他们夫妇团圆，而自己却出家为道士。十年之后，包拯做了府尹，才设计杀了鲁斋郎。这个令人痛快的结局，也没有减少这个悲剧的力量。

《蝴蝶梦》是他的又一个悲剧，这悲剧同样地也有喜剧的结

局。它以贤明的审判官包拯为主角，但更重要的剧中人物却是王婆婆。她丈夫被恶霸葛彪无故打死；他的三个儿子王大、王二、王三为父亲报仇，也打死了葛彪。但葛彪属于权豪势要之家，他打死人是不偿命的，而王氏兄弟打死了他，却是一件天大的事，立刻都被捉将官里去。审判官包拯判决以三兄弟中的一人去偿命，并让王婆婆在三人中选择一人。王婆婆经过激烈的感情和理智的斗争，最后决定由王三偿命，因为王大和王二是她丈夫的前妻之子，王三才是她自己的亲生。包拯为这个贤母的牺牲精神所感动，终于让一个盗马贼代替王三死去，而将王三释放了。这个剧描写王婆婆的含冤负屈之情以及她的感情和理智的斗争，极为深刻。它是最好的悲剧之一。

他的《五侯宴》，也是一个悲剧。一个无依无靠的妇女被一个地主所欺骗，投身到他家里当乳娘，又被迫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幸而他的孩子王阿三被一位将官收养了，后来也成为一个有名的将官。正当他母亲被那个由她乳养成人的地主的儿子迫害时，王阿三却及时地拯救了她。这悲剧写尽地主的压迫和凶狠，是中国戏曲里写同类故事的最为激烈生动的一部。

以上只是关汉卿所写的悲剧的一部分，但已足以使我们看出他是怎样地同情于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怎样地为社会正义、为小人物的苦难而呼号斗争。虽然每一部悲剧都是比较“大快人心”地结束了，但剧中用了宋代或晋代的人物，因而观众就知道这个理想的幸福的“结局”在当代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岂不更加加深了他的悲剧的感染力吗？

他的喜剧美丽得像春天的花朵，剧中却也同样深深地寄托着正义感和人道主义。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处在受压迫的地位，特别是奴隶似的婢女和被人鄙视的妓女，但在关汉卿的喜剧里，她们往往是主角，往往以自己的勇敢和机智来争取社会地位和幸福。在这些喜剧里，最重要的有《救风尘》、《调风月》和《望江亭》，

它们都是不朽的杰作，足为妇女们扬眉吐气。《救风尘》写一个妓女把她的同伴从一个恶霸的欺凌压迫下解放了出来。《调风月》写一个婢女怎样为自己的爱情作斗争。《望江亭》写一个智勇双全的妇女谭记儿怎样为拯救丈夫的性命而愚弄了一个坏人。这样的喜剧，充满了笑声，也充满了讽刺，甚至还有谩骂。它们是会引人深思的。

关汉卿也写了不少历史剧。他所写的关羽（《单刀会》）、张飞（《西蜀梦》）、尉迟恭（《单鞭夺槊》）等历史上的大英雄，都是生气勃勃，气概雄猛的。

很少有这么一位戏曲家，能够象关汉卿那样描写那么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和各式各类的男女老少的。他的人物和故事直到今天还是有活力，还是很动人的，虽然他的原作除了《单刀会》之外，已经不能在舞台上见到了。

他在一二七九年以后不久，曾经到过南宋的故都杭州。可以想得到，他也把北方的戏曲的影响带到南方来了。他的卒年约在一三〇〇年左右，那时他大约是九十岁上下。

在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曲是主要的文字形式，最主要的诗人们都在写作戏曲，即诗剧。关汉卿不仅创造了这样一种诗剧的体裁，而且是那些诗剧作家里最伟大的一位。我们离他有七百年了，但他还像活在我们当中。

（一九五八年第七期）

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邓　拓

亲爱的读者们！大家都很熟识曹雪芹和他的作品《红楼梦》吧！这位生活在中国十八世纪的伟大作家，逝世二百年了。他留下一部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越来越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二百年来，曹雪芹的《红楼梦》，不踁而走，到处被人争相传诵，成为千千万万读者们最喜爱的读物之一。不但如此，这部作品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在绘画、雕塑等各种美术创作中，都曾不断地反复再现，成为老少皆知的通俗题材，表现了强烈的艺术生命力。同时，在外国，英人鲍拉曾于一八六八年把这部作品的一至八回译成英文；后来英人约理又把它的前五十六回译成英文。这就证明，曹雪芹的《红楼梦》早在十九世纪已经在欧洲流传了。

为什么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国内外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呢？这当然是因为这位作家，具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属于叛逆性质的新的世界观的萌芽，具有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态度，又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他以一生的心血，历时十年之久，前后修改了五次，才写出这部作品。它反映了中国十八世纪上半期，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全盛时期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它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骄奢淫逸，深刻地揭露

了当时的贵族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兴衰过程和腐朽的本质；它通过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故事，发出了当时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新兴社会力量的反封建呼声。《红楼梦》的内容，不但揭露了封建法制和伦理道德的虚伪性，批判了封建秩序和正统观念，讽刺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八股儒学，极端藐视封建贵族官僚的腐败政治，痛恨男尊女卑和主奴之间的不合理关系，特别痛恨那种戕害男女爱情幸福的封建婚姻制度；而且，它还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剥削和高额地租以及商业高利贷的剥削，揭露了卖地、卖身的封建农奴和贵族官僚大地主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两极化。总之，这部小说全面地触及了当时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作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根本问题。尽管由于曹雪芹本人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一切揭露和批判都还很不彻底，但是，这在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外文学史上，都不能不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一个具有新思想萌芽的作家，通过亲身的经验，深刻地感受到他所处的时代脉搏，抓住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征而在艺术上进行巨大努力的必然产物。读过《红楼梦》这部作品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它是非常成功地描写了封建贵族大官僚家庭从兴盛走向没落的典型环境、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这些典型恰恰都是曹雪芹所最熟悉的。

曹雪芹的原籍是河北省丰润县，他的祖先大约在明朝末年迁居关外，入了旗籍，隶属汉军正白旗。他的祖父曹寅是由被奴役的“包衣”出身而受到清代康熙皇帝重用的大官僚，官居江宁织造之职。他的父亲曹頫，在他祖父去世之后，承袭原职。曹雪芹便是出身于当时织造衙门所在地南京城的。据可靠的材料推算，他出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一七一五年，即清代康熙五十四年。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曹雪芹，就在豪华的大官僚家庭中度过。到了曹雪芹大约十三岁的时候，即公元一七二八年，清代

雍正六年，曹頫得罪被抄家，原因是曹家属于康熙皇帝生前重用的官僚集团，为雍正皇帝所嫉忌，当时清代的封建统治日渐稳固，雍正已不再需要曹家这样的爪牙了。遭受了被抄家的巨大变故之后，曹雪芹跟随他的父亲迁回了北京。由此，他不但更深刻地认识了封建制度的丑恶面目，而且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去世，家庭生活更加一落千丈，他又从北京城里搬到西郊去住，这就造成了他在生活上前后迥然不同的两大阶段，他的思想随着生活上的巨大变化，也更加波澜起伏，不可遏抑。因此，他后来决心写作。有某些材料表明，曹雪芹在三十岁左右，大概曾经再到南京，重游旧地，搜集创作材料，回到北京又得到他的亲友——许多贵族子弟的帮助和鼓励，使他能够从事《红楼梦》的创作。不幸的是，由于生活的穷困和疾病的侵袭，到公元一七六三年（或一七六四年）即清代乾隆二十七（或二十八年）的除夕，他竟以不及五十岁的壮年而与世长辞，连坟墓也无法查找，徒令后人为之惋惜！

然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却一直流传人间，且将永垂不朽。现在的读者们常常会觉得《红楼梦》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虽然是作家笔下塑造的主人公，但是他们始终是具有强烈生命力的。这正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虽然已经是古人，却仍然是有强烈生命力的一样。《红楼梦》结构之庞大、完整，人物之众多和描绘的深刻而准确，可算得是我们中国古典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中最杰出的成就。它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特别是继承了明代以来的小说创作的丰富传统又有新的发展，因而它的成就更远远地超过了它以前的作品。通过这部作品的艺术手法，作者的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精神，以及他对待生活的真诚态度，充分地表现了出来。《红楼梦》所以能够成为一部完美的感人最深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伟大悲剧，原因也在这里。作者把这个悲剧的全部故事情节，用两根互相交织的红线贯串起来。这

就是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脉络，而以贾氏及其亲戚王、史、薛等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变故为依据，并且在这些基础上展开了在封建社会制度下饱受折磨和被奴役的年青一代的生活历程。

正如历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们所公认的，曹雪芹自己也可以说与他的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的性格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点。当然，过去中国资产阶级的“红学家”把《红楼梦》仅仅看成是作者“感叹自己的身世”，“为情场忏悔而作”的自传和才子佳人式的作品，那是完全错误的。《红楼梦》虽然也描写了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但是它却不同于历来以才子佳人的爱情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我们应该充分正确地认识《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它是生动地刻划了整个历史时代的伟大作品，我们决不能因为它以才子佳人的爱情为题材和带有自传的性质而贬低了它的意义。据我们所了解的作者生平，尽管与《红楼梦》中的主人公有许多相似之点，因而，应该承认这部作品是带有自传性的，但是，它毕竟又不是曹雪芹本人的自传，而是一个巨大的文学创作，是刻划了整个时代面貌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伟大创作。

为了创作这一部原稿为九十万言的文学作品，曹雪芹大约从三十多岁开始动笔，一直写到他死的时候，全书还没有完成，只有前八十回基本上已经写完，后四十回仅存残缺不全的草稿，在他死后二十多年，由另一个作家高鹗加以续补，成为一百二十回的完整作品而流传下来。

在《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曹雪芹经过了十年的不断写作和五次修改，已经把这一部伟大的悲剧情节和全部故事发展的线索安排好了；后四十回未完成的残缺不全的草稿，经过高鹗的续补，基本上也保存了它的悲剧性质。续作者高鹗也是汉军旗人，中过进士，他续作《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功绩是不应该被抹杀的。二百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一代一代地流传着一百二十回完整的《红楼梦》。广大的读者们似乎并没有觉察到《红

楼梦》的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出于两个作者之手；他们似乎也不愿意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分开。虽然，后四十回在艺术手法和结局的处理等方面有不少缺点。因为高鹗毕竟不是曹雪芹啊！

过去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中，除了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以消闲和猜迷的态度，以评头论脚的月旦式牵强附会的考据而自满之外，还有一班资产阶级的学者，他们的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身世，考证出《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原稿有些残缺，并且八十回以后也有未写完而散佚了的一部分原稿，这是好的；但是，他们对《红楼梦》的研究，仍然免不了许多主观臆断，并且根本抹杀了它的伟大社会历史背景，同时，这在实际上也歪曲和贬低了《红楼梦》这个完整的悲剧结构在艺术上的成就和意义。

其实，一切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尽管有许多已经被发掘出来，并且还可能有许多没有被发掘出来，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但是《红楼梦》的问题决不是神秘的不可解的。那些所谓“红学家”们仅仅满足于烦琐的考证，以至牵强附会，做出各种主观主义的假设和推论，给《红楼梦》平添了许多神秘主义的色彩，那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我国学术界在几年前曾经批判了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得到很好的效果。经过了这次批判之后，一般地说，人们对于《红楼梦》这部作品和它的作者曹雪芹，有了比较一致的正确认识。但是，认识总是要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有些问题，不可能完全认识一致，应该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研究，真理总不会被埋没的。

现在多数人都承认《红楼梦》的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对于他当时所向往的理想的人生，表示了真诚的热爱和追求。作者的这些思想倾向，在当时恰恰代表着一种新兴社会力量的要求，代表着新的世界观的萌芽。

所谓萌芽当然是处于自发状态的，它还没有发展到自觉地与封建制度直接对立的地步。这就因为曹雪芹毕竟是从封建贵族大官僚家庭出身的，他自己就是封建贵族阶级的一个公子哥儿，他要从封建阶级的世界观逐渐转变为新的世界观，不能不带着很大的自发性，因而他的世界观也就不能不带有双重性和不彻底性。他的世界观对于当时的封建制度来说是莫大的叛逆；而从社会革命的观点来说，仍然是很不彻底的。我们在《红楼梦》中往往会发现许多虚无主义的和宿命论的消极思想，不时地流露出来，便是这个缘故。我们虽然不能同意那些"红学家"们把《红楼梦》说成是色空思想和虚无主义的作品；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完全忽视它的这种消极思想。不过，这些消极思想，并没有取代积极的思想，而在全部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相反的，整个《红楼梦》的主导思想还是非常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正因为这样，所以曹雪芹的《红楼梦》二百年来在中国以及国外，仍然具有巨大的日益深远的积极影响。

（一九六三年第十期）

曹雪芹佚著、遗物的发现

吴恩裕

《红楼梦》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之一。它不但在人物塑造、景物描绘、故事设计和文字水平等艺术性方面，成就很高，而且通过描述一个官僚地主大家庭由盛而衰的过程，揭露了当时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的必然没落趋势，所以也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政治性质。

二百多年来，虽然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直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了解这部巨著的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过去由于除《红楼梦》外，我们既不知道曹雪芹还有其它什么诗文书画等作品，也不了解他个人的生平，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写他的传记，就是想要结合他的生活情况来进一步深入地研究《红楼梦》，都很困难。这种情况，一直被中外《红楼梦》研究者引为憾事。直到解放前胡适、李玄伯才对曹雪芹的家世做了研究，解放后周汝昌等同志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进一步的成绩。

可是对曹雪芹本人的历史，我们知道的还很不够。我从一九五四年起，就决心要从传说、文字和实物以及实地考察等方面搜求曹雪芹生平的资料，先后发现永忠吊曹雪芹的三首诗；敦诚的两首挽曹雪芹诗初搞；弘晓过录的己卯本《石头记》；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任过职以及王利器同志发现的张宜泉有关曹雪芹的几

首重要的诗。这些发现对于研究《红楼梦》及作者，都有很大的帮助，但还远远不够。

一九七三年，我在《文物》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曹雪芹的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中介绍的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是二百多年来的首次重要发现。《集稿》包括讲金石、风筝、编织、印染、脱胎泥塑、刻竹画扇、园林和烹调八册手稿。这部著作是为了教给因贫苦、残废而无以自活的人们一种维生的手艺。《集稿》原是清朝礼亲王府所藏，一九四四年礼亲王的后人金鼎臣售与日本人□信武夫（原称“金田”氏）。当时在北平北华艺术专门学校日籍教授高见嘉十主持下，由该校美术史教员杨歉谷，另有金钟年和高见嘉十的学生孔祥泽等参加，把讲风筝的一册的内容抄摹下来一些。这件事已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松枝茂夫教授在一九七三年冬去富山县访问高见嘉十时，得到证实。讲风筝的一册名为《南鹞北鸢考工志》，其中有曹雪芹的自序、风筝歌诀、彩色风筝图式、董邦达的序言和作为附录的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在这批材料中，我们不但看到了曹雪芹字迹的双钩、他的自序文字，也看到了敦敏和董邦达对曹雪芹的为人、风度的描述。这都是很可贵的史料。

在我那篇文章发表以后直到最近，又有以下陆续的发现：一、曹雪芹讲烹调的残文；二、论光与画的残文以及例示光与画的关系的乌金翅图摹本；三、《集稿》中讲泥塑一册的小序残文及德荣所塑曹雪芹的像；四、《集稿》中讲编织一册内容的残文；五、在香港发现的《瓶湖懋斋记盛》所记、曹雪芹于乾隆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在敦敏家鉴定认为伪品的“宋人李龙眠”《如意平安图》；六、友人所赠上款刻着“芹溪尊兄大人正之”的曹雪芹所用的扇股；七、最重要的是，一九七七年冬发现曹雪芹续婚时，他的朋友送给他的两个书箱。书箱上刻着朋友的贺诗和画的兰石。第二个书箱背面，居然有曹雪芹手书工楷的五条书目和他续

娶夫人在他刚刚逝世后的亲笔悼亡诗。曹雪芹写在书箱上的亲笔字与一九七三年《文物》二期上《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的双钩字迹，完全是一个人的手笔。书目的内容和芳卿悼亡诗的内容所涉及的情况，不但与我们已知的曹雪芹事实完全符合，而且使我们知道更多的事实。经鉴别木器的专家鉴定，书箱的木质确是二、三百年前的旧物——从书箱的样式和开合处的铜环样式来看也可以佐证。书箱是继《考工志》之后，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资料的又一重大发现。书箱的收藏者北京的张行同志，河北深县人，可能是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的后人。

为了让中外广大读者知道以上情况，我们特地发表几项有关资料的图片，并加简要说明，读者是会有兴趣的。对《红楼梦》的研究者们，也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发现这些新材料之后，应该怎样进一步理解曹雪芹和《红楼梦》呢？"我认为新材料证明：曹雪芹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工艺美术家，还是一位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社会的政治思想家。

（一九七九年第八期）

蒙古族的摔跤

乌里吉

蒙古民族特别喜爱摔跤。相传成吉思汗（公元一二〇六——一二二七年在位）小时候和一个牧童摔跤，一连赢了三次，牧童衷心佩服，就帮助他报了父仇。后来成吉思汗做了皇帝，便把摔跤定为考核将士的重要科目，以后历代相沿，发展成为普遍流行的体育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牧民从四、五岁就学摔跤，平时一有空就找对手在草地上摔起来，冷天也用摔跤取暖。在那达慕大会上，摔跤更是必不可少的节目。摔跤名手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正式摔跤比赛的仪式很隆重，参加的人要穿上传统的服装：坎肩用多层帆布或皮革做成，缀着闪亮的银钉或铜钉，下身是三色短裙，绣花的马裤和长靴。比赛一般分为两队，比赛前大家按照习惯互相对唱：

快一点儿呀！

把你们的摔跤手选出来，

让我们好比赛！

最有名的摔跤手出场要唱三遍，普通的只唱一遍。接着摔跤手跳跃着出场。他们都是膀宽腰圆的彪形大汉，最初低头瞪着对方，慢慢转着圈子，接着就象猛虎一样迎上去，使出浑身力气来压倒对方。按照规则，膝盖以上的任何部分碰着地面就算失败。这种力与智的剧烈斗争，常常是在一两分钟内就决定了胜负。

蒙古族牧民自幼在草原骑马奔驰，经常和风雪搏斗，练成一身结实的筋肉，摔跤手更是勇力过人。去年全国摔跤比赛，蒙古族选手僧格和著名汉族大力士杨宝和相遇，虽然僧格的体重比杨宝和轻八公斤，而且采用汉族摔跤规则（汉族摔跤可以抱腿，蒙古族不许抱），但他仍以十二比一的绝对优势战胜对手，荣获全国重量级摔跤冠军的称号。

（一九五七年第八期）

篮下夺魁的人们

曲岳华

在北京西郊的一个篮球练习馆，我们访问了一九七五年以来连续四次获得亚洲冠军的中国男子篮球队。

这些运动健儿来自许多省、市、自治区，有的来自解放军。他们在队领导和教练员的指导下，根据国际比赛的需要和本队的情况，正积极地进行速度、投篮、防守、篮板球等方面的训练。

吴忻水、邢伟宁等运动员一个接着一个地沿着快攻路线，在我们眼前飞掠而过；郭永林、张卫平、匡鲁彬、何炬华等在急速中突然停步，腾空而起接球投篮；在半场攻防训练中，穆铁柱、马占福站在篮下，由李玉林、王宗兴等配合，单手抓球迅速做几个动作，而后轻轻地将球放进篮内……

穆铁柱是这个篮球队最高大的队员。他身高二米二八，脚穿五十四号鞋，体重约一百五十公斤。这位来自山东的巨人，是一九七二年被解放军发现并培养为篮球优秀运动员的。一开始，他由于身躯高大，跑跳都很困难。但是，他热爱体育事业，具有坚强的毅力。在教练员的指导下，他刻苦训练，身体素质和个人技术都提高很快，不仅一次能跑五千多米，并且掌握了相当的篮球技术。在国际比赛中，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志们亲切地称他为“瞭望台”。

吴忻水比穆铁柱低五十公分，是队里最矮小的一个。他的特

点是机动灵活，善于快速突破。在比赛中，他往往使高大队员防不胜防，并能随着战机的变化灵活组织进攻，被誉为“灵魂队员”。驰名世界乒坛的我国女乒乓球队员李莉和他是一对幸福的伴侣。

何炬华有“广东球王”的称号。他平时训练刻苦，比赛时敢打敢拼敢进攻，经常能突破对方防线直接上篮。他那原地双手扣篮的高超技术，很受人们赞赏。

身高一米九〇的郭永林早有“神投手”的美誉。在比赛中，他经常能在高大队员重重防守的情况下突然投篮得分。在一次同美国队比赛中，他得了二十五分，占全队总分将近四之一。他去年到罗马尼亚参加“黑海杯”男子篮球邀请赛，又荣获优秀投篮一等奖。

在练习馆里，攻防训练还在继续进行。

“弹簧，快！”队员李玉林应声飞步向前，接住第二号高大队员马占福传过的球急速上篮，一举命中。

“为什么叫他‘弹簧’？”

马清盛教练回答我们说：“李玉林打球勇猛顽强，中距离投篮准确，善抢篮板球。在名古屋和日本队最后五分钟决胜期比赛中，他一人抢得三次篮板球，在日本队高达二米三〇的冈山头上补篮成功。因他弹跳力好，弹速快，所以大家就亲热地叫他‘弹簧’。”

“在比赛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亲密团结吗？”

“也是这样，而且这种亲密团结的关系往往会在无形中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量。”马教练接着说：在名古屋，中国队与日本队比赛，开始，中国队曾领先十一分。不一会，日本队改变了战术。中国队换张卫平上场。他是一位具有投篮准确、篮下进攻威力大的优点而被外国朋友誉为“魔术师”的优秀运动员。可是，

他这次上场打得很不顺利，前后四次投篮不中，思想上感到有压力，而同志们谁也不埋怨他，却鼓励他。这种亲密友谊和热情鼓励，使他增强了信心，他和大家一起，再接再厉，打得勇猛顽强。在比赛中，郭永林扭伤了腿，坚持打到底；黄频捷体力消耗极大，也坚持不肯下场；身高一米九七的王宗兴同身高二米三〇的日本队员争球，用了最大力气高高跳起，把球挑了过来，争得了主动权。在关键时刻，就连平时腼腆的匡鲁彬也打得非常泼辣，接球后迅速而准确地投进了篮，从而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训练结束，队员们列队回到了宿舍。

入夜，运动员宿舍里灯火通明，谈笑声、歌声、乐曲声交融在一起，一派欢乐气氛。粉白墙壁上挂着的奖章和各国篮球队赠送的队旗，以及桌上摆着的各种纪念品，记载了他们几年来的战绩和同各国运动员结下的深厚友谊。在另一个房间里，马清盛、张子沛、钱澄海三位经验丰富的教练员则正聚精会神地在沙盘上研究着次日的训练方案。

（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走向世界的中国体育

李梦华

一九八四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也是奥运会年。今年七月，中国男女健儿将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三十五年来中国体育运动的情况如何？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将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这是人们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

三十五年来，新中国的体育可以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日益广泛深入，运动水平突飞猛进，不少运动员冲出了亚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三十五年前的旧中国，体育极其落后，这项活动只属于少数人，运动水平也很低。例如男子一百米成绩为十秒七，二百米是二十二秒，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九年，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毫无进展。男子跳高为一米八七，撑竿跳高为四米一五，三级跳远为十四米三六，也都是从一九三六年起没有任何长进。至于举重、游泳等运动水平更差，器械体操只有单、双杠，还不知高低杠为何物，现代体育的许多项目都未开展。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极大重视，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积极发展体育运动。一九五六年，陈镜开打破了举重世界纪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世界纪录。一九五七年，郑凤荣打破了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戚烈云打破了男

子游泳世界纪录。一九五九年，容国团获得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到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中国男女运动员已先后三千五百四十二次刷新各个项目的全国纪录，并有四十一人二十六次打破二十一项世界纪录，这被称为中国体育运动的“第一次起飞”。

此后，虽经“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但近几年，尤其是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体育运动又迅速恢复，并取得了新的发展和突破。从一九七九年第四届到一九八三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这四年间，中国运动员就有六十六人十三个队在四十三个项目中夺得七十一个世界冠军，三十四人六个队四十五次打破和超过三十三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乒坛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囊括了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全部七项冠军；中国女排先后两次获得世界冠军；中国运动员李宁一人获得第六届世界杯体操比赛的六枚金牌，为世界体操比赛中所未有；在第九届亚运会上，中国选手夺得了金牌总数第一。

在过去的一年，我国体育又获丰收，城市体育更加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一些行业恢复或建立了产业体协，全国和地方相继成立了老年人、伤残人体育组织，开展了民族体育、民间体育，举办了街道、基层和家庭运动会。职工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已突破两千万人，青少年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有二千五百多万人，全国累计达标人次已达一亿多。随着农村经济大发展，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参加体育活动。一九八三年，我国体育运动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全年共有十一人一个队十三次打破或超过八项世界纪录，在十一个项目中获得三十九个世界冠军，这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一些项目继续保持优势，一些项目开始进入世界前列。在第二十二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中国男队战胜两届冠军的苏联队赢得了冠军。在第四届世界杯技巧赛上，中国技巧队获得了十枚金牌。女子竞走在世界杯赛中获得了团体

和个人两项冠军。女子篮球队首次跻身于世界三强。跳水、羽毛球、航海模型、航空模型、跳伞、射击也都取得了好成绩。尤其是男子跳高选手朱建华，在第五届全运会预赛和决赛中，先后两次打破世界纪录，震动了国际体坛。至此，中国已有百余名优秀选手可以大踏步地进入奥运会的比赛行列。

那么,他们在奥运会上将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我们认为,我国运动员到奥运会去，首要的是为了友谊、为了学习和取得经验，当然也一定要努力争取优异的成绩。不过，从总的情况看，我国选手还缺乏重大比赛的经验，要想获得任何一点成功，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为我国体育事业虽说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发展的时间毕竟还短，与世界上体育发达的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决心经过十年、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争取在本世纪内使我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

（一九八四年第五期）

气　功

王永强

在我国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气功是一朵为人瞩目的奇葩。几千年来，气功为人们的强身保健发挥了巨大作用，其自身也不断丰富完善起来，形成了以意念为主导，以人体“动”与“静”的运动形式为基础的医疗保健养生法。

我国古代医学认为，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是所谓“真气”或“元气”，真气（元气）的盛衰决定着人体的强壮与衰弱。现在，人们认为，“气”是指呼吸的气和人体的全部生理功能；“功”则指练习、锻炼。进行气功锻炼，可以调动和挖掘人体的潜在能力，收到强身、祛病、延年益寿的功效。

在我国广大城镇，每当晨曦微露，公园里、绿地间，甚至街道旁、巷子里，都可以看到进行气功锻炼的男女老少。他们或如雁舞，或似鹤行，静如柔波，动似疾风……气功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了众多的功法和种类。它们各有所长，各显其能。从练功的姿式方面划分，大体可分为四类：行功、站功、坐功、卧功。

气功另有“静功”与“动功”之分。静功是指形体不动，精神宁静，大脑皮层在相对安静状态下做定向性的意念活动和体内气息运动，即所谓外静而内动。动功则指形体的运动和精神活动的相对安静，所谓外动而内静。静功锻炼精神的宁静的体内气息

运动，常用于治病；动功主要用以锻炼肢体，强健筋骨。但两者还须交互运用，有机配合，方可收效。

气功起源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找寻抵御疾病、强健自身方法的探索中。根据史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传说中的“尧”的时代，人们就用“舞”的方法治疗疾病。到春秋战国（公元前八世纪——前三世纪）初期，便已有较为详细的气功理论见诸文字，并已形成较系统的功法。汉末名医华佗（？——二〇八年），模仿自然界的五种禽兽——虎、鹿、熊、猿、鸟的动作，编制了“五禽戏”。这是我国最早的成套医疗保健运动。此后，气功无论从功法上还是理论上都在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可对人体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发挥调节影响作用的养生理论和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气功研究，出版了一批理论、技术书籍，设立了气功门诊部，气功辅导站等。北京、上海、北戴河等地还开设了气功疗养院。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气功汇报会”，使气功的研究、普及有了新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对气功疗法中的“外气发功”进行了一些测试、研究，测得了不同的物理效应和生理效应。这说明尽管气功强调意念，但气功是有物质基础的。经过临床观察和实验表明，气功不仅能起到养身保健、益寿延年的作用，而且对防治一些慢性病、老年病以及当前用药物疗效不佳的病症，也有可喜的疗效。

（一九八四年第十期）

我们都是中国人

朔　望

九月初的北京，流汗的日子过去了，西瓜早已收市，接着眼见满池粉红色白色的荷花次第让位给小青莲蓬。颇有点秋意了，人陡然爽心起来，也变得沉静些。早晚，在阴凉的院子里散步，除偶尔滋生一种上苍终于赐福的感激之情，不知为什么最容易想起人了，——虽然这时离传统的登高怀远佳节重阳，还有好几星期。

也许只因年岁大了，私己可眷恋的日少，便常想到故人乡国这方面。最近每每说起台湾的事，于是自然而然回忆起一年前在美国见到的那些来自台湾或者与台湾有较多关系的朋友。这恐怕是由于这是台湾对我唯一的具体印象，而这印象是深刻、悠远、引人入胜的。

一九七九年秋天，正是美国中西部玉米地带金黄色的收获季节，肖乾和我一道来到密西西比河附近的小城依阿华，参加依阿华州立大学举办的国际作家聚会，要住四个月，撰写自订的创作，结识各国的文友。这在我们二人倒算得是驾轻就熟的赏心乐事。然而这中间也确有件令我不很踏实的事，这便是这个国际聚会的东道主、盛情多营的聂华苓女士准备乘便邀请来自台北、香港、美国各地的华人作家，加上北京的肖乾和我，座谈中国文学问题，尽管规模不大，却多少轰动了海外文坛。难为华苓的格外细心，

为这个活动安上了一个宽舒的名字“中国周末”，并只说其中如何有游宴之乐，然而我在兴奋之余仍不放心：我们离家万里，他们来自台湾，我们在这里会遇到些什么事呢？

这天到了。我紧抱着一瓶从北京带来、单手握不住的茅台酒，费力地爬聂家大楼（门上铜牌写着“安寓”——安格尔夫妇的寓所）前边的陡坡，来赴午后酒会。只见楼上临湖的露台上人影绰约。他们想必到齐，只等我辈去对垒了。

但是，没有发生对垒，连对局也没有。我和已经到会的人一一作了六十度的鞠躬、握手，挤在几张公园里用的长木凳上闲谈，有的刚坐下来就交换通讯地址。老肖被几位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围着问这问那，从他的《珍珠米》到《人生采访》。这些大都是六十年代从台湾大学文学系毕业的人，对我国五四和三十年代的多数作家是认同的，尽管各自有其特殊爱好和独到见解。他们中有研究鲁迅的，肖红的，闻一多的，丁玲的，艾青的，还有沈从文、钱钟书、曹禺、吴祖湘等人。一位青年妇女说她背得出卞之琳早年的诗篇。Z教授是著名的红学家，Y教授研究中国古典诗同英美现代派诗的渊源。他们男的大都长头发，只有Z留着平头，已经花白了。他们说着带各种方言口音的普通话。Z的浓重的湘音也是最突出的。其余是宁波、湖北、闽南、广东、上海。北方的有两位：L是河南人，诗人Zh是河北人，都是黝黑敦实的体态。众人没有专讲英语的。忽然，纽约来的C女士引起了一场关于意识流手法的争论，吵得不可开支，夹着打趣戏谑。我在旁听着，觉得挺受用，因为人们在北京有时也愿意这样消磨时光；总之是中国人的样子。我放心了。我把茅台酒留给主人，准备明晚上喝。

第二天下午三点，我们这批中国人在依阿华大学的美术展览所里举行关于中国文学前景的讨论会。来自北京、台北、香港和美国各地的几位作家发了言。台北作家方面是由诗人K发言的

（他的一首长诗《中国颂》很感人）。“中国周末”的主持人原来邀请了台湾的著名文学家王拓，但受阻于台湾当局，出不来。由于参加国际作家聚会的三十多位各国作家都来旁听，所以会议用英语进行。这些外国朋友并不熟悉现代中国文学的情况，但颇为中国人之间表现的“各抒己见，也让别人畅所欲言”的宽容作风所动；当晚就有人写诗送给我们，祝贺“中国人的高风”。

当然，就这次座谈会上各人的发言的内容而言，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现状是有不同看法的，偶尔也有争论，但大家都还能彼此尊重，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为来日着想；而那种种的异处，随后几天在日常的接触中也都得到了交换意见的机会，即使一时无结果（这是常事），也没有伤和气。

这天晚间，聂家举行聚餐会。室内温馨，廊前清静，大家撂下了白昼讨论问题的担子，显得分外轻快。到处发散着茅台的香气。同时，又拿出台湾产的黄酒，也是刚从台北来的。在耶鲁大学的诗人Zh的娴雅的夫人为大家唱了《望春风》等几支台湾民歌之后，多才多艺、留着山羊胡子的H教授站起来指挥大家唱起中年以上的人熟悉的歌，从《松花江上》一直唱到《太行山上》。大家记性这样好，兴致这样高，真出乎我的意料。在酒桌一边放着精致的文房四宝。诗人画家S显然多喝了几盅白干加米酒，披一头长发，一边听唱，一边伏案在大幅宣纸上奋笔疾书“我们都是中国人”，连写几行。凡看到的，眼圈都红了。听说这一夜好多人回到住处都聊天不止，快天亮才睡觉。

第二天，我们从早到晚都在一起参观游览。夜，是在充满关于马克吐温传说的密西西比河上度过的。但声声汽笛唤起我的只是武汉长江轮渡的情景。一桌吃冷餐的同伴几乎没谈过一句中国以外的事。我发现，素以笔锋冷峻至于刻伤地步的小说家L在闲谈间竟也是通达多情的人；她担心自己（以及许多在美国的华人家庭）的下一代也许不会说中国话了。她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六十

年代在大陆住过好几年。她的孩子一个姓她的姓，一个随父亲，象北京知识分子家庭时或见到的一样。船到茂陵，大家在黑暗中草草分手，只喃喃说着一些“今后多通信”之类的安慰话。这样的告别也罢，免得许多人要当面动感情。

从那时起，又是一年多了。海峡两边人与人之间在各种机会中的往来也渐渐多了起来，如飞机过境，海员偶访，运动场上的竞技，国际会议上的邂逅，天不断赐良缘，人不断在探索，今后定会更频繁、更热闹、更扩大，直至形成一股力量冲破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障碍，实行自由来往。我们欣赏依阿华一年一度的《中国周末》。现在，艾青、王蒙正在那里享受秋日里的小阳春。此文发表时，他们该到北京了，一定会给我们带回更多好诗文、好信息的。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关于华侨和外籍华人

郑　群

在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华侨和外籍华人的踪迹，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我国福建省厦门市，有一个华侨博物院。这里展出的一千二百多件照片、图表和实物，比较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华侨的产生及其发展概况。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随着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古代就有人侨居国外；唐朝（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以后，人数渐渐增多。以后，虽然历代都有人移居国外，但华侨急剧增加并形成现有规模，还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即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殖民者依仗“船坚炮利”，打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逃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中国东南沿海许多破产的贫苦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到异国谋生。另外，国内频繁的政治动乱，也使一些人逃亡海外。

当时，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美洲、非洲、澳洲的殖民地，开采矿产、经营种植园、修建城市、码头、港口、铁路等，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在贩卖黑奴被禁止以后，吃苦耐劳、工资低廉的华工便成为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的

压力，允许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于是“契约华工”在一个时期内成了中国人移居海外的重要成份。

所谓“契约华工”，是指中国劳动人民“应募”到海外出卖劳动力，与外国资本家或其代理人订立契约，成为失去人身自由的苦力。他们被当作“猪仔”，装上苦力船，从中国运往世界各地。当时，从澳门航行到美国加州要七十五到一百天，到古巴要五个月左右。在这漫长的航程中，华工闷在罐头似的船舱中，受尽了人间折磨。据统计，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六年间，开往美洲的“猪仔”船，平均死亡率为百分之二十六，甚至高达百分之四十四。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平均每年有十多万华工被贩运到世界各地。他们在邦加、勿里洞开锡矿，在苏门答腊种烟草，在马来亚种橡胶，在婆罗洲开田辟荒，在古巴种甘蔗，在秘鲁挖鸟粪，在巴拿马开运河，在巴西种菜，在墨西哥种棉花，在美国、加拿大淘金矿、修铁路，在俄国开采阿穆尔金矿、修筑海参威港口、兴建西伯利亚铁道，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开挖金矿、种菜种烟，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南非、毛里求斯，在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大溪地）、西萨摩亚、斐济、瑙鲁、夏威夷各岛，都有大量华工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西方殖民者一面尽力榨取华侨的血汗，一面为了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而挑拨华侨与当地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断制造排斥、屠杀华侨的事件。一八八二年，美国国会首先通过排华法案，停止华工入境，还排挤、虐待在美华工。其它西方国家也相继效尤，制定种种排华法规，排挤和虐待华侨。但这并不能也没有动摇华侨与当地人民友好关系的根基。当然，随着时代的进展和各国政局的转变，各国对华侨的态度也有不同的改变，华侨的境遇也有所不同。

长期以来，华侨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劳动，为开发和建设居住国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居住国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华

侨也给予同情和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地的华侨同反法西斯的各国人民共同行动，并肩战斗；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为此英勇牺牲。在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有不少华侨参加战斗，曾受到列宁的称赞。为了纪念华侨参加古巴独立战争，如今，哈瓦那街头还保留着“华侨纪功碑”。类似的事迹不胜枚举。

华侨对祖国始终有着深厚的感情，爱国爱乡是他们的光荣传统。长期以来，他们对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许多贡做。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就得到华侨的大力支持。在一九一一年广州起义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华侨就占三分之一以上。孙中山先生曾称赞“华侨为革命之母”。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华侨和国内人民同仇敌忾，他们或捐款，或推销公债，或抵制日货，或回国从戎参加战斗。他们热切地盼望祖国强盛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这从根本上消除了中国人大量移居海外的国内原因。祖国日益繁荣昌盛，国际威望日益提高，使海外华侨欢欣鼓舞。我国政府考虑到华侨的历史与现状，早在一九五五年就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我国政府不主张有双重国籍，赞成和鼓励华侨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反对采取强迫他们改变国籍的做法。凡是已经自愿加入或者已经取得居住国国籍的，就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对于保留中国国籍，我国政府要求他们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为所在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中国政府有责任加以保护，也希望得到有关国家的保障。对于已加入或取得外国籍的，就不再是“华侨”而称为“外籍华人”或“华裔”。由于他们受着中国故土几千年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故土还有亲人，家乡的名胜古迹，人情

风俗，不时引起他们的怀念，他们和中国人民仍然存在着亲属关系。我国政府欢迎华侨回国探亲和观光，也欢迎外籍华人入境探亲和旅游。中国这一政策的贯彻，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外交流，使华侨成为我国人民和有关国家人民友谊的桥梁；增进我国人民同所在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笔 墨 缘

珊 音

这是一幅四人合作画。作者是台湾的张大千、香港的赵少昂、广州的关山月和美国的林文杰。前三人是举世知名的中国画大师，林文杰是美国德州休士顿贝勒医学院的教授、广州中山医学院的客座教授、一位年仅三十五岁的青年科学家。他喜种兰花，也善绘兰花。

这幅合作画，并非一般的应酬之作。据林教授称，这画的创作过程，很有意思。起初，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在广州找到一张四尺的宣纸，在上面写了几笔青兰；翌日，到了香港，赵少昂给添上一竿墨竹和一支笋竹，并盖上齐白石为他镌刻的印章；四天之后，林先生便到了台北的摩耶精舍去拜望张大千（又名爰）。大千先生再添上灵芝和寿石，说这代表长寿。这位大师又说："灵芝一定要有了红叶才会补的，我得给它上点色，可是这么一来，本来是幅水墨,为了几片红叶,就变成彩墨，灵芝也成了整幅画的焦点了。"这位大师绘好画，盖了他的老友方介堪替他刻制的印章，然后嘱咐道：最好请关山月先生补上枝墨梅。此时关先生不在广州，延至一九八三年暮春三月，才写上一枝苍劲的梅花。

在写灵芝寿石的同时,张大千还专门为林文杰教授的画册(内有中国大陆大部分名画家的作品）写了一幅我国古代大诗人——

《归去来辞》一文的作者陶渊明的造像。这幅意味深长的画，引起了许多艺术评论家的注意。有人说："张爰想家了！"相隔不久，老画家李苦禅在北京看到老友此画，深有所感，特画了故乡常见的蘑菇、白菜，以示乡情。

张大千先生不幸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在台北与世长辞。距作此画时还不到三个月。距四人合作画的最后完成，不到一个月，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作品吧。中国的艺术家们都以怀念的心情，评价这一艺坛的团结与合作的珍品。

（一年八四年第四期）

故乡情

黄阿原

编者按： 黄益腾（艺名阿原）原为台湾中华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先祖是福建漳州人。去年九月，他和家人一起回大陆，在北京定居工作。今年元宵节期间应故乡人民的邀请，首次回家乡参观访问。这里发表他此行的感想。

多少年来，几回回梦里回故乡。今天真的回去了，那酒一样浓烈的故乡情，使我沉醉，令我激动，让我怀恋……

春节刚过，应故乡人民的邀请，我到福建去寻根访祖。回故乡，是我的夙愿。大家知道，台湾和福建，有一种剪不断的联系，是历史与地理的，也是现实和心理的。总之，是神圣的。比如，在台湾时，大家谈天说地，一讲起自己是漳州人，是泉州人，有人就会说："噢，我们是乡亲啊！"再谈下去，原来三百年前，祖先们是一起跟着郑成功到台湾的。年代虽然久远，但乡亲却是认下了。这种乡情观念，是超越时间，甚至是超越历史的。与世界其他民族比，这也可以算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观念吧。

故乡行的第一站是福州。一下飞机，我的心就醉了。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仿佛都与我早就相识。在那里，我受到热情的接待，与广播电视的同行们谈得非常愉快。那几天，似梦非梦，我

终日沉浸在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之中。我想弄明白这感觉，但由于时日匆匆，却不能。

“一个女婿半个儿”。泉州是我爱人许绣丝的祖籍，我到泉州来过元宵节。古城泉州，到处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喜贴春联；元宵之夜，欢歌笑舞，火树银花。这一切，使我倍感亲切。泉州过元宵节的情景几乎与台湾无二，只是规模更大，气氛更浓，心情更好。当地的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像接待女婿一样，对我周到热情。当我还在福州的时候，他们就打来电话，问我喜欢吃什么东西。在这里，我又吃到了在台湾时就爱吃的热粽、酸菜猪血汤、海蛎……我到处走，到处游，被热情的泉州人民包围，他们不叫我“黄益腾”，而叫“我们的阿原”。啊，亲切的闽南乡音啊，让我热泪盈眶。泉州人民已经不是接待“女婿”了，而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是的，我是你们的儿子。

那一天，去游清源山，当地的同志让我留字以作纪念，写什么呢？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才能准确地概括我的感觉呢？一时间，无数场景奔来眼前：在台湾，在北京，在黄陵，在福州，在泉州……祖国是一个不可超越的概念，而故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则是其中的精华与核心。稍费踌躇，我写下了“故乡情”三个字。是啊，故乡情似酒，深情把我留……但是，我不得不离去，虽不情愿，无可奈何——漳州和厦门的父老兄弟还在等我。

漳州是我的祖籍，本想多住几天，与亲人昼夜厮守，但因工作日程很紧，我只能逗留一日。在这里，我一点做客的感觉也没有，我黄阿原本就是漳州子弟嘛。市长陪我一天，直到深夜十二点多，至今我心中仍有些惴惴。倒不是别的——他是我的“父母官”，我不该客气——可他每天有多少事需要处理啊！我从中也悟出一点东西，他与台湾的官大不相同。然而，这里与台湾又极为相似：风俗、习惯、语言、衣食住行的格调……在这里，我更深深地感觉：台湾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

来到厦门，到鼓浪屿，登上日光岩，凭借望远镜眺望大担、二担和金门，一切历历在目。自然而然，我想起了台湾和在那里的亲人，海峡两岸，有我的严父慈母，有我的爱女晓意，还有无数我的听众和观众。面对涛涛海浪，遥寄一片情怀。愿风平浪静，海峡变通途；愿祖先神明保佑，亲人早日团聚。我也想对台湾当局说，如果真正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那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辞》）

以上便是我的故乡情。

（一九八四年第五期）

唐代建筑

梁思成

中国建筑的体系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建筑体系。在中华民族文化孕育成长的长期过程中，我们的建筑体系也跟着孕育、成长起来。它最初的起源已无从知道。但中国最古的建筑遗迹，同中国最古的文字“甲骨文”是同属于殷代（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前后），而且在同一地点——平原省安阳县殷墟——发现的。这个体系的主要特点，就是在一个台基上先用木材立柱上梁，做成一个构架；然后在顶上盖瓦，在四面砌墙或安门窗，成为一座房屋。因为有构架承托上面的一切，墙壁就不负重，所以墙壁和门窗在配置上十分灵活，可以适应任何气候和不同的用途。用若干座这样的房屋，与门、廊等配置起来，组成一个个的庭院。从新疆到日本，从黑龙江到越南，凡是接受了中国文化影响的广大地区内，数千年来，人民所建造、所居住的房屋，都是属于这个体系的。

斗拱的结构

这个体系以木构架最为重要，而在这木构结构的全部里最特殊的部分是“斗拱”。“斗拱”是一种巧妙而美丽的结构组织：用在柱头上，以木材做成斗形的“斗”和弓形的“拱”，交叉垒叠，来承托上面的梁枋或屋檐。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法，由于积累

的经验，逐渐改进到非常灵活，富于变化，以解决结构上的许多问题，而目的都是将各部位的横梁上的重量集中之后，转移到柱子上面。“斗拱”主要总是托在大梁底下，并列在屋檐底下，或楼阁上层廊子的栏杆底下。所以“斗拱”虽然是结构部分，却也是建筑外表极富于装饰性的部分。在我国的建筑中，即使是砖筑的，或石造的，塔，牌坊或门楼等，也常用砖石做成“梁柱斗拱”的形状以保持建筑外表所特具的美丽形式，就是这缘故。在唐以前的实物木造的已没有存在的，但有许多汉朝的“石阙”，就是用石料做成木构的各种部分，包括那时的“斗拱”结构。总之“梁柱斗拱”和屋顶部分的开展就始终是中国建筑特有的结构和形式。

到了唐朝，中国建筑可以说正发达到一个成熟而最健康壮伟的时期。那时中国正是经过三百多年封建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而重新统一起来的时候。唐朝封建主维持了一个相当长期间的“安定”局面，以剥削人民得来的资财建造了许多城廓宫室，同时佛教盛行，也建造了许多寺塔。

可是千余年来，每当改朝换代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火并的时候，他们首先就把这些劳动人民血汗造成的建筑烧毁泄愤，毫不爱惜。所以千年以上的，即唐代或更古的建筑已不太多。若干砖石的佛塔得以幸存，而木构的殿堂（据我们所知道的）就只剩一座了，就是本期所刊载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由唐朝留下来不多的几座建筑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千年前房屋的一些印象。在木构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建筑独有的构架；檐下和殿内雄大的“斗拱”；檐部挑出很远；（比北京清朝的太和殿的“斗拱”大得多，檐也宽得多。）内部的梁是微微弯起的“月梁”；梁两头的下面也用四、五层的“斗拱”托着。无论外部内部的印象都同唐朝以后的大不相同。可惜它周围的建筑已非原物，无法得到唐代成组建筑的全貌了。

除了这唯一的实例外，我们从陕西西安大雁塔的石刻上和甘肃敦煌千佛洞的壁画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唐代木建筑的形象。在风格上它们都是一致的。现在河北、山西、辽西有几座辽代建筑，基本上还保存着唐朝的风格，很可以作比较参考。

唐朝的砖石塔留存的全国还有很多座，都是四方的。后世常见的八角塔那时还没有。（只有一座单层像亭子形的净藏“墓塔”除外。）唐代的塔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单层的“墓塔”、多层“亭子”垒叠起来的“多层塔”和塔身比较高而上面有多层檐的“密檐塔”。我们在这里对各类型都选择了一两个典型，其中大雁塔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物。玄奘（唐三藏）就是在这塔下的慈恩寺译经的。大雁塔就是他藏经的“书库”。这塔已不是公元六五二年所建的原物，而是公元七〇一年至七〇四年间改建的。它是纪念中印文化交流的最重要、最伟大的一个标志。

唐朝是中国建筑史中极辉煌灿烂的时期，可惜留存下来的实物已不多，仅能给我们一点印象。这些为数不多的唐代建筑都是中国人民最珍贵的宝贝。我们不惟要爱护它们，而且还应该认识它们。

（一九五二年第一期）

塔

陈从周

在丰富多采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塔是给人以“建筑美”的类型之一。随着佛教东来，塔在我国开始有了兴建，历代匠师们创造了许多既美丽，又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新作品。长期以来，它矗立在城镇、山林、原野、水际，构成了城镇轮廓的特征或某一地方的标志。

塔的形式很多，有四门塔、楼阁式塔、密檐塔、金刚宝座塔等。在材料方面，从早期的木塔，进而为砖塔、石塔，还有木檐砖塔。就数目说，有单塔、双塔与五个塔组成的金刚宝座塔等。

河南嵩山的嵩岳寺塔，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砖塔。它建于北魏正光元年（公元五二〇），平面作十二角形，在很高的塔基上，再加上一层很高的塔身和十四层很密的檐，总高达四十米，外轮廓流畅柔和。它矗立在苍褐色的嵩岳山间，在斜晖映照中，山色塔影构成一幅极美的画图。西安市的大雁塔，是唐代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回来，藏梵文原本的所在。此塔于公元七〇四年改建，到了明代，又在塔外加很厚的砖壁，因此显得更加硕大了。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是我国现存的唯一木塔，塔高六十六米，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一〇五六），全部用梁、柱、斗拱结构，在当时的建筑技术上，确当得起“鬼斧神工”四字的颂歌。

江苏省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和浙江省杭州开化寺六和塔，都

是楼阁式的砖塔，它们一建于五代周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一建于宋代绍兴二十六年（公元一一五六）。在结构技术上，这时候的塔又比以前推进了一步，其特点是加上了塔心柱，使塔身更加坚固。六和塔原为木檐砖塔，后来外檐被焚，如今这十三层的木衣，是清代重修时加的。这两座塔，一在虎丘山上，一在钱塘江边，在不同的地位上，美化了苏杭两地的风光。

祐国寺塔，在河南省开封市，建于宋代庆历元年（公元一〇四一），因为全部用铁色的琉璃砖砌成，人们都称它为“铁塔”。塔形为八角十三层，远远望去，风姿异常挺秀。塔的内部有梯道，穿塔身旋转而上，则又别具一格。而质地极精的琉璃砖，又反映了宋代琉璃工艺的高度水平。

到过北京市的人，大都见到过西城妙应寺的白塔，它是北京市轮廓线上一个极其突出的标志。塔身硕大莹洁，衬托在蔚蓝色的天空下，光芒照人。这座距今已六九二年的古塔，是尼泊尔人阿尼哥设计的，它象征着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北京市近郊的金刚宝座塔，也是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塔。它建于明成化九年（公元一四七三），是在一个长方形的高台上，建立了五座宝塔，塔的雕刻工整而细致，是我国明代石刻的上选。

在我国，如今还保存着数以千计的历代各种形式的塔，在辽阔的土地上，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凝重秀丽南北各尽其妙。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保护古代文物，很多古塔列入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范围，并加以修整。它们不仅作为学者研究的资料，同时也供人登临凭眺，万里江山，历历在目；尤其春秋佳日，乐事从容，则又游者自得之了。

（一九六三年第五期）

故宫的建筑

沈从文

北京有个天安门，建筑得庄严、雄伟而美丽，我国人和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

北京是以风格特殊的东方古建筑著名的。天坛、颐和园等建筑群都自成一个体系，具有独立的艺术风格；综合起来又如一个整体，从属于更大结构的要求，即全个北京城设计的企图。北京城的中心主题结构是紫禁城里的故宫。天安门只算故宫前沿突出部分的一座大门。由此向前还有中华门、正阳门等一线贯通直达最南端的永定门，这条既平且直如抵如矢的中心大道，和北京城一样，是五百五十年前明永乐定都时就安排好了的。由天安门向里走，还有端门、午门；午门才是紫禁城真正的大门，午门以内紫禁城统属故宫范围，现在是故宫博物院——世界著名的一所文化美术博物院。

午门是天安门以外另一杰构，它在历史上作用和古罗马凯旋门有些相同。在棕红色三丈高台上矗立起一长列九楹重檐大殿，有四个金顶重檐方阙楼环卫着，两道长廊把它们贯串成一个整体，显得端重而严肃。午门下边东西两廊，清代文武官员多在此候朝。皇帝坐朝时，午门两旁阙楼即钟鼓齐鸣。

紫禁城是一个方形，南北长三百三十六丈，东西三百零二丈九尺五寸。共有四门，各有雄伟高大的门楼，四角还各有转角楼

一座，结构壮丽而秀拔。

进午门是金水桥和太和门。金水河如一条曲折白玉带子横勒广场，五座白石桥一排展开，门前有一对雄伟威猛的青铜狮子，周围用长廊环抱。太和门平台虽不怎么高大，迎面看来格局却十分壮观。门后广场尽头便是故宫主要建筑三大殿。

太和殿是过去帝王坐朝问政的"金銮宝殿"，宝座现在还金漆煌煌。这座殿地位高旷宏敞，殿基高二丈，殿屋高十丈，广十一楹，纵深五楹。重檐垂脊，前后有金铜饰门和琐窗。殿脚用三层白石台子围绕三层白石栏杆，每一阶段都排列着几个大炉鼎，殿前还有金铜铸龟、鹤、香炉和大缸。广场东西各有一座双层高阁，用六十四间廊庑连接。从建筑工程看来真够得上说是堂皇庄严，气象万千。其它两殿中，中和殿规模略小，保和殿高大可比太和。

保和殿北入乾清宫门，门前格局小而精美，琉璃八字花墙经过二百多年还如崭新，这里已临近帝王平时起居地方。西庑一列靠墙小房子，五十年前军机大臣就在这里住宿办事。东西六宫是帝后居住地方。

乾清宫是清初诸帝起居寝殿，乾隆以来多在这里召见奏事大臣。后边交泰殿，屋顶藻井雕刻特别精美。清代帝王在这里举行婚礼，殿后坤宁宫，是婚后暂住的地方。

御花园在故宫最后地区，五十年前只有帝王一家人在此饮酒喝茶赏花玩月，现在已成了游人休息地方。御花园有很多珍奇花木，其中几株阅世多、上了年纪的老树木，大都经过明清两个王朝的兴废。

出御花园后面的神武门，可上景山。从山顶的万春亭鸟瞰北京全城，极目远望，天坛祈年殿和西城大白塔都收入眼底，近处在北海琼岛和整个故宫建筑群，更是历历在目。向后看，在中心轴大道上还有钟楼鼓楼各一座，从万户人家绿树丛中巍然高耸。

古人说，登高远望，使人心悲。现在登临景山，则只会引起人大好河山的亲切感，为的是这个伟大都城并不因为古老而衰颓，事实上正在返老还童，永远有青春活力注入，使它越来越美丽，越年青！

（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石桥

梁思成

民间小调“小放牛”里的小姑娘回答牧童哥道：

“赵州桥，鲁班爷修；

玉石栏杆圣人留。

张果老骑驴桥上走；

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

千百年来，赵州桥就是这样深深地印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被看作劳动人民杰出成就的象征。“鲁班爷”是所有具有创作天才的巧匠的代名词。手艺卓绝的雕匠被尊称为“圣人”。还有关心民间疾苦、在群众中随时出没的张果老和长期为劳动人民当作英雄人物来歌颂的柴荣在桥上留下的“仙迹”——一对驴膝印和一道车轮压的沟，也被十分珍惜。在有的元曲和弹词里，这座桥也是歌颂的对象。

赵州桥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南门外的洨河上，它在一千三百五六十年前的隋代就建造起来了。它不仅便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而且在唐、宋两代还多次为国际运输发挥了作用，千军万马曾奔驰而过这座大石桥去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

赵州桥所以引起世代人们的赞誉，首先是由于它的二十七点四七公尺跨度的大石券。这在古代可不简单。更令今天的工程师敬佩的是：大券两头，上面各背着两个小券，水大的时候，急流

可以从小券通过，使桥身免被冲塌。历代留下的诗、铭、赞、记中，许多人都曾指出这“两涯嵌四穴”的特征。我们还应指出：这样还节省了材料，减轻了桥身重量，从而简化了基础工程。这种做法，比起欧洲要早一千多年。

这座伟大的石桥是隋朝匠人李春修建的。关于李春，除了这桥之外，我们虽然一无所知，但可以毫不踌躇地说：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桥梁工程师。从这座桥的成熟的工程技术看来，我们可以推论，发券造桥的技术当时显然已经达到高度水平。李春的创作无疑地是从前人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发展出来的。他生活在那样的年代和社会里，竟能留下这样“奇巧固护，甲于天下”的桥，我们怎能不以敬仰的心情，缅怀这位一代杰出、前无古人的巨匠！可是，在今天的中国，解放了的人民中已经涌现了无数更伟大的“李春”，他们所创造的桥，不是跨过小小的河，而是跨过天堑长江和汹涌澎湃的黄河！

“小放牛”里的小姑娘所说的“玉石栏杆”，据唐人记载，是“锤斫龙兽之状……若飞若动。”一九三二年曾到赵州桥去进行过测绘、研究的一位建筑史家说，他当时所看到的栏杆已经肯定不是“圣人”留下的原物的。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古代劳动人民留下来的文物，将赵州桥加固重修。在河床下两三公尺深的淤泥里，原有栏板若干块被发掘出来。这些装饰浮雕不但刀法简练，既刚劲又流利，栩栩若生，而且其中有些龙兽还非常淘气、诙谐，充满了劳动人民的乐观情绪和纯朴、爽朗的风趣。

现在这座名桥已经以现代的工程技术加固起来。优秀的刻石工人们正在精工复制那些栏板，安在桥上屏护行人。连两处“仙迹”也照原样仿凿出来。“圣人”留下的原作即将移置赵县文物保管所中永远珍藏。赵州桥雄跨在静静的洨河上，已经“返老还童”了。

（一九五八年第八期）

水乡的桥

陈从周

提起“江南水乡”不由使人想起“户藏烟浦，家具画船”的一些水乡景色。每当杏花春雨，秋水落霞，更令人依恋难忘了。这明秀柔美的江南风光，是与形式丰富多变的水上桥梁有所分不开的。它点缀了移步换影的景物，刻划了水乡的特征，同时又解决了交通问题。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地从功能与艺术两方面来处理了复杂的水乡交通，美化了村镇城市的面貌。

在水道纵横，平畴无际的苏南浙北地带，桥每每五步一登，十步一跨，触目皆是。在绿满江南的乡村中，一桥如带，水光山色，片帆轻橹，相映成画。但在城镇中，桥又是织成水乡城镇面貌的重要组成部份之一。每当舟临其境，必有市桥相迎，人经桥下，常于有意无意之中，望见古塔钟楼，与夹岸水阁人家，次第照眼了。数篙之后，又忽开朗，渐入柳暗花明的境界。

这些水乡的桥，因为处于水网地带，在建造时都是运用了“因地制宜”与“就地取材”的原则，在结构与外观上往往亦随之而异，例如在涓涓的小流上，仅需渡人，便点一二块“步石”，或置略高出水面的板桥石梁，小桥流水，掩映村居。在一般的河流上，大多架梁式桥或拱桥；因河流的广狭及行船的多寡，又有一间（拱）三间（拱）乃至五间（拱）的。上海青浦的放生桥，横跨漕港，是上海地区最大的石拱桥。江南水乡河流纵横多支，为

了适应这种情况，往往数桥在望，相互“借景”成趣。亦有在桥的平面上加以变化，来解决这种矛盾，浙江省绍兴市宋宝祐四年（公元一二五六）建的八字桥，因为跨于三条河流的汇合处，根据实际需要，在平面与形式上有似“八”字。为便利行船背纤用的“挽道”桥，多数是比较长的，像苏州的宝带桥建于明正统七年至十一年间（公元一四四二——一四四六），为联拱石桥，计孔五十三，高其中三孔，以通巨舟。这类长桥中著名的还有吴江的垂虹桥（建于元泰定三年，公元一三二六），而于绍兴尤为常见，长桥卧波，若长虹，似宝带，波光桥影，为水乡的绮丽风光更增颜色。

桥的形式似拱桥变化最多，有弧拱、圆拱、半圆拱、尖拱、五边形拱，多边形拱等。青浦普济桥，为宋咸淳元年（公元一二六五）建造，迄今已快七百年了，古朴低平，其拱券结构，不失为我国桥梁发展中的重要物证。绍兴广宁桥，为多边形拱桥，重建于明万历二年（公元一五七四），雄伟坚挺，桥心正对大善寺塔，为绝好的水上“对景”。在建筑材料方面，不论梁式桥与拱桥，皆以石料为主，不过亦有少数砖木混合结构与木结构的。砖木混合结构桥，去冬在青浦发现的一座元代桥梁，名为迎祥桥，可称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巧妙地运用了石柱木梁及砖桥面，秀劲简洁，宛如近代桥梁，虽经明清几度修理，但亦保持了悠悠的几百年岁月。此外，桥除了本身外尚有附属建筑来丰富美丽它，苏州横塘古渡的亭桥便是平添一景。宝带桥在桥边还置小塔、石狮，桥堍又建石亭，使修直的桥身，起了轻匀的节奏。

水乡的桥是那末丰富多采，经过了漫长岁月的考验，到现在还发挥其作用，不论在艺术造型上，风景的点缀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至于结构又复符合科学的根据，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力量的结晶。如今，我国桥梁工作者，正从这些宝贵的遗产中，推陈出新，创造着不少既有民族传统，又适应今日功能的新型桥梁。（一九六二年第九期）

漫话园林建筑

廊·亭·桥

陈从周

古典园林建筑是我国珍贵的历史遗产之一。造园艺术影响达于朝鲜、日本，并远及西欧等地。古典园林，荟萃于江南。组成园林的诸要素，不外乎自然的水、石、花、木，和人工亭、台、楼、阁、廊、榭、杆、馆等，在园艺匠师们的巧妙安排下，处处成景，情趣无尽。本刊约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就园林建筑中的廊、亭、桥三景撰文，以飨读者。

廊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一千多年前的唐诗，就点出了廊在庭院中的妙用。我国古代建筑的单体与单体之间，必依靠廊来作联系，才能成为一个整体。在园林等风景区，则更是因地制宜，巧于安排，构筑了曲直、高低、爬山、临水等多种式样的廊。

廊在园林中是游览线，又起着分割空间，组合景物的作用。廊引人随，水石其间，移步换影，幅幅成图。像驰名中外的北京颐和园的长廊，漫步其间，得以饱览昆明湖的湖光景色。而苏州拙政园的水廊，则轻盈婉约，人行其上，宛如凌波漫步。扬州西园前的香影廊，未至其境，名已醉人。至于苏州沧浪亭的复廊，用花墙分隔，使园有界非界，似隔非隔，令人遐思无限。扬州园

林主体建筑用楼，其廊亦作楼式，即复道廊，形成了多层的游览线，寄啸山庄是为佳例。

廊之运用得当与否，有关全局，高下得宜，曲折有度，尤其在可有可无之间，益见功力。即竹廊三折，雅素无华，亦必婉转宜人。至于千步长廊，闿爽平直，则又为别调了。

亭

人们在旅途间，或在游览中，每见一亭，总想小憩片刻，借以恢复暂时的疲劳与观赏四周的景色，即"亭者，停也"。同时，因为它本身形式的丰富多采，成为点缀风景的主要建筑小品之一。

亭之美，除造型外，还在于所处之景与所对之景，水边亭、山际亭、林间亭、花畔亭、桥上亭、廊中亭，地位不同，景因而异。伫云亭、快雪亭、待霜亭、牡丹亭之类，又因时而殊。可见亭之构筑非孤立的一座建筑物。

亭在风景区与园林中，起着"点景"与"引景"的作用。北京的景山五亭，为城内的最高点，每到北京的人，常为它所吸引，必登高一快，以饱览首都景色。苏州拙政园的扇面亭，亭名"与谁同坐轩"，小亭临流，静观自得。笠亭如盖，半枕山腰。而网师园之"月到风来亭"又正点出此亭观景之妙。

至于亭的形式，真是变化多端，可分方、圆、多边、海棠、梅花等等多种。按材料的不同，又有饶多野趣的茅亭、雅洁玲珑的竹亭、庄严凝重的石亭、与翚飞多姿的木构亭，它在园林建筑中展示了最美丽的一页。

桥

桥，古代称为"河梁"，是架在水上的行道，虽属解决交通问题的一项工程，但是聪敏的我国古代人民，总是设法把它和生活、感情、艺术结合起来，是那么富于诗情画意。"小桥流水"

足以令人想望江南水乡景色，而风景区的“断桥残雪”、交通要道的“庐沟晓月”，又使人必与四周的风物人情联系在一起。而园林中的桥，正是建筑艺术中的精品。

北京颐和园十七孔长桥卧波，陆水之间，平分秋色，为该园增添上几许光彩。晶莹如雪的玉带桥、一亭翼然的石桥、轻轻地划破了湖面的平整，淡淡地点醒了山影的静穆，又烘托了四时佳景。

江南园林之桥，以雅洁精巧取胜。灵珑空透的拱桥，崛起空间，人桥倒影，更显得云高水阔，而水平线条的梁板石桥，则贴水而过，观赏游鳞莲藻，益得情趣。苏州拙政园是以动观为主的园林，曲桥不但使水面分隔空间，更与曲廊一样起着“桥引人随”的作用，其分庭妙运，思致相同。网师园园小而精，以静观为主，廉泉桥小小一拱，横枕涧上，隐处园隅，安排得那么妥贴，游者至此，往往留步。

美丽的中国园林桥梁，形式丰富多姿，有梁式桥、拱桥、浮桥、廊桥、亭桥等，在世界建筑艺术上放出一种独特光彩！

（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唐代长安的发掘

徐　稚

如果把中国古代文明比作一条长河，那末，唐代就是一个新的浪峰；如果把中国古代文明比作一幅锦绣，那末，长安就像缀在上面的一颗宝石。长安代表的唐代文化，当时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并且影响着亚洲各个邻国。

唐代长安正在发掘的消息，早就吸引着我们，怀着对唐代文明的浓厚兴趣，我们终于来到西安参观了长安的遗址。

在云气变幻莫测的终南山和渭河之间，展开一片富饶的平原，一千多年前，这里矗立着一座长方形的城市。城的正北、东北和东南，龙楼凤阁凌霄汉，白色的殿墙雅致地冠以黑色的屋顶，殿阁亭台，雕饰绮焕。人们把这些建筑群简称为“三大内”。正北的太极宫叫“西内”；东北的大明宫叫“东内”；东南的兴庆宫叫“南内”。

全城以皇宫为主体，整齐地分布着一〇八个坊里，它们由南北十四条街和东西十一条街划分出来。白居易登高览胜，看到长安严整的市容，写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确是最形象的写照。从前的京城布局，都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工商业区设在皇宫的后面；这座京城却有点新鲜、别致，工商业区被集中为东、西二市，左右对称地摆在皇宫的前面。

长安城内纵横着宽阔、笔直的街道，最狭的街道以四十七

步，合六九·〇九米；一般的为一百步，合一四七米；大明宫前丹凤门大街的宽度为一二〇步，合一七六·四米；宫门外的东西大街，竟宽至三〇〇步，合四四一米，这简直宽得令人难以置信了。街道中心为大街，大街两旁的水沟边，种着一排排的青槐和榆树，市民行走在绿荫冉冉的人行道上；达官贵人乘着朱红色的马车，慢慢地走在大街上。

唐代统治者集中了劳动人民和全国科学技术力量建设的长安城，比今天的西安旧城大五倍，这里居住着一百多万人口。

唐长安的规模确定于隋代。隋开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始建大兴城，都城的设计者是当时的大建筑家宇文恺。唐兴以后，定都于此，改“大兴”为“长安”，开始了扩建。建都之初，宫殿只有“太极”，至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在太极宫的东北龙首原，修建永安宫，次年改名大明宫，但未建成而止。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又重建大明宫，次年宫成，迁往听政。此后，唐玄宗虽另建兴庆宫，但唐代帝王多居大明宫，重大政治措施主要出自“东内”。

一九五七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西安唐城发掘队，到大明宫勘察和发掘，现在，大明宫的发掘已经结束。

七月七日的早晨，终南山突破了云雾，现出峭拔的雄姿。唐城发掘队队长马得志同志陪同我们去参观大明宫的遗址。出了西安市的北门，汽车向东北方开行，地势渐渐隆起，这一带就是有名的龙首原了。这时马队长告诉我们，现在正沿着大明宫的西墙行驶，那边露出地面的残存墙址，是太极宫的西墙。汽车爬上了高原，不久，停止在一片广阔的坡原上。我们已经来到了麟德殿的遗址。

麟德殿是大明宫内规模最大的宫殿之一，当时宰相奏事，宫内宴会和接见外国使节，都在这里举行，殿的台基用土夯筑成，平面呈长方形，殿堂、廊庑都建在重台之上，台基和庑殿的断壁

被火烧过，像坚硬的红烧土，地面上还残存不少灰烬，这个殿显然是被焚毁后废弃的。

站在台基上，远远望见东边隆起一座葱绿的土山，那是当年宫内太液池中的蓬莱山。白居易《长恨歌》云："太液芙蓉未央柳"，写的太液池就在这里了。轻风迭浪，芙蓉飘香的太液池已无从复睹，但池的痕迹至今犹依稀可辨。

我们离开了麟德殿的遗址，沿着西墙向北行，从北墙的转角再折而向东，到了重玄门。重玄门正对玄武门，重玄门的门道还看得清楚，玄武门的门址虽只剩下两个高大的土堆，但仍然使人领略到一派雄伟的气势。

由玄武门顺原路返回，到了含元殿。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殿址是一个长方形的高台，从殿基和地面的巨大石柱础来看，它俯瞰长安，是一座气魄壮丽的建筑物。殿的两侧耸立着两个黄土高台，是翔鸾阁和栖凤阁的遗址。含元殿遥对著名的大雁塔，俯首一瞥，今天的西安市区全在眼下了。

为了了解作为唐代经济文化中心长安，唐城发掘队于一九五九年夏天对长安的工商业区西市作了全面的探测和发掘。探测结果，知道西市的平面大致是正方形，市内有东西大街、南北大街各两条，街宽十六至十八米，四街交叉像个"井"字形，这和文献的记载是相符的。

七月七日那天，我们还参观了正在发掘的西市遗址。发掘出来的，有一条街道，街面尚保存车辙的痕迹。街旁是一条排水沟，沟边发现店肆的遗址，地面遗存约一公尺厚的砖瓦堆积层，出土许多"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和大量的陶、瓷片。从西市店肆遗址之稠密，可以想见唐代长安商业的繁荣。

文献记载：西市有绢行、装饰品店、大衣行、秤行、果子铺、秋辔行等，这里不仅是唐代工商业的中心，也是外商聚居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地方。西市附近建有西域传来的新宗教祠宇，并

有各种胡戏上演。西市住着能认识珠宝的波斯商人，有开设酒店的胡商。胡商的酒店，当垆侍酒的多为胡姬，就饮的也有文人。诗才横溢的李白，有一天，飘然步入一家胡家酒店。诗人饮着醇美的西域葡萄酒，欣赏胡姬的轻歌曼舞，不禁诗兴豪发，写出了“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的诗句。

从西市归来，沿途，我的心中萦回着对唐代人民伟大创造力的敬意，和马队长谈论长安城发掘的前景。马队长说：一九五八年在发掘大明宫的同时，对兴庆宫作了部分的发掘。一九五九年，我们对唐长安作了全面的调查，就在这一年，开始东、西二市的勘测和部分发掘。一九六〇年是大规模钻探和发掘唐代长安的一年，这年已经将整个城址范围内的街道、坊里勘测清楚，弄清了长安城的布局。不过，发掘长安，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宫殿的发掘和东、西二市的部分发掘，只是这个计划的开端呢。

（一九六一年第十期）

周代的虢国文化

林寿晋

在我国人民中，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晋国（今山西境内）的南面有虞国和虢国两个小国。晋兵要经过虞国去攻伐虢国，便派人送名马和玉璧给虞国的国君，请求借道。虞国的大夫宫之奇谏劝虞君道："虢国和虞国是兄弟之邦，像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虢国如果灭亡，虞国就危险了。"但虞君不听忠告，反而和晋国联合起来征伐虢国。结果，晋兵攻灭虢国后，也接着吞并了虞国。原来送给虞国的名马和玉璧也回到晋国的府库中。

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故事流传着，而这个悲剧的牺牲者虢国确切的地理位置究竟在哪里呢？它的古老的文化面貌又是怎样的呢？却一直是个谜。

改造黄河的宏伟工程开始了。一九五六年冬天，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文化部联合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队，在三门峡市上村岭的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两件铜戈，戈上有"虢大子元徒戈"铭文。这个线索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后，在上村岭及其周围，又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终于发现了虢国的都城上阳和它的一处墓葬群。在墓地中，发掘出虢太子等各级贵族与非贵族的墓葬二百三十八座，四座车马坑和马坑，被湮没了二千多年的虢国文化，就重新出现在眼前了。

发掘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探明了虢国都城上阳的位置。它就在今三门峡市李家窑村一带。遗址长约一公里多，这里出土的遗迹主要有瓦类建筑物和窖穴等。从发现的器物中还可以看出，晋兵攻陷上阳后，城址可能并没有完全废弃。此外，虢国建立的确切年代得到确定，也是这次发掘工作的一个重要成就。根据《国语》记载，虢国在公元前七七〇年周平王东迁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另外的一些文献，却一直认为虢国建立于东迁以后，长期以来，形成一种传统的看法。这次在墓地中发现的许多西周时代的器物，证明了虢国确实建立在东迁以前。

墓地出土的数千件青铜器皿、工具、武器、车马器、乐器和装饰品，表明虢国有着相当规模的青铜铸造业。晋南、豫西本来蕴藏铜矿和锡矿，虢国的铸造业很可能是就地取材的。这里发现的全部青铜器皿，都是用拼合的陶范铸造的。不过一般都比较粗糙，这或许和虢国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有关。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四把短剑和三面镜子，这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剑和铜镜。剑和后代的不同，脊上都有一条凸起的圆棱；镜文也较后代的小而朴拙。这个发现，将我国开始使用铜剑和铜镜的年代，确切地追溯到西周和东周之际。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是手工业中的玉器制造业。墓地中发现的随葬玉石珠饰达一千多件。玉石器多用大理石、鸡血石、绿松石和软玉制作。其中最精致的是一种由鸡血石珠和玉饰相间串成的项链。这里还出土了许多玻璃珠饰，但无法肯定它们是本地制造的还是从别处输入的。出土的器物中还发现了一些木胎的漆器皿，有的镶嵌着蚌壳磨制的圆珠，这是颇为罕见的工艺品。

虢国处在黄土高原地带，陆路交通相当发达。在三座车马坑里，一共发掘出二十辆车和四十四马的遗骸。这是我国已发现的保存得最好的车辆。车用木造，是两匹马拉的双轮独辕车，全长约三公尺左右，车的各部分还有青铜制的零件和装饰品。

在发掘出的二百多座墓中，一般随葬物都是陶器皿，只有少数墓葬才用铜器皿。而且有随葬列鼎和不随葬列鼎的区别；以列鼎随葬的又有不同的等级。这种情况，说明虢国社会上存在着严密的等级制度。

从发掘情况看，墓地大概是和虢太子元徒有关的这一族人的葬地，它在公元前六五五年虢国复灭后，就完全废弃了。由于墓地的年代下限明确，考古学家就能够科学地断定遗址的年代。

虢国遗址的发现不仅有助于认识虢国的社会和文化面貌，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这个时期的考古学上的空白。

（一九六二年报第三期）

蓝田猿人头骨

吴汝康

一九六三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在陕西省蓝田县进行新生代地层调查和寻找脊椎动物化石时，在该县泄湖镇陈家窝村附近发现了一个完好的猿人下颌骨。这是我国周口店以外另一发现猿人化石的地点。这个发现公布后，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

一九六四年初，在前一年工作的基础上，组织了规模较大的调查发掘队，在蓝田进行更广泛的调查发掘。五月下旬，在蓝田县秦岭北麓，高出地面约八十多米的山坡上的公王岭化石地点，挖出了一个猿人牙齿化石；十月份在运回的大块含化石堆积中发现一个猿人头骨，经过仔细清理，这个猿人头骨保存的部份计有额骨、顶骨、右侧的颞骨、眼眶的大部分和鼻骨的一部分，右上颌骨的大部分和左上颌骨的一部分，并附连有二个牙齿，连同五月份在野外发掘的一个牙齿都是属于同一个猿人的。

和猿头骨一起，还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根据对发现猿人头骨的地层层位和古动物化石等的研究，初步认为出产猿人化石的地层是第四纪中更新世的早期，估计离现在已有五、六十万年。

从蓝田猿人头盖骨的外表，可以看出它在石化过程中，因受外来的压力而有轻度的变形。额骨的中央部分明显高低不平，凹

坑周围隆起的嵴有锐利的边缘，可能是在土壤中长期受溶蚀而形成的。

上颌骨前面也因受压而变平，右第三臼齿齿冠咬合面被压而朝向上后方，但仍附连在齿槽骨上。

蓝田猿人的年龄可以根据头骨骨缝的愈合情况和牙齿的磨耗程度来判断。蓝田标本的额骨与顶骨之间的冠状缝已经愈合，上第二臼齿的磨耗程度，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已达二度，年龄约为四十岁左右。但原始人类头骨骨缝愈合的时间较现代人为早。由于原始人类的食物远比现代人为粗糙，牙齿的磨耗程度也较现代同样年龄的人为大，因而估计这个猿人大约是三十多岁。

蓝田猿人的性别目前还难于正确判断，从头骨和牙齿的较为细致来看，可能是女性。

蓝田猿人头骨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眉毛下的眉嵴骨（眶上圆枕）极为硕大，左右互相连续并向外延伸，在眼眶上方形成一粗壮的横行骨嵴。前额非常低平，明显向后倾斜。头骨壁极厚，头骨高度很小。脑量估计只有七百八十立方厘米，明显比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为原始，而大致与爪哇猿人中最早的粗健猿人相近。

在陈家窝发现的猿人下颌骨与公王岭发现的猿人头骨的类型相一致，根据这些材料，复原了蓝田猿人的完整头骨。

和猿人头骨同时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半数以上是森林性的种类，如剑齿虎、猎豹、狮、貘、各种鹿和大猕猴等，但个体数目极少，而且化石材料又很零散，看来主要是由公王岭南坡树木覆盖地带由水冲下来堆积在一起的。也有少数几种草原动物，如原始野牛，三门马，羚羊等，可是个体数目却很多，化石材料也保存得较好，是在化石地点附近生活的动物。整个动物群中有许多热带或亚热带生活的种类，表示蓝田猿人生活时，蓝田地区的气候比现在当地的气候以及北京猿人时期周口店的气候为温

暖。

蓝田猿人头骨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蓝田猿人比北京猿人为原始，地层层位也较早，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就世界范围来说，目前只有五个地区发现有猿人头盖骨化石，阿尔及利亚发现的毛里坦（阿特拉）猿人和坦桑尼亚发现的舍利猿人的时代大致比北京猿人稍晚，爪哇直立猿人的层位大致与北京猿人相当，而蓝田猿人大致与爪哇粗健猿人相当，因而蓝田猿人代表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一种猿人类型。蓝田猿人头骨的发现，扩大了早期猿人的分布范围，增加了我们对早期人类的了解，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根据。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过去在周口店发现的猿人头骨都被美帝国主义者弄得下落不明了，蓝田标本是我国现有的唯一的猿人头骨，是由我国的科学工作者自己发掘出来和进行研究的第一个猿人头骨，这是我们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方针的胜利，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蓝田猿人头骨的发现，更表明中国是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进一步的工作将对人类起源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六五年第七期。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殷墟考古的新发现

肖　纯

一只鸮鸟，敛翅挺立。仔细一看，鸟上还有两只小鸟：一只在头上伫立，一只在尾部展翅。这样生动的鸮鸟形青铜器，是一九七六年春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

妇好墓所在的安阳市郊，三千多年前，原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古地名叫北蒙，又叫殷。从盘庚（第二十代商王）迁殷到商朝（公元前十六世纪——前十一世纪）灭亡，商朝在这里建都二百多年，历史上又把这段时期称为“殷代”。公元前十一世纪期间，在周武王（西周第一代帝王）伐纣（商朝末代帝王）的战争中，这座都城被攻陷，殷王朝宣告灭亡。随后，殷城逐渐沦为废墟，堙没土中，被人遗忘。直到十九世纪末，随着甲骨文在安阳大批出土，才使人们重新注意这座古代都城。此后，在这里又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殷墟”就成为中外考古学界所注目的地方。可是，在旧中国，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分子对我国文物的大肆掠夺，致使殷墟遗址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大型墓葬被盗掘一空，大批珍贵文物流散国外。

解放后，国务院宣布殷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专门建立了工作站，对殷墟进行详细的勘察和重点发掘。殷墟的范围有二十多平方公里，已探明有宫殿区、殷王葬地以及手工业作坊，平民墓地等遗迹。近几年，殷墟考古

取得了很多重要收获，妇好墓是殷墟发掘五十年来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共出土一千四百多件青铜器、玉石器、牙雕等珍贵文物，数量之多，制作之精，都是殷墟发掘以来所难以比拟的。

根据妇好墓的文物特点和地层关系，特别是许多青铜器上都有“妇好”铭文，可以确定这座墓葬的年代为殷代中期（公元前十二世纪前半叶），墓主人应是武丁（第二十四代商王）时期的妇好。历史文献记载，武丁是盘庚迁殷后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殷王，达五十九年。他对殷代奴隶制国家的发展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据考证，妇好既是武丁三个法定妻子中的一个，又是为武丁东征西讨的一员女将，曾统领过一支一万三千人的队伍。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殷代墓葬。

妇好墓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有四百多件。其中有不少是过去从未发现或罕见的珍品。如造型奇特的偶方彝。形体高大的方鼎（仅次于我国最大的“司母戊”方鼎），体态生动的鸮尊，纹饰精美的兕觥等等，充分体现了殷代冶铸业的高超技艺。在近二百件青铜礼器中，各种酒器又占百分之七十，而且大多成对成组。它们既是殷代奴隶主贵族嗜酒成风的证明，又是研究当时礼制的宝贵资料。

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品种繁多，雕琢精细。五百多件玉石器中，有人像、飞禽、走兽、昆虫、鱼类以及各种礼器和饰物。玉石器的造型，有的是立体雕琢，有的是平面浮雕；写实的，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写意的，构思奇特，极为传神。其中十多件玉石人像和人头像，发型和服饰各不相同，有的戴冠跪坐，有的盘发赤足，可以了解到当时不同社会阶层的风俗人情。

面对这批三千多年前的艺术瑰宝，怎能不赞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才能与智慧！当时，那些无名的奴隶用心血浇灌出来的艺术之花，却为奴隶主贵族所占有和享受；今天，墓中奴隶主的尸骨早已化为朽土，而奴隶们创造的古代文物却依然光彩夺目。

（一九七八年第八期）

中山国文物

李学勤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公社一带发现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年）古城遗址一处,发掘大小墓葬三十座，出土许多精美的文物。这一重要发现，揭示了中山国的文化面貌。

中山国是我国北方民族白狄建立的国家,春秋(公元前七七〇——前四七六年）时期称鲜虞，国都在今河北正定县境。公元前四〇六年，中山国曾被魏国占领。不久中山复国，迁都灵寿（今平山县境），并于公元前三二三，和燕、韩、赵、魏五国同时称王。这时中山国国力强盛，曾北败燕军，南侵赵国。后来，在公元前二九六年被赵国吞并。平山这次发现的古城，从种种迹象推断，就是中山国的国都灵寿。三十座墓葬中的两座大墓是中山王陵，其中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三〇八年左右，墓主人可能是中山王嚳（音错）。平山发现的大量文物，不少具有令人惊叹的水平。特别是种类繁多的青铜器，制作精巧，纹饰瑰丽，为我国文物宝库增添了新的光彩。

错金银的器物多，动物形象的器物多，可谓中山国青铜器的特点。最精采的如错金银虎噬鹿铜器座，一只凶猛的老虎，扑攫了一只小鹿，小鹿在虎口中伸颈绝叫，形象极其逼真。又如错银双翼铜神兽，其造型如虎生翼，是富于神话意味的作品。过去，

人们只是在东汉（公元二五——二二〇年）以至南北朝（公元四二〇——五八九年）的石雕中看到过类似的神兽，时代这样早的却是第一次发现。错金银龙凤鹿铜方案底座有四只昂首的鹿，其间有纠结盘绕的龙和展翅欲飞的凤，形成复杂的动物群像，别具一格。案边上刻有铭文，说明这件精美器物是中山国的工匠制造的。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一号大墓出土的十五连盏铜灯。这台灯灯形如树，共有十五个灯盏。树上栖戏着猿猴和鸟雀，树梢还有夔龙盘绕。树下两个赤膊的人，正举手托食饲猴，树枝上有两只猿猴悬臂垂身接食，形象的酷肖令人叫绝。全灯可以拆卸成若干部件，各有不同形状的接榫，也极见巧思。

中山国的青铜器很多刻有铭文。一号墓出土的中山王鼎和方壶，器面各有铭文四百余字。其中中山王鼎是我国现已发现的铭文最长（四百六十九字）的战国青铜器。铭文内容主要是记述中山国伐燕得胜的事迹。据古史记载，公元前三一四年，齐宣王利用燕国内乱，起兵伐燕，只用五十天的时间就攻占燕都。现在从中山王鼎等青铜器的铭文可以知道，原来中山国也参加了对燕国的进攻，并占据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的燕国土地。这在史籍中是没有记载的，对研究古代史很有意义。同时，铭文中提到了中山历代国君，使我们知道了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世系。

中山国器物中，有些具有白狄民族文化的独异风格，如山字形青铜器等，还有青铜帐具之类，反映了当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但从总体来看，中山国器物和中原各国是极其接近的。其文字与华夏相同，铭文里还多次引用《诗经》等书，可见战国中期的中山国已经相当华化了。这种民族间的文化融合，是列国走向统一的重要基础。

（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二千二百多年前軍阵的再现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黄韬鹏

二千二百多年前，在通往秦朝都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附近）的驿道上，一队队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罪人”，在身穿铠甲、手持长矛的兵卒押解之下艰难而缓慢地行进着。他们是被征发来为秦始皇修建陵墓的。

秦王嬴政十三岁继位，第二年就不惜耗费巨资，修宫造墓。到公元前二二一年，他统一六国称始皇帝之后，由丞相李斯主持，大将章邯监工，又大规模修陵十年，人数最多时达七十二万之众。

在咸阳以东约五十多公里的骊山脚下，秦始皇陵的建造工程接近完工。只见那椎形的夯土陵冢，已堆有十四丈多高，陵园占地约二十五万平方米，长方形的内外二城，也即将垒好，周围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随葬墓坑，正在加紧修筑，在陵园的东侧，有无数孔土窑，冒着黑烟和白气，那是在烧制工匠们精心雕塑的各种随葬陶俑。

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历史上曾经起了进步作用。但是，他横征暴敛，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征发这样多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如此浩大奢华工程，人民深受其害。这一幕悲惨的历史已经过去很久远了。后人只是从史书上和传说中，知道一些这段历史的轮廓。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人们才看到这段历史真实图景的一角。

一九七四年三月，陕西临潼县宴寨公社西扬生产队社员们，在骊山秦始皇陵东侧约一公里半的地方打井，忽然挖出了和真人大小相仿，形象逼真的陶俑，一时传为奇闻。以后，经过国家文物部门有组织的勘探和发掘，竟然发现了一个面积有一万二千多平方米，约有六千个兵马俑的随葬坑。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并便于就地发掘、修复和供人们参观，国家在这个俑坑上，建造了一座大型展厅。这是以拱形钢架为主体的卷棚式结构建筑。它东西全长二百三十米，从棚顶到底层高二十二米，南北跨度宽七十二米，十分宽阔敞亮。从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正式建成开馆以来，参观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人们无不为秦始皇陵兵马俑这个壮观的奇迹而感到惊异。

这个兵马俑坑深五米左右，是一长方形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建筑。已出土陶俑五百余件，战车六乘，陶马二十多匹，以及许多的实战兵器等。坑的东端为南北向长廊，排列着面向东的三列横队，每列有七十个武士俑，除了三个领队陶俑着铠甲外，其余都着短袍，扎裹腿，免盔束发，持弓挎箭，像是军阵的前锋。后面有东西向的过洞十一个，其中六个过洞配有四匹马拉的战车，五个过洞是步兵。这样就组成了一个佩剑执矛的武士俑与兵马战车相间的三十八路纵队，为军阵主体。俑坑的南北两边过洞外侧及西端，各有一列武士俑，分别面向南、北、西，这可能是卫队，以防侧尾受袭。

这座地下建筑的底层，地面铺着绳纹砖。过洞地面两边墙根，挖有渠槽。里面平卧着方木，方木上立着壁柱。过洞顶和土梁上都搭有巨大棚木，上面铺席，而后再填泥加土。从砖面到顶棚约高三米。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秦始皇陵的广大地区又做了较详细的

探查。在原来这个俑坑附近，又先后发现和试掘了二号、三号兵马俑坑。二号俑坑是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曲尺形军阵；三号俑坑在一、二号俑坑之后，像是统帅一、二号俑坑军阵的军幕。三个俑坑有机地联系着，构成一个面积二万多平方米约有八千个陶俑兵马，车步骑混合编组，部伍严整，排列有序，气势宏伟的军阵体系。

地下王国是地上王国的再现。据考证分析，秦始皇陵是一幅理想的宫城图，所有地下建筑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果说皇陵内城象征着宫城的话，那么从兵马俑坑所处位置，以及陶俑的姿势动态来看，这支队伍可能是象征驻在京城外的宿卫军。这是他们进行操练演习的坐阵，而不是出征的战阵。

这些数量巨大的兵马俑，反映了秦代雕塑艺术的水平。令人信服地显示了秦代艺术家和工匠们的聪明才智。所有陶俑、陶马，与真人、真马大小比例相仿，许多细部也都刻划得真实精巧，富于质感。特别是俑头的塑造，更是惟妙惟肖，通过肌肉纹理和眉、眼、口、鼻的细致处理，展现了陶俑非常丰富的表情和性格。陶俑造型大多具有关中人的特征：方脸宽额，大嘴厚唇，留八字胡，抬头挺腹，身高有的达一米九〇以上。还有一些陶俑模样很象西北的少数民族。从这里也可看到当时士兵的来源。

陶俑在坑道内的位置，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加上装束的不同，大致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等级和军种。比如一般兵卒，身穿短褐或不带花边的铠甲，头挽发髻，也有的戴软帽，腿扎行縢，足穿方口齐头浅履。中下级武官则身穿带花边的前胸甲，头戴单卷尾长冠，足登长靴。他们在兵卒中间一般靠前，而中级以上的将军俑则身披甲片小得多的彩色鱼鳞甲，头戴双卷尾长冠，胡须较长，年龄也大得多，他们在队伍中间一般靠后。其他如骑兵俑、御手俑、车士俑、弩兵俑和跪射俑等，也都装束各异，并各作出

自己的姿势。一匹匹雄骏的陶马，也都膘肥体壮，高约一米五——二米来长，它们都昂头竖耳，目瞪口张，大有喷鼻嘶鸣，跃身飞驰之势。有人说这些陶马的体形有点象今日新疆的和田马，是一种既善于奔跑，又有耐久能力的良种战马。

据专家们研究，这些陶俑、陶马，原来都是有着漂亮彩绘的。但由于后来的火烧和浸泡，大多已剥落或变色，现仅存部分残片，经化学分析，多为矿物质颜料。有红、绿、蓝、紫、褐、黄、黑、白等多种颜色。

就在这些兵马俑身边的淤土里，还发现了大量当时的实战兵器和其它遗物。有带锋槽的箭头；有刻着铭文的戈；有的剑虽经两千多年，至今依然发光不锈，锋利如初。这也反映了当时冶金技术已有相当发展。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为研究秦代的历史、军事制度及文化艺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一九八〇年第七期）

杜甫草堂

彭继亮

杜甫（公元七一二 ——七七〇）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由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光照千古的诗篇。

杜甫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由强盛开始转入衰落的时代。公元七五五年，安禄山发动兵变，从北京附近打到洛阳、长安，侵袭了黄河流域大部地区，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在战争中，杜甫在长安一带开始了流徙的生活。公元七五九年，他流亡到四川成都，得到友人的帮助，在成都西南风景清幽的浣花溪旁，盖了几间草堂，作为栖身之所。他住在草堂虽不满四年，却写出许多优美的诗篇。诗人始终没有忘怀祖国的危难与苦难中的人民，他急迫地期待着人民早日摆脱水深火热的生活。他怅望云山以外的长安、洛阳，发出了悲壮的声音："洛城一别三千里，胡骑长躯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有一次，他的草堂屋顶为秋风卷走，房里漏得没有一片干土，在不眠的长夜里，他由于自己的灾难，想到流离失所的人们，便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里，他把个人的命运与广大的

不幸的人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了天下的“寒士”免于饥寒，他宁愿牺牲自己。

这一时期，他的诗歌的韵律更加严密，形式也更加精警和多样了，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我国人民尊敬杜甫，热爱杜甫，人们都怀着对诗人敬仰的心情，向往着这座草堂。解放以来，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人们到草堂瞻仰。党和政府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对草堂加以大力修整。现在，草堂门前楷木葱茏，溪水潆洄；诗史堂和工部祠前，楠木和梅花掩映。里面陈列着杜甫诗集的历代版本和研究诗人的生活及艺术造诣的著作，此外，草堂还陈列着与杜甫有关的文物二千多件，这些著作和文物帮助人们从各方面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以及他对我国和世界文学的贡献。

（一九六一年第一期）

晋祠

贾玉江

山西太原附近的晋祠，一向以优美的景色、奇特宏伟的古建筑和雕塑艺术吸引游人。然而首先给人深刻印象的，却是绿荫蔽天苍苍郁郁的古树。我们来到晋祠，一进门就看到几株参天的古槐，那就是唐槐，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此外，还有更早的相传植于隋朝（公元五八一——六一八）和周代的槐树和柏树。这些古树，虽然盘根曲节，老枝纵横，但仍浓荫四布，与晋祠绮丽的风光荟萃在一起，极富于古趣。

一个著名的建筑学家参观晋祠后，曾从造园学的角度，形容晋祠的布局“像庙观的院落，又像华丽的宫苑”“大殿楼阁在古树婆娑，池流映带之间，实像个放大的私家园亭”。这话确实不错，所不同的，是这里的主要建筑，几乎都涉及到一段历史故事或有趣的传说。

西周时代（公元前十一世纪——公元前七七一年），成王年幼即位，一天和他弟弟叔虞游戏，顺手把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样子，递给叔虞说：“把这玉圭给你，封你去做诸侯吧！”史官在旁听了，请成王择日立叔虞，成王说：“这是开玩笑的呀！”史官说：“天子是不能开玩笑的。”成王无奈，就把叔虞封到唐国（今山西的汾河以东）去做诸侯了。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上记载的“剪桐封弟”的故事。叔虞到了唐国之后，领导国人改善

农田水利，积极发展生产，很得人心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继位，因临近晋水，改国号为晋，成为春秋时代强大的国家之一。晋祠就是为纪念晋国开国君主叔虞而建筑的。

晋祠建筑的历史很古，据公元五世纪末叶地理学家郦道元记载，在北魏以前就有了，但确切的年代已不可考。到公元十一世纪的北宋时候，在建筑圣母殿、重修鱼沼飞梁之后，接着修建了各种亭阁、配殿；元祐、绍圣年间（公元一〇八九——一〇九八）人们又集资铸造了铁人，筑了金人台；金大定八年（公元一一六八）更增建了用以祭典圣母之用的献殿，明万历年间（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二一）还修了一座专供演戏使用的水镜台。这样，以圣母殿为主体，便成了晋祠的主要建筑了。

在晋祠的三百多宗殿、堂、楼、阁等古代建筑中，圣母殿、鱼沼飞梁历史最久，建筑艺术也最精美。圣母殿南北宽七间，东西深六间，内部构造使用减柱法，上端则是重檐歇山顶，是我国古代罕有的建筑之一。圣母殿前面是一方形池水，泉水汇集池中，水温冬暖夏凉，倒映在池中的殿宇、古木，随波荡漾。一座乳白色的桥梁直跨池上，又从中生出两翼，沿斜坡而下，形似鸟飞，加之池中多鱼，故有鱼沼飞梁之称。这座桥以它奇特的结构，获得建筑学家极高的评价。

晋祠的古建筑确实值得大书特书，但更为游人所注意的，还是圣母殿内的塑像。在圣母殿中央，我们远远地就能看到一尊头戴风冠，凝神端坐的贵妇人塑像，这就是圣母邑姜。她是周初的功臣，姜太公之女，成王、叔虞之母。周代十个治乱功臣中唯一的女性，据说就是邑姜。围绕着圣母的还有四十二个侍女彩塑，她们的体态、表情、年龄、性格以及内心活动，无不各含特征。有的年龄稍长，黛眉双锁，流露出美人迟暮之感；有的端庄凝重，似有万语千言欲说不休；有的娇媚羞涩，全然是少女的风姿。这些塑像虽然都是宋代作品，但塑造技法和艺术风格，却完全脱离了宗教

神化的范畴，成为人间生活的写照。人们站在她们之中，仿佛看到了她们轻巧的行动，听见了她们清脆的笑声和言谈。难怪艺术家都把她们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作品之一。

穿过金人台，在水镜台的前面横着一条干渠，渠名“智伯”，是春秋末期晋国世卿智伯用以决晋水灌晋阳，攻打赵襄子时，修筑的渠道，后人稍加整修，用来输送晋水灌溉农田。顺渠道南行不远，是晋水的主要源头“难老泉”。泉水从地下涌出，水量每秒约一·八立方米，天旱不减，雨涝不增，一年四季水温都保持在摄氏十八度左右。泉前面的水潭，是晋水分为南北两支的交叉点，潭水清洁如镜，水中绿草如茵，永远象春天一样美丽。

“难老泉”西边，是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一五四五）建筑的水母楼，楼下正中有一坐在瓮上的水母铜像，容貌纯朴、善良，很像一个农家妇女。原来这个形象是根据一个民间传说塑造的：很久以前，晋祠附近有一柳姓媳妇，很受婆婆虐待，一天她挑水途中，巧遇一骑马老人，要借水饮马，柳氏慨然应允，老人便赠他一支马鞭，要她放在瓮内，只要抽动马鞭，水就自然流出。婆婆见柳氏久不挑水，而瓮内不干，便偷偷去看，并把马鞭猛地抽出，于是清水汹涌而出，这样就形成了美丽的晋水。因为晋水灌溉着附近的几万亩农田，所以人们都把柳氏当作水母来祀奉。显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晋水对人确实是无价之宝，早在北宋时候（公元一〇五二），文学家范仲淹就曾这样赞美过晋水：“千家灌禾田，满目江南乡；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现在，在晋祠的南面又筑了一个水闸，使晋水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著名的晋祠米种植面积，也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

（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

历史上的北京城

侯仁之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城市的诞生

历史上北京城的变迁很复杂，探讨起来也很有趣。

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在现今北京城最古的城址上，有一个不大的以农牧为主的居民点，开始出现。这就是北京的原始聚落，它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叫做蓟。这时中国已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社会，主要统治势力是已经运用文字记事的商朝（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前十一世纪）。

周朝灭商之后，又分封诸侯来统治远在北方的两个小奴隶国，这就是蓟国和燕国。后来燕国逐渐强盛，吞并了蓟国，并迁都蓟城。至于燕国迁蓟以前的故都在哪里，史书没有记载。但可喜的是，近年在北京城西南约四十公里的琉璃河附近，发现了商周时期一个残存的古城遗址和一些重要墓葬。在出土文物中，有极可珍贵的青铜大鼎一件，内壁有铭文二十六字，其中有“燕侯”字样。“燕侯”也就是燕国第一代的诸侯。这一考古发现不仅印证了燕是被封的一个诸侯国，也指明了燕国故都的所在。

至于蓟城乃是当时从华北大平原经过燕国的故都进入北京小平原的咽喉。它的地理位置远比燕国故都重要。燕国迁蓟之后，

利用了这一有利的地理条件，向南争霸中原，在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终于发展成为中原北部的一个强国。

贸易中心和军事重镇

公元前三世纪初，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在我国历史上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在广大的领域内，他创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从此蓟城就成了经由华北平原进入东北疆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城市。

从秦开始，封建王朝相继更迭，一直到本世纪初清朝的灭亡，前后共计二千一百多年。在这期间的前期，也就是从秦、汉（公元前二〇六至八年）到隋（公元五八一至六一八年）、唐（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七年），中国最重要的统治中心在长安，蓟城只是一个地区性的行政中心。但是由于它地理位置重要，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势力强大的时候，它是中原地区汉族与北部游牧部族之间物资文化交流的中心。当封建王朝势力衰微的时候，它又成为抵御北方游牧部族入侵中原的军事重镇。

封建王朝统治后期，崛起于西辽河与松花江上的契丹族和女真族，相继驱兵南下。首先是契丹族占据了蓟城，建为陪都，叫做南京也叫燕京，国号辽（公元九一六至一一二五年）。继起的是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朝（公元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年），正式迁都到这里，改称中都，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扩建工作。这时，来自陆地和沿海的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市场繁荣。但是金朝的统治还只限于淮河流域以北的地区。

全国的政治中心

金朝扩建中都城之后，还利用城东北一带湖泊兴建离宫，故址就在今天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一带。

十三世纪中叶，兴起于北方的蒙古族，在打下中都城之后，

决定在这里建都。并利用金朝的离宫为设计的中心，另建新城，命名大都，进而统一中国，这就是元朝。元朝大都城的兴建，是历史上北京城的一个极大发展，也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非常值得重视的一页。

元大都城于一二六七年开始兴建，开工之前，先进行了地形测量，然后根据中国古代的一种理想设计，结合历史发展的因素和地方上的地理特点，拟定了一个全城的总体规划，逐步施工。首先顺着地形开凿河渠，铺设下水道。其次才在地面上根据分区布局的原则，进行营建，并注意使宫殿建筑和自然景物结合起来，因此取得了人工与自然相互辉映的奇妙效果。这期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长途跋涉来到大都。后来他在著名的游记《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对大都城作了详细的介绍，并称赞说："城里满是壮丽的宫殿以及为数众多的巨大而漂亮的旅舍和房屋。……全城的格状街道有如棋盘，布局如此完美和精巧，想给以恰如其分的描写，是不可能的。"

大都建成后不到百年，起兵于长江中下游的明朝（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打下了大都城，改称北平。十五世纪初又从南京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这是北京得名的开始。

明朝在迁都北京的过程中，又大规模地进行了城市改建工程，把大都城的平面设计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朝（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继承明朝建都北京，完全袭用了明朝的宫殿，除重修或增建了现在故宫中的一些大殿和城西北的众多园林外，没有更多的改变。这就是保留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的旧北京城。

旧北京城经过元、明两代的缔造经营，在中国历代封建都城的设计上，最后完成的最杰出的典型。它突出的特点，就是自南而北纵贯全城的中轴线，以及建立在中轴线上的皇宫紫禁城。这条中轴线从外城正中的永定门开始、向北经过内城正中的正阳门

（前门）、皇城正中的天安门，然后穿过紫禁城的正中央，越过景山中峰，最后止于内城北部的鼓楼和钟楼，全长近八公里。紫禁城中全部宫殿建筑，只有象征封建皇帝权力中心的前朝三大殿和皇帝日常听政和起居的后三殿，才被兴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他建筑，都按照对称排列的原则，布置在这条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全城街道系统以东西、南北正交的干道为主，从而形成了旧北京城具有几何图案美的城市平面图。

总之，北京旧城从平面设计到全部宫殿庙坛的建筑，强有力地宣扬了一个主题思想，就是封建帝王的"普天之下，唯我独尊"。今天看来，它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是腐朽的。但是它的造型雄伟而瑰丽的建筑物和平面设计的严正与和谐，却是我国古代匠师的杰作，是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宝贵遗产。

建设人民的首都

现在，北京城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首都，正在经历着一次极为深刻的变革。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就是这一深刻变革的一个具体说明。

天安门这座古老的建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地方。古代劳动人民和建筑师所赋予它的庄严壮丽的形象，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上，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天安门前面原是作为宫廷广场的一片禁地，现在已被扩建为开阔的广场。

由于广场的出现，使雄踞全城中心的紫禁城一带更加壮丽辉煌。从广场两侧平伸展开的东西长安街形成一条新的轴线。

（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作者系北京大学地理系系主任、教授）

麦积山石窟艺术

王朝闻

麦积山，在甘肃省天水县东南，离火车站二十五公里。从正面看，这个米黄色和竖长方形的石岗，很像当地农家的麦积堆。由最低处之五一号龛至岗顶高一四二公尺，矗立在青翠的群山之间，显得很奇特，很突出。外观上最惹眼的是贴在峭壁上的泥塑大佛像。具有汉代风格的崖阁多面形的列柱，似乎是悬挂在峭壁上的栈道和栈梯（古代的栈道和栈梯，早已在大地震等等灾害中毁损了，今年才由人民政府修复。长达五九四公尺），看起来有点象蜂房一样的密布的许多黑洞——石龛和石窟。

麦积山有一百八十多个龛和窟。规模最大的是“碑洞”（一三三号），高五·九七公尺，横广一四·九一公尺，进深最大处一一·五八公尺。也有很小的石龛，小到人都进不去。此外还有几个崖阁。“上七佛阁”（〇〇四号）最大，它的长廊——“散花楼”在七个大石龛的外面，高一六·七〇公尺，长三〇·五〇公尺。关于麦积山造像始建年代问题，根据西崖第一一五号窟中须弥座上的墨书发愿文看来，至晚在北魏（公元五〇二年景明三年）以前就已经有完整的龛窟和造佛。但是据《魏书》的记载，早在公元四二四——四二六年之间，就有高僧隐居麦积山前的寺院，僧徒三百余人。可见这时期这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佛地，就有可能营造石窟。有名的庾信的碑刻虽已丧失，文章仍保留在

他的文集中，“瑞应寺”中并有明代补刻的碑文，可以证明公元五六三年（北周保定三年李允信为其王父造“七佛龛”），就已经在大规模地开辟佛窟。

记载中的麦积山那些壮丽的古代木构建筑物已经没有了，可是崖阁、龛和窟中的塑像、石刻、石碑、壁画还保存了不少。除了无数用模型印制的小佛像之外，大小佛像约有一千尊。受了粗糙的砾岩石质的限制，如同敦煌石窟那样，这些佛像几乎全部是泥塑的。大部分是北魏后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后代重塑或重妆的。西部小龛窟的佛像毁坏程度较小，而且大多不是重修重妆的。未经重妆的塑像，虽然被烟薰得黝黑，丧失了外部妆绘的灿烂色彩，可是作为雕塑来看，形象还是很美丽很动人的。完整的大石佛二尊，为北魏杰作。石碑十八块，有简朴而优美的浮雕。因为受了地震，潮气（麦积山终年多雨）、流水和野鸟的损害，现存的壁画不多。虽然多半残缺不全，模糊不清，却都是精美的。

麦积山那些静坐着的、眼光向下、永远微笑着的佛或菩萨，似乎在沉思，似乎陶醉在某种幸福的瞑想里，似乎存心不和观赏者发生关系，观赏者却不能不被那特别而不普通的神态所吸引。例如一二三号窟内的佛像之一，它那种矜持、温婉和愉快的神态，是很自然很生动很感人的。我们怎样透过这些以佛经为题材的古代艺术，了解当时的那些无名的艺术家，他们怎样了解生活的意义，他们怎样服从着题材的要求而又突破了它的限制，他们怎样藉佛像的制作寄托着自己的感情、愿望、要求、希望和理想，认真说来，这是一个新的尚未经过研究的问题。可是这许多动人的艺术形象，无疑是古代艺术家们天才的创造。容或有人怀疑：受了一定格式限制的佛像，谈得到什么创造？事实是这样：这些塑像和中亚或印度佛像不同，和中国北魏其他各地区同一时期的佛像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有名的龙门古阳洞佛像的外形还显得有

些过于清癯，那么，麦积山“碑洞”左侧的小佛像就具备了柔和、圆润、丰满的特色。以面部而论，虽然面型和眉眼都是修长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风格，却显得更婉美动人，透露出过渡向隋、唐艺术风格的端绪。

不能使人忘怀的一二三号石窟里那一对供养童男童女，也许因为它更不受既成格式的拘束，更便于发挥创造吧，他那俊秀的少年的形象是很可爱的。虽然他们像侍者一样分立在佛的左右侧，它仍不完全依附佛的存在而存在，而是有独立性的，造型洗练、单纯和丰满的这两个少年，绝不只表现他们在佛前的虔诚。更引人注意的，是那个童女那种庄重的娇美的愉快的神态。她稚气、乐天、纯朴。我们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又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容或在人们的想象中闪现过这样的形象，可是在造型艺术上，难得看到像这样确切的描写。一千三、四百年前出现了这样具有高度写实性的形象，那些不知名的艺术家的创造才能是可惊的。

有限的篇幅不容许我们提到许多很值得怀念的艺术品。例如“天堂洞”（一三五号）那些壮丽的壁画所描写的、追逐野兽的动的场面或是庄严的说法的场面，实在是值得仔细观赏的。“牛儿堂”（〇〇五号）崖阁顶上的壁画，不只是奔驰的马的姿态画得十分生动，而且许多“飞天”的动态、神气和笔法都很高超。特别是“飞天”的长带所形成的那种飘扬的动势，与雄壮而俊秀的飞奔着的马和谐地组织在一起，真是巧妙的结构。这些和静穆的佛像相对照的善于表现动势的壁画，如同闪动的佛光的火焰一样，构成了石窟的丰富性与完整性。其他例如一二七号或一三五号的石佛的衣褶线的组织所显示的写实性与装饰风味的统一，对于并非服膺于宗教的我们，在创作上的借鉴意义都是不能漠视的，都是很值得珍爱的。

（一九五四年第二期）

唐陵石刻

贺梓诚

在我国历史上，唐代是文化艺术光彩照人的时代，诗歌、散文、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都有杰出的成就，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它的石刻也是如此。唐代石刻上承南北朝时代的优良传统，旁汲外来艺术的长处，形成了它特有的风格。它们气魄雄伟、造型丰满、意态生动，显示了踔厉风发的时代精神。

这里我们介绍陕西西安附近各县的一些唐陵石刻。这些石刻是马、虎、狮、驼鸟、独角兽等。它们之中的代表作为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六骏。

六骏是唐太宗早年作战时骑乘的六匹战马，名字是：飒露紫、拳毛䯄、青骓、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六骏石刻是六块将近二米平方的大浮雕，刻于唐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图样相传是唐初著名工艺家和画家阎立德兄弟设计的。其中飒露紫、拳毛䯄两块石刻于一九一四年为帝国主义分子盗往美国。国内现存四块。特勒骠缓辔徐行，悠然自得，好像奏凯归来，漫步于长林丰草间；白蹄乌、青骓、什伐赤则腾骧驰骤，好像正追奔逐北于沙场，体现了唐太宗《六骏赞》中“足轻电影”、“追风骏足”的描述。总之，在它们身上，作者不只出色地塑造了良马骨格的壮健，更出色地表现了良马意态的神骏。

此外，唐高祖李渊献陵的虎、武则天母杨氏顺陵的狮和天禄

（独角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乾陵的翼马和驼鸟，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虎的整个神态镇静凶悍，给人凛然不可侵犯之感。它两腮微鼓，我们好像可以感觉到它正在颤动，将立刻发出吼声；它两眼前注，好像前面正有猎物；而它略为前俯的身躯，显示了它欲动未动的瞬间。狮是唐陵最普遍的饰物，几乎每个陵寝的四门都有一对，或蹲或立，仪态多样。其中顺陵的最大最生动，它高达三米，长达三·三米，高昂的头部披以卷毛、饱满的胸部肌肉突出，比例匀称恰当，视真狮更为雄健。乾陵的翼马举首凝视，奋然思飞，足部虽已残缺，但仍无损于它的“天马行空”的气势。

唐陵石刻是我国珍贵的艺术宝藏，但它们散处各县，道远途阻，历来散失和损坏不少。现在，陕西省博物馆正筹建石刻馆，准备把这些石刻逐步迁来西安陈列，一方面便于保护，一方面便于人们观赏。

（一九六二年第八期。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

石刻艺术的宝库——大足

傅天仇

在我国四川省大足县境内，有许多以佛教造像为主的、迷人而杰出的古代石雕，上起晚唐（九世纪），下迄宋末（十三世纪），共五万多躯，分布在四十余处，总称“大足石刻”。

八世纪中叶以后，唐王朝内部战乱不已，中原生产衰退。四川偏处西南，相对安定，不少人才流入四川，经济和文化均日趋繁荣。王建为蜀王后，又大力支持在中原几乎绝迹的佛教密宗。至此，四川具备了开凿石窟的有利条件，古大足就成为雕刻高手的竞技场所；其中北山、宝顶山两处最有代表性，也最为精彩。

北山距县城二公里。唐末昌州刺史韦君靖为储粮屯兵，曾在此营建了“永昌寨”，并从公元八九二年起开凿石窟。北山石刻有晚唐、五代至两宋二百五十多年间的佛教造像近万躯，以佛湾为中心分布于山之四陬。风格因时代而异，一般说来，晚唐的人物造型庄重朴素，镌刻精致，技法成熟；五代造像体态多变，玲珑潇洒；两宋作品则个性鲜明，身段窈窕，衣饰华丽。第一百三十六号的“心神车窟”是北山最完整的大型石窟，可称宋刻代表作。窟内的观音、大势至等菩萨像和蔼可亲，不象云岗大佛那样神秘、高深。尤其是坐吼狮的文殊与骑白象的普贤最引人注目，善良的美女和被驯服的野兽产生柔和与强力两种造型的强烈对比，构成善战胜恶的哲学形象，达到艺术上静与动的和谐统一。

传说中，“观音从天上深入人间救苦救难”，“地藏决心下地狱挽救冤魂”。北山就刻有大量观音像，其中以表面风化的“媚态观音”最使人难忘。这尊观音被人称为“媚态”，不仅因为体态和肌肉具有弹性感和青春特征，更重要的是，“庄严”的神像流露出爱恋之情。这一雕塑比例适中，胖瘦得宜，神情在笑与非笑之间，娴静中带有温柔亲切的感情。有的外国参观者曾誉之为“中国维纳斯”。宋代的“地藏化身窟”现存四个比人略大的地藏化身像，造型准确，用刀老练，形象朴素而有体量感，是严格而精练的写生雕刻。北山的石雕秀丽、优美，刀法流畅、锋锐，在神的人化和神化身为人的造型上有很大发展。石雕与人的感情相互交流。神秘与恐惧渐被亲切与平易所代替。

宝顶山石刻位于县城东北十五公里，由奉持密宗的宋代名僧赵智凤主建，前后历时七十余年。这里共有造像一万多躯，以大佛湾最为集中，在长约五百米的马蹄形山湾中，统筹安排了“华严三圣”、“护法神像”、“释迦涅槃圣迹图”等主要造像十九组。此外还有大型的佛传故事（释迦今生故事）、佛本生故事（释迦前生故事）、经变故事（释迦以外的神话故事）等。内容无一重复，“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释迦涅槃”巨像不但显示了安祥的造型和宏伟气势，半身弟子群像也是同类题材的独创，使人看到传统雕刻形式的丰富体裁。

在释迦行孝组雕之前，有“六师外道谤佛不孝”一组，描写数婆罗门手舞足蹈，手指王舍城孝子担挑父母行孝道，以嬉笑怒骂指责释迦出家抛弃父母不孝；美女形的外道阿旃延吹着筚篥参加讽刺的合奏；佛弟子阿难听了谤言，表情犹疑。人物都溶合在统一的音乐和拍节之中，有很强的戏剧性。以“谤佛不孝”作反衬来歌颂释迦的手法，确是石窟大型雕塑中的大胆创造。

宝顶山石刻重视运用生活形象。“父母恩重经变”把怀孕、临产、哺乳到婚后离别等情节刻成组雕，俨然一幅引人的世俗生

活图。“酒醉昏乱”组雕描绘释迦向弟子迦叶讲论饮酒的危害，把“父不认子”、“夫不识妻”中父与夫的醉态，刻划得惟妙惟肖；还暗示醉者的行动（如坐书桌）违背自己训人之词；是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绝作。

由十个画面组成的“牧牛图”，又称“牧牛道场”，原意是以牧牛比喻修行者被驯服而皈依神佛的十个阶段。然而牧童制服顽牛的场面很吸引观众，人们想到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往往忽略了它的宗教含义。雕刻技法扼要传神，妙趣横生，令人神往。

描写清晨放鸡出笼的“养鸡女”石雕，是又一幅反映生活的石刻。可爱的年青农妇似乎在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美丽的画面成为对劳动者的赞歌。可是岩石上却刻着“养鸡者入于地狱”的文字，说明了创造人的原意；叫人颇费思索。不过，作者着意刻划她的真诚、善良、美丽，把想残害她的判官、小鬼，赋予令人见而生厌的丑恶形象，鲜明地表现了雕刻大师的爱憎。这种凝聚成形的情感引起世世代代观者的共鸣。造型艺术显示的威力，远远超过了岩壁上的题记。

至于可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异曲同工的“愤怒明王”，和流水巧妙结合的“九龙沐太子”等，无不是精妙雕刻与神奇故事共生的杰出艺术品。就连圆觉洞也比别处多出一个跪在当中的神，虽减少了信徒朝拜的平地，却增添了浓重的故事色彩。宝顶是雕刻艺术之山，是故事之山。

我国佛教史上有记载的重要石窟，都出现在晚唐以前。大足石刻把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历史，又往后延续了四百年；并以神的人化和大量社会生活场景，直接地表现、记载了当时当地的人民生活；从内容到形式创造了新的摩崖石窟艺术，把它的民族化、地方化推到一个新阶段。大足石刻提供了从晚唐到两宋的雕刻历史形象，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丝绸之路

黄祖安

编者按：

丝绸之路东起中国西安，经陕西、甘肃、新疆，越过帕米尔，再经中亚、西亚，西到地中海东岸，然后转达欧洲罗马等地。它是中外友好文化交流之路。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三、四世纪前后，丝绸之路联结着世界最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和埃及，以及著名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所在地。我国境内的古丝道上，有漫漫平川和茫茫高原的壮丽风光，有沙碛荒漠和雪山冰峰的瑰奇景观。丝绸之路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

一

一踏上丝绸之路，我们就仿佛在历史长河畔漫步。

远古，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中原大地草木繁茂，一株株桑树上长满嫩叶。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移着轻盈的脚步缓缓而行。突然，晒在庭院里的马皮飞来，裹着少女腾上桑树，化为头似马首、身躯纤细的蚕。这个中国古代神话说明了：聪明勤劳的中国人开始养蚕，还早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出土文物告诉我们：四千多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已经会制造丝线、丝带和绢。

古代人发明了养蚕、缫丝、织绸。古代人的各种交换活动和游牧民族的流动生活，形成了包括丝绸流传在内的东西文明的相互影响。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鬲（陶制三足炊具）出现于中亚和西亚。公元前十六至十一世纪，商代的马头刀、马具等有中亚和西亚文化的痕迹。公元前十一至八世纪，人们把地中海一带生产的玻璃管带到陕西。人们又把中国丝绸带向西方。丝绸在公元前五世纪之前传到阿尔泰山地区，这里出土的凤纹丝绸鞍褥体现出汉民族的艺术创造才能。约公元前四、五世纪，丝绸传到欧洲，欧洲人因此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丝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举止温厚”，“住在大地的边缘”，丝绸“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养蚕缫丝，把丝想象成从树叶上抽取出来用水湿润后理成丝。有的把桑树叫做“黄金树”。中国养蚕缫丝技术直到公元四世纪传到中亚、西亚，六世纪传到希腊。

中国丝绸西传，以及东西文明其它各种交流，传送着沿途各国的深情厚谊。十九世纪欧洲学者把古代东起长安（今西安）、西至罗马的万里迢迢的长途称为“丝路”，中国人又称之为“丝绸之路”，简称“丝路”。由于这个名称恰当地表达了这条通道的特色，很快便被人们所接受。

二

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正西向奔驰在黄土高原。为首的一位汉族人，约二十四、五岁，身材魁梧。旁边的一位助手是兄弟民族的模样，肩背硬弓，腰佩箭囊。他们精神抖擞。奔马过处，扬起了漫天尘土……这就是张骞及其伙伴出使西域的情景。

张骞素有大志。公元前一三九年，他应汉武帝的召募，出使西域。同行的还有兄弟民族的堂邑父。张骞率领队伍出陇西（今甘肃临洮）西行，路经匈奴被扣留。匈奴人企图诱降，但他忠贞

不渝，在匈奴度过十年多拘禁生活，终于伺机脱身，同堂邑父等继续西进，经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抵达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中部）张骞在大月氏和大夏（今阿姆河流域南部）逗留一年多，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一二六年，他同堂邑父趁匈奴内乱才挣脱牢笼回到长安。

公元前一一九年，张骞率领三百多人，每人备马两匹，带了数以万计的牛羊和价值几千万万的礼物，到达从甘肃西部迁移到伊犁河流域和楚河上游一带的乌孙。张骞在乌孙又派遣使者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

张骞出使西域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是使西汉知道了西方诸国的地理、风俗、特产等情况，因此，汉武帝连年遣使远出；西方诸国也知汉地饶富，都派使者随同到长安，商人也纷至沓来。这样，就在东西交通史上揭开了新页。

从公元前一二一年起，西汉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又新筑长城和亭障，连绵一万一千五百余里，向西直到罗布泊附近，并且五里一墩、十里一台，设有烽燧传讯报警，保障了交通道路安全。而后，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天山南北广大地区五十个地方政权，归西汉中央政府统辖。交通更加畅行无阻。

三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族装束的人，中国西北兄弟民族模样的人，外国打扮的人，驾驭着一队队的骆驼或一群群骏马，负着行囊，驮着丝绸，披满陕甘高原的风尘，踏破河西走廊的寂静，唤醒塔里木盆地的沉睡，前进，再前进……

公元一世纪，行进在这条路上的人流中．有从小仰慕张骞的班超及其同伴。班超在西域生活三十年，后期连年担任西域都护，同当地人命运与共。公元七十六年，他奉召将回洛阳，于阗人从上到下拦道痛哭，抱着马脚挽留他。直到公元一〇二年，他

才以七十一岁的古稀之年返回洛阳。他曾派遣甘英在公元九十七年出使大秦（罗马帝国），途经安息，穷临西海（今波斯湾）而还。

七世纪，唐代著名的佛学家玄奘，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穿行甘肃新疆间荒无人烟的八百里石砾戈壁。他在白天则惊风拥沙、散如骤雨，夜晚则遍地磷火、烂若繁星的旷野中，一连行走四夜五天，没有滴水沾喉，晕倒在地，幸被凉风吹醒，挣扎脱险。在翻越天山时，他经过七天的生死搏斗，才穿过汗腾格里峰西南的柯尔木息阿达山口的雪山冰峰，进入中亚，后又历经艰难险阻到达印度，从印度带回六百多部佛典经论。他行程五万里，记录沿途所见所闻的《大唐西域记》，既是一部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又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

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出生于威尼斯商人之家，自幼向往东方，十七岁时如愿以偿，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出发，二十一岁到达上都（今内蒙多伦西北），后至大都（今北京）。他在中国十七年，足迹遍于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一二九五年回到威尼斯，后因战争被俘，在狱中口述自己的东方见闻，由同狱人鲁思梯谦用法文笔录成书，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一大奇书的《马可波罗行纪》。十五世纪的哥伦布就是读了这本书后羡慕东方文明，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信开始远航，结果到达中美和南美的东北角。当时他还以为到了印度和中国，并把墨西哥看作是《马可波罗行纪》中的“行在”(杭州）。

在这通道上行进的人流中，还有二世纪到洛阳的安息王子安世高；三国时第一个往西域求法的僧人朱士行；四、五世纪时中国著名的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六十五岁从长安出发、七十八岁才归国的名僧法显（约三三四——约四二〇年）；六世纪时奔走于中国新疆、印度、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把中国桑蚕西传东罗马帝国的几个印度僧人；更有无数的商人、工匠、牧民、士

兵、文艺家、宗教家……

络绎不绝的人群，历尽艰辛，为丝绸之路增添异彩。

汉代，丝绸之路东起长安，沿渭水西行，循着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分南北两道：南道从敦煌西南出阳关，至楼兰（即鄯善，今若羌东北），缘昆仑山北麓西行，经于阗（今和田）、莎车等地，翻过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再往西可达条支（今波斯湾口）、犁靬（即大秦，罗马帝国）；北道从敦煌西北出玉门关，至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缘天山南麓西行，经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等地，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今里海、咸海间），再往西南经安息可西达犁靬。汉代还有自哈密西行、缘天山北麓西去大宛、康居的一条道，后来形成一条北新道：从敦煌经伊吾（今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渡北流河（今伊犁河、楚河），西行至拂林（东罗马帝国）、西海（指地中海）。

四

丝绸之路把沿线各国联结在一起，大大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

丝路畅通后，中国丝绸不断流传到西方。在中亚、在伊朗、在叙利亚、在地中海沿岸、在意大利，都发现中国汉唐的丝绸。中国的钢铁在汉代传到罗马。炼钢术由汉代使者和士兵传授给大宛人。大宛人自中国学会凿井术。此外，中国的桃、梨也都传运到国外。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在公元三世纪时传到西域。八世纪时，阿拉伯人从中国学会造纸，约十世纪初传到埃及，十二世纪后传到欧洲各地。中国从丝绸到造纸术的西传，对西方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是没有意义的。

丝路畅通后，西方物产和文化同时不断地传入中国。葡萄、石榴、核桃、芝麻、香菜、菠菜等都一一传入中国。苜蓿随着大

宛马的传入而遍种于汉代长安的离宫别馆。狮子、大雀等奇兽珍禽，被运送到中国。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而后，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接踵而来。犍陀罗艺术给中国的雕塑、绘画带来新的养分。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的交流导致互相促进。而中亚、西亚的乐器和乐曲的传入，使汉民族音乐焕然一新。

东西文化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广泛的交流，交相辉映，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民族文化。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正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同时也是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分不开的。即以音乐而论，张骞从西域传来《摩诃兜勒》乐曲，汉乐府因此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唐代音乐发展到十部乐。其中八部是西北兄弟民族的音乐和外国的音乐。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是唐代东西方音乐融合的优秀作品。著名的音乐家曹善才、白明达、米嘉荣、康昆仑、安万善，都是西域人或西域人的后裔。在唐代长安、洛阳，民间也流行兄弟民族的音乐和外来音乐。唐诗写道："胡音胡服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外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极其频繁兴旺，从京都长安到四方边陲，纷纷呈现出东西文明交相辉映的动人情景：西自拂林、东到日本的大批使臣、使团会集长安；在朝供职的外国官员有大食（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国及日本人等；国子监里，外国留学生书声琅琅；寺庙院中，颂经声此起彼落；繁华商市，中亚富贾经营珠宝、丝绸；街头小巷，胡商小贩出售胡饼、抓饭；而酒店胡姬则春风当垆、延客醉金樽；玄奘学习印度佛学，又另创新义，再传到印度和日本；佛经的翻译推动语言音韵学的发展，促进唐代近体格律诗的兴盛；大画家吴道子和来自于阗的尉迟乙僧，纯熟运用晕染法，创作出大量佛教壁画，其风采至今还可在敦煌艺术中窥见一斑；皇宫深院内，从波斯传来的打马球盛行一时，唐玄宗曾亲率四人球队同吐蕃十人对阵；马路广场上，来自地中海滨的艺人表演杂技、马戏、魔术；

达官贵人之家，中亚的胡旋舞、胡腾舞左右旋转、纵横腾踏；通衢大道之上，满载丝绸的骆驼、骏马络绎不绝，正如一首唐诗描写的："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丝绸之路虽然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今天仍然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因为它是历史上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

（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丝路明珠——敦煌

黄祖安

在人类文明史上，丝绸之路像是闪烁着中外人民友谊和智慧之光的项链，敦煌则是项链上的一颗明珠。举世瞩目的敦煌艺术，焕发着绚烂的光彩。到敦煌去，几乎是每一个对丝绸之路有兴趣的人和艺术爱好者的赏心乐事。

历史的遐想

灿烂辉煌的艺术宝库，为什么会出现在河西走廊西部的一片荒漠中？

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戈壁滩上，党河两岸，郁郁葱葱的绿洲，自远古起，一个又一个的兄弟民族在此游牧。公元前一二一年，河西走廊归入西汉（公元前二〇六——公元八年）的版图。一批又一批的中原移民，奔走在河西走廊上，最多的一批达七十余万。人们引水灌溉，从事农耕，变沙漠为良田。人们建村院、筑城郭。公元前一一一年，西汉设立敦煌郡。敦煌，意义是非常兴盛。阳关大道上，骏马飞奔，明驼驰足，东来西往，出入阳关和玉门关。敦煌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总汇、“华戎所支”的都会。

自西汉起，汉族文明就在这里生根开花，人才辈出。魏晋（公元二二〇——四二〇年）时更加发展，农人牛耕，汉学风行，绘画、建筑水平同中原不相上下。名儒讲授儒家经典，学生有几

千人。佛教在魏晋时逐渐传布，号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原籍月氏，世居敦煌，八岁随师游历西域各地，通晓各地语言，取得梵文佛典，在敦煌等地译经说法。高僧法显六十六岁时途经敦煌居住月余，后又继续西行越过帕米尔奔向印度。隋、唐（公元五八一——九〇七年）时，敦煌是通往西方的三条道路的枢纽，由于经济繁荣，佛教也兴盛，寺院遍布……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孕育出东西文明交相辉映，异彩纷呈的敦煌艺术。

莫高窟的由来

敦煌石窟艺术包括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等处，其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首推莫高窟

初夏的一天下午，我们来到莫高窟。它坐落在三危山和鸣沙山的怀抱中，四周平沙莽莽，唯独它绿树成荫。前一天刚下过雨，空气格外清新。黄昏，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三危山上晶莹闪光。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和夫人李承仙，招呼我们观赏了这奇异景色，并热情地说：“这就是所谓金光万道，状有千佛。佛都在欢迎你们呵！”

据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碑文记载：公元三六六年，乐僔和尚德行高超，拄着锡杖西游，他穿森林，越漠野，走到三危山下，已是黄昏时候，举目四顾，忽见山下一派金光，仿佛显现着千佛的形象。这虔诚的信徒就在三危山对面的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石窟。

随着佛教的发展，洞窟日益增多，唐代已有一千多个。虽经长期的风蚀和流沙掩埋，现今仍保存着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历代洞窟四百九十二个，窟内共有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二千余身。莫高窟不愧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

大悲大慈的佛国

参观石窟，琳琅满目，我们只能浮光掠影地浏览。

乐僔和尚开凿的第一个石窟已经难以辩认，现在知道的最早的石窟约建于十六国（公元三〇四——四三九年）晚期。十六国、北魏（公元三八六——五三四年）、西魏（公元五三五——五五七年）的石窟，大体上是由粗犷的壁画衬托着静穆的彩塑佛像，构成一个大悲大慈的佛国。

壁画以表现释迦牟尼的一生和前生行善牺牲的本生故事最为突出，主人公是受苦受难者的形象。

第二七五窟十六国晚期的《尸毗王本生故事》，描绘尸毗王以自己的肉喂鹰来拯救鸽子。尸毗王盘膝端坐，一手托鸽，镇定自若，同旁边面目狰狞的刽子手凶狠地割肉，形成鲜明的对比。画力图以肉体的极端痛苦来突出心灵的宁静。

第二五四窟北魏本生故事《萨埵那舍身饲虎》，故事说萨埵那为救饿虎、投身虎旁，但饿虎已奄奄一息，他又用干竹枝刺脖、以血饲虎，再坠身虎旁。饿虎舔食王子的血，又吃掉他的身体。而后，两兄寻弟、父母悲泣、立塔埋骨。几个主要的情节，被古代无名艺术家巧妙地安排在一个画面上。整幅画以深棕为主调，错杂着青、绿、灰黑、白等冷色，烘染出阴森凄厉的气氛。

这些画突出地渲染悲惨的苦难，借“大悲”来宣扬佛的前生舍弃一切的“大慈”。

佛，梵文的意义为“智者”或“觉者”。彩塑以飘逸脱俗的风度来体现佛的洞察一切的睿智和渗透一切的觉悟。佛像体格高大，面貌清瘦，衣服折纹紧贴躯体，带有一些印度人的风味。在壁画的烘托下，佛显得超凡绝尘，仿佛周围世界越紧张、动乱、悲惨，佛就越冷静、肃穆、超脱。

东方的微笑

艺术不是宗教的奴仆。无名艺术家塑造形象总要透露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态度和感情。第二四九窟窟顶西魏《狩猎图》，一猎人张弓引箭策马追逐三只黄羊，一猎人勒马回身弯弓射虎，构成一幅天如穹庐、山野茫茫、骑马打猎的游牧场景。即使是佛像，归根结底也还是曲折地体现着人间的审美理想。佛睿智、脱俗、秀骨清相，恰恰是魏晋以来贵族阶级所追求的美。最有意思的是第二五九窟佛像，头、手、身段比例匀称，面部生动，眉目开朗，嘴角上翘，显示出一种会心的微笑。常书鸿比之为“蒙娜丽莎”。这是比欧洲早一千多年的东方的微笑。这东方的质朴而又明朗的微笑，意味着在神权压迫下人的意识的朦胧的抬头，在森严的佛国中透露出一线人间的光明！

承前启后

北魏时期的艺术造型简练、线条奔放、用色大胆，继承了汉的传统；同时也有着印度佛教艺术的风采。但在外来的宗教题材及其现成格式同民族传统的结合上，显得比较生硬勉强。自北周（公元五五七——五八一年）、隋（公元五八一——六一八年）起，形象、题材、风格开始明显变化，逐渐向灿烂的唐代艺术过渡。

隋代彩塑中出现的阿难和迦叶的像引人注目。第四一九窟迦叶像的朴实善良的微笑，是饱经风霜的奋斗者喜悦心情的自然流露。他那谦虚而自得的微笑，那一对勉力睁开的眼睛，几颗稀落的牙齿，面部的皱纹，颈项间显露的筋骨，处处都使人想起丝绸之路上渡流沙、越冰峰的高僧。他们磨劫历难，终于达到目的，发出恬静的微笑。北周第二九六窟福田经变画中的商队，留下了丝绸之路上商旅生活的痕迹。隋代壁画出现了维摩诘像，“清羸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是中原六朝的画风。

天上、人间

一踏进唐窟，花团锦簇、富丽堂皇的壁画灿烂夺目。整壁的《西方净土变》中，阿弥陀（梵文的意义为“无量光明”）佛端坐正中莲座，左右是观音、势至二大菩萨，周围圣众环绕。佛的座前是伎乐，两旁丝竹鼓乐和鸣，中间的舞女婆娑起舞。再前面是宝池莲台，并有奇妙珍禽。佛后是菩提双树和画栋雕梁的亭台楼阁，上面彩云缭绕，或飞天迎风飘舞，或系着彩带的乐器飘忽回旋。在这里，艺术家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将人间繁荣昌盛的李唐王朝升华为天上庄严皎洁的中华佛国，从而奏出了一曲华丽多彩的“天上、人间”的交响乐章。

唐代艺术把幻想的宗教世界和现实结合起来，并把外来艺术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唐代是敦煌佛教艺术最辉煌的时期。

惹人喜爱的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称为香音之神的能奏乐、善飞舞、满身异香、美丽的菩萨。唐代飞天既不象汉画中的羽人，又不象古希腊插翅的天使和古印度腾云驾雾的天女。唐代艺术家只用了轻软绵长的飘带，衬托优美女性的轻捷身躯，就使飞天漫天飞舞起来。千姿百态的飞天，自由飞翔于人间、天上，它是民族艺术中一个绚丽的形象。

鲜明的个性

唐代彩塑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佛像可亲可近。第一三〇窟盛唐（公元七一三——七六一年）高达二十六米的大佛，形体匀称和谐，表情生动细腻，流露出温和慈祥的微笑，是中国佛教艺术巨型造像的代表作之一。

唐代塑像注意个性的刻划和对比。佛严肃祥和，阿难天真聪慧，迦叶老成持重，菩萨温柔文静，天王勇猛威武，力士强壮暴

烈，各具鲜明的个性，似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唐人说："宫娃如菩萨"。其实是菩萨如宫娃。第一九四窟中唐（公元七六二——八二〇年）菩萨像，俨然是一个美丽的妇女。她体态娟秀，脸颊丰腴，唇角略带微笑，肌肤细腻润泽，表现出女性的优美和善良。旁边的力士另具一种神情，裸露的上身肌肉突起、青筋暴现，仿佛即刻要迸发出雷霆般的力量，表现出古代武士的健壮和凶猛。

现实的人世

晚唐（公元八二一——九〇七年）以后的艺术中，人世间的生活醒目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第一五六窟晚唐《张议潮统军收复河西图》（长八米、宽一·二米），旌旗飘扬、鼓角喧天，八十多匹骏马，一百多个人物，是直接描写现实生活的空前巨作。第九八窟五代（公元九〇七——九六〇年）于阗国王李圣天像高二米多，是莫高窟最大的供养人像。它告诉我们当时和田人的服饰风貌。宋代（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壁画中，生活的形形色色都有表现。如第六一窟长十三·五米、宽五米的《五台山图》画着从太原经五台到镇州（今河北正定）的山川地理、形胜习俗。它使我们看到当时铡草、推磨、舂米、挑担、驮运、借宿等生活情景；看到桥梁、城郭、寺庙、亭阁、塔堡、店铺等各种建筑一百七十多处。它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形象地图，又是别具一格的山水人物画。元代（公元一二七一——一三六八年）石窟都是密教艺术。第四六五窟保存着六十多幅画有织布、牧牛、制陶、驯虎等活动的人物画，透露出元代社会生活之一斑。

铁马丁当

"时光在流逝，莫高窟檐角铁马的丁当声永远在我心头鸣响。"所长常书鸿早年在巴黎就为精美的敦煌艺术而倾心。一九

四三年，他长途跋涉来到莫高窟。多少个不眠之夜，浩瀚的戈壁死一般的沉寂，唯有铁马丁当给他带来一些生气。多少个难忘的日子，亲人远离，生活艰难，他以舍身饲虎的精神侍奉敦煌艺术。他今年七十五岁。三十多年来，他和研究所的同志辛勤保护文物，临摹优秀的壁画、彩塑，编写图书，介绍敦煌艺术，得到人民的赞扬和政府的嘉奖。

铁马丁当，它似乎向我们诉说苦难的过去：创造艺术瑰宝的古代画师塑匠卖子换粮，最后倒在阴暗的小洞里，只有一纸遮身，石窟被风日侵蚀和流沙掩埋，还遭受人为的破坏，特别是从一九〇五年起，帝国主义分子割取壁画、盗去雕塑、劫走数以万计的各种古代文书。现在，它又仿佛在欢庆古窟展新颜：鸣沙山上筑起了一道防风沙的大墙；上下四层的洞窟之间修建了护栏回廊；所有洞窟都已修缮，连崖壁也加固了；壁画上注射了保护液；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公布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敦煌，这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在新时代里将更加光辉烂灿。

（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西南丝路

杨阶

“西南丝路”是汉、唐时期(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九〇六年)我国西南地区对外交通的一条商道,它从盛产蜀锦的四川成都起,经云南西部的大理,通往缅甸、印度等国。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一二二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回国后,对汉武帝说,他在大夏市场上见有四川出产的蜀布和邛竹杖,经询问,得知来自身毒(今印度),是四川商贾经邛西(今四川西昌西)以西贩运去的。由此可见,在四川和印度之间,存在一条民间商道。因此,张骞便建议开辟西南商道。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使臣至滇求通身毒道。公元前一〇五年以后,从内地广征士卒丁壮,在滇西大规模地开凿“博南道”。从此,我国商旅通过“博南道”,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印度等国的宝石、木棉、犀角、象牙等,贸易活动至唐代仍历久不衰。

今天,当我们乘汽车行驶在昆(明)畹(町)公路上时,沿途还可见到这条古丝路的一些遗迹和文物。位于公路线上的永平县城南二十多公里处有博南山,汉时“博南道”即由此得名。山下石碑上刻有汉明帝(公元五八——七五年)重修博南故道的记载。这里至今还保存着一段古驿道,直通澜沧江边。江上有一铁索桥飞架两岸,是为“霁虹桥”。这个古渡最早是以舟渡,后为笺绳桥。到元代元贞元年(公元一二九五年)建木桥时被命名为“霁虹桥”。

现在的铁索桥是明成化十一年(公元一四七五年)所建，清康熙年间重修，由十六根铁索组成。桥西岸崖壁上，有“西南第一桥”“天南锁钥”等前人的许多题刻。

渡过澜沧江，翻越博南山后，西边便是保山县，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六九年)设永昌郡治于此，是“西南丝路”上的商业重镇之一。这里接近中缅边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当时中外商旅云集，所以有“金银宝货之地，居官者富及屡世”之说。

过保山再西行，丝路分成南北两路。南路经龙陵、畹町、通向缅甸的勃生，往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北路则经腾冲、盈江通向缅甸的密支那、印度的华氏城（今巴特那）、巴基斯坦的呾义始罗（今拉瓦尔品第附近）和阿富汗的喀布尔，进而可通至苏联的木鹿（今塔什干马里），与西域“丝绸之路”汇合，一直通向地中海。

公元九七年、一二〇年、一三一年，掸国（今缅甸东北部）国王雍由调先后三次遣使沿着“西南丝路”，到东汉首都洛阳访问；第二次还带有一个庞大的乐队和杂技团在洛阳演出。

古籍中还提到“掸国西南通大秦”，这个大秦多数学者认为就是古罗马帝国，可见缅甸在当时“西南丝路”中地位的重要。唐代高僧义净在《大唐求法高僧传》中也记有：四、五世纪印度笈多王朝时，曾有中国僧人从四川过云南永昌、经缅甸而至印度者。因此，“西南丝路”实为沟通古代中国与中南半岛各国、印度乃至欧洲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

（一九八四年第五期）

历代陶瓷

陈万里

瓷器是中国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之一，它有灿烂的悠久历史，它有优良的民族风格。

远在公元前二、三千年，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彩陶——薄薄的胎骨，气魄深厚的造型，以及线条优美、颜色鲜明的彩绘。到了殷代（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又有釉陶的发明。

汉代（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年）的陶器，施以绿釉黄釉的很普遍；仿铜器的大壶上，有弦纹，有兽环，并且装饰着狩猎的雕刻。从魏晋（公元二二一——四二〇年）时候起，陶器上平面的刻划以及立体的浮雕，有了楼阁人物禽兽等等不同的形象；陶器的实际制作，亦已由低火候的软釉进步到高火候的硬釉。根据现有的材料证明，这一时期的由陶而进步到半陶半瓷，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晋代的越器，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产物。

由此经过六朝以至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邢（河北邢台）越（浙江绍兴）二窑平分南北。邢器釉白，类玉，类冰；越器釉青，类银，类雪。色釉达到了洁净温润的地步。五代（公元九〇七——九六〇年）时，越窑的器物上有着繁复的图案花纹除对飞的蝶蝴鹦鹉外，还有花间舒翼的小鸟以及云中飞翔的白鹤等等，圆盒上的牡丹或秋葵花，更是生动优美。而继承邢窑白釉的定器（河北曲阳），除了刻划花纹外，还开辟了用模印花的新天

地。花纹的细致工整，真是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中国陶瓷制作的技巧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成就，这是由半陶半瓷推进到瓷器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由于越器青瓷的影响，北方产生了汝窑(河南临汝县)。汝窑发展为北宋晚期的官窑（河南开封），再转变到南方的修内司及郊台下二窑(皆在浙江杭州)。同时，浙江龙泉的龙泉窑，在青釉瓷的制作上，也有高度的成就。在这时内青釉的色泽匀净细腻，一无瑕疵。而河南禹县的钧窑作品，又在天蓝的色釉上显现了鲜艳的赤色以至绚烂的紫色，或浅，或深，或浓，或淡，或聚，或散，可以说是尽态极妍的了。

除了几处名窑外，在宋代(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三百年间，北方瓷窑先后兴起的如河北安阳、修武。都有卓越的创作。白釉上面施以刻划雕剔与描绘，画风豪迈奔放，线条坚强刚劲。而南方的江西景德镇窑，又创造了青花及釉里红。这些演变——由本色釉上（如越之青釉，定之白釉等）刻划雕印进展到自由描绘更进而在白釉下显现红青两釉，可以说是中国瓷器史上极重要的发明。由此就开辟了以后的多彩施釉以及种种彩绘的新途径。

由此经元(公元一二七一——一三六八年)而明（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到了永乐（公元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年）和宣德（公元一四二六——一四三五年），青花釉里红的烧制，完全成功。同时，瓷器的形式亦有极大的发展。成化（公元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年）的时候，釉上彩绘的技巧到达了圆熟的地步。万历(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年)继起，更是五色缤纷，光彩夺目。此时的景德镇窑，执着全国的牛耳。其他各地的瓷窑，如福建的德化，釉白如象牙，制作多雕像，独具一种风格；浙江的龙泉，保持着青釉的传统，质朴色美，因而当时流传国外极盛。

清代继承明代三百年间各方面的创造，加以发扬光大。色

釉除红蓝两色外，还有茶叶末、鳝鱼黄等等，较之以前，更为繁复。彩绘如康熙（公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五彩，雍正（公元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斗彩，乾隆（公元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粉彩，都能另辟途径，争奇斗妍，于仿制宋代的官、哥（注）、汝、钧、明代的宣德青花与成化斗彩以外，还能别出心裁，仿制雕漆、古铜、木纹以至玉石、象牙器物，而火候色泽，悉能充分掌握。制瓷至此，可以说是极尽人工的能事了。嘉庆、道光（公元一七九六——一八五〇年）以后，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因反动政府的暴征，以致中国瓷器遭受严重的摧残。解放后，各地瓷窑渐次步入复兴大道，尤其是景德镇瓷器，青花斗彩已追踪康雍，“龙泉青釉”及“康熙天蓝釉”亦已达到相当水平。在这样一个技术基础上，此种日用美术工艺品定能推陈出新，完成它的新的历史任务。

（注）哥窑：浙江龙泉琉田乡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二人，分别烧瓷。兄所烧的，称哥窑，弟所烧的称弟窑，亦称章龙泉窑。

（一九五四年第四期）

纸的故事

谢泗春

从"衡石量书"说起

《史记》上有所谓"衡石量书"（衡，称的意思；石，一百二十斤）的话。说一世之雄的秦始皇（公元前二五八——二一〇年），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斤公文。因为，这时还没有纸，文字是刻或写在竹木简上的。在竹木简之前，刊载文字的，主要是钟鼎等青铜器；再之前，在殷商时代（公元前十六世纪——十一世纪）是甲骨；在竹木简的同时和之后，还有缣帛、石碑。此外，另有一种漂洗丝绵时产生的丝绵薄片，西汉（公元前二〇六——公元八年）人也用以书写，它可以说是纸的先驱。

关于蔡伦造纸

纸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从文字史料及出土的残纸片看，西汉时代，我国已能造纸。到了东汉（公元二五——二二〇年）中叶，蔡伦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为造纸事业（从而为人类文化）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耒阳县）人，和帝（刘肇）时任中常侍，很有才学，能监制秘剑及各种器械，无不精工坚密。元兴元年（公元一〇五年），他利用树皮、麻头、敝布、渔网制成纸，和帝很称赏，从此开始用这种纸。后来，蔡伦被封为"龙亭侯"，以他的方法制作的纸被称为"蔡侯纸"。历代手工业造纸工

人奉他为祖师，每年于三月十六日纪念他。现在，陕西洋县有他的墓地、祠庙，湖南耒阳有相传他使用过的“洗纸池”。

蔡伦死于东汉安帝（刘祜）建光元年（公元一二一年）。其后约八十年，又有东莱人左伯，很能造纸。他的纸“妍妙辉光”，被称为“左伯纸”。

造纸术的外传

利用植物纤维造纸的方法虽早已告成，但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在蔡伦之后几百年，纸和简、缣帛还是同时并用，直到南北朝（公元五世纪——六世纪）纸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远在这时之前，我国的纸已由朝鲜传入日本。隋炀帝（杨广）大业六年（公元六一〇年），我国造纸术又由同一路线东传日本。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年（公元七五一年），中国和大食（今阿拉伯，当时疆土达到中亚细亚）军队因援助内讧的突厥可汗的各一方，交战于怛逻斯，中国军队败绩。大食人从中国俘虏中学得了造纸术。不久，即在撒马尔罕开设工场。从此，撒马尔罕纸名播远近。其后，造纸术更由阿拉伯而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它于一一五〇年建成欧洲第一个造纸工场），及于欧、美大陆。

宣纸及其他

在国内，东晋（公元三一七——四二〇年）以前，纸的主要产地在洛阳一带。东晋以后，移到南方各省。同时，河北、山东也产良纸（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提到“五色华笺，河北胶东之纸”）。唐宋以后，南方一直是造纸业的中心。纸的种类，以原料分，有竹纸、皮纸、草纸、麻纸；以产地、用途、式样、色彩和制作人、制做方法等分，则如俗语所说“纸短话长”，无法细表。其中为人们乐道的名纸有：宣纸、薛涛笺、十色谢公笺、澄心堂纸、金粟山藏经纸等等。但物换星移，它们留下来的，大多

是一些佳话。只有宣纸，在制造和使用上，至今仍永葆其青春。

宣纸又名玉版纸，产于安徽泾县，以檀树皮和稻秆制成。它的诞生，在泾县有个传说：东汉末，蔡伦的弟子孔丹在泾县造纸，怀念师傅，久想制造一种特别好的白纸为师傅画像、修谱，但没有好原料，有一次，他看见倒在山溪的檀树，因年深月久，被水浸泡得腐烂发白，便想到利用檀树皮。研究、尝试了十多年，终于如愿以偿。宣纸纯白，细密、柔软，一向是国画家和书法家不可或缺的文房妙品。解放后，产量日有增加。

新中国造纸业剪影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我国造纸业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处于手工生产阶段。到清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在上海开始有中国人经营的第一座机器造纸厂：伦章造纸局。但在外纸如潮涌入的情势下，旧中国的机器造纸业受到摧残，不能有大发展。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机制纸年产量不过十点八万吨，生产能力只有二十万吨左右。

解放后，整个造纸业已面目一新。以机制纸为例，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中，产量增长十五倍，品种由六十九种增加到三百多种，象比木头还硬的钢纸、比蝉翼还薄的电容器纸，以及其它各色各样的文化、工业技术用纸，我国都已能大量制造。许多从来没有机器造纸业的省区，也出现了成批的中小型造纸工厂。许多省市并有了科学研究机构，许多大学设了造纸专业。在旧中国，这些方面都完全是空白。同时，造纸工业的建设队伍也由小到大，能胜任大型造纸厂的总体设计和大型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例如，一九五八年建成的大型的南平造纸厂，就完全是我国自力建设的产物。

今天，在发明造纸术的我国，纸的产、消量正日趋增长。有人说，从煤的产、消量可以看出一国的工业水平；那末，可以说，

纸的产、消量的增长，也不会仅仅意味着它本身的增长而已的。

（一九六一年第八期）

纺织的来历

王若愚

中国的纺织技术有悠久的历史。古代希腊人曾称中国为“丝之国”。公元前一世纪，中国和中亚、欧洲进行了频繁的丝绸贸易，罗马和波斯曾为争夺中国丝绸贸易的垄断权，发生过战争。中国的植桑养蚕和丝织技术，随着丝绸国际贸易的发展，经过中亚逐渐在欧洲传播开来。世界上有一些语言中的丝字，也是用和汉字“丝”字同音的“S”为字头的。

距今约五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利用野生麻类纤维搓成线条，缝缀皮革，穿连石珠做装饰品，后来又用它搓线编网从事渔猎。在各地发掘出来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遗址中，都有石制或陶制的纺轮，这证明当时纺织已比较普遍了。同时，从这时期大量驯养牛、羊、犬、马的事实看来，也为毛纺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经历周秦到了两汉（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已能织出带有花纹的毛布、地毯等高级毛织物了。

丝织品的出现则稍迟于麻、毛，我国人民植桑养蚕，相传起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最早的文字殷代（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前十二世纪）甲骨文便有了桑、蚕、丝、帛等的记载。安阳大司空村古墓出土的遗物中，还发现有玉雕蚕的殉葬物；在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也发现有相当精细的丝绸印痕。这些文字和实物都

说明，中国的养蚕和丝织，有史可考的已经有三千多年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各种纹样织布的国家之一，并且首创了提花织机。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丝绸印痕上可以看出，早在三千多年前，人们已经会织出斜纹、花纹等比较复杂的纹样。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八世纪——前三世纪），我国丝织技术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信阳长台关和长沙楚墓出土的织物残片看来，那时出产的高级丝织品中，不仅有绫、锦，还有纱、罗、绮、缟等物。两汉时期，广泛使用了丝织提花机，织出的云彩、鸟兽纹样都很生动。南北朝时期（公元四世纪——六世纪）丝织也相当发展，当时的《邺中记》一书，记载了许多锦的名称。到隋唐时期（公元六世纪——十世纪），丝织物上的瑞鹊衔花、大宝相等图案，益显得庄严华丽，生气勃然。宋代（公元十世纪——十三世纪）出产的宋锦、缂丝，种类繁多，当时已在纹样中，应用了写生的技巧。元、明（公元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以来，则有了纳石矢、云锦、绒缎、明锦等等著名的丝织品。

清代（公元十七世纪——二十世纪）出产的绸、缎、绫、罗、锦以及丝绒等等，古雅的色调和丰富多采的花纹，都充分表现出当时在丝绸织造技巧上和花样设计上的精美绝伦。此外在麻、毛纺织方面也都有新发展。

棉纺织技术在我国发展较麻、丝为迟。棉花大约在两汉时期传入我国云南、广东、新疆等地，到宋末元初（公元十三世纪），始在中原地区大量推广。十三世纪末我国著名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和松江的劳动妇女一道发明的多锭式纺车，已能同时纺出三根纱了。元代（公元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发明的水力大纺车，也比欧洲早了几个世纪。

我国劳动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和智慧，在世界纺织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由于长时期的封建统治，中国纺织业没有得到

更充分的发展，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中国纺织手工业。在解放前，洋布、洋纱、洋棉像潮水般地涌进我国，我国民族纺织工业受到严重的摧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纺织工业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解放以来棉纺纱锭比旧中国多了一倍多；并且建立了现代化的纺织机器制造业。解放前曾经一度衰落的丝绸工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麻、毛纺织工业也取得相应的成就。

（一九六二年第二期。作者为河北纺织工学院教授）

中国计时器的发展

赵 莹

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钟表提供了时间观念。为了计算标准时刻，许多天文工作者，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着。在繁星闪烁的夜晚，他们用望远镜探视星空，把恒星经过的时刻，用仪器记录下来，经过计算，再用来校正计时工具，然后把标准时刻发布出去。

但是，在没有钟表的时候，人们是怎样测定时间的呢？

在遥远的过去，人们是依靠日月星辰的出没估计时间的，他们观察到阳光下树影、房影的移动，进而用"立竿见影"的办法创造了最初的"表"，时间不停地前进着，"表"的影子从早到晚不停地移动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就是人们珍惜时间的结论。从一根简单的"表"开始，古人又创造了"圭表"、"日晷"等。"圭表"影子的变化能告诉我们一年中二十四个节气的变化，而"日晷"又能指示一天的时间，但是这些仪器只能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工作，那么夜间、阴天又怎么办呢？

大约在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年）人们已经创造了"铜壶滴漏"，它是用水的上浮力作动力，使指示时间的漏箭逐渐升起，无论在白天、夜间、阴天都能计时。但是它需要专人管理，按时添水，只能在宫廷之内和少数城市才有条件设置。

随着历史的前进，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历代人民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机械计时工具。我国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认为从汉代开始，我国就创造了机械性计时器。在距今一千八百三十多年以前，东汉科学家张衡就创造了“水力浑象”，它利用铜壶滴漏的原理，把水量加大，使漏水推动一个大水轮等速旋转，并通过齿轮系的减速传动，带动浑象，使它很有规律的一天只转一周。同时，通过另一个齿轮系带动蓂荚的升落表示每月的天数。

公元七二五年，唐代科学家一行和梁令瓒又利用齿轮系进一步创造了“水力浑天铜仪”比张衡的仪器又进了一大步，它能表示出一年，一月和一天的时间，同时它还有打时报刻的木人。

北宋时(公元九六〇——一一二七年)科学家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创造的“水运仪象台”是一个自动的天文仪器，又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时钟，原台有三丈六尺高，台的正面设有五层楼阁，每到一个时辰，第一层阁的木人打着不同的乐器报告时刻，在音乐声中，二层阁的木人出来报时，三层阁的木人报刻。每到日落、黄昏、日出，四层阁的木人鸣钲打更，五层阁的木人出来报更。更重要的是，苏颂增加了一个叫做天衡的机构，它控制着水轮的运转，相当于现代钟表中的操纵器所起的作用。在当时可算是精确而复杂的仪器。

到了元末明初，科学家詹希元又创造了“五轮砂漏”，它是用砂做动力的，即使是天寒结冰也能使用，它也有打时报刻的木人，它的最大特点是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表盘，指针不停地工作着，很象现在的时钟。“五轮砂漏”的诞生为现代时钟开辟了道路。

在十七世纪晚期（清代初叶），我国在原有发明的基础上，并参考了外国自鸣钟的构造，创造了不少具有民族形式的钟。钟的制造在广州、南京、苏州等地成为一种专门行业。仅南京、苏州两地就拥有工匠二百名左右。当时生产工具非常简陋，但能工

巧匠们在重重困难下，制造出多种精致美观的钟。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钟的制造业停止了发展。

解放后，我国钟表的制造有了大的发展，除了制造民用闹钟、挂钟外，还生产手表和各种用途的钟，如世界钟、楼钟、定时作息钟、子母钟、盲人怀表和各种体育比赛时用的计算钟等。这对于发展我国工农业生产，便利人民安排生活和工作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一九六五年第九期）

齿　　轮

周世德

人们都知道，齿轮是机械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发掘证明，远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公元前二二一——前二〇七年），我国已经有了铜铸的齿轮。稍后，又出现了铁齿轮。与此同时，还有不少简易的木齿轮为人们所用。

齿轮是怎样发明的呢？从我国现存的古代齿轮来看，早期的齿轮大多是属于止动用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为了使那些作回转运动的机械（譬如辘轳——一种简单的起重装置）停下来并防止其滑动，因而创造了齿轮。

汉代（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年），我国已经有比较进步的齿轮了。以后，齿轮的应用日益广泛，最普遍的是用于加工粮食的机械水磨、水碾等。

自东汉至魏（公元二二〇——二六五年）、晋（公元二六五——四二〇年）、南北朝（公元四二〇——五八九年），齿轮的使用范围又扩展到农田排灌机械、天文仪器。在粮食加工机械方面则出现了连磨，即用牛拉转一根竖立的轴，轴上装大齿轮，再带动装有小齿轮的八个磨盘同时工作。另外，还有一种装有齿轮的活动木偶戏：当水力推动一只木轮转动时，便出现木偶表演敲锣打鼓、翩翩起舞以至舂米、推磨等场面。

隋（公元五八一——六一八年）、唐（公元六一八——九〇

七年）两代在齿轮运用上也有许多创新，其中最突出的是发明了一种计时器。这种由许多齿轮组成的自动计时机构，可以每十五分钟击鼓，每两小时撞钟，以向人们报时。

从三国（公元二二〇年——二六五年）开始，历代史书差不多都有记里鼓车和指南车的记载，但是比较简略。直到宋代（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宋史》才详细地记载了它们的内部齿轮构造。宋人造的记里鼓车，车轮直径为二米，滚动一百圈正好一里。车上装有一组减速齿轮，与车的轮轴相连。车行一里，最后一个齿轮回转一周。再装上一个与凸轮有同等作用的拨子，拨动木人上臂，每行一里使他击鼓一次。这样随着车轮的转动，便自动地表示出了车行的里数。

指南车则是一种独辕车，车上装的是一组自动离合的齿轮。它能在车辆转弯时，自动调整车上木人，使他始终指向南方。

此外，宋、元（公元一二七一——一三六八年）、明（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各代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采用了数量更多的齿轮。如苏颂、韩公廉等人造的水运仪象台，就是将象征天体的铜球和各种复杂机械集合在一个三丈多高的木结构阁楼里，再通过两组复杂的齿轮机械带动它们每天作均匀的运转，这样来进行天文的科学研究和观测。

清代（公元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初年，广州和苏州的钟表制造手工业已很发达，所用齿轮都是由当地工匠精细加工。乾隆年间，清廷造办处曾制造更钟，能报时和打更，其中有大小齿轮百余个，加工之精密，已经达到更高水平。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业十分落后，齿轮只能由一些条件简陋的修配厂零星加工制作，质量低劣，品种很少。解放二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些专业齿轮厂，能够加工制造汽车、拖拉机、精密仪器以及机械制造工业的成套设备上所用的齿

轮，在齿轮的制造工艺、检测方法和基础理论研究等面方，也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一九七六年第三期）

石油、天然气的利用和开发

邢润川

石油、天然气的利用和开发，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石油，我国古代又叫石漆、石脂水、火井油等等。“石油”这个名称，是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公元一〇三一——一〇九五年）在《梦溪笔谈》一书中首次提出的。

远在公元一世纪，著名史书《汉书·地理志》就记载说：“高奴，有洧水，可燃。”汉代的高奴县在今天的陕北延安附近。洧水是延河一条支流。这里所说的可燃物，就是漂浮在水面的石油。可见，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汉代，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发现石油了。

石油进入古代人民的生活领域，最早是用于照明。以后，随着劳动人民不断采集、观察、试验，对石油性能有了更多了解，到北魏（公元三八六　五三四年）时，酒泉一带人民已开始用石油作为车辆、水碓轮轴的润滑剂；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劳动人民还用石油涂牛皮囊。

那时候，人们用的大都是自然凝固的原油，至宋代（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民间已有了原油初步加工产品。在军事应用方面，随着宋代火药工业的兴起，有些火药配方中用石油产品作为延发剂，并且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立了专门加工石油的军工作坊“猛火油作”。沈括在考察陕北时，发现石油燃烧后

烟很浓，把帏幔都熏黑了，于是把这些烟垢扫下来制成墨。这是我国古代进行的第一次石油化工实验。

明代（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石油加工利用和开发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陕北劳动人民将石油煎制后用于照明，说明已经发明了从石油提炼灯油的技术。在宋代，已有用石油疗疮的记载，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则进而对石油作了药理分析，他在《本草纲目》中指出，石油入药可治小儿惊风、疮癣等多种疾病。同时他还提到用石油作锻炼铁器的淬火剂。

天然气，是石油的共生物。它的发现，在先秦时代四川开凿盐井的同时或稍后，当时被称为“火井”。晋代（公元二六五——四二〇年）的一部四川地方志《华阳国志》首次记载了四川人民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况，并指出其经济效益很受重视。十七世纪早期明代重要科学技术文献《天工开物》，对火井煮盐有更详细的记述。

上述石油、天然气利用、开发的历史事实，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创造力。但是近百年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下，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工业却停滞不前。解放后，我国石油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我国迅速甩掉了石油落后的帽子，从一个“贫油国”变为一个石油自给国，而且在石油的开采和加工技术方面都有所创造。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国的石油、天然气事业发展前途将更加灿烂美好。

（一九七六年第一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供稿）

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

席泽宗

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当代科学家们最感兴趣的是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天象记录。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北宋时期的公元一〇五四年，我国记录到天关星附近，有一颗本来看不见的星忽然辉煌灿烂起来；过了一年零十个月又不见了，现在许多外国人都把这颗星叫作“中国新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欧美天文学家们根据中国和日本的记录，对这颗新星做了新的详细研究，得出结论说，它是规模更大的超新星的爆发。在这颗超新星爆发的位置上，现在遗留下了一个蟹状星云。一九六八年在蟹状星云的中心，又发现了一个规则的快速旋转的脉冲体，这个脉冲体可能就是恒星演化到晚期的中子星，为当今高能天体物理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因而，宋代天文学家的观察对全世界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超新星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现在公认的银河系内的超新星只有四颗，除上述那颗以外，其余三颗分别出现在公元一〇〇六年、一五七二年和一六〇四年。我国是唯一对这四颗超新星都拥有记录的国家。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甚至认为，中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以前的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已有关于超新星的记载。

自殷商时代起到二十世纪初的清末为止，我国记录了日食一六〇〇多次，月食一一〇〇多次，月掩行星二〇〇多次。利用这些

记录可以研究地球自转变慢的速率和万有引力常数是否在渐小的问题；前者对于地震的研究有一定的联系，后者则与宇宙学有关。

现在，全世界的天文学家正在忙于迎接哈雷彗星的到来。哈雷彗星每七十六年回到太阳附近一次，下一次过近日点的时间是在一九八六年二月九日，那时它最为明亮。哈雷彗星上一次经过近日点是在一九一〇年，从此一直上溯到公元前二四〇年，共出现二十九次，而中国又是每一次都拥有记录的唯一的国家。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不但勤于观测，而且精于观测。公元一六一〇年伽利略把望远镜指向天空，发现了太阳的黑子和木星的卫星，这是任何一本天文学史中都要大书特书的事。但是在伽利略以前二千年，我国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七五 — 前二二一）的甘德就记载了木星“有小赤星附于其侧”；在伽利略以前一千六百年，《汉书·五行志》中就记录了黑子，而且从此以后，史不绝书，至伽利略时已经纪录了一百多次。

除了对这些奇异天象进行监视，予以观测和记录外，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更多的工作则是用仪器进行天体位置的测量，据以编制历书。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〇 — 前四七六年）我国的历法已经相当准确。战国时，我国已普遍采用四分历，即取一年的长度为 $365\frac{1}{4}$ 日，这比罗马人采用儒略历早约三六〇年。宋代的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的长度，这和现今世界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完全一样，但比格里高利颁行（公元一五八二年）早三八三年。明代邢运路于公元一六〇八年测得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190日，已经准确到十万分之一日了。

要取得这样精密的数据，当然非用仪器不可。回归年的长度可以用圭表和漏壶得到。表是直立的柱子，圭是一支南北平放的尺，用来量度在太阳光照射中表影的长度。河南登封现存有一巨型测景台，是元朝（公元一二七一 — 一三六八年）按照圭表原理建造的。同样的一个设施也建立在元大都（今北京）的太史院里。元代

的太史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机构，占地一一二〇〇多平方米，有一座高十七米的天文台，台上安装有郭守敬设计的、由传统的浑仪改进而来的简仪，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

用浑仪测出恒星的坐标值以后，把它用文字叙述，就是星表；绘在图上，就是星图；绘在圆球的表面上就是浑象（天球仪）。我国在战国时期已有包括一百二十一颗星的所谓“石氏星经”，这比希腊人约早六十年。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敦煌星图的画法已和现在的方法一样；而宋代（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的苏州石刻天文图，更是以星数多、位置准闻名于世。汉代张衡利用水力推动齿轮系，齿轮带动浑象绕轴均匀地旋转，一天刚好旋转一周。这样，人坐在屋子里看着浑象，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哪颗星在什么位置上，其巧妙程度在当时也远远居于世界的前面。

（一九八三年第十一期，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气候的变迁

沈文雄

差不多在一个世纪以前，我国就有人注意到了历史时期气候的变化。但是真正有系统的科学研究，还是在最近二十年。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生前主持了这项研究工作。我国科学研究人员根据丰富的历史文献中有关气象、物候的记载，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了我国五千年来气候的变迁。

研究证明：在距今三千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于现在的长江流域，为温暖时期。在西安附近半坡村遗址（约五千年以前）和河南殷墟（约公元前一四〇〇——前一一〇〇年，地址在今河南安阳）发掘的材料中，说明当时在这里生活着水牛、竹鼠、獏等热带和亚热带动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有象的记载，种植水稻的季节也较现在提前一个月，年平均温度约比现在高2°C左右，一月份的平均温度高3°—5C°。

自那时以后，气温曾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最低温度分别出现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殷末周初）、公元四〇〇年（六朝）、公元一二〇〇年（南宋）和公元一七〇〇年（清初）间，年平均温度摆动的范围为1°—2°C；，而在每四百到八百年的期间里，又有五十到一百年周期的小循环，温度摆动的范围是0.5°—1°C。

大约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到公元一四〇〇年，气候多变，被称为寒暖交错时期。周初（公元前一〇六六年开始）气候温暖。在出

土的刻在铜制器物上的文字中，记载衣、帽、器皿、工具等名称，都以象形的竹字为头，说明当时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着竹子。这种温暖时期，持续时间不长，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就出现了短期的寒冷。发源于陕西南部的汉江，在公元前九〇三年和前八九七年两次结冰就是证明。从春秋（公元前七七〇——前四七五年）开始到秦汉（公元前二二一——公元二二〇年）时代，我国又处于温暖时期，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亚热带作物的分布范围较现在更向北方。

东汉末年（公元二二〇年）以后，气候又逐渐转寒。公元五三三——五四四年成书的《齐民要术》，是一部总结六朝以前农业生产知识的著作，书中记录黄河以北桃花开、枣树生叶的时间，都比现在迟十五至三十天。隋唐（公元五八一——九〇七年）期间，气候又一度变暖，国都长安（今西安市）可以种植柑桔。到了十一世纪以后，气候又变剧寒，不仅长安一带柑桔全部冻死，而且出现了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全部结冰，可以通行车辆。

根据六百多种地方志记载鄱阳湖、洞庭湖、汉江和淮河结冰的资料，可以断定我国黄河流域较为温暖的冬季是：公元一五五〇——一六〇〇年和一七二〇——一八二〇年；寒冷的冬季是：一四七〇——一五二〇年、一六二〇——一七二〇年和一八四〇——一八八〇年。其中十七世纪最冷，十九世纪次之。

研究的结果还指出：这种气候的变迁是全世界性的。气候变冷时似乎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移到西欧；温度回升则自西向东。最近几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气候异常，有些人不顾气候的这种变化规律，对一个时期的气候“异常”，表现惊慌，甚至扬言“气候的良好时期已经过去，世界将面临一场灾难”。而根据我国科学研究的结果，指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气候异常，只是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继续。

我国历史时期的气候，虽然不时变迁，但从未发展到灾难性

的地步。相反，在和自然的斗争中，中国人民逐步提高了改造自然的能力。据记载，在最近五百年间，地球上曾出现过三次相当寒冷的阶段即所谓小冰期。在小冰期内，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2°C左右。我国在小冰期内，长江流域的太湖、洞庭湖、汉江有时曾经冻结。以上海为例，那时的温度，冬季(十二月至二月)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3°C，最低温度达零下 11°—12°C。一九六七年上海的冬天，就出现过接近小冰期的气候，但上海郊区农民，采取了种种措施，仍然获得了农业的大丰收。

（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中国的穆斯林

李华英

中国和穆斯林各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伊斯兰教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伊斯兰教的黎明时期，穆罕默德为了鼓励广大穆斯林寻求知识，曾有“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训示，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伊斯兰教广泛传播之后，穆斯林建立了西濒大西洋，东至中国边陲的大食帝国，当时中国正处在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的繁荣昌盛时期。这两个东、西毗邻的大国，在后来长达六百年的历史中，一向友好相处、不断加强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人类文明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公元六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奉穆罕默德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之命，前来中国的第一个阿拉伯使者到达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他会见了唐朝皇帝，并介绍了大食帝国的情况和伊斯兰教教义。史学家们以此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从此，两国的友好交往，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日趋频繁。据史书记载，在唐代，被派到中国的阿拉伯使者共三十七次；宋时（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被派到中国的阿拉伯使者，有四十九次。由唐及宋，前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更是络绎不绝。他们不仅携带香料、药材、琥珀、珍珠等等而来；满载丝绸、瓷器、茶叶等等而归，而且还把中国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

和火药制造术传到欧洲，后来又把阿拉伯的医学、数学、天文学介绍到中国。

在这些经商的穆斯林中，有不少人在中国久居不去，同中国人发生了亲缘关系，逐渐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是中国最早的穆斯林。公元八四八年，穆斯林李彦升还考取了唐朝的进士。随着中国的广州、泉州、杭州等地被辟为国际商埠，宋时前来中国的穆斯林，人数远比唐时要多，他们的影响也比唐时要大。这时，不仅清真寺和穆斯林公墓的建立已见于记载，而且穆斯林蒲寿庚、蒲寿晟兄弟还担任了宋朝的官职。

十三世纪，蒙古人征服中亚、西亚各民族之后，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等被迫随蒙古军队进入中国。他们便开始了“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生活，并随蒙古人军政力量所及驻戎中国各地。后来，这些被迫从戎的穆斯林有的被委以军政要职，如赛典赤瞻思丁；有的经商、掌教；而大部分则是就地屯田务农，并与当地居民通婚。这就是穆斯林遍及中国各地的原因所在。元代（公元一二七一——一三六八年）定居中国的穆斯林比唐宋时留居中国的穆斯林更多。虽然他们之中有多种民族成份，但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在中国逐步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在十四世纪，不少穆斯林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中的穆斯林将领英勇善战，为明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明初历代皇帝都曾下谕要保护伊斯兰教，并在各地敕建清真寺以表彰他们的功绩。明代，穆斯林中有不少名人，如航海家郑和，在公元一四〇五——一四三三年间，曾七次出海，访问过三十五个亚非国家，其船队规模远远超过当时西方的船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又如，中国历史上的清官、回族穆斯林海瑞，在其任官期间，伸张正义，执法不阿。作为历史人物，后人用各种剧目把他搬上舞台。他的

事迹至今仍受人们称诵。

除了与汉族历史、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回族穆斯林之外，在我国新疆、甘肃、青海等地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撒拉、东乡和保安等各族人民先后也信奉伊斯兰教。这样，伊斯兰教在中国就成了十个少数民族所信仰的宗教。

中国穆斯林不仅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有不少历史人物，就是在学术方面也人才辈出。比较著名的有十一世纪七十年代叙事诗《福乐智慧》作者、维吾尔族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发明七种天文仪器的天文学家札马鲁丁，通晓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的学者瞻思；元代著名诗人萨都拉；规划元朝大都（今北京）宫阙的建筑学家亦黑达尔丁，等等。

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穆斯林中还出现了许多对《古兰经》、圣训、教法学、伊斯兰哲学造诣精湛的学者，他们的译著甚多。其中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复初被誉为“四大学者”。近代的谢赫·王静斋、谢赫·马良骏、谢赫·庞士谦以及一九七八年去世的哈吉·马坚教授，对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也颇有贡献。

中国穆斯林具有反抗民族压迫和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十八世纪以来，回、维吾尔、哈萨克、撒拉、东乡等各族穆斯林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西北两次回民大起义和穆斯林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汉、彝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规模最大，有力地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广大穆斯林积极参加抗战，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被誉为铁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各族穆斯林也不甘人后，他们对祖国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后，中国穆斯林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在我国各级权力机构中都有穆斯林的代表。根据宪法规定，在包括信仰伊斯兰教各族人民在内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分别建立了自治区、自治

州和自治县。穆斯林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历史上多数穆斯林处于文盲状态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由于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广大穆斯林的信仰受到尊重。伊斯兰教的传统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政府均规定为假日，并为穆斯林群众过好这两个节日准备必需的物品。一九五三年，中国穆斯林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国穆斯兰教协会。然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国的宗教政策也像其他政策一样遭到践踏。当时许多清真寺被关闭，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受到干涉。

粉碎“四人帮”以后，政府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根本政策。为确保宪法的实施，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现在各地的清真寺已陆续开放。穆斯林聚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放的清真寺已达一千九百多座。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穆斯林和各国穆斯林的友好往来日趋频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除经常接待各国穆斯林友好使者外，去年以来还多次组织穆斯林使者出国访问，增进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友谊。中断多年的中国朝觐团也已恢复。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有一千三百多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四分之一。他们和我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也生动反映了中国人民和穆斯林各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一九八〇第一期）

中日友谊，源远流长

古　进

今天，我们翻阅中国的史书，就知道：东汉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日本九州北部的一个国王曾派遣使节来到东汉的首都洛阳，受到友好的接待。汉光武帝刘秀曾赠日本国王一颗金印。公元一七八四年（日本天明四年），日本福　县志贺岛的一位农民在田野里挖出了这颗金印。这是中日两国通使的最早见证。但从日本出土的自制的铜铎、古镜等文物的造型看来，在这之前，两国人民可能早有交往了。

在古代，中日之间的交往，有的经过朝鲜半岛走陆路；有的坐船从海上航行。七世纪到九世纪，中日两国海上交往频繁。日本先后派过十三次“遣唐使”到中国唐代首都长安(今西安市)，还有四次是派使臣护送唐朝的使臣回中国。随同日本使节来中国的有留学生和僧人，水手和工匠等。每次人数，少的约二百人，多的达五百人以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惊涛骇浪，历尽海上漂流的艰苦，对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经济交流作出了贡献。

当时到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例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十七岁来到中国读书，在中国工作了三十多年,后来担任了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和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等是好朋友。他回国途中，遇风暴，漂流到越南。当时传说他在大海中遇难，李白写了《哭晁卿衡》

一诗哀悼他，表达了老朋友之间的深挚情谊。后来，阿陪仲麻吕辗转跋涉，回到长安。六十九岁时在中国逝世。

和阿倍仲麻吕客死在友邦一样，唐代扬州的鉴真和尚是在日本古都平城京(今奈良市)度过他一生的最后十年的。日本僧人邀请他前往日本。他在十一年间曾五次努力东渡，都没有成功。第五次因遇暴风漂流到海南岛，历尽艰辛，又折回扬州。当他双目失明之后，以六十七岁的高龄，于公元七五三年又一次东渡，终于如愿到达友邦日本。他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还带去了寺庙建筑、中国医药等方面的人才。他们在平城京建筑了宏伟的唐招提寺。这个标志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建筑物，一直保存到现在。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交流也是密切而悠久的。从七世纪以来，直到近代，两国之间友好的贸易关系基本上一直延续下来。以宋朝（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为例，中国输到日本去的，主要有药材、香料、瓷器、文具、丝织品等。日本输入中国的，主要有硫磺、木材、砂金、刀、扇、漆器等。日本的刀和扇，尤为中国人喜爱。十世纪末，日本的“聚头扇”传到中国，便在中国广泛流行。这是中国人民至今普遍使用的折扇的来源。同样，今天日本人民饮茶的风气，是十二世纪以后，中国茶种在日本广为种植的结果。

日本古代曾使用汉文作为表达和记录思想感情的工具。后来利用汉字或汉字的一部分作为音符，来表示日本语言的声音，逐渐形成现在流行的两套“假名”（字母）。这是日本人民的伟大创造。长期以来，用汉字构制的一些词汇，在两国之间互相交流。在日本语言中，有许多中国词汇，如“宇宙”、“世界”、“矛盾”、“实践”、“天文”、“地理”、“音乐”等。在中国文字中，也有许多日本词汇，如“哲学”、“主义”、“进化”、“归纳”、“立场”、“干部”、“手续”等。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改变祖国的命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以后，积极学习西方国家，取得成效。求进步的中国人便向日本学习。二十世纪初，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最多时，达到一万人左右。伟大的中国革命作家鲁迅，青年时代就到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开始从事文学活动。西方的各种科学著作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通过日本文译本转译到中国来。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公元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曾在日本组织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他的革命活动得到了许多日本朋友的同情和支持。

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很大的祸害。但是，中日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结成的深厚友谊是破坏不了的。中国人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把广大日本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对日本人民遭受的战争祸害怀着深厚的同情。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尽管中日两国间的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但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却一直没有断过，而且日益获得发展。日本各阶层人民和友好人士，包括政界、文化界、经济界许多有识之士，不断为促进日中友好而积极努力，作出了贡献。有的朋友，如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为了日中友好事业，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会见前来访问的日本朋友，并赠送题词。周总理等也经常会见日本朋友。两国青年进行联欢，工人农民交流经验，贸易界互通有无，文艺团体互作友好访问，球队进行友谊比赛……所有这些活动，为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七二年秋天，日本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中国访问。毛主席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

大臣、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两国总理和外长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外交关系。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交往历史，中日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深信，中日友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中日两国伟大的人民一定能够排除各种障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一九七三年第五期）

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王庆余

在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之后约三百年，又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人来到了中国，他就是十六世纪末叶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过贡献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利玛窦一五五二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契拉塔城，原名玛太奥·利奇。他自幼勤奋好学，十九岁加入天主教耶稣会，以后进入罗马学院深造。他追随博学的格拉维斯神父，学习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成绩卓著。

一五八二年，利玛窦受耶稣会派遣，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传教，先到广东的澳门、肇庆、韶州（现在的韶关）居住，后又北上到南昌、南京等地，其间也曾到过北京。为了便于在中国居住和与中国朋友交往，他据根西文名字的发音，取汉名“利玛窦”，别号“西泰”。一六〇一年，利玛窦第二次赴京入贡，并留居北京。

利玛窦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科技知识，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他与不少中国士大夫结下深厚的友谊。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后来官居礼部尚书的徐光启，就是利玛窦的学生和朋友。他们合译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名著《几何原本》，对西方平面几何知识在我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另一位著名学者李之

藻也是利玛窦的学生和助手,他们合译的《同文算指》一书，是介绍到我国的第一部欧洲笔算著作。西方数学知识的传入，使沉寂一时的我国古典数学领域又呈现出复兴的局面。

利玛窦在华期间刊刻的《万国舆图》，综合反映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他把地球仪带入中国，还把经纬度的理论介绍到中国。他实地测得我国东部一些城市的经纬度，开创了中国制图学的新阶段。

除数学、地理、天文外，利玛窦在介绍西方机械、火器、建筑、水利等众多科技领域，均有所建树。他来华时所携带的西方"奇物"，如自鸣钟、铜版画、铁弦琴、洋装书、三棱镜、玻璃器皿、葡萄酒、天鹅绒等，使不少中国人士耳目一新。

利玛窦不仅把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同时也把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介绍给西方。他来华后，首先苦学汉语，很快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在中国老师指导下,读过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他曾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利玛窦在南京参观北极阁观星台时，赞美元代以青铜铸成的天文仪器，制作精美，装饰华丽，非欧洲所能匹敌。在山东临清，利玛窦应邀观看精彩的杂技表演，他评论：不管在欧洲，还是在以杂技闻名的印度，从来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卓越表演。此外，富丽堂皇的明皇宫、工程浩大的南北大运河、巧夺天工的工艺品，这一切都使利玛窦赞叹不已。在他写的《中国札记》和寄给欧洲的书信中，向遥远的西方展现出一幅绚丽多彩的中国画卷。

利玛窦遗留下来的中文译著甚为丰富。除七、八种科学著作外，尚有《西国记法》、《交友论》、《二十五言》等。他所撰写的神学著作《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力图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揉合在一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在晚年撰写的《耶稣会入华记》（又名《中国札记》），除了记录天主教耶稣会传入中国的历史外，也记述了他三十来年在中国的见闻，介

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地理、历史等方面的情况。利玛窦逝世后，耶稣会士金尼阁将该稿整理后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刊印后在欧洲曾风靡一时。这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第一部系统的研究中国的专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一六一〇年五月，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整整二十八年。明朝皇帝根据一些大臣的请求，特赐葬于京郊。到现在将近四百年过去了，“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依然挺立在北京阜成门外车公庄的墓地上，成为中意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又一历史见证。

（一九八二年第七期）

柬埔寨纪行

持松法师

从飞机上向柬埔寨王国的首都金边望下去，银色的湄公河蜿蜒流过，金碧辉煌的佛塔布满市区。当我们驱车向市内进发时，公路两旁的奇花异草都扑面迎来，使人感到如入众香国里，目不暇给。

我们是应邀去参加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大典的。在半个月作客期间，我国谒见了国王、王后、西哈努克亲王、摩诃尼该派和达磨如特派僧王、还见到很多文武大臣、社会硕彦和大德高僧。主人们对我们异常热情。西哈努克亲王担心我们过不惯热带生活，接连几天要王宫的厨师为我们做素菜，派他的副官给我们送来，并且还专请华侨为我们做中国菜饭。摩诃尼该派僧王见到我们时常常讲一两句中国潮州方言，表示亲切。临别时，他还带病做芒果汁招待我们。柬埔寨王国国家最高议会副主席和佛教会主席桑年大臣曾经到过我国，这次和我们算是旧友重逢了。他常常和我们谈起北京风物，表示十分怀念。临走时他托我们带回了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的信件。这次大会期间他曾削发为僧，临时出家七天。按照柬埔寨风俗，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要出家一次。

柬埔寨的风光是十分美丽的。我们曾去朝拜的吴哥，不仅是佛教圣地，也是世界知名的艺术宝藏。那里的殿宇楼台、龛窟塔庙，全都用巨大石块砌成，不用一根树材、一颗铁钉，非常庄严。

栋梁柱础和门额间的浮雕图案极其细致玲珑，佛像和天神像都姿态活跃，栩栩如生，表现出柬埔寨人民惊人的创作毅力和湛深的智慧。

柬埔寨朋友都很关心我国佛教的情况。他们听到我们为了纪念佛陀涅槃拓印了封存一千多年的房山石经，编纂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刊印佛教画册等都很高兴。

中柬两国佛教徒友好关系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一千四百多年前，扶南（即今柬埔寨）的高僧僧伽婆罗法师等就先后来到我国，翻译了不少经典，这次我们曾带去他们译的佛经十种送给大会和西哈努克佛教大学院。达磨如特派僧王也表示要把他们从巴利文翻译为高棉文的藏经送给我国。我们带着柬埔寨人民的友谊归来时，正是百花盛开的季节。我们都衷心祷祝中柬两国友谊的花朵四时不谢、冬夏长青。

（一九五七年第九期，作者当时为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

阿富汗纪行

林 林

我们到达阿富汗王国，正是石榴已经结子、红夹竹桃花簇灿烂的季节。

当我们的飞机在兴都库什山脉上空飞过的时候，山顶的积雪在映着太阳发射银光。两千年前，中阿两国就是通过这片大雪山进行接触、建立友谊的，两国的先辈曾经经过这里带回许多有益的东西。

阿富汗人民富有爱国主义传统，民间流传着许多热爱祖国、崇拜英雄的歌曲。有一首歌这样写道：

要是我的朋友
　光荣地为国捐躯，
我将用自己的头发
　为他缝做一件尸衣。

现在，纪念独立战争的无名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首都喀布尔。英国殖民主义者残酷地侵略过阿富汗。阿富汗人民曾经前仆后继地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抗英战争，终于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取得了独立。阿富汗的国旗是由浓烈的黑、红、绿三个颜色组成的，据说黑色象征苦难，红色象征争取独立的斗争，绿色象征繁荣和幸福。

在我们访问期间，达乌德首相和纳依姆副首相接见了我们，

并且同我们亲切地谈了话。阿富汗王国政府坚持和平中立政策，奉行万隆会议精神，对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所做的努力，值得赞扬。

我们参观了赫尔曼德河水利工程、航空中心坎大哈以及公元前三四百年希腊亚力山大帝建立的赫拉特，觉得阿富汗王国政府重视经济建设，特别是水利和纺织业。为了改变人民群众中文盲比例较大的情况，政府对发展教育工作也十分注意，每年支出一笔很大的经费。阿富汗有普什图和波斯两种国语；普什图语是广大群众的通用语，政府设立了普什图语学院，并且出版了普什图语民间诗歌。

阿富汗的文化是古老而出色的。据说，在中国三国时，阿富汗地区曾经有人到中国来制造琉璃。现在，阿富汗的琉璃制作业还保持着它的优良传统。在赫拉特一所大清真寺里，墙壁上嵌着的琉璃，色彩华丽，图案优美，令人赞赏不已。在喀布尔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公元二世纪时的琉璃，还看到了古代中国的漆器。

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回国了，还记得阿富汗王国教育副大臣阿纳斯博士的一番谈话。他说，有位学者曾经写道：古时候，阿富汗有希腊的工艺家，也有中国的工艺家；当时国王安排宫殿两边的布置，一边归中国工艺家设计，一边归希腊工艺家设计；中国工艺家这一边画了许多画，希腊工艺家那一边安置了许多镜子，结果中国的绘画完全反映在希腊的镜子里面了。这是多么饶有兴趣的友好的谈话啊！

（一九五九年第十七期）

摩洛哥之旅

韩北屏

没有去摩洛哥之前，已经听到很多人夸说她的美丽；到了摩洛哥之后，感到确是名不虚传。

摩洛哥气候宜人，既不酷热也无严寒，植物茂盛，四季都有香花水果。它西临大西洋，北靠地中海，蓝湛湛的海水，围绕着半数以上的国境线。站在大西洋岸边看落日，景色极为壮丽；站在地中海岸边听涛声，远眺海那边迷蒙的欧洲，又是一番情趣。到内地去，在阿特拉斯山麓，透过椰枣林遥望皑皑雪峰，景象庄严肃穆；在白杨林中，一边喝着薄荷茶，一边欣赏牧人的轻歌曼舞，那迷人的东方情调，使你仿佛走进《天方夜谭》所描述的境界。

摩洛哥的公路两旁尽是树林和草地，树林有果树林、软木林和松林，车过处，一阵阵桔花香；草地上，黄色的、紫色的以及别的颜色的野花，有的交织在一起，有的自成一片，美丽得简值像阿拉伯的毯子一样。

首都拉巴特和商业城市卡萨布兰卡，是沿海地区的两大城市。拉巴特有二十万人口，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国王哈桑二世和他的政府均在这里。王宫在市内，泥土垒砌的宫墙，宫门口站着穿红色上衣的卫士，很有古风。但是，拉巴特的商业区和大部分住宅却是现代化的。市内那条著名的穆罕默德五世大街，宽敞整

洁。街上，书店和书摊特别多，街边，咖啡座触目皆是。法国影响在这里还残存着，巴黎的报纸当天可到，法语比较流行。但摩洛哥政府正努力发扬民族文化，推广民族语言，在群众扫盲教育中，用的也是阿拉伯语。

卡萨布兰卡是个商港，原来有一百万人口，近年来因为欧洲人离去，稍稍减少了些。这个商港和世界许多商港有联系。和欧洲的关系似乎更深。我在那里的旅馆的房间内，看到介绍直布罗陀、马德里和巴黎旅馆的广告。卡萨布兰卡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摩洛哥有这样一个大城市，足以自豪。但是，在这个城市的郊外，有一处庞大的美军基地，摩洛哥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几经交涉，将于一九六三年收回这处地方。

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是新兴的现代都市，而保存着光荣传统与辉煌文化古迹的城市，则是内地的非斯和马拉喀什。

非斯这个古城至今已有一千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城市建筑在两个小山之间的峡谷里，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最热闹的市场，顺着山坡迤逦而下，市中心恰恰在最低处。街上时有骑驴而过的旅行者和商贩。城内有一座最古老的大学——卡罗因大学。它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建筑极为精致漂亮。非斯曾是摩洛哥历史上有名的都城，过去土耳其人几乎征服了阿拉伯世界，但非斯却是个例外。法国殖民主义者一直到一九一二年才攻陷了它，他们为了切断摩洛哥人的历史联系，将首都强迫迁往拉巴特。

马拉喀什在摩洛哥的西南内陆，阿特拉斯山是它的屏障。它建于十一世纪。这里著名的建筑是“黄金清真寺”和王室陵寝。陵寝中埋葬着许多朝代的国王和王后。国王墓地上盖有豪华的屋宇，屋内的柱子和墙壁全用大理石，雕刻精细。据说，这些大理石产于意大利，是当年用一斤糖抵一斤大理石的昂贵代价交换来的。

摩洛哥离开中国很遥远，可是，我在摩洛哥旅行时，却感觉

到很亲切。

摩洛哥的民族形式建筑，自然是阿拉伯风格；但是，我却在某些建筑中看到熟悉的东西，比如：麦克纳斯古宫的“夹道”，简直和北京故宫的相类似；又如麦克纳斯博物馆内一个庭院，有一座木窗棂的小屋，极象中国园林中的“花厅”。摩洛哥人爱喝中国龙井茶，这种习惯也和我们的相同。在历史上，中摩两国有过友好来往。我在博物馆中看到中国的陶器，那是三百多年前传到摩洛哥去的。上述的一切，当然使我感到亲切。但摩洛哥朋友的谦虚诚恳、热情好客，使我更难忘记。

（一九六二年第九期）

今日赞比亚

蔡尚雄

从飞机上往下看，赞比亚的大地像被绿茸茸的地毯覆盖着，美丽、富饶。赞比西河向东流去，哺育着两岸的人民。奔腾咆哮的维多利亚瀑布一泄千里，象征着赞比亚人民刚毅、倔强的性格。

赞比亚是世界主要产铜国之一。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了著名的铜矿——铜带省的恩昌加露天矿和炼铜厂。在炼铜厂里，只见金色的铜液，象一条条火龙在翻滚，铸成的铜锭堆积如山。

这里矿山绵延起伏。在我们脚下，就是世界著名的"铜带"。据说，在遥远的过去，这里原来是一片大海，因为海底火山爆发，海水把含铜的岩山冲刷出来，扩散到许多地方，经过漫长的岁月，海水退去，逐渐形成一条宽六十五公里，长二百二十多公里的铜带，蕴藏着将近九亿吨铜。赞比亚人民的祖先，早在数千年前向大自然作斗争中，就懂得了开采和炼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十八世纪中叶，殖民主义者闯入这个地区，开始了血腥的掠夺，他们用皮鞭和刀枪迫使这里的人民为他们采掘铜矿。

英勇的赞比亚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的统治和掠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赞比亚的国土上升起了独立自由的旗帜。

独立后，赞比亚人民，一再挫败了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

和白人种族主义势力的侵略、颠复和封锁，胜利地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独立后第五年，卡翁达总统宣布取消外国垄断资本在赞比亚经营铜矿的“永久开采权”，由赞比亚政府接管恩昌加和罗昂两个铜矿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一九七三年又宣布成立铜的销售公司，任命赞比亚人为铜矿公司经理，进一步管理和控制铜矿工业。

民族独立激发了赞比亚人民的劳动热情。中国新闻代表团在访问中，到处见到赞比亚人民劳动着，学习着，显示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为发展民族工业，进行不懈的斗争。

赞比亚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优越的自然条件，维多利亚瀑布蕴藏着巨大的水利资源。赞比西河为沿岸土地带来了天然肥料。赞比亚政府提出“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要求逐步改变农村面貌。当我们走访农村时，看到田野里玉米结实丰硕，棉桃累累，山坡上种着茶树和各种果树，农村市场上水果蔬菜种类很多。

在短短的十七天里，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了五个省、十四个城镇，处处感到中赞两国人民的友谊深入人心。我们遇到过载歌载舞欢迎中国客人的群众场面，也遇到过不少人用感人的语言表达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当我们来到奇希岛时，岛上的男女老少，穿着艳丽的新装，做了可口的抓饭，摘下了鲜美的香蕉来款待客人。临别时，村长牵来了一头肥壮的绵羊，久久地握着我们的手，情深意长地说：“中国兄弟，我们接待来自远方的中国友好使者，这是第一次。我们奇希岛的渔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美好的一天！请接受这头活羊作为纪念，以表达我们最真挚的心意。”送活羊是赞比亚人民对最尊敬、最信任的朋友的一种传统礼遇。我们永远珍惜这种礼遇。

我们还忘怀不了炼铜炉旁一边挥汗生产，一边向我们热情招呼的工人，也忘怀不了从园顶茅屋里飞奔出来向我们友好致意的妇女和儿童。当我们想起这些热情友好的面孔，我们眼前就浮现

出赞比亚国旗上的展翅飞翔的雄鹰，它象征着赞比亚人民将战胜艰难险阻，胜利地前进。

（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塞内加尔散记

钱　浩

在阳光灿烂、气候宜人的季节，中国新闻代表团到塞内加尔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在这美丽的国土上，我们到处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大陆西部，濒临大西洋，海岸线长达五百公里。首都达喀尔建立在绿角突入大西洋的顶端，是非洲大陆距拉丁美洲最近的一个地方，来往于欧、亚、拉丁美洲的船只多在这里停泊加油，一些西非国家的进出口物资也多在这里转运，达喀尔港口是中、西非最大的海港。

达喀尔海港始建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过去它是殖民主义者掠夺和侵略非洲的一个重要海口。塞内加尔独立后，收回了海港主权，由塞内加尔人任海港总局局长。站在海港高处眺望，大西洋烟波浩渺，水天无际，港口南北两大堤劈波斩浪，伸入海中，堤内形成水面宽阔的优良港湾。据海港负责人介绍，港内水深十一米以上，十万吨位以下的船只都能进港，四十多艘远洋轮可以同时靠岸。我们看到塞内加尔职工正在达喀尔港熟练地操纵着各种机械，为管理好这个著名的海港而忙碌地工作。

距达喀尔三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有一个叫戈雷岛的小岛。

从十五世纪开始，殖民主义者沿大西洋南下，就占领了这个小岛，作为掠夺西非财富，从事奴隶买卖的据点（当时，他们不敢

在大陆上驻扎，现在海滩上废弃着当年殖民主义者的大炮，岛上还有一个奴隶堡。

奴隶堡是二层建筑，楼上是奴隶贩子的住处，楼下有十多间囚禁奴隶的黑屋。一间六·二五平方米的房间，要关押十到十五个黑奴，奴隶手脚都加镣铐。奴隶被卖后，不再叫原来的名字；有的全家沦为奴隶，男、女、孩子都分开，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奴隶堡后门紧靠大西洋，奴隶从后门上船，被送往美洲，从此一去不复返。据介绍，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经这里被掳走的奴隶约二千万，在转运途中死亡的六百万。这血淋淋的惨痛历史，永远揭露着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教育着塞内加尔和非洲人民。

塞内加尔人民经过长期斗争，于一九六〇年获得了独立。近几年来，塞内加尔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就。政府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并强调发展农业，把发展农、牧渔业作为“民族独立的坚实基础。过去，由于殖民当局强迫居民种植花生，花生的种植面积约占耕地百分之五十，粮食不能自给。近几年来，塞内加尔正在努力改变单一生产花生的情况，扩大耕地，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加强科学研究，增加粮食产量。当我们沿着塞内加尔河在北方地区参观时，看到引河水灌溉的达卡纳水利工程和尼昂加排灌站正在兴建，新修的渠道划破沉睡的大地。萨瓦尼农场三年前还是一片荒野，如今已开发了一万公顷土地，引水种稻，稻熟谷黄，农民正在开镰收割。盖德农业区正在逐步扩大，中国稻种“珍珠矮”在这里种植，已取得了良好成果。在疏密相间的灌木林和绿色草地上，出没着成群牛羊。

塞内加尔沿海鱼产丰富。为了保护民族资源，制止超级大国掠夺海洋资源，塞内加尔政府宣布把领海范围以外的一百一十浬海域规定为捕鱼区，对违法进入捕鱼区的外国渔轮给予惩罚。

塞内加尔人民正在沿着独立自主的道路前进。

（一九七五年第十期）

兰

司马文森

有人喜菊，有人喜梅，有人独喜兰。

平时在家里种几枝鲜花，放两盆观赏的花，在解放前被当作有钱、有闲人家的特殊享受，而劳动人民是与它无缘的。解放后，观赏花的人大大增加了，每年在全国各地举行的菊花展览，兰花展览，总吸引上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成为一时盛举。每年春节在广州赶“花市”，在北京游厂甸的人，总是拿的拿，捧的捧，把供观赏的花带回家。好像只有花才能烘托出节日的喜气。几声炮竹，几枝笑逐颜开的花儿，才能更好的把春意带了出来。

在各种名花中，我独喜兰。

兰花是我国的特产，在我国的栽培历史约有三千多年。兰的品种很多，经过人工培植的品种有一百二十多种，其中有一些名贵品种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兰花清香淡雅，兰叶别致多姿，也不仅它被古代诗人、画家作为高洁、坚贞的象征。我更喜它香而不艳，出自深山幽谷而不染尘的傲骨。几阵淅沥春雨过后，从窗外飘来阵阵奇香，一看，春兰抽蕊吐艳了，在雨中欢笑。你观赏它，会感到身心有说不出的喜悦。而它从抽蕊吐艳，一直到落花枯萎，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昙花虽好，但仅一现，而兰却青春永驻，生命力强盛得很。

中国人喜兰，外国人也喜兰。

我没有到过日本，听说在那儿，养兰成了一门专门学问；去年我们就有一个兰花代表团应邀去访问，和日本的兰花专家进行经验交流。

我是到过印度尼西亚的，在这横跨赤道上的国家中，我发现他们的人民也特别喜爱兰花。自然他们的兰花品种和我们的不同，他们称为“恩格勒”，我则称之为“热带兰”，热带兰品种达千种以上，色彩丰富，花姿多变，形状奇特，然而艳而不香，而且大都是寄生的。

印度尼西亚人民把热带兰当作体现友谊的象征。当贵宾抵步时，最隆重的欢迎仪式是把玫瑰花瓣和兰花洒在客人身上，而印度尼西亚的妇女们，在迎接贵宾时，也总把兰花簪在发髻上，表示对客人的尊敬。

在印度尼西亚工作和生活了几年后，我又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我又养兰了。每当我看到那生气勃勃的兰花，在抽芽，吐蕊时，就想起在那热情好客的国家中，那些浸满友好情谊的热带兰。

（一九六四年第五期）

竹

谢泗春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这是我国著名诗人苏东坡（公元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年）歌颂竹的名句。在我国，竹是人们最喜爱的植物。它和松、梅一起被尊为“岁寒三友”，象征高洁和坚贞的品质。诗人和画家更经常以竹作为创作题材。

在纸张发明以前，竹是纸的代用品。我们祖先把文字刻在竹简上，用兽皮连缀起来，就成功一册书。匠人们则用竹制成形形色色的工艺品，有的工艺品上面还有编、刻成各种精美的艺术图案。像四川梁山的竹帘、自贡的竹丝扇、浙江黄岩的翻簧雕刻，东阳、嵊县的竹编都是久享盛名的。至于日常家具器皿方面用竹的地方，就如俗语说的“罄竹难书”了。

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到处可以看到苍翠的竹林，农民们也喜欢在住屋前后种上几丛绿竹。用竹来构筑房屋，在我国由来已久。宋代文人王禹偁曾给他的竹屋作了极富诗意的描写，说它“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最近我国科学家研究出在建筑物中用竹筋代替钢筋的方法，效果良好，竹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更加扩大了。

（一九五六年第十二期）

饮茶

黄苗子

当你在辛勤劳作之后，坐下来小作休息，那时茶将是你的良伴。喝一口茶既觉清香可口，并且消除疲劳，俗话说得好："清茶一杯，元气百倍！"

喝茶是我国人传统生活的一部分。几个人坐下来讨论问题，谈天说地，主人殷勤地敬茶一杯，便使得友情洋溢，谈笑风生。

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了茶。公元七八〇年，学者陆羽用几十年的工夫研究茶，写了一本"茶经"，总结了中世纪我国喝茶的经验。从此饮茶的艺术便日益精进。不单茶叶有多种多样，茶具、烹茶的水和烧水的方法也都日新月异。

一般的茶叶可分为不发酵的绿茶，经过发酵的红茶，半发酵的乌龙茶，蒸软后压成的砖茶和用茉莉、珠兰、玫瑰等香花窨制的花熏茶。这些茶又因茶种、产地和制法不同而有无数的名称和品种。一般地说近热带的人喜欢绿茶，近寒带的人喜欢红茶，广东、福建人和华侨喜欢乌龙茶，边疆少数民族爱喝浓烈的砖茶，而北京人则特别爱好花茶。

在古代，我们的茶是煮的，这种茶汁液十分浓涩，需要加盐、香料、薄荷、枣等调味品来中和它。现在我们沏茶都用开水冲泡。泡饮的方法不仅手续简便，更主要的是充分发挥了茶叶本身的色、香、味等特点。我们喝一杯龙井，就感到它翠色可爱、

香气清洌、略带甘涩。喝一杯红茶，那紫红丝绒似的颜色和浓厚甘醇的香味，又给人以迥然不同的感觉。

陆羽认为烧茶的水是“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讲究喝茶的人分辨得出水的味道。现在都市里的人，喝茶都用自来水煮沸冲泡，但在江南农村则仍然采用传统的方法，用杂质较少的雨水或雪水烹茶。这种茶味道纯清，更能显示茶的真味。

在我国，喝茶的工具——杯、壶和茶灶，也有无穷的品色。中国的陶瓷和茶有密切的关系，唐代人歌颂“越窑”（浙江的青瓷）茶器，近代人喜爱宜兴的陶壶。这里面因为茶的品种和冲泡方法不同，茶具又有各种不同的考究。

（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北京鸽

于非闇

天刚破晓，晴朗的天空传来一阵阵琅琅悦耳的鸽哨声。它忽高忽低，时远时近，似乎在预告天气的美好，祝颂人们万事如意。养鸽的人对哨音更感到亲切，他能分辨出这里哪一位同行放出了鸽群。

放鸽是养鸽人最感到兴趣的事，北京的养鸽行家收藏有各种名贵的鸽哨。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养鸽的人把带哨的鸽群放入天空，哨子随着鸽群升降回旋，发出悠扬嘹亮的音响。特别在雨过天晴时，一群白鸽像一颗颗闪亮的银星划过碧空，小哨和主哨奏出强弱缓急的旋律，令人心旷神怡。这时，只消撒出一点饲料，鸽群顿时破空而下，鸽哨便发出像交响乐终了时的强有力的尾音。

鸽子是娇小玲珑、和平近人的。它历来就被人们喜爱。它能尽如人意地和饲养人生活在一起。只要看见你走进院子，它就会依依向人地飞过来和你亲近。养鸽人对自己多年培育出来的新种鸽子，更有一种特别怜爱的感情。

北京的鸽子以品种多样著名，它是荟萃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名种培育成的。我在一九二七年写过一本《都门豢鸽记》，收录了四十九种北京鸽。三十年来，虽然有些品种没有保存下来，但也出现了十几种新品种，像悲铁膀的“雪上梅”、“墨环”和

“乌头”等都是近几年出现的新种。所谓铁膀，就是在白翅膀的大翅两边生着几根黑翎（也有生着几根紫翎的，称为铜膀）。“雪上梅”是全身满白、头顶有一撮黑、紫羽；“墨环”是脖项有一圈黑；“乌头”的头部全是黑色。这样的变种，是要经过好几代的交配才能产生出来的。

近年来我虽不养鸽，但对鸽的爱好并未稍减。最近我去过护国寺和白塔寺，那里的鸽市更热闹了，买鸽的人也更多了。养鸽已成为不少北京人生活中的赏心乐事了。

（一九五七年第二期）

昆虫学家的珍藏——蝴蝶

李传隆

昆虫大多是不好看的，独有蝴蝶天生丽质，是昆虫中的“西施”、“王嫱”。我国诗歌对它的描写很多，民间有恋人梁山伯、祝英台生不同衾，死后化为双蝶的故事。

世界上有多少种蝴蝶

二百多年来，一直有人研究蝴蝶。初步估计，世界上约有一万四千余种，几乎遍布全球；其中半数分布在新大陆（以亚马逊河流域为最多），欧洲有五百五十余种，我国有一千三百余种（云南、海南岛、台湾的种类最多，四川峨嵋山有二百余种）。作者一九四六年到葱岭和帕尔米高原调查时，在拔海五千米的雪线上发现成群的蝴蝶在阳光下觅食、求偶、产卵，可见这小东西的耐寒性很强。

蝴蝶只吸花蜜吗

由于种类不同，蝴蝶的食物也不同，但绝大部分是专食性的：有的只吸花蜜，而且专食某些花蜜，有的嗜食发酵的烂果或蛀树干中渗出的汁液；有的专食人、鸟、兽的粪便；最奇的是有些蝴蝶的幼虫和蚁同居，蚁食蝴蝶幼虫的蜜露，而蝴蝶幼虫吃蚁的幼体，各种蝴蝶都要饮水，稍含咸味的水尤能吸引它们。我们

时常可以看到许多蝴蝶停在潮湿的地方吸水。一九四三年夏天，作者在秦岭曾发现数以万计的粉蝶在一片约一平方米的低湿地面上一起饮水，一个挨一个，没有一点空隙，这是不多见的奇观。

“洲际飞行”和“蝶会”

人们只常见蝴蝶在花间飞舞，而不知有些蝴蝶能远渡重洋，作洲际旅行，旅行队伍可达数十亿只。根据英国威廉斯（C. B. Williams）一九三〇年的统计，世界上已知有二百一十四种蝴蝶作过一千二百三十七次迁飞；他在一九三五年的一个报告中说：一群斑蝶从墨西哥迁飞到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总计飞行了四千公里。我国蝴蝶作长距离迁飞，记载上只有五次，都发生在滇、桂两省；最近一次在一九三三年，当时上海《新闻报》报道：“五月二日正午天阴，云南昆明距市东方四十里之板桥镇，忽有白蝶数千万，漫空蔽野由东面飞来，遍布于该镇之田亩林木及房角墙壁等处……此蝶群休息二小间后，又行起飞……径往西方省城飞去……居民检视田间房角，无一存者……此蝶类纯系白质，大小翅上，各有黑斑一二小点；最奇者其数约有千百余万，并无他种色彩者搀入其中……。”在云南，大理点苍山麓蝴蝶泉有“蝶会”的趣闻，可能是群蝶迁飞途中的一个场面。

（一九五九年第十五期。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教授）

温泉疗养

傅连暲

温泉，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也许很多人已观赏过那奇妙的温泉景象，亲身体验过那别有风味的温泉浴。

我国人民很早就懂得将温泉应用于人类的保健医疗。在古代的《山海经》中便有温泉的记载，一千多年前的《水经注》则载有："大翮山……右出温汤，疗治万病……。"此外，汉代科学家张衡的《温泉赋》，北魏元苌的《温泉颂》，北周庾信的《温汤碑》以及唐太宗的《温泉铭》，都是古代歌颂温泉之作，其中都提及温泉治病的效能。

利用温泉于保健医疗，最通常的方式是温泉浴。温泉对于人体的作用，主要包括物理学与药物学两方面。前者是由于它所具有的温热和浮张力的特性，能帮助活跃人体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皮肤的生理功能。同时，温泉浴对于感觉神经能起镇静止痛作用，缓解肌肉的紧张，因而能帮助消除疲劳，使人体感到舒适。温泉浴的药物学作用则依据各种温泉所含成份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应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可将温泉分为单纯温泉、硫磺温泉、碱泉、碳酸泉、食盐泉、明矾泉以及放射性矿泉等类型。有些温泉的治病效果是比较好的。比如硫磺温泉能治愈疥疮和预防一般寄生虫性皮肤病；此外它对于治疗关节炎亦有所帮助。食盐

温泉能增进新陈代谢，具有镇静镇痛的效能，比较适于关节炎和神经痛的患者。碱泉能帮助除去皮肤表面的皮脂污垢，使皮肤清洁润滑，同时由于它具有加快体表温度放散的性能，所以浴后有凉爽清新之感。至于单纯温泉，由于其中所含各种矿物质极微，作用缓和，对人体的主要作用是活跃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镇静镇痛，消除疲劳，所以适于神经痛、神经衰弱、初期高血压症和关节炎的患者。

我国温泉遍布各地。北京小汤山、广东从化、陕西临潼华清池、云南昆明安宁和重庆南、北温泉等地的温泉，都以水质优良，疗效显著，风景优美而著名于全国。我的家乡福建省长汀县河田亦有硫磺矿泉，当地居民经常在劳动之后沐浴于温泉浴池之中，因此他们极少有患疥疮的。我在少年时代常到河田温泉沐浴，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长征时期，我们行军经过党岭山时，也看到了温泉。山顶上是白皑皑的积雪，山脚下却是热腾腾的温泉，蔚为奇观。

在解放前，我国许多著名的温泉多是被反动统治阶级所霸占，成为他们私人的财产。解放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卫生健康事业高度重视。十多年来，医务工作者对数十处温泉进行了分析研究，探讨它们的治疗效能和适应症状，并先后建立了数十处温泉疗养院，接纳各地劳动人民，国家干部前往疗养。今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必然会建筑更多温泉疗养院。温泉对保障人民的健康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一九六四年第八期。作者原为中华医学会会长）

梅　花

燕　草

在冬末春初，风雪未消，百花沉睡的时候，梅花却含苞吐蕊，冒寒开放，给人们带来春的信息。中国古代许多诗人写下了不少诗篇，来颂扬梅花的这种傲雪凌霜，斗寒吐艳的性格，所谓“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毛主席著名的《咏梅》词。在这里，诗人借梅来比喻革命先驱者的坚贞品质和伟大胸怀，开拓了历代咏梅诗从来未有的崇高意境。

梅花白色的多，也有红如胭脂的红梅，还有浅黄、淡红、微绿的。花开时青香扑鼻。古代诗人描写她的芬香，曾有“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

梅花不仅色香俱美，而且枝干挺拔苍劲，姿态万千。园艺工作者常常精心培植，制成梅花盆景，用小山石加以点缀，宛如一幅画图。

梅花正是由于她的独特的性格，色香俱美的花，奇异多姿的枝干，成为我国人民最喜爱的名花之一。在她生长之地的江南，到处有人培植，江南农村的篱旁屋后，山崖水边，随处可见，往往出现成片的梅林。至于西湖的孤山，太湖的梅园，更是以梅花著称的风景区了。

（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海蜇生活史

戴宝珍

每年秋末，只有一年寿命的海蜇完成繁殖后自然死亡，可是，直至次年六、七月间，幼海蜇才摇曳着美如花束的口腕在海湾中出现。

神秘的海蜇生命怎样发生、发展和繁衍？五十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工作者不断探索之谜，现在已被辽宁海洋水产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揭开。

一九七九年，辽宁水产所通过蓄养亲蜇获得受精卵进行培养，窥见了海蜇生命的全部进程。

原来，海蜇生活史是曲折多变的过程，大多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其庐山真面目的小生命，时而象毛茸茸的小蚕茧（浮浪幼体），时而又似光洁明亮长满触手的玻璃杯（螅状体）；当水温上升到摄氏十五度以上，这螅状体（此时也称横裂体）却象垒筑高楼一样，然后分裂出丛丛菊瓣般的碟状体。此后，又经过不断的演变，九个多月后才显现出它们双亲的模样。

怀卵数十万以至数百万的鱼类，可谓多子多孙。而海蜇的卵是数以亿计的，只有产卵三亿的翻车鲀才能与之相比。有意思的是海蜇的螅状体和横裂体还有数不清的无性繁殖的世代。螅状体从冬至夏不断挪动它附着的位置，每个螅状体移动一次，就产生一个新的螅状体。几天之后，这没有“父亲”也没有性别的新生

命也象它的母体一样，不断孳生新的螅状体。到了夏天，水温达到十八至二十度的条件下，这螅状体忽然一反常态分裂出许多碟状体。当最后一个碟状体离开母体时，这螅状体就只剩一个小小的足盘了。可是不几天，它又象变“魔术”一样，变成新的螅状体，并一代代继续进行无性繁殖。一个螅状体通过无性繁殖，可以变成数以百计的螅状体，产生数不尽的长成幼海蜇的碟状体。海蜇这种以几何级数都无法统计的繁殖后代的本领，是高等动物里少见的。

从受精卵发育成大海蜇，一年一周期。但从只有三毫米克重量的薄如纸片的碟状体到长成十公斤以上的大海蜇，只有二三个月。这样惊人的成长速度，海洋生物里也是罕见的。

海蜇那树根状巨大的口腕，自上至下，布满大大小小的吸口，可以广泛摄取浮游生物。这也许就是它生长速度惊人的原因。

海蜇个大、肉质好，是一种质量最好的大型食用水母。它主要产于我国及日本、朝朝附近海域。我国人民利用海蜇资源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辽宁水产所正在从事增殖海蜇资源的实验，已在十二立方米的水体中，平均每立方米培育出三十多万只早期螅状体，并找到了较理想的饵料，即将在自然海域开展人工放流幼水母的实验研究。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M1NDIyMDBf5pe25Luj55qE6Laz6L+5ICDkurrmsJHnlLvmiqUzNeW5tOaWh+mAiSAgMTk1MC0xOTg1LnppcA==",
"filename_decoded": "13542200_\u65f6\u4ee3\u7684\u8db3\u8ff9 \u4eba\u6c11\u753b\u62a535\u5e74\u6587\u9009 1950-1985.zip",
"filesize": 47439650,
"md5": "07d582890be332d02dc12d5e44ef02c6",
"header_md5": "d62805cb3963b0861575c3f3615a0dca",
"sha1": "1a95d5e87e7e1cdb6e75262343e51e0dbf8cf6f0",
"sha256": "670c05265f6c9044d539e4f410d3163b047814a3016d1be7f5fa150e17906643",
"crc32": 51301723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58907079,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527,
"pdg_main_pages_max": 527,
"total_pages": 541,
"total_pixels": 168365151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